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挑战四小龙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谁来挑战四小龙（代前言）

曾经辉煌的未必永远辉煌，
曾经沉寂的未必不能雄起，
让未来告诉历史！

70年代的亚洲经济，是“四小龙”的时代。大韩民国，汉江边上创奇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速率曾令日本汗颜；宝岛台湾，如日中天般的经济成就令世界感略到了惊愕的味道；弹丸之地的香港以其不斐的经济成就，名噪全球！

80年代，泰、马经济令世人刮目相看。名不见经传的泰王国，创造了30年不败的经济神话；小小的马来西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令美利坚知道了什么是后生可畏。

90年代，南部中国黑马行空。以广东为首的中国经济第一军团，屡掀大跨越、大发展、大赶超的经济狂澜；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已活力勃发，浦东和连云港无疑是龙头上的点睛之笔，她就要一飞冲天了。环渤海经济圈，内依京冀，外通四海，丰富的资源优势，配套的加工生产体系，堪与世界上任何地区媲美；京沪、京九、京广、陇海大动脉，直接把中南海决策送到了神州大地的四面八方；珠江三角洲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示范区；欧亚大陆桥，已把亚洲的中国与欧洲接通，中国的产品也挤进了那些发达的国家。

世纪之交，亚洲地区八仙过海。中亚五国已经露出虎相；西亚列强石油资源殷实，威风八面；第二大国印度决非甘居下游之辈；越南在经历了反思之后已是浪子回头；印度尼西亚早已在窥视“龙”位；泰王国创不败纪录的意念越发坚定；中国大地上的诸多经济增长带皆已具备与小龙单兵较量的实力。缘此，人们才敢断言：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

皇冠轮流戴，明朝到谁家？

日本是曾创造世界经济奇迹的国度，但盛者必衰，这一真理越来越深刻地体现在诸多经济强国身上：苏联解体了，美利坚负债累累，欧共体吵得不可开交……。但无论如何，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本经济发展的趋向告诉人们，既然日本都不是金身，区区“小龙”又算得了什么？！

挑战“四小龙”，我们来！

作者
1996.10.29

谁来挑战四小龙

一 广东：中国经济的核反应堆

广东是中国南部经济的核心，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南部的发展。因而，广东已逐渐有意识地去进行示范性改革和发展。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集群无一不是在借鉴它的发展模式进行着自身的改造。内引外联，正在成为广东发展模式中的主要特色。

“四小龙”在启示着广东

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潮流已从希腊——大西洋——地中海时代转向亚洲、太平洋时代。

史学家阿诺德·托印比预言：说不定21世纪中国文化要占居世界的领先地位。

林肯时期的美国国务卿瓦里安·H·西诺德说过：“太平洋才是控制未来世界命运的大洋。”

二次大战后，日本在60年代迅速崛起；亚洲“四小龙”在70年代脱颖而出；80年代以来，在泰国、马来西亚等取得令人刮目相看成就的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西方学者最先感觉到了“亚太世纪”的来临。

1992年1月19日，一个既普通又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风尘仆仆地来到广东人民中间。

他无限欣喜地看到广东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肯定了广东十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振兴中华是这位伟人一贯追求的目标，他无限深情地说：“中国要发达起来，中国穷了几千年了，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现实都有力地证明：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步伐对于中国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他谆谆告诫广大干部群众“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

欣喜，紧迫感，高瞻远瞩。根据十多年来的经验，一个宏伟蓝图，一个面向“亚太世纪”的伟大命题经过深思熟虑后终于形成了：

广东要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

让我们从“四小龙”的发展轨迹中寻找广东起飞的启示吧。

台湾告诉人们什么

台湾，祖国的宝岛，它位于祖国大陆的东南面，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在这大小80余个岛屿上，居住着2000多万炎黄子孙。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切断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正常联系。在这人为隔绝的四十年里，两岸人民互不了解，在人们的印象中，台湾有林涛云海的阿里山、风光旖旎的日月潭，除了这美丽的自然景色之外，人们对它就知之甚少。

50年代初，台湾还是一个农业省，除了几家制糖厂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而现在，这个大约只有广东三分之一人口、五分之一面积的岛屿，岛内生产总值却是广东的四倍，出口总值是广东的六倍之多，人均生产总值

是广东的十二倍多。

1990年,台湾当地生产总值1628亿美元,人均当地生产总值7997美元,出口总值672亿美元。

现在,台湾的外汇储备已超过日本,名列世界前茅,台湾有20多项出口产品占世界首位,这小小的海岛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台湾经济经历了从内向型到外向型四个发展阶段。

50年代头几年是台湾经济的恢复阶段,这期间实行的“土地改革”,缓和了封建土地关系的矛盾,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到1952年,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

整个50年代是台湾内向型经济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是解决人民的吃穿用基本需要。因此,从发展农业入手,相应地发展轻工业,以替代进口,为了保护岛内工业,实行进口管制和保护关税。1953年至1962年,岛内生产总值年递增6.9%,工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由17.9%提高到27.8%。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到了50年代末,台湾岛内市场已基本饱和,以纺织品和服装等非耐用消费品生产为中心的替代进口工业生产开始过剩,有一半以上的工厂开工不足。面对生产过剩的矛盾,台湾当局及时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力时机,把经济发展迅速转到外向型轨道,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带来了六十年代轻纺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台湾当局实施了“以贸易促进成长,以成长拓展贸易”的政策,奖励投资,拓展国际市场。对工业投资实行租税减免,对外销产品实行退税,改复式汇率为单一汇率,积极引进侨资和外资,设立了亚洲第一个出口加工区——高雄出口加工区。外向型经济带动了台湾整个经济增长。1963年至1972年,岛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1%。外贸出口更是成绩卓然,1972年比1963年增长8倍,出口产品中工业品占80%以上,彻底改变了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传统结构。

天有不测风云,1973年发生了世界石油危机,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台湾经济受到猛烈的冲击。与此同时,许多工资水平比台湾还低的国家和地区也纷纷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使得台湾失去往日的优势。面对这些变化台湾当局采取“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升级”的策略,优先发展“高技术、高资本、高质量”的重化工业,推动第二次进口替代和出口扩张,实现再次飞跃。

8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实施“第三次经济改革”,以“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为基本方针。同时,进入了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策略性工业发展时期。1980年,台湾信息产业的产品出口额只有100万美元,到1987年已达到137亿美元,短短七年增长13700倍。现在,台湾微电脑出口占世界市场的六分之一。最近《亚洲资源电脑产品》的调查显示,在亚洲,台湾的微电脑出口竞争力超过日本而位居第一。

台湾经济发展迅速,与台湾所处的内外环境及所采取的政策有关。

外部援助对台湾经济的起飞起了重要作用。截止1980年底,包括美国“经援”、“军援”各种贷款在内,西方国家倾注在台湾的资本估计达到160亿到200亿美元。台湾一位高级经济官员曾撰文说:如果没有美、日等国的“经济与技术合作”,“台湾经济的发展至少要落后30年”。

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经济高速增长,物价基本稳定。这与台湾当局采取的“稳定中求发展,发展中求稳定”的基本策略以及确立的“农

业——轻工业——重工业——策略性工业”的建设顺序是分不开的。

在当今世界上，谁能把握时代的脉搏，谁就能取得成功。把岛内经济发展与世界市场结合起来，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是台湾能够取得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

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适应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弥补资金不足，吸引外资和侨资，台湾当局于1954年公布了《外国人投资条例》，第二年又颁布了《华侨归台投资条例》。到台湾投资办厂，手续非常简单，效率极高。

自6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先后设置了三个出口加工区，占地183公顷，设厂300多家，吸引侨资外资5亿多美元，雇佣工人近10万人。

当前，台湾经济面临严峻考验，种种政治、经济的原因造成民间投资意愿不高，日本等国际货币维持强势而使台湾大多数企业成本继续攀升，竞争力下降，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美国贸易摩擦加剧，使台湾对外贸易困难殊多，前途未卜。然而，台湾当局正执行一项雄心勃勃的六年建设计划，以刺激经济增长，提高生活素质。

韩国给人的启迪

1988年，耗资30亿美元兴建的气势恢宏的汉城奥运会体育场馆在汉江边上拔地而起。第二十四届奥运会会歌《手拉手》带着韩国人民的骄傲与自豪，飘洋越洲响彻全球。

韩国是“四小龙”中唯一举办过奥运会的，人们由此感受到其背后雄厚的经济实力。

事实上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日等发达国家已经明显感到不安，这位昔日微不足道的小兄弟如今不仅长大了，而且日益成为自己不可等闲视之的竞争对手。在汉城奥运会前约半年，美国前总统里根已批准在奥运会后约半年取消对韩国等“四小龙”的普惠制待遇，接着西欧各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标志着韩国已经从发展中国家进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1968年韩国才能生产电视机。可是今天韩国的某些电子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韩国生产的磁带录像机经美国市场的性能检验，其质量已经超过日本。彩色电视机已接近日本的水平。

1985年，在加拿大市场，韩国轿车的销售数量超过在此行销20多年的日本，同时在美国销售65辆汽车，打破了长期以来由日本车垄断的局面！时隔两年，韩国汽车在美国销售量已达25万辆。目前，韩国的汽车产量已成世界第十一位。

韩国东、南、西三面环海，是东北亚的海上要冲。绵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海湾和天然良港，成了韩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良好条件。

韩国土地狭小，人口稠密，自然资源严重匮乏。一半以上的粮食和五分之四的能源需要进口，工业用石油、原棉、原糖等更是100%需要进口。

1950年，朝鲜半岛燃起的战火，使韩国人民蒙受了一场巨大的灾难：100多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四分之一的固定资产被摧毁。

当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韩国面临的是政局不稳，物资匮乏、市场混乱、物价飞涨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因此，医治战争创伤，安定民生是韩国的当务之急。

韩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将主张学而优则仕儒家学说奉为国教。特别是从 50 年代开始，韩国更是形成了一种普遍重视教育的气氛。据估计，韩国家庭为教育承担了 5/8 的直接费用，这一数字是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两倍。1945 年到 1960 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增长了近 11 倍，文盲率从 78% 下降到 28%。韩国专家认为，从重建人力资本基础这个角度讲，50 年代是韩国发展的转折点。

1953 年至 1961 年是韩国的经济重建时期。其时韩国奉行高关税壁垒，严格的进口限制，以便实行非耐用消费品和水泥等原材料的进口替代战略。由于这一时期国内储蓄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经济重建计划所需要的资金只好仰仗外国援助。1954 年至 1959 年间，韩国从美国等国家得到了经济重建计划七成以上的资金。尽管如此，由于韩国自然资源有限，国内市场狭小，进口替代战略很快就走到尽头。因此，韩国从 1962 年开始选择了外向型发展战略。

实现外向型发展的最重要一步，就是修改贸易政策。1964 年，韩元第一次大幅度贬值，并实行了统一的浮动汇率制度。为鼓励出口，政府对出口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对优先发展的重点出口企业减免所得税、法人税、营业税等，对这些企业的设备和原材料进口免除关税。为了推行“出口第一主义”，1964 年 9 月制定了《出口产品基地开发建设法》，进行了大规模的出口工业区建设，截至 1987 年 6 月，兴建了出口工业区 40 个，进驻企业 3700 余家。

60 年代韩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62 年到 1971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5%。出口年均增长 40%，1971 年突破 10 亿美元大关。

70 年代是韩国重化工业发展时期。1993 年宣布的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对造船、汽车、钢铁、石油化工等工业实行优惠。

为了在有限的国内市场实现必要的规模经济，当局允许少数工业垄断生产，并建立了国家投资基金会，以较低的利率提供资金，以便满足大规模投资的需要。为了给重化工业发展筹集资金，当局减少了对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的支持。

大企业主宰一切经济活动是韩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可以说没有企业集团就没有韩国经济。1982 年企业集团所属的十大综合贸易商社的出口额占了总出口额的 50.4%。

1978 年，美国《幸福》杂志评选美国以外的世界 500 家大企业中，韩国就占了 11 家。韩国的三星公司，截至 1988 年 5 月，已有职工 15 万，系列公司 37 个，在 40 多个国家有 25 个当地法人企业和 90 多家分公司。

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从 1962 年开始，韩国当局制定并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五年计划。政府把领导经济开发作为基本职能，把进出口作为政府活动的重心。

1961 年 7 月成立的“经济企划院”，自 1963 年起就由副总理兼任企划院长官。企划院作为一个“超级部”，不仅负责制定所有的国家长、短期发展计划，而且还直接参与执行这些计划。韩国的“贸易促进委员会”更是由总统亲自主持。

大胆合理地利用外资是韩国取得成功的重要方面。截至 1986 年，韩国共引进外资 756 亿美元。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高达到 53.7%。1983

年，当韩国外债超过 400 亿美元时，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人们为这个世界第四大债务国捏一把冷汗。可是根据韩国官方的《外债白皮书》预测，到九十年代的后半期，韩国将成为债权国。韩国走了一步险棋，然而成功了。

重视科学研究与技术引进是韩国产品能够不断升级的关键。早在 1962 年就成立了技术管理局。

1966 年成立了科学技术研究院，开展基础研究。70 年代进一步增加科技投资，鼓励技术开发，技术引进、消化和创新，并投巨资建立科学城。进入 80 年代，当局明确提出，必须从贸易立国向科技立国转变。

80 年代韩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期。这些调整包括：在经济目标上，由“增长第一”转变为“稳定第一”；在宏观机制上，逐步由“政府主导型”向“民间主导型”过渡等。借以克服发展失衡以及收入分配不均等弊端。

面向 2000 年，韩国计划大力发展半导体、办公自动化设备、光纤通讯和生物化学等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争取到 2000 年使研究开发经费占到 GDP 的 5%，产业结构进一步接近先进工业国，整体经济水平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

香港是这样发光的

香港以“东方明珠”而名噪全球！

1991 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 702 亿美元，人均 12143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在亚洲“四小龙”中名列前茅。

弹丸之地的香港，1990 年港产品出口总值 297 亿美元，是广东的两倍多，加上转口贸易，则是广东的 8 倍。

自 70 年代以来，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出口地区，1990 年连转口在内的服装出口总值为 140 亿美元，占世界成衣出口的 14.5%。

香港玩具出口 1964 年赶上西德，1972 年超过日本，居世界首位，1987 年起，虽被台湾取代而屈居第二位，但若连转口在内的玩具出口总值，香港仍执世界牛耳。

香港启德机场是东南亚地区的空运枢纽。1990 年在香港开办定期航机服务的航空公司已达 43 家。这些航空公司每周大约 870 个定期航班及 240 个不定期航班，飞往世界的 80 个城市。

架空和海底电缆、卫星及陆上无线电系统将香港及世界各地连在一起。香港电话服务遍及全球 200 多个城市。在香港，平均每百人中有 56 部电话，每 8 人中有一个无线电传呼机，每 44 人中有一部无线电话。

香港成为万商云集的繁华都市，经历了一个艰苦的创业过程。

50 年代以前，香港一直是靠转口贸易来维持生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长达 20 年的稳定发展时期，这给香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香港最先发展起来的是纺织制衣，随后塑胶、玩具、小五金等轻工业相继涌现，从此之后，香港加工业获得迅速发展。1959 年，港产品出口值首次超过转口贸易值，在出口贸易总值中，港产品出口值占了近 7 成，至此，香港经济终于完成了从以转口贸易为主到加工工业为主的转变。

60 年代香港加工工业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港英当局及时抓住时机，制定法例，成立香港工业总会和香港科学管理协会，随后又成立了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和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以及三个技术中心，加强对工业发展的指导和推动。

1960年至1970年，工厂从4784家增加到16507家，工人由21.6万增加到54.9万人。港产品出口值1970年达到123.5亿美元，比1960年增长3.3倍。

70年代是香港经济全面高速增长和向现代化、多元化飞跃发展的时期。香港充分利用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提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对外贸易为主导，加工工业为基础，多种经营为特点的国际性大都市。

战后西方各国多盛行凯恩斯主义，而香港一直奉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自由经济运作体系，依靠市场调节发展经济。

新货币主义的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把香港作为“不干预主义最好的例子”，实际上港英当局奉行有其自身特点的积极的不干预主义。即对一般经济活动不加干预，只在必要时予以非常有限的积极干预。

香港缺乏自然资源，不宜发展重工业。因此，香港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大力发展轻纺工业。

香港以中小企业居多，50人以下的小工厂占了工厂总数的九成以上。这些为数众多的小企业适应了国际市场瞬息万变的需要。

香港发达的金融体系和良好的服务，为港产品称雄国际市场、渡过重重难关立下了汗马功劳。

优越的投资环境，是香港经济腾飞的重要方面。

自由政策是吸引外资的关键，香港对外投资没有任何限制，外资企业和本地企业一视同仁。外商来港投资，从签证进港到注册登记没有繁琐的规例，只须按照经营法例登记后即可开业。

香港经济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还由于香港拥有熟练的产业大军和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

大陆尤其是广东对香港的繁荣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港两地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和两地的共同繁荣。中国内地已超过美国而成为香港的最大市场。80年代香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来自对外贸易，而转口贸易增长最快，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火车头，正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香港转口贸易的蓬勃发展。

广东现有一万六千多家“三资企业”，其中90%来自香港，三万多家“三来一补”企业中，绝大部分也来自香港。形成了在港接单，在内地加工“前店后厂”的格局。珠江三角洲丰富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降低了港产品成本，增强了竞争力。而香港的资金、管理经验、市场信息则极大地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粤港间亲密的合作关系促进了两地经济的繁荣。

1984年，中英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前途问题的圆满解决有助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香港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97年香港将回归祖国。可以预见，东方这颗明珠，明天将更加光彩夺目。

新加坡美在何处

新加坡共和国，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北有长堤与马来半岛相连，南扼马六甲海峡东南海口，东邻浩瀚的南中国海，地处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会合点，是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要冲。

新加坡面积 626 平方公里。其最大的岛屿新加坡岛东西长 40.8 公里，南北宽 22.5 公里。用这些数字表示一个国家的幅员大小，可以说是再小不过了。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自豪地说：“小就是美”。

新加坡确实很美。

你看，那争奇斗艳的花卉，那四季常青的树木，那翠绿如茵的草地，每一样都会向你展现其苍翠的新姿和婀娜的芳容；而市区高大雄伟的建筑物，机场起降频繁的国际航班，街上穿着整洁、步履匆匆的行人则赋予这个城市更多的现代都市气息。

新加坡的美远远不止于它给人视觉上的印象。它的迷人之处还在于其人民的信心、勤奋和拼搏精神。1990 年，290 万人民创造了 346 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 11900 美元。对外贸易总额达到 1131 亿美元。

新加坡是世界重要制造中心之一。在这里生产的石油产品、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钟表、成衣等远销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香港、马来西亚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是继东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外汇交易中心。在被称为新加坡橱窗的珊顿大道上，耸立着各国银行和金融机构。其中，仅外资银行就有 130 多家。

优越的地理位置，自由港政策和开放的移民政策促进了新加坡贸易的发展，但这头小龙真正引起世人的瞩目还是最近的事。

1965 年，新加坡独立。这个当时不到 190 万人口，几乎没有矿产资源、工业基础薄弱、农业衰微，连淡水都要依靠进口的蕞尔小岛，到了兴衰存亡的紧要关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声泪俱下地号召全体国民和衷共济，渡过难关。

19 个春秋过去了，到了 1984 年，新加坡克服了新马共同市场解体造成的困难，度过了 1971 年英国撤出军事基地所引起的需求减小和就业危机，完成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经济转轨，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多元化发展。新加坡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商港、第四大金融中心、第三大炼油中心和亚太地区主要船舶修造中心。

新加坡何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人们认为，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是新加坡经济起飞的最重要因素。目前，新加坡制造业的投资八成以上来自外资，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人数超过总就业人数的 50%，而产值的近七成，附加值的六成以上，出口值八成以上都是外资企业提供的。所以有人说，来自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创业家已将 20 年前英国留下的海军基地转变成了工业基地。

新加坡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1989 年美国对全球 48 个国家和地区所作的投资环境评估，新加坡名列第四，仅次于瑞士、日本和西德。同年“国际管理发展机构”及“世界论坛”发表的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评估，新加坡成为 10 个新兴国家和地区中最有竞争力的市场。

新加坡具有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

20多年来，新加坡政局稳定，社会关系协调，从未发生过政治风波。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新加坡政府“大家都是新加坡人”的口号下和平共处，安居乐业。

新加坡一贯奉行自由经济政策，是一个不设城墙的现代城邦。自由利率、自由汇率、工商企业自主经营、商品资金自由进出。在新加坡，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货币兑换商可把任何一国的货币换成另一国货币。

新加坡基础设施完善。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码头，1990年处理了522万个标准集装箱。新加坡政府还在着力建造一个耗资10亿美元的新码头。70年代，当巴那利峇机场还能提供不错的服务时，新加坡政府已经预计到未来的迅速发展，决定移山填海，开辟出670公顷的土地修建樟宜机场。

新加坡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

在新加坡，货物出口只要填一两种表单，平均两天可以出关，外商投资只须经过经济发展局即可办好全部手续，一般当天即可知道是否核准。在海关，穿着整齐的海关关员，每20分钟让一条船过关；建屋发展局平均每四十分钟建成一套四房式公寓；外国人去移民局三个小时就可办好延长签证。一位经济发展局的高级官员说：“我们没有丰饶的土地，没有金矿、不产石油，付不起慢条斯理做事的代价。”

新加坡政府素以廉洁而著称。直属新加坡总理领导的贪污调查局，负责着全部公务员的廉洁。该局铁面无私，成效显著。不管是部长、次长，还是一般公务员，谁贪污受贿，都会受到查处，任何人都“没有特权，没有侥幸”。

新加坡法制健全，执法严明，大到走私贩毒处于绞刑，小到随地吐痰课以罚款，都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有人说罚款使新加坡成了美好的城市；有人故意把人民行动党的缩写PAP解释为PAY AND PAY，大意是除了罚款还是罚款。

李光耀总理认为：人才是成功的关键。

新加坡政府重视基础教育和在职训练。教育公共费1980年增长15.8%，1985年增长了23.3%，1990年更增长30.2%！

“三级分流”制是新加坡初等教育的一大特点。三级分流是在小学三年级结束、小学毕业及初中毕业三个不同时期，依据学生的成绩和身心发育的差别分别进入不同的班级或学校学习。这些班级或学校对学生提出不同要求，树立最适合学生具体兴趣和潜质的培养目标。

新加坡政府认识到，仅仅依靠国内培养人才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不惜用重金招揽世界各地的一流人才。尽管新加坡住房还不能完全满足需求，但政府还是给外来人才留下住房。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一再向他的国民解释说：给这些优秀人才较高的待遇正是为了新加坡民众的利益。目前“新加坡延揽人才服务委员会”等专门机构活跃在人才云集的英美名牌大学里。

在新加坡人看来，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新加坡电脑专家不足，但却发誓要把自己建成世界上信息产品及服务的供应开发大国。

新加坡计划到2030年使人均GDP达到9860美元，这将是美国当时的水平！回想到新加坡过去说到做到的豪气，使你没法不相信他们的理想终究会变成现实。

时代的重托

这里是古代“曲江马坝人”栖息过的地方。

这是一条黄金海岸，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随着丝绸的对外输出，一千多年前的广州便成了“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

这里是英雄的故乡。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这里英雄辈出。三元里人民抗英纪念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这些历史名胜都向你展示出广东人民敢为天下先的革命气概。

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今天的广东，更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土。

广州市环市东路，这里七年之前只是一片平房，现在又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中出现了一座 63 层的国际大厦。

深圳，14 年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镇。1980 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1 亿多元，1992 年竟超过 284 亿！深圳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速度”形象地体现了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巨大优越性。

顺德、南海、中山、东莞四市被称为南粤“四小虎”。改革开放以来，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四项主要指标年均增长速度都在 20% 以上。其中仅顺德市就有产值超亿元的企业 18 家，国优部优名牌产品上百种。

《人民日报》载文说：“这个刚被认可为县级市的地方，竟为 11 亿中国人生产了占总量 1/3 的电饭煲，1/4 的电风扇，1/4 的微波炉，以及相当份额的电冰箱、热水器和燃气灶。”

无数个在竞争中崛起的企业集团，一千多个灿若群星的工业重镇，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广东经济。从 1980 年至 1992 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由 245.7 亿元增加到 2218 亿元，年均增长 13.34%；外贸出口由 21.9 亿美元增加到 180 亿美元，年均增长 19.2%。

过去，流行一种颇为形象的说法：“电话没有单车快”。如今，全省县以上城市电话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大部分市、县开通了程控电话。在大多数珠江三角洲城镇的大街小巷里，电话可直拨世界上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过去，为了温饱，人们“走后门去工厂，找窍门进城市”，偷渡外流成了沿海各级领导最为头疼的老大难问题。如今，珠江三角洲成了极有吸引力的一方热土，仅仅从港澳回到深圳、珠海两市定居的人就有 7 万！

美国《幸福》杂志载文说：“在自邓小平首次打破束缚以来的这 14 年里，中国的整个经济搞得相当不错，珠江三角洲显然更是堪称‘明星演员’。”

战后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是美国的 3 倍，英国的 4 倍。80 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增长速度使日本自愧不如，而现在广东的经济增长已在速度上超过“四小龙”。广东 13 年来的经济增长幅度等于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时期的 18 年。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广东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还是同样的人。过去终日在地里象绣花一样精耕细作还是难得温饱的农民，现在有许多人成长力出色的企业家。

还是这一块三角洲。当这里的农民懂得了现代化农业，懂得了市场经济规律，当由无数辆摩托车组成的铁骑在这里的城乡之间奔驰的时候，这里成了当今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

1973 年 3 月，20 几个年轻人在由旧仓库改造成的车间里，开始用几口旧锅生产穿心莲。就是这些饱经磨难却又不不知什么是艰苦的年轻人，把这个制

药车间变成了今天的白云山企业集团公司。如今的“白云山”已是一个拥有68个分厂和公司、14家境外合资企业，资产和年收入逾10亿的大型企业集团。

有人说，广东靠的是这种拼搏精神。

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尽人皆知的。基本建设的钱从哪里来？“等、靠、要”？不行！广东借鉴了他人的成功经验。用“以路养路，以桥养桥”、“以电养电”的办法去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于是，有了540公里的衡广复线，322公里的三茂铁路。有了1500多座100米以上的桥梁和纵横交错的公路网，有了170多个一、二类口岸，有了沙头角电厂，……

有人说，广东靠的是这种首创精神。

当人们为姓“资”姓“社”的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广东人却一门心思在搞建设，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干，实践证明，广东走的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有人说，广东人靠的是这种务实精神。

这些都对，但显然不止这些，……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邓旋风”被看成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信号。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广东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一股空前的经济建设热潮正在南粤大地兴起。

1992年3月12日，广东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定，接着，又制定了力争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初步构想。

1992年7月23日，省政府全体（扩大）会议结束。各单位、各部门在总结前段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本地区、本部门追赶亚洲“四小龙”的具体实施规划。

1993年1月29日，广东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省政协七届一次会议隆重举行。会议进一步审议并通过了广东力争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整个追“龙”过程将分两步走：从目前到2000年为第一阶段，力争使生产总值达到50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7200元；第二阶段，从2000年到2010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160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000元。使广东的综合指标基本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广东省将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工业建设；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力争2010年三大产业的比例变为5：31：64；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到2010年，力争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深圳、珠海、汕头将建成科技型、综合型和多功能、高层次的现代化特区。

广州将在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同时，成为发达的信息、金融、贸易中心。

地处珠江三角洲的佛山、江门、中山、东莞等八市将建成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技术产业带。

地处粤东的河源、潮州、汕尾、梅州等市以及地处粤西的茂名、阳江、肇庆等市将重点发展大型炼油，乙烯、化肥、钢铁和精细化工工业。

地处粤北山区的韶关，清远两市将发挥能源、矿产，林农产品丰富等优势，加快发展步伐。

惠州大亚湾，广东 90 年代建设的重点。一个以重化工工业为主的工业、农业、商业、旅游服务业综合发展的外向型海滨城市将在这里迅速崛起。

金海岸，金海滩——展示着珠海无限美好的发展前景。

大港口，大工业，大经济——反映出珠海人民多么豪迈！

当你得知那 6000 米长、120 米宽的联岛大堤是在 300 天内建成的时候，你不能不为西区人的干劲和勇气所折服。

一个可建 70 个 1 至 10 万吨级深水泊位、年货物吞吐能力超过 1 亿吨的大港口开始在这里兴建。一个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国际投资的大型工业项目基地正在这里崛起。

广州市南沙，广东 90 年代又一开发重点。一位香港实业家预言：若干年后这里将和今天的香港中环一样繁荣。

汕头，我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1992 年以来，汕头市抓住特区范围扩大的有利时机，积极做好扩大开放工作，创造了四个月内新办“三资”企业 115 家。投资总额近 13 亿的新纪录。

湛江市东海岛，一块待开发的宝地。湛江市决定，用 20 年时间将该岛建设成有国际大港口的冶金、石化、造船、建材等工业基地和国际贸易中转加工区。

侨乡江门市，地处珠江三角洲黄金地带。为了学“虎”赶“龙”，市委市政府树立了包括鹤山纺织总厂在内的 87 家企业为经济建设的排头兵。目前，全市已经形成高新技术开发区、综合开发实验区、市县工业区、工业卫星镇、山区镇全面推进，立体式、全方位的大开放态势。

20 年赶上亚洲“四小龙”、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党中央对广东的信赖，是全国人民的重托，是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朱森林省长表示：“广东六千多万人民一定会迎着困难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一步一步地前进，努力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追赶“四小龙”，广东具有很多有利条件、面临着很多机遇。

中共中央对广东寄予厚望。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田纪云、邹家华、朱镕基等亲临广东视察，给了广东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14 年改革开放使广东具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培养出了一大批勇于开拓的优秀企业家，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及其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等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祖国辽阔的内地是广东的坚强后盾。唇齿相依的澳港是广东发展外向型经济得天独厚的条件。香港、澳门将先后回到祖国的怀抱，港澳的优越条件与大陆资源、技术人才的结合将形成强大的竞争力。

我们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和严峻的挑战。

广东与亚洲“四小龙”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据有关专家估计，广东省 1990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台湾或韩国的 1/3。出口总值不到台湾的 1/6。我们也缺乏附加价值大，技术资金密集程度高的支柱产业。

我们的发展还不平衡，广大山区人民脱贫致富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

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体制尚待建立与完善。

许多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的地区将成为广东不可等闲视之的竞争对手。

广东必须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后起之秀的国家之间的夹缝中搏斗。

目前，20世纪就要结束，“亚太世纪”即将来临。跨世纪的20年对于广东是至关重要的。“付不起慢条斯理做事的代价”的又岂只是过去的新加坡人？今天的广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广东赶“龙”不是梦。六千多万广东人民正在朝着这个跨越世纪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赶龙不是梦

广东力争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根本问题就在于人口控制和经济增长。

1. 广东与亚洲“四小龙”的差距

按官方汇率法（1美元=5.2元人民币）和购买力平价法（1美元=1.25元人民币）计算，广东199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为461和1919美元。

表一显示，1990年广东的人口是香港的10倍之多，接近于其余三条“龙”的人口总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比台湾高3.4个百分点；土地面积是“四小龙”总面积的1.3倍；生产总值并非屈居“四小龙”之后。但人均生产总值与“四小龙”比，差距很大。人口多，增长快，素质低，已成为制约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即使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1990年广东人均生产总值仅占香港的15.8%，占“四小龙”平均数的27.8%。

表一 1990年亚洲“四小龙”与广东人口和主要经济指标之比较

指 标	计量单位	亚洲“四小龙”					广东
		“四小龙” 平 均	香港	新加坡	台湾	韩国	
一、人口	万人	-	580	269	2035	4287	6246
二、人口自然增长率	‰	-	7	11	13.1	9.2	16.5
三、面积	平方公里	-	1068	626	36000	99000	178000
四、国内生产总值	亿美元	-	702	280	1548	2365	1177
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6898	12143	11694	7997	5536	1919
广东为“四小龙”的							
1.官方汇率法	%	6.7	3.8	3.9	5.8	8.3	-
2.购买力平价法	%	27.8	15.8	16.4	24.0	34.7	-

2. 广东与“四小龙”人口与经济增长趋势预测

六、七十年代，“四小龙”经济腾飞，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六十年代为10%，七十年代为9%；而广东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六十年代为4%，七十年代为6.6%，差距不断扩大。八十年代广东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以12.34%的速度突飞猛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上升到10.46%；而“四小龙”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下降7.9%和6.6%（见表二）。

表二 1980 ~ 1990 年亚洲“四小龙”与广东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上年比较的增减百分率） 单位：%

年份	亚洲“四小龙”				广东
	香港	新加坡	台湾	韩国	
1980	10.9	9.7	7.3	- 3.7	16.0
1981	9.4	9.6	5.8	5.9	8.4
1982	3.0	6.9	4.1	7.2	11.3
1983	6.5	8.2	8.7	12.6	6.7
1984	9.5	8.3	11.6	9.3	14.8
1985	- 0.1	- 1.6	5.6	7.0	20.1
1986	11.9	1.8	12.6	12.9	11.3
1987	13.9	9.5	11.9	13.0	17.7
1988	7.9	11.1	7.8	12.4	15.6
1989	2.3	9.2	7.3	6.8	7.0
1990	2.4	8.3	5.0	9.0	11.3

进入九十年代，“四小龙”面临着成本上升、通胀压力增长、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等问题，加之西方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挑战四小龙加强，迫使“四小龙”相应进行结构调整，将本地资本和部分企业向国外（或地区）转移，导致内部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长将呈下降趋势。据国内外有关研究机构预测，未来二十年“四小龙”的人口和经济增长率如表三。到 2010 年，“四小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为 17955 美元，广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否达到目标值？我们分别作了两种测算，结果如表四。

表三 “四小龙”人口和经济增长率预测表

	1991 ~ 2000 年 增长率 (%)			2001 ~ 2010 年 增长率 (%)			2010 年人均 GDP	
	GDP	人口	人均 GDP	GDP	人口	人均 GDP	指数 (5) (1990 年为 100)	余额 (美元)
“四小龙”平均	6.5	1.1	5.3	5.5	1.0	4.5	260.3	17955
其中：台湾	6.0	1.1	4.8	5.0	1.0	4.0	236.5	18099
韩国	7.0	1.05	5.9	6.0	0.95	5.0	289.0	15999

表四 广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测表

预测方法	年份	平均增长率(%)			期末人均 GDP	
		CDP	人口	人均 GDP	指数(%)	金额(美元)
趋势预测法	1991 ~ 2010	12.34	1.699	10.46	731.31	14034
目标预测法	1991 ~ 2010	13.23	1.250	11.83	335.75	17955
其中：第一阶段	1991 ~ 2000	13.00	1.350	11.49	296.86	5697
第二阶段	1991 ~ 2010	13.46	1.150	12.17	315.33	17964

上述测算表明：若按广东 1980 ~ 199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自然向前推进，二十年内难以赶上“四小龙”，届时，将与“四小龙”平均水平相差 21.84%，与第四名的韩国相差 12.28%。若要实现既定目标，首先必须下最大决心将人口增长率降到 12.5% 的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同时将国内生产总值在现有的增速上再提高 0.89 个百分点。只有这样，广东才能实现二十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赶上亚洲“四小龙”的宏伟目标。

3. 对策与措施

第一，加强人口意识教育。力争两、三年内使全省人民意识到控制人口增长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大事，是关系到民族兴衰的大事，同时也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密切相关。

第二，实行并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各市县党政主要领导在任期内连续完成人口控制计划的予以表彰；工作不力造成人口失控者给予黄牌警告，必要时予以免职；对于未完成计划生育任务的集体和违反计划生育的个人，必须按有关法规严肃处理，坚决实行诸如“一票否决权”之类的强制措施。

第三，增加教育经费投资，迅速提高广东人口素质。广东人口科学文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亚洲“四小龙”相比则差距更大。1990 年台湾、南朝鲜人均教育经费投入分别为 382 和 371 美元，而广东仅为 65 元人民币。广东教育经费的投资与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往往不能适应控制人口和发展经济的需要。

力争“九五”期间：(1) 在全省实行市区普及高中教育，郊县普及初中教育，乡村普及小学教育；(2) 稳定高等教育规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增加专科层次教育，加强职工文凭和专业岗位培训教育；(3) 从国内外引进一批高科技人才，迅速改善全省科技人才匮乏的状况。

表五 广东与“四小龙”劳动力就业结构和国内生产总值结构比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0	1980	1990	1970	1980	1990	1970	1980	1990
劳动力就业结构									
香港			1.5			36.4			62.1
新加坡			0.3			49.3			50.4
台湾	36.8	19.5	13.1	28.4	42.4	40.6	34.8	38.1	46.3
韩国	50.3	33.9	18.3	20.3	29.1	27.3	29.4	37.0	54.4
广东省		70.7	52.7		16.9	24.9		12.4	22.4
GDP结构									
香港	2.2	0.9	0.3	36.5	32.0	29.0	61.4	67.2	70.7
新加坡	2.3	1.1	0.3	29.8	38.8	35.9	67.9	60.0	63.8
台湾	16.9	7.9	4.2	35.5	46.0	43.4	47.7	46.1	52.3
韩国	28.0	14.2	8.3	22.4	37.8	45.5	49.6	48.1	46.1
广东省	39.3	33.8	26.1	39.4	41.1	39.9	21.3	25.1	34.0

第四，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利用现有劳动力资源。劳动力在三个产业之间的流动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没有农业一定程度的发展，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就不会大量流向第二产业；没有农业和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第一、二产业的劳动力也就不会大量流向第三产业。同理，没有劳动力在三个产业之间的流动，就没有三个产业的发展。现代人口产业结构使人和物这两个生产因素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得到合理的组合，给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据测算，第三产业劳动力所占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50%以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35%，低收入国家多数接近20%。广东劳动力和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与亚洲“四小龙”比较如表五：

上表资料表明：（1）广东第一产业劳动力构成远远大于第三产业，属于传统人口产业结构；（2）1990年广东第三产业劳动力构成22.4%，只相当于韩国1970年水平，属刚脱离低收入的就业结构；（3）1990年广东第一产业劳动力占52.7%，但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26.1%。不改变目前这种传统的人口产业结构，广东经济很难腾飞。

第五，进一步调整人口城乡结构，加速城市化进程。人口城乡结构，是指总人口在城镇和乡村的分布比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必然会大量流向第二、三产业，传统人口产业结构的现代人口产业结构转变，客观上要求调整人口城乡结构，加速城市化进程。广东四次人口普查人口城乡结构资料，见表六。

表六 广东四次人口普查城乡人口结构 %

时 间	第一次全国 人口普查	第二次全国 人口普查	第三次全国 人口普查	第四次全国 人口普查
指 标	1953年7月1日	1964年7月1日	1982年7月1日	1990年7月1日
市镇人数占总 人口比重%	12.0	18.3	19.3	36.8

表六显示，1953~1982年，广东城镇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极其低下。1982年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广东人口城乡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到1990年，广东城市化水平已达36.8%，高于全国同期27%的平均水平。但是，与现代人口产业结构的要求仍相距甚远。目前，世界人口城市化的平均水平为45%， “四小龙”平均水平已超过80%。

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兴起，必将产生城市劳动力相对缺乏和农村劳动力绝对过剩的矛盾。为此要调整产业结构，“有计划地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向第二、三产业，加速城市化进程。城镇人口比重加大可以相对降低总体出生率。在人口城乡结构调整中，应逐步推行农村独生子女农转非优先的激励政策，这样，既有利于缓解未来城市化所引起的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矛盾，也有利于降低农村人口出生率，使广东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合理比例。

二 珠江三角洲：老鼠吞大象

大象是怕老鼠的，并不是因为老鼠有什么特异功能，而在于它的灵活以及使大象窒息的本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迅速崛起，无疑是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及地方的不懈追求的结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腾飞，为我国沿海特区的发展作出了示范。

珠三角——中国经济发展示范区

珠江三角洲，地处亚热带南部，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文化发达，华侨众多，历来是广东省对外交往频繁的地区，人民群众一直有经商的传统。

广义上的珠江三角，北至清远，西至高要，东至惠州，即所谓“大三角”，在这个大三角内，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 18 市 12 县的经济开发区，总面积为 41596 平方公里，人口 2056 万。目前，这块地方已形成一个城市群，城乡连成一片。按 1993 年底统计，国内生产总值为 2265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1017 元。早在 1990 年，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市人均年收入已超过 800 美元，提前达到小康水平。

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摇篮到珠江三角洲大经济区的建立，给人们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勃勃生机。国外有经济学家预言：珠三角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条“小龙”。

著名经济学家重大林曾经撰文指出：珠江三角洲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摇篮，它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进行了首次成功的实践，它为中国改革开放立下了头一功！

谁都清楚，改革开放之初，珠江三角洲不但与境外的落差相当大，而且在国内的先进经济中也排不上队，在这种劣势之下，靠中央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靠邻近港澳的独特优势和人民群众的勇敢开拓，使这片原先的“南蛮之地”，一跃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区和试验地。

事实上，十多年来，珠江三角洲大胆地排除各种干扰，不怕香港，不怕资本主义，认真吸引和借鉴港澳与海外那些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包括有关市场经济的机制、法规等等，把他们嫁接过来，从而塑造了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机制，其效果是有目共睹，下面几组数字，就很有说服力。

——改革开放前 10 年，广东的经济顶多是个“二流省”，工农业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排在第六位。

——经过 15 年奋战，到 1993 年广东单是乡镇企业总产值、总收入就突破了 2000 亿元，净增值是 724 亿元，超过 1989 年全省乡镇企业总产值收入 683 亿元的水平。于是北京有传媒惊叹：广东净增了一个“1989 年！”

——据 1993 年底统计，珠江三角洲人口为 2056 万，而国内生产总值是 2265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 11017 元，远远高于国内其他经济区域的人均水平。

——改革开放 15 年间，广东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以 12.6% 的速度递增，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 3—4 个百分点，成为国内最具经济活力的省份，在全国一直保持了“大哥大”的地位。

上述几组数字，其主要成绩是来自珠江三角洲，据 1993 年统计，面积占

全省 23.4%，人口占全省 31.2%的珠江三角洲，其国内生产总值却占了全省的 70.2%。因此，珠江三角洲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全省的总体概貌。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珠江三角洲成为广东经济的龙头。1980—1993 年，该地区累计财政收入 433 亿元，利用外资近 100 亿美元，外贸出口 330 亿美元，分别占全省的 30%、34%和 33%。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新机制的建立，该地区工业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1993 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2116 亿元，1980—1993 年，年均递增 26.6%；1993 年乡镇企业总收入达 1324 亿元，占全省同期的五成以上；各市、县乡镇的住宅、交通、通讯、供水、供电等各种生产生活设施，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当内地农村还在缓慢而沉重地酝酿如何由农村向城市化、现代化过渡时，珠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的 15 年，已经发展起星罗棋布的乡镇工业，建立起极具规模效益的现代化大工业。以工业化带动生产力的大步迈进，这就是令全世界都为之瞩目与惊叹的“珠江模式”。

珠江三角洲在这 15 年中，实现了一次工业化的“核爆炸”，从时间坐标上来定位，80 年代是这一“爆炸”的首次冲击波，从空间坐标上来勘测，以广州、深圳、珠海三个中心城市组成的大三角和顺德、东莞、中山、南海四小虎构成的小四方，是“爆炸”的核心点。这一“爆炸”的结果，使珠江三角洲摆脱了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落后生产局面，显示出现代工业文明如浩荡春风，所到之处高楼耸立、街道宽阔，珠江三角洲变成了真正的“金三角”，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区，一个繁华的都会带展现在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进入 90 年代中期，珠江三角洲已经完成了以国民经济工业化为主要内容和标志的经济起飞阶段，现在是转向以城市化、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全面现代化建设的最好时机。在这一阶段，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社会发展将完成由经济规模扩增为主，向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经济、环境、社会、文化与人综合协调发展的转变；社会生产力发展由资金投入和自然资源开发为主导向科技进步为主导的转变；经济体制由过渡型市场经济向成熟规模型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与此相适应，发展也要由谋求短期目标的策略决策型向着着眼于长期发展的战略决策型转变，那么这一地区将会再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优势，迅速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行列。

早在 1991 年秋季，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就发表文章，称赞广东出现了“爆炸性的经济繁荣”，认为华南地区是世界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并且预言，到本世纪末，将会与南欧一样富裕。

华南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正如联合国官员贺尔康一再称赞，“我确信广东将会比‘亚洲四小龙’干得更出色。”因此，国外有经济学家评论珠江三角洲将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条“小龙”！

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率先在省内实现现代化，这是加快“龙头”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带动广大山区和东西两翼腾飞的战略步骤。

事实证明，自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经济增长最快，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二，成为全球投资者的垂青之地。有经济学家说，你只要触摸着珠江三角洲跳动的经济脉搏，就能感悟到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征兆。

处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如何使这一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以带动广大山区和东西两翼梯度发展，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目前，广东的经济发展

状况是，老少边穷地区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如何解决这一尖锐矛盾，帮助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经济？这是广东决策专家学者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有专家学者提出，大致有两种办法可供选择：

——用抑制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来扶持老少边穷地区，这种办法，无疑是削弱珠江三角洲的优势，使该地区既不能更好向前推进，也无力的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快速发展，全省经济实力也深受影响。

——加快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以带动和帮助老少边穷地区。采取这种办法可以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级差效益的存在，珠江三角洲在市场初次分配中具有效率的优势，然后通过政府的再分配，在富裕地区多取，向贫穷地区多予，扶持贫穷地区的发展，使贫穷地区也能尽快赶上经济发达的地区。这是市场分配效率优先，政府再分配兼顾公平的一种办法。这种办法，与邓小平同志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因此，省委、省政府在现阶段提出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率先在省内实现现代化，这是广东 20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抓住了广东经济发展的“牛鼻子”。最近，童大林在畅谈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发展时指出：“广东又摸到了一块石头！”他认为，在头 15 年改革开放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充分把握了机遇，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地“摸着石头过河”，诸如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探索等；现在又适时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战略部署，这是广东在理论和实践上又一次了不起的突破。

省委、省政府决定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实质上是要加快广东经济“龙头”的建设，使珠江三角洲地区在追赶亚洲“四小龙”中，更好地发挥龙头的作用，以保证广东国民经济“中部地区领先，东西两翼齐飞，广大山区崛起”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龙头动，龙身舞。可以预期，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这个龙头的带动下，全省广大山区和东西两翼，都将振雄风，立壮志，各显神通，互相协作，共创辉煌。放眼看，一个实现广东省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又一次涌现在人们的面前。

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是加快华南大城市群形成的最佳途径，到下世纪初，一座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城市群，将矗立在珠江三角洲大地上。

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城市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活动的中心舞台，是生产力最高水平的代表。城市化程度的高低，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1978 年至 1990 年，我国城市由 191 个增至 467 个，增长了 140%；而同期广东的城市只由 10 个增加到 19 个，仅增长了 90%，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比近邻的湖南省还少七个。

跨入 90 年代以后，珠三角的城市化进程才加快了步伐，到 1992 年，全区建制镇已由 80 年代中期的 200 个增加到 393 个，加上原来的大中城市，这一三角洲地区已有城镇 406 个，平均每万平方公里超过 85 个，大大高于全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珠三角城市群的建设所以能够进入快车道，主要是得益于本地区的地利和人员的优势，得益于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使全区的经济节节攀高。1993 年，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达 2265 亿元，1980—1993 年，年均递增 20.8%，高于全省平均增幅六个百分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 1980 年的 500 元增加到 11017 元，远远高于全省 4938 元的平均水平，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珠江三角

洲成为广东经济的龙头，为华南大城市群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1992年以来，经国务院批准，这一地区先后有顺德、南海、番禺、花都、增城、新会、开平、台山、三水、从化等16个县撤县建市，东莞、中山两市则从1988年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

90年代以前，我国已形成了三个城市群：一是沪宁杭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二是辽中城市群，三是京津唐城市群。这三个城市群的形成都用了100年或更长一些的时间，而目前正在崛起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仅用了短短的15年时间便形成了雏型，并以极快的速度向前推进。可以预期，到下世纪初，这里将成为我国最现代化、最有生气的、“一国两制”的特殊城市群，也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目前，珠三角城市群的框架已经架起，整个珠江三角洲，有上千座桥梁凌空飞架，把昔日河网密布的水乡连成一个整体；有数百条高等级公路交错纵横，将密如星斗的新城镇串连在一起，组成了珠江三角洲现代城镇群。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将是多核心，除加强“港—深—穗”主轴的发展外，在轴线交汇处将形成新的发展热点，如南沙、常平、大亚湾、珠海西区及横琴岛等，它将协助推动整个区域的城市化，冲破各种行政界限的束缚，建立等级和分工合理的城镇体系。

进入21世纪，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将超过3000万，加上外来人口接近4000万，城市化将高达63%左右，绝大部分县城都会撤县建市，城市数目可能超过30个。到2010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2000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5000美元，从而进入后工业社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现代经济，实质就是城市经济。城市经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因此，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是加快华南大城市群形成的最佳途径，是促进该地区尽快步入后工业社会的最佳选择，可以预见，到21世纪初一座亚洲最大的城市群，将矗立在珠江三角洲的大地上，一座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城市群，将展现在地球的东方！

在两大经济板块即将撞合的历史时刻，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这对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工程，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随着1997年和1999年即将到来的历史时刻，港澳和珠三角两大经济板块很快就要撞合，这对建立华南大经济圈无疑是增加了强大的“引擎”。

珠三角经济区规划协调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日前指出，过去的15年，珠江三角洲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充分利用靠近港澳的地缘优势，形成三地之间优势互补，劣势互消的合作关系。

港澳地区，尤其是香港，是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它是世界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港澳地区回归之后，将成为我国的特别行政区。作为经济中心，它将会比现在具有更强更大的辐射和扩散功能，其中辐射和扩散最强烈的将会是邻近的珠江三角洲。而与此同时，又将从珠江三角洲吸其辐射和扩散所需的能量。

因此，珠江三角洲与港澳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水平如果差距太大，这种辐射和吸收就难以实现。所以，加快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使之与港澳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经济体制缩小差距，就可以顺利地接受港澳的辐射和吸收，而且能够使自己与港澳联成一体，成为新的国际经济中心。

事实上，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是港澳工商界迈向中国内地广阔市

场的黄金通道，广东对外开放，应该说首先是向国际金融、商业和贸易中心香港开放，打开大门，欢迎香港的资金、技术、信息和管理经验进来，突破封闭的计划经济模式，通过自由度很高的香港这个桥头堡，和国际大市场对接。这种对接，首先表现在香港的资金和广东的资源两大优势的结合上。

近 15 年来，粤港两地的“贸易神经”早已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有美国经济学家说：“珠江三角洲已成为香港的大型加工区”，而香港工商界则把珠江三角洲称之为“超级工程地盘”。据统计显示，如今港商在珠江三角洲和广东其他地区开设的工厂已达 2.5 万多家，雇佣的外省劳工超过 300 万，相当于香港目前制造业工人的六倍。目前，粤港两地的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相互依赖，各得巨益，血肉相连，谁也离不开谁。就像《红楼梦》中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现在，摆在珠江三角洲经济面前的任务是，尽快把本地区建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先进，产业结构优化，社会分工合理，基础设施配套，服务设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城乡融为一体，具有高度文明的大经济区、大部会、城市群，率先在全省实现现代化，在全国成为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基地，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示范区。

把珠江三角洲建成社会主义示范区，其意义是十分重大：1. 可带动广东东西两翼齐飞，促进广大山区崛起；2. 最大限度地缩小与港澳的发展落差，有利于回归后港澳的繁荣稳定；3. 给沿海、沿边和内陆的经济发展树立样板，给国人展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发达示范区；4. 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勃勃生机，显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与当代资本主义较个高低。

珠江三角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广东的发达地区，也是全国的发达地区之一。因此，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广东，而且将影响全国，所以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还要加强与周边省份、地区的合作关系，还要全国的大力支持。

以发达国家水平为目标的珠江三角洲大经济区，在世纪末的大决战将是十分激动人心的一幕，它对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工程，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极其深远的影响！

珠江三角洲应避免成为“三明治经济”的夹层

经济专家董辅仍谈到：最近去韩国作第三次访问，使我联想起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有一些思考。

记得第二次去韩国时（1992 年），我在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获得深刻印象的同时，也使我对韩国经济未来将怎样发展产生了问题。我在访问韩国主持产业政策的部门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想：韩国的经济、产业结构正处于一个转折点，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工资上升、地价上升已经渐渐失去优势，其产品的国外市场逐渐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产品所挤占，这些企业正逐渐向国外转移，其中一部分已转移到中国。近年来，韩国制造的服装、鞋之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量已出现负增长，同时，韩国国家小，科技人员少，基础科学不够强，在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方面不及美国、日本、西欧的发达国家。面临这种形势，韩国的经济将如何发展呢？其产业结构将怎样调整呢？对于我提出的这个问题，那时没有

得到正面的回答，因此，我的问题仍然作为一个问题存留在脑子里。

1995年10月，我第三次去韩国，我又一次向韩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有一位高丽大学的经济学家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确实，韩国面临着我提出的问题。这是“三明治经济”。意思是指，韩国经济像夹在三明治上下两层面包片之间的那层奶酪或火腿。一层是发展中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层是发达国家实力很强的高科技产业。夹在这两层“面包片”之间，韩国经济的出路何在？其产业结构如何调整？

他说，韩国的经济还是有出路的。在他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谈话中，归纳起来，韩国经济的出路如下：

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未放弃，而是使其向高品质的方向发展。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品质为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不及，在世界上仍有市场，而且随着各国人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市场正迅速扩大，不仅如此，这些高品质的产品的价格比低品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高出许多，即使韩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数量减少，其出口金额仍增加。只要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品质保持其领先地位，其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可存在，甚至继续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看法有道理。我们看到，在韩国的市场上，韩国自己生产的服装、鞋等产品，仍然很多很多。由于其品质较高，即使在我国的市场上，韩国的商品仍颇畅销。

在高科技产业方面，韩国提出了“技术立国”的口号，把促进技术进步，发展高科技产业放在突出的地位。政府和技术转让，设立技术服务企业，研究开发现代办公用品等方面给予免税或减税。韩国瞄准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新趋势，集中投入于一些领域，强化科技开发，取得了突破，从而跻身于世界前列。韩国在汽车、多媒体计算机、开发高清晰度电视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堪与世界水平媲美，在世界市场上韩国的一些高新技术产品都具有竞争力。突出的例子是，1994年韩国三星集团在世界上最先开发出256兆动态存储器芯片，连美国日本也未开发出来。韩国的一些大的集团都有强大的技术研究和开发力量，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开发资金。三星集团的科研人员达13000多人，每年投入科研开发的资金占销售额的5—10%。同时，它们十分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仅三星集团每年花在人力培训上的费用就达2.4亿美元。

韩国有一些世界级的大型集团，它们已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足以同世界上其他的大型跨国公司相抗衡。1994年，三星集团的销售额已达610亿美元，居世界大企业的第14位，每年的利润达50—60亿美元。韩国的经济学家说，这些大集团以其规模经济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胜。例如，韩国的现代集团的造船厂规模庞大，能建造百万吨级的大型船舶，其轿车制造厂年产小轿车一百几十万辆。大规模的生产，成本低，是韩国一些高科技产品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保证。我参观过这些工厂，深信其言之不谬。而且也只有这些大型集团才有能力研究和开发高新技术产品。

正是由于以上的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才使得韩国虽面临成为“三明治经济”夹层的威胁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从韩国我想到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开我国改革开放的先河，得我国改革开放的先利，其经济的发展获得了惊人的成就。但珠江三角洲经济朝什么方向发展也引人思考。我想，可能已经到了转折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一带主要是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迅速崛起的。这里利用土地和劳动力价廉的优势，引来了不少海外的投资，特别是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转移到这里。但这里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劳动者的素质也不高，其中有相当多的劳动力或者是由当地或附近的农民直接转移过来的，或者是由内地的农民流入到这里的。这是其先天的不足。

经过 10 多年发展，这里人民富起来了，但工资也高了，土地和房价也高了，与内地相比，这里原有的优势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外迁。仅深圳就空置了近百分之三十的厂房。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前，这里是国防前线，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除广州之外，无论是企业还是学校、科研单位的科技力量都相当薄弱。这些年虽然从内地流入了不少科技人员，但并未形成强大的科技力量。此外，这里的企业大多是规模小的乡镇企业，本身也缺乏独立从事科技开发的人力与财力。

面对这种形势，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有可能成为“三明治经济”的夹层。一方面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方面受到内地正在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的竞争，珠江三角洲产品的内地市场可能逐渐缩减。国际市场则受到内地企业以及附近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产品的竞争，也可能缩减，另一方面在高科技产业方面，由于缺少科技力量又难以同上海、长江三角洲、渤海湾地区和内地的一些科技力量密集的省市竞争。以陕西来说，这个西部省就有高等院校 56 所，各类科研机构 1076 个，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31.5 万人，机械、电子、航工、航天，仪器、能源、纺织等工业都有相当强的实力。像陕西这样的内地省、市随着改革的深化，对外开放的进展，具已有工业基础、科技实力将逐渐发挥作用。在这种形势下，珠江三角洲必须避免出现产业的空洞化，成为“三明治经济”的夹层。或许人们想从发展第三产业找出路，但是，除了少数城市以外，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农业、工业等实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没有坚实的基础的。

参照韩国的做法，珠江三角洲应从以下一些方面入手：

第一，通过收购与兼并，尽快形成一些有经济实力和科技开发实力的大型集团，目前在珠江三角洲已有一些大型集团，但为数不多，而且与国际的大型集团相比，它们还是太小太小。

第二，珠江三角洲生产一些名牌产品的企业应通过收购、兼并、扩建等途径扩大这些产品的生产规模，利用规模经济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取胜。在珠江三角洲，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太多，规模大多很小，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是难以避免的话，那么这种状况再不尽快改变，这些企业将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它们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或者联合起来分工协作，或者合并成一些规模大的企业。

第三，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向广东山区和内地转移的同时，必须有更高层次的企业填补腾出的空间。最好的办法是用产品更新换代的方法，用更高品质的和新的产品去取代转移出去的产品。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发生企业空洞化使蓬勃的经济发生衰退，另一方面可以继续保持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但那已是技术水平更高、产品品质更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珠江三角洲与内地相比应该走在产品更新换代的前头，用更好更新的产品与内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

第四，珠江三角洲应看到自身在科技实力方面的弱势。为发展高科技企

业。必须一方面加强自身的科技实力，另一方面继续用“内引外联”的办法，用与外地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企业协作的办法，引入和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珠江三角洲已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吸引力这样做，一些大企业更应先做起来。

第五，政府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珠江三角洲城镇密集，但大多是中小城市和镇，各个政府所能发挥的作用小。最好是由广东省出面对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作出区域性规划，成立珠江三角洲协作机构，协调各方关系，推动规划的实施。政府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和引进高新技术产品方面，在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陕西省政府最近制定了《“1851”科技经济一体化计划》以全面实施“教育奠基，科技兴陕”战略，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很值得重视的经验。

我对珠江三角洲经济缺乏了解，或者我的看法只是“杞人忧天”，或者珠江三角洲应避免成为“三明治经济”的夹层的问题已经早有人看到了，并已有可行的措施了。我的愿望是：珠江三角洲能继续保持繁荣，继续充满活力，继续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前列。

三 浦东：敢与香港争世界

如何把国家带入 21 世纪？世界各国都在思考着谋划着这个问题。为此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以顺时应势？我们应如何看待上海浦东的开发？

中国为什么要开发浦东

为什么要开发、开放浦东？这是怎么看浦东的首要问题。这里先从一位美国经济专家访问浦东的故事说起。

这位美国经济专家访问浦东新区时，接待人士向其介绍，浦东开发的目标，是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新城，以使上海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请问上海每年的资金流量占世界多少？”这位美国客人提出问题后又说：“美国纽约每年的资金流量占世界的 13.7%，香港占 7.9%，中国占 1% 也不到”。

资金流量的比例多少，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城市等级的依据之一，也是显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标志。因此，进入 21 世纪，中国需要有一个世界级的经济中心城市，这样才能与世界级经济中心城市对话，才能有资格参与国际竞争，为了实施这个目标，作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以使上海尽快建成世界级的经济中心城市。

那么，中国政府为何选择上海作为中国建设世界级中心城市呢？

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在一次演讲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从世界地图上看，有一条由东北向西南倾斜的直线，在这条线上，依次排列着东京、汉城、上海、台北、香港、曼谷、吉隆坡、新加坡，这些城市构成了一条“亚洲经济走廊”，这里是亚洲地区商品、资金交流的重要通道，占世界贸易的 1/3、外汇储备的 1/4，而上海正好处在这条“走廊”的中点，这个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上海成为全国观察世界经济、面向世界的最佳“窗口”。

还有一位专家从上海地理位置与全国关系的角度作了阐述，他说，上海地处沿海，沿江、沿路（铁路、公路），是广东、闽东、山东、辽东、浦东的交汇点；它周边地区的宁波、绍兴、杭州、嘉兴、湖州和苏州、无锡、常州、南京等地，历来就是上海的依托和辐射之地。长江沿岸都市以至重庆的发展，历来依托上海，因此，上海这个优越的龙头地位，形成经济新的增长极，必将带动龙身、龙尾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起飞。

再从上海经济基础来说，除矿产业外，上海各种工业门类基本齐全，早在本世纪 30 年代，上海就是远东最大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建国后，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城市，每年的财政收入占全国的 1/10。上海还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高校有 55 所，科研机构数百家，各种行业人才百余万。

也就是说，上海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基础、人才资源等，决定它有资格建成世界级中心城市。

那么，如何实施这个目标呢？

上海要建成世界级中心城市，仅靠浦西是不够的，要寻找新的天地，而黄浦江对岸的浦东，即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沿江一带属城乡结合部，这么大的一块宝地，在当今地球上是唯一的一块未开垦的黄金之地。浦东成陆已

有 1800 年历史，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在浦东开发东方大港，90 年代改革开放的洪流，使浦东开发渐成事实。开发、开政浦东，邓小平同志是决策的奠基者。他老人家多次视察上海，作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浦东如果像深圳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国际上一些有识之士对浦东开发的意义作了评述。陈香梅女士率美国、韩国以及台湾的企业家组成的访问团考察浦东，她说：“浦东新区是亚洲的明珠和骄傲，也是中国的明天。”美国黑格将军参观浦东后说：“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战略研究家们，已把目光投向了上海浦东这块大地。”

浦东开发是按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功能设置，建设具有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区，使之成为上海“三个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浦东开发是世界级城市综合功能的开发，这是浦东开发高起点、高水平的集中体现。

正在陆家嘴开发建设的上海 CBD（中央商务区）核心地区，是浦东开发高起点、高水平的突出标志。上海要建成世界级中心城市，就需要建立 CBD。因为 CBD 是现代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标志地区，是一个大城市经济、金融、贸易活动的聚核区和制高点。国外一些世界级经济中心城市，其国际性经济活动的功能，正是通过 CBD 地区来显现的。如纽约的曼哈顿、伦敦的道克兰、法国的法兰克福、日本的东京站区、香港的中环区等。

上海的 CBD 建在哪里？经过上海市最高决策人士和专家的高空考察，决定建在浦东两岸沿江区域，浦西在黄浦区外滩这个区域，浦东则在黄浦江东岸沿江的陆家嘴。为什么把 CBD“核心区”建在浦东呢？专家们论证指出，浦西外滩区域城市形态反映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的建筑技术，它适应 21 世纪国际竞争的需要，但又不能推倒重建，只能对楼宇的功能进行改造。因此，浦西外滩区域难以充分释放能量，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天地，与之组合。这个发展新天地，最理想的是浦东对岸的陆家嘴地区，它既是浦西到浦东的主要交通通道，也是东西的“门户”和“汇集地”。从地理位置来说，它是建设上海 CBD 核心区的理想之地。

按照规则，上海 CBD 面积 5 平方公里，由黄浦江东西沿岸两侧所组成，浦西约 2 平方公里，以河南路以东，外滩金融街为主；浦东约 3 平方公里，以小陆家嘴地区为中心。

浦东陆家嘴是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它怎么建设，建成一个什么样子，关系到上海 CBD 的水平、形象、功能。

如何确保这个规划的高起点、高水平、超前性？市府采取中外专家合作编制开发建设规划，并组成国际咨询高级顾问委员会，选择了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四家国际上著名的设计事务所和中国专家，各做一个规划方案，经过领导和专家的评审，最后从五个方案中博采众长，搞了一个综合的深化方案，于 1993 年底经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审核批准。

目前，被人们称之为“中国曼哈顿”的上海 CBD 核心区规模，三分之一的正在实施，有 12 幢金融楼到 1997 年可全部投入使用，率先建设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办公楼——银都大厦今年 5 月已投入使用，人民银行市分行已开始浦东办公。随着其他金融楼的建成，上海金融活动中心必将东移，使这里成为东方“华尔街”。

与东方华尔街相邻建设的 2500 米长的浦东新外滩，样板段早已建成，业已与正式投入使用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相组合，成为浦东新区的两大标志性建筑物。

五年多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已成雏形，国外许多人士参观后说，当今世界再没有比这里开发建设规模更大的地方。有的国际人士说，所有这些，会使国际性大企业感觉到，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不在陆家嘴占一席之地，将成为历史的遗憾。

浦东新区有 9 个开发小区，规划开发面积 100 平方公里。各开发小区的建立，是按照建设世界级中心城市功能设置的，有中国唯一以“金融贸易”命名的陆家嘴开发区，以先进技术制造产业为主的金桥出口加工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区的中国最大的外高桥保税区，还有作为 21 世纪小康型住宅示范区的六里现代生活区、华夏旅游开发区，以及王桥工业开发区和星火综合开发区。经过五年多的开发建设，这些开发小区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浦东百姓所说：“浦东开发高速度，几乎每天都是新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现代化建设形态迅速扩大。如今，步入浦东新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现代化的建设态势。

5000 多个工地正在构筑新城区；从陆家嘴到张杨路，在新建的宽敞道路两侧，有一组组现代化建筑群体正在拔地而起；从相继建成的南浦大桥到杨浦大桥，从新建的龙阳立交、罗山立交、金桥立交到各开发小区，使人们感受到浦东已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重点小区开始进入收获期。作为上海中央商务区组成部分的陆家嘴开发区，已形成了金融贸易的框架，近 100 多个金融商贸大楼正在拔地而起，其中 25 幢高楼竣工或结构封顶；步入国际先进水平的金桥出口加工区，形成通讯、汽车、医药生物、现代家用电器、机电一体化等五大产业基地，正在建设的有 150 多个项目。

——外商抢滩浦东投资不断增长。到今年 8 月，外商投资项目超过 2997 个，协议吸收外资达 82 亿美元。它表明，外商已成为浦东开发的一支生力军。

——经济运行机制有新突破。如今浦东新办企业已增至 2.5 万多家，这些企业一开始就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创建，尽管还有待健全，但由于产权关系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按照市场机制运行，因此企业比较具有活力，经济效益比较好，这就为新区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下了基础。

——上海经济新的增长点。浦东新区经济结构逐步向“三、二、一”目标实施，第三产业突飞猛进，去年比上年增长四成以上；一批替代进口和出口的高科技产业基地正在崛起，现代的空调器、电冰箱、洗衣机、程控电话、传真机和电梯等生产布点已形成规模。

五年多来的实践展示，浦东开发所以起点高、速度快，主要是因为形成了以建设中国世界级中心城市为目标的一系列开发思路，这就是坚持“法规和规划先行”和“金融贸易、基础设施、高科技产业先行”的方针；实行“中华牌”、“世界牌”的战略；推进“东西联动”，以上海浦西为依托开发浦东，以浦东开发为契机，带动浦西发展；以社会开发为出发点，不单纯依靠优惠政策，注重功能开发，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以改革为动力，促进对外开放。过去的五年是为基础开发打下基础，今年是浦东开发第二个五年，进入

了基础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的阶段，浦东开发要建设一个具有世界级经济功能的中心城市，就需要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功能、金融功能、贸易功能的开发，也就是说，要建设贸易中心，仅有商贸大楼，没有人流、物流，也就形成不了中心。贸易功能的开发，还需要金融功能开发同步实施，贸易的发展，加速了资金的流量，这就需要更多的金融机构提供配套服务；贸易的发展，促进生产，那么，经济功能的开发也就需要同步进行。

按照开发的目标，作为上海 CBD “核心”的陆家嘴地区，其功能的实施，至少需要 5000 家国内外大公司总部和国际上 1000 家大银行中的 100 家银行落户，才能使这里成为金融、贸易活动中心。

为实施这个目标，中国政府为今后五年的浦东开发，最近赋予了一系列的功能新政策。有关贸易、金融功能的开发，在浦东试办几家中外合资进出口公司，这是我国几十年来第一次实行的新政策，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全国各地百余家外贸企业纷纷涌到浦东，要求申办子公司；外资金金融机构驻沪办事处纷纷咨询如何在浦东落户的问题；名列世界银行前列的日本富士银行一马当先，成为第一家在浦东开业的外资银行，每年一度的上海华商会，1995 年 10 月 5 日举行，盛况超过任何一年，原安排 200 位海外华商参加，结果增至 300 多人，由于中央给浦东新政策的吸引，海外华商投资浦东的热情大增，两日内签约投资 9 个项目，总投资近 2 亿美元。可以预测，浦东今后五年，将变得更好更美。

中南海与浦东开发

浦东开发开放，是 9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国内外各界人士都把目光投向这里。

5 年多来，浦东每一天都发生着令人惊异的变化。世人从这扇窗口里看到中国日新月异的新景观。

这一切，都缘于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缘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

邓小平全力推动。

1990 年初，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过春节。

他老人家虽然已经退下来了，可他的心歇不下来。十几年来，他亲自倡导设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4 个经济特区，使南方沿海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相比之下，作为我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前进的脚步相对迟缓了。

他自责道：当年搞经济特区没有加上上海，是自己的“一个大失误”。

老人家思考着 90 年代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他把眼光投向了上海，投向了与繁华的浦西一江之隔的那片有着巨大开发潜力的宝地——浦东。

如果把长江比作一条巨龙，那么地处长江口的浦东就是“龙头”。依托上海浦西老区人才、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开发浦东，振兴上海，进而带动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其意义将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老人家和上海的负责同志谈话，对浦东开发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不久，邓小平同志回到了北京。他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几件事，我还要说一下，其中之一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

要多关心。过后邓小平同志又对中央负责同志说：“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邓小平同志的意见，高瞻远瞩，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新上任的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受中央委派迅速赶往上海，实地考察了浦东地区，并很快向中央作了汇报。

几天之后，在中央的关心和支持下，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请求》。

同年3月28日到4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率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再一次到上海，就浦东开发问题作了为期10天的专题研究和论证，形成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4月10日，李鹏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了姚依林关于开发浦东的专题报告，并对开发开放中的若干问题逐个作了研究。

12日，江泽民总书记主持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方案。

14日，李鹏总理视察上海，并在18日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成立5周年庆祝大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他特别强调：“这是我们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这“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事情。中央要给予必要的支持，全国各地也要给予积极的支持，但更主要的是要依靠上海人民的支持和努力。”

李鹏总理还表示，欢迎外国的企业家以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投资参加浦东开发。他说：“我们将为此提供优惠的合作条件和日趋完善的投资环境。”

李鹏总理的声音，通过电波迅速传遍了全世界。从这一天开始，浦东开发开放的帷幕拉开了。上海再一次成为国内外瞩目的热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由此翻开崭新的一页。

次年2月18日，即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邓小平再次来到上海过春节，他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托身旁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旋转餐厅里挂着两张大幅地图，一张是上海地图，另一张是浦东新区地图，地图旁摆着浦东开发的模型。

一切就像当年组织重大战役时的情景一样。邓小平同志看着地图和模型，指挥若定地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国外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到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邓小平对上海的负责同志说：“什么事情总要有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语，使上海市的负责同志都感到心里特别敞亮。他们表示，要抓住机遇，扎实工作，像邓小平同志设计的那样，在浦东描绘最新最美的蓝图。

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南下，巡视了武昌、深圳、珠海，并再次来到上海。一路上，他又多次谈到浦东开发问题。他对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和市长黄菊说，90年代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他还说：“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邓小平还鼓励上海的干部：“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

1993年末，89岁高龄的邓小平又一次来到上海。

这时的上海，正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浦东已经展开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黄浦江上历史性地架起了南浦和杨浦两座宏伟的大桥，其中堪称世界叠合梁斜拉桥之冠的杨浦大桥，是1993年9月20日通车的。邓小平同志已经从电视上看到报道了，非常高兴。这次到上海，他提出要到浦东看一看，到大桥上走一走。12月13日这一天，寒流南下，风力6级，上海气温骤然降至摄氏零度左右，还不时飘着细雨。邓小平同志在吴邦国和黄菊的陪同下，驱车视察了新建成的上海内环线浦东段和浦东罗山路、龙阳路两座立交桥，接着驶上了杨浦大桥。邓小平在桥上下车，迎着寒风，迈步走在高高的杨浦大桥上。他眺望着热气腾腾的浦东，含笑吟道，“喜看今日路，胜读十年书。”他对吴邦国和黄菊说：“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他还握着大桥建设总指挥朱志豪的手说：“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我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

从地方战略构想到国家重大战略决策

请允许我们暂时将时针拨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与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起和国内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地区和城市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相比，上海这座风光了多少年的昔日远东最大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城市已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了。

但是，上海的广大干部群众有一股子劲，他们绝不甘心上海在他们这代人的手中衰落下去。上海是共和国的长子，是共和国经济大厦的支柱。几十年来，上海为国家财政奉献了数千亿元的巨资，今后上海仍要为国家挑重担，仍要为国家作贡献；在全国的经济格局中，仍要担当主角，要走在最前面。聪明的上海人，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不仅有这个决心，也完全有这个能力。

在这个基础上，一个共识正在上海人中逐步形成：上海要重塑中心城市的地位，一定要有大措施，要有大动作，要寻找新的增长点。

不久，一个个方案摆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的案头。有的提出往宝山方向发展，也有的提出往金山方向延伸，但经过反复比较，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东进，即跨过黄浦江，开发浦东，振兴上海。于是，到1984年，在上海市府上报给国务院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中，就首次提出了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区的建议。国务院在批复中也肯定了这一重大构想。但这时的构想，仅仅是从上海的发展来考虑的，还没

有如邓小平 1990 年那样提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决策的高度。

1986 年，开发浦东的构想开始深化。国务院在接到上海市政府提交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后，再次批复道：“当前，特训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要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高教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

为落实国务院的两次批示，1987 年 6 月，上海市政府正式成立了“浦东新区中外联合咨询小组”。这个小组作了为期一年的可行性研究，形成了浦东开发的规划构想。

1988 年 5 月，上海市政府邀请了 100 多名中外专家，在上海举行“开发浦东新区国际研讨会”。当时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和市长朱镕基以及市政府经济顾问汪道涵，与专家学者共商浦东开发大计。江泽民在会上说：“上海是闻名世界的大都市，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解放三十多年来，我们重视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来不及相应地进行城市改造和建设，以至削弱了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对外对内枢纽的功能。这种状况当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江泽民的话，抒发了与会者的共同心愿，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自此之后，上海加快了浦东开发的前期研究工作。

就在这时，邓小平同志对浦东开发发表了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作了重要指示，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等同志也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这些讲话、指示和意见，加快了浦东开发的决策进程。同时，也开阔了上海市领导干部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自觉把浦东开发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局联系起来思考。那些日子，上海的干部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浦东开发要“东西联动”，振兴上海，同时要打“长江牌”，打“中华牌”，要为长江流域的经济和全国的经济服务；开发浦东的起点要高，要面向世界，按国际惯例办事，努力把浦东建成与世界经济的联结点；大胆探索，积极进取，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切按新体制的要求运作；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把浦东建成既是现代化的又是高度文明的新城区……

这些思考，后来都集中到了 1992 年 4 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和 1992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之中。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鹏明确指出：“上海浦东新区是今后十年开放开发的重点。要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开放开发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逐步使上海发展成为远东地区经济、金融、贸易的中心之一。”

在《政治报告》中，江泽民宣布：“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新飞跃。”

这标志着，浦东开发开放从八十年代的上海地方战略构想，已上升为 90 年代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决策。这就为上海的振兴和浦东的腾飞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前景，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深入调研，精心指导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浦东开发开放气势恢宏，进展顺利。

积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十几年建设的经验，浦东开发开放的起点更高，标准更高，要求也更高。从 1990 年起的 5 年为第一步，主要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小区开发步伐；第二个 5 年，即 1996 年到本世纪末为第二步，初步具备全国第一流的市政基础设施，形成全国最大的商务活动中心，初步建成高度开放的金融贸易区和综合性保税区、先进的出口加工基地、现代化的城郊型农业和配套服务条件完备的高质量的生活区；第三步，即到 2010 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和现代化的新区。

为实施这一宏大的跨世纪工程，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在要求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敢想敢于、大胆探索的同时，年年到浦东搞调查研究，与上海的同志一起，分析情况，解决问题，帮助和推进浦东的开发和开放。

在宣布浦东开发后的第二年，即 1991 年，李鹏总理就率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到浦东实地考察。他视察了一些企业建设工地并听取了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的汇报后，谈了许多重要意见。李鹏说，浦东开发是一项长期工作，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八五”期间主要是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前期准备，关键是创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为“九五”期间和下世纪初的迅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开发浦东要充分利用上海现有的基础和各方面的有利条件，以进一步发挥上海经济技术的综合优势和市场发达的优势；浦东新区的目标是外向型、多功能。因此，一起步就要处理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关系；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可以搞一些有市场、有效益的小片开发。

按照李鹏总理的意见，浦东开发区采用招标的方式，请国内外第一流的大师来作浦东新区的规划，又多次召开咨询会议，对各种规划方案进行讨论、分析和比较，然后优中选优，确定最佳方案。在此基础上，报请人大审定，使规划具有“法律效力”。这些年，浦东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得以井然有序地进行，与事先就制定出高水平的规划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1 年 10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也视察了浦东新区。他希望上海广大干部、群众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步伐，把开发浦东、振兴上海这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事办好。

1992 年 1 月和 11 月，江泽民连续两次到上海，都重点考察了浦东新区，逐个听取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和外高桥保税区建设情况的汇报。当了解到浦东开发仅仅两年，首批十大市政重点工程已全面施工，有的已进入竣工阶段，国外客商投资也出现热潮时，总书记说，浦东开发是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出发提出来的。因此一定要集中力量把浦东开发这件大事办好，使这项工作不断跃上新高度。

1993 年 4 月 17 日，浦东开发开放 3 周年之际，李鹏总理再次来到浦东考察。在了解了全面情况，并充分肯定浦东新区“统筹规划，小区启动，滚动开发，扎实前进”的开发方针后，李鹏总理又深入到外高桥保税区调查研究。在这次考察中，李鹏总理着重指出，无论是保税区、浦东新区，还是整个上海的对外开放工作，都应该和国际市场接轨，要按国际规则办事。

时隔 20 多天，江泽民总书记再次来到浦东考察。当时由于中央对全国经济采取了一些宏观调整的政策，外界就有入担心，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政策会不会变，有些境外传媒对此也议论纷纷，颇多猜测。针对这些情况，江泽民总书记在参观了金桥出口加工区的规划模型之后满怀信心地郑重宣布：“中央开发和开放浦东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改变的。”“中央对

上海未来的发展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上海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经济发展上一个更大的台阶奠定坚实的基础诸方面，取得新的成就。”

两天后，朱镕基副总理也相继视察浦东。他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敢于突破，创造出与旧管理体制完全不同的新体制、新格局。同时，把浦东新区的国有土地资源管好、用好，充分发挥级差地租的效益。

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乔石、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也考察了浦东。乔石说，3年来，浦东开发的速度比较快。上海要在90年代把浦东新区的基本轮廓勾画出来，为迎接21世纪更大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浦东在发展中即使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也无妨，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心和政策不会改变。上海的同志要有“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魄，坚定不移地干下去，振兴上海。刘华清说，上海正在出现新的飞跃，正在向高科技、大工业发展，那么多高科技大项目，那么多先进技术的引进，建设好了不仅会对国家经济腾飞起重大作用，也可以进一步鼓舞人们树立起建设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到上海视察和讲话，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很少有过的。它对上海的干部是极大的鼓舞，对浦东的开发建设工作也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对浦东的投资者来说是吃了“定心丸”，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浦东开发的顺利开展。当时浦东新区有外商投资企业1273家，投资额54亿美元。中央政府采取宏观调整措施以来，没有一家外商投资企业终止合作项目。

1994年四、五且间，江泽民、李鹏又相继考察了浦东，了解浦东开发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江泽民指出，4年来，浦东开发有力地推动了上海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李鹏强调，浦东目前正处于开发的建设阶段，因此中央还需要对浦东开发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要保持浦东开发政策的连续性。

不久，中共中央政策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也考察了浦东新区。他指出，上海的改革和建设起点高、发展快、步子稳、势头好。这是因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上海发展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的政策，包括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确实是振兴上海的关键一着。

浦东的开发建设就是这样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精心指导下，扎扎实实地前进着，到1995年4月18日浦东新区“年满5岁”时已今非昔比，250亿元资金的投入，使浦东的路、桥、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面貌一新，2600多个外商投资项目的落户和100多亿美元的外资投入，使浦东不仅成为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增长极，也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送走了第一个5年的浦东，下一个5年怎样加快发展？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一次分别考察了浦东。在下基层、听汇报、和上海干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他们同意浦东新区下一个5年实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功能开发并举的方针，全面出形象、出效益。为此，国务院给予了浦东新区一系列加快功能开发的新政策。这些政策的内容主要有——经外经贸部批准的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年出口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外贸企业、出口额在2000

万美元以上的自营生产企业，可以在浦东新区设立子公司；允许在浦东新区选择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试办 3—4 家中外合资的外贸企业；外高桥保税区内可以开展除零售业务以外的保税性质的商业经营活动，并逐步扩大服务贸易；一旦中央政府同意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将允许首先有浦东试点，进入浦东的个别外资银行将获得优先权；在具备条件以后，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在陆家嘴注册的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在浦西和外高桥保税区内设立分支机构；可以在浦东新区再设若干外资和中外合资保险机构等等。

这些政策一公布，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中外经济界人士都认为，中央给予的功能性政策，为浦东的进一步开发和最终起到带动长江流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腾飞的“龙头”作用，开辟了更为广阔也更有作用的舞台。

一份出色的答卷

1990 年 4 月 18 日至今，共 5 年多的时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浦东来说，这段日子称得上是史诗般辉煌的岁月。在这两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浦东发生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巨变和激变！昨天还被上海人称作“乡下”的地方，一转眼已经呈现出现代化大都市的雏形。宽阔的高等级的公路，高耸的智能化的楼群，无烟囱的、整洁的和静悄悄地进行着生产的高科技园区和进出口加工区，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有“境内关外”之称的保税区，设施先进的新建码头和正在建设之中的国际航空港、国际信息港、轻轨交通网等等，以及一大批勇于探索、大步向现代化迈进的年富力强的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

这一切，无一不吸引着外部世界的关注。4000 多批外宾和 200 多名国际政要和经济界巨头专程来这里考察，生气勃勃的现实使他们看到了这里是当今世界难得的最具潜力的投资沃土。世界排名前 200 位的大型跨国公司中，已有 60 余家在这里落户，3000 多个外商投资项目已在这里生根开花，国内 4000 多个各部委和各省市投资的企业也在这里成长壮大。现代通讯、新一代家电、生物工程产品、汽车及相关工业产品、计算机软件与硬件、机电一体化产品等等，从这里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这一区域内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从 1990 年的 60 亿元猛增到 1995 年的 410 亿元，比上一年净增 120 多亿元。与此同步的是，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人民收入相应增长……

更可贵的是，在取得这些物质成果的同时，浦东建设者们自觉地把浦东新区的开发建设当作学习和实践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课堂，碰到问题就向小平理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请教，获得成功就注意总结归纳，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样，逐步形成了具有理论指导的，在浦东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的一系列思路。

——法规先行的思路。法规是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保持市场秩序的有力武器。依靠法制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5 年多来，通过市人大和市政府，浦东新区先后颁布了 14 项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和法规；在规划管理、土地管理、项目审批、征地吸劳、外来人口管理等方面，出台了 26 个暂行规定和办法，从而确保了开发建设的有序和新区社会的稳定，受到了进区中外企业的普遍欢迎。

——金融贸易、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的思路。这是从小平同志对浦东开发的一系列指示中归纳出来的。这 3 个产业先行，既体现了浦东开发开放的高起点，又有效地防止和避免了浦西老城区在开发建设中的种种“城市病”，同时还保证了浦东新区经济建设的后劲。

——浦东开发与浦西联动、与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联动的思路。这是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的。因此，浦东的建设者在开发浦东的过程中，坚持打“上海牌”、“长江牌”和“中华牌”，坚持“浦东是全国的浦东”的思想，既依托全国，又服务全国。金桥出口加工区是浦东新区国外高新技术产业最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带动上海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最见成效的地方，上海一大批老企业和老产品与在这里落户的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合作后，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浦东已经成为向长江流域地区进行项目、技术、资金和信息辐射的重要“辐射源”。他们还开放市场，提供服务，与兄弟省市共享中央给予浦东新区的各项政策。

——面向世界高起点开发浦东的思想。这是小平同志对浦东的嘱托。由此，浦东开发的规模称得上是世界级开发的规模。浦东的规划也达到了世界高标准水平，浦东开发的资金来自世界各地，浦东开发的智力也来自五大洲四大洋，浦东开发的运作方式已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接轨，浦东经济的发展也已经纳入到世界经济、特别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中作通盘的考虑。正因为这样，浦东引进外资项目，项目的水平和金额，一直名列全国前列。在金桥出口加工区落户的200多个外资项目，平均每个项目投资额为1300万美元，是全国外商投资项目平均金额的10倍。

——城乡一体共同发展的思路。城乡共同发展是小平同志的一贯主张。目前划入开发建设范围的浦东新区522平方公里，绝大部分是农村，到2000年，城市化地区也仅有100平方公里左右。因此，在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中，绝不能把农业、农村和农民撇在一边。5年多来，浦东从总体规划、经济发展、经营管理到组织建设，都根据城乡一体化的原则予以统一安排，在建立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和张江4个功能性小区之后，又组建了孙桥农业开发区，目的就是要在开发浦东的同时，在开发现代化农业方面闯出一条新路。

——浦东开发不仅仅是项目开发、产业开发，而且是社会开发，要争取社会全面进步的思路。这是小平同志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在浦东开发建设中的具体体现。浦东的建设者一开始就十分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社会事业的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强化，注重社会矛盾的研究和化解，从而卓有成效地把握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5年多来，浦东新区在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先后转移和安置了10多万国家征用土地上的农民劳动力，没有发生大的震荡，保持了新区社会的稳定。

——用一流党建带动一流开发的思路。这与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直接的联系。浦东的建设者提出“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为此，他们着重抓了“养成教育”，即在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中养成勤政廉政好习惯。浦东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明确而又严格地设定了“领导干部个人不准直接谈地价、不准参与工程承包、不准为亲属、子女的动迁、安置打招呼”等“三条高压线”，从而有效地防止和成功地减少了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

——重视功能开发和惜土如金的思路。这是按照小平同志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从浦东开发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之所以提出惜土如金，资源的廉价批租和拍卖，决不能以国有土地资产的流失为代价，而是要提高土地的利用价值，其办法是“按规划，带项目，批土地”。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炒卖地皮，圈而不用现象。5年多来，浦东新区4个重点功能开发小区总共完成开发面积15平方公里，就是惜土如金的典型例证。之

所以提出功能开发，是因为浦东新区的道路、桥梁、厂房等形态开发要真正取得成效，没有功能的发挥是不行的。如同体育比赛不能光有场地没有运动员一样。国内外有些开发区曾经出现过的“空楼现象”，时刻提醒他们要加强功能开发。

浦东建设者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答卷。

“九五”规划已经开始。新的5年，是浦东新区进入基础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的重要阶段，是要初步建成“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城区框架的重要阶段。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在上海市委会上具体勾画了浦东新区未来5年的蓝图：

到2000年，要形成60平方公里的新建城区，使城市化地区达到100平方公里；

重点建设好新一轮十大基础设施骨干工程；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要以楼群建筑出形象、出功能为重点，积极引进中外金融机构和商务机构，力争尽快进行区内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试点，试办离岸金融业务，加快培育金融保险市场，形成富有活力的金融贸易区；

外高桥保税区要大力开展国际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保税仓储和出口加工业；

金桥出口加工区重点发展以现代电子通讯设备、新一代家用电器、机电一体化等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加工业；

张江高科技园区重点发展以现代生物与医药、微电子为主的高科技产业，逐步形成高科技产业化发展基地……

浦东的前景是宏伟而又美好的。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上海人民牢记着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嘱托，不断开拓前进。

中南海紧紧连着浦东。浦东，必将以更新的面貌跨入21世纪。

浦东开发使上海大变样

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已经走过了六年不平凡的历程。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浦东开发是面向世界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上海市委、市政府制定的浦东开发开放的十六字指导方针同样包含着面向世界的内容，这就是：“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面向世界的浦东开发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也对世纪之交的亚太与世界经济发展及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推动。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六年中，随着第一轮以交通、能源和通信为主的十大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相继竣工，浦东新区已呈现出现代化新城区的雏形；重点小区滚动开发已产生效益，目前，已有70家国际著名跨国公司投资新区，使浦东新区成为国际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新区经济建设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各类市场兴盛活跃，方兴未艾。所有这些，不仅为“八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划上圆满的句号，而且为“九五”期间实现跨世

纪的新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黄浦江为界，浦西为上海老市区，浦东为上海新区。浦东新区的崛起，使东上海面貌大变样。

综合经济实力跨上新台阶。1994年，浦东新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GDP）412亿元人民币，实现了年初制定的目标，比1993年增长22%，“八五”期间的五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长23%。浦东新区GDP占上海市的比重由1994年的14.8%提高到1995年的16.7%。在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的同时，产业结构更加协调地发展，1995年，浦东新区第三产业在前几年领先高速增长之后，仍保持了20.7%。三产、二产和一产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0.6%、68.6%和0.8%。工业经济迅速壮大，1995年新区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元，达到1077亿元，比1990年时翻了一番多，年均递增20.1%，占上海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0.1%上升到20.5%。

1995年是浦东新区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的一年。全年新区完成工业销售产值1054亿元，产销率达97.8%。工业经济效益总体上有所好转。新区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全年新区完成财政收入39.2亿元，比上年增长62.9%，其中区级财政19.88亿元，增长45.1%，呈现出良性经济增长势态。

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1995年是浦东新区基础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取得卓著成效的一年。首轮十大骨干工程早已提前完成，通讯、道路等建设已取得新的成果，新一轮重大项目正在陆续启动，蓄势待发。全年新区基础建设重点转到生态环境构建以及市政配套工程建设上来。浦川路工程、白莲泾改道以及陆家嘴污水排放工程均告完成。1995年新增电话容量22.5万门，总容量已达55.14万门。1995年全年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达到53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85亿元，比1994年增长11%。“八五”期间浦东新区共完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14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4，占上海市“八五”时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26.4%。

重点小区建设稳步推进。1995年，浦东新区各重点开发小区集中财力，突出功能开发，取得新进展。小区建设初具规模，开始先后进入收获期。全年各重点开发小区完成土地转让69幅，面积达365万平方米，完成国家固定资产投资56.2亿元。新签进区建设项目916项，吸引国内外资金19.9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项目458项，吸引外资13.9亿美元。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作为上海新城区的都市氛围逐渐浓厚，至1995年底已有108幢大楼在建和建成，其中25幢已竣工和交付使用。外高桥保税区在5.5平方公里的封关区域内，国际贸易、出口加工和保税仓储三大功能齐头并进。1995年又有400多家从事国际贸易和转口贸易的外商企业入驻区内，全年保税市场完成交易总额24.96亿元，其中进口贸易4.81亿美元。金桥出口加工区已累计引进项目298家，投产124家，1995年工业企业总产值达123亿元，占新区工业总产值的11.4%。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项目占区内项目总数的5/8以上。今天的金桥已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标准工厂和现代化工业技术的博览区。张江高科技园区今年又有一批高科技项目驻园创业，至1995年底已累计引进项目29个，一个独具特色的生物医药谷正在迅速崛起。王桥、六里、华夏、孙桥以及星火开发小区的建设，也有较大进展，各自纷纷发挥优势，引进一些特大型项目，或调整小区定位，突出自身特色，浦东开发小区的建设正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社会文化建设全面进步。浦东新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也促进了社会

事业的长足进步。1995年新区实事工程全面完成。社会事业项目投资完成2.1亿元，教育卫生事业得到了优先发展。1995年新区教育投入达5.76亿元，占整个新区全年财政支出的15%，比上年增长23.6%。一批重大项目已经动工。新建扩建了一大批学校和医院，建成了有线电视中心、农贸市场等一批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项目。至1995年底，浦东新区已累计竣工住宅建设面积765万平方米，解决了浦西10多万动迁居民的住房问题。社区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敬老、帮困、扶贫工作扎实进行。全年收养孤老846人，扶助380户农村贫困户于当年脱贫。扶贫帮困人数达5万多人，共发放各类帮困补贴1700多万元，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稳定工作。

抓住机遇迎接新的飞跃。“九五”期间，浦东新区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要抓好起步年，开局年。要进一步强化基础开发，大力推进以浦东国际航空港、深水港、信息港为标志的第二轮十大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建设浦东国际机场一期、五号沟集装箱深水港一期、陆家嘴通信信息中心、地铁2号线一期、轻轨PD-A线一期、外环线、白龙港污水排放等工程。1996年浦东新区确定了“十路一桥一管”市政建设任务，主要包括东方路、上川路顾路段、上川路王桥段、金海路、栖霞路、申江路、上南路、浦城路、航津路和外环线浦东段这十条道路工程建设，及浦东南路张家滨桥改建、陆家嘴污水干管工程。这些工程大部分将在今年内竣工通车。由此向世人展现浦东开发迈向21世纪现代化新城区的新形象和持续发展的灿烂前景。

在形态开发上，要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优势兵力抓好陆家嘴地区的“四个一”工程，即：“一区”工程的陆家嘴中心、“一道”工程的滨江大道、“一线”工程的文明景观路线和“一块”工程的菊园小区，以迅速形成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形象。

在功能开发上，以“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和“五加一”的政策和功能定位，增强内外投资者对浦东开发的信心，建设“大工程”、引进“大项目”、培育“大市场”，吸引更多的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带大项目到浦东来投资。同时，浦东新区对项目审批采取“一门式”服务，真正体现在浦东办事的高效率和投资于浦东的整体优势；在小区功能开发上，“九五”期间要抓紧实施为重大项目和重点小区功能开发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为浦东国际机场配套的龙茶大道以及沿黄浦东的滨江大道、轴线大道等，以发挥浦东功能开发的整体效应。要按照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区域发展、分片合作的城市发展思路，搞好黄浦江人行越江隧道、轨道越江工程以及其他东西联动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在新区社会事业的全面开发上，在“九五”期间其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市民素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改善生活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照顾程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到2000年，基本形成具有一流水准的、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社会事业总体格局，建成职教中心等一批标志性教育设施；东方图书馆等标志性大型文体设施；东方医院、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等一批设施。教育优先发展，人口增长得到控制，社会事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社会功能有效发挥。

加强浦东新区社会事业总体格局的调整与建设工作，基本形成现代化的社会事业体系与格局。

浦东开发业的任务是十分光荣而艰巨的，虽然有诸多不利因素，然而浦

东开发前景诱人，希望与困难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浦东新区一定会以一个现代化新城区的崭新形象屹立在黄浦江东岸。

四 大上海：百年孤独听惊涛

上海，被誉为“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那是一种很古老的比喻了。今天，它的经济实力已能与其它世界工业大都市相媲美，它在中国也以 10%的生产力雄居于榜首。它的任何举动都足以使全国震动，也足以使亚洲震动，连德国和日本都以花数百万美元在上海一百橱窗陈列各自的产品作为在东方竞争的手段。这庄中国工业重镇的发展已成为跨世纪的焦点。

再度崛起的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是经济最为发达、商业机会最多的城市，是内地与海外集散商品、融通资金、转移技术的枢纽和桥梁。

上海是国际著名的港口城市，是世界亿吨大港之一。上海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对外经济贸易正在不断扩大。

上海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和协作配套条件，有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有较强的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有较高的经济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上海又是亚大地区的交通枢纽之一，地处中国大陆东海岸线的中部和长江的入海口，周边地区水路成网、路桥相连，有着广阔的不冻港、四通八达的航空港、手段先进的通信港。

本世纪 30 年代，上海是远东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城市。如今，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上海正在重振雄风，再度崛起。进入九十年代，上海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标志表现为：

1. 上海的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台阶

80 年代初，上海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占 21%左右。到 90 年代初，第三产业的比重也不过 30%左右。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三、二、一”产业结构调整的方针，第三产业以年均 12%以上的速度递增，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以每年 2 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上升，到 1995 年底第三产业的比重已提高到 40.1%。其中金融业发展尤为迅速，它的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已到 27%以上。与此同时，上海积极改造传统工业，发展新兴产业。第二产业中，汽车、通信，电站设备、钢铁、石化、家电六大支柱产业已经形成，1995 年其销售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比重 45%以上。就第一产业来说，也正在走出一条特色农业、创汇农业、高效农业的新路。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上海国民经济在有市场、有质量、有效益的基础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992 年至 1995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分别达到 14.8%、14.9%、14.3%、14.1%，年均增速达 14.5%，高于 80 年代增幅 7.4%约 7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同期约 3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近几年来财政收入的增长大大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经济的持续增长使上海城乡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以 1995 年为例，上海职工人均工资性收入达 9242 元，扣除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因素，增长 5.2%，郊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4200 元，扣除商品性支出价格上涨因素，增长 3%。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达 1396.13 亿元，比年初增加 420.88 亿元。同时，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社会帮困措施，使一些困难企业职工和低收入居民的基

本生活得到保障。

2. 上海的城市改造大规模展开

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一直是困扰上海发展的老问题。要改造必须有大量投入。然而，上海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城市建设的投入只有70多亿元；八十年代的投入明显增加，但总共也不到250亿元。进入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后，上海的城市建设大规模展开，平均每年投入超过150亿元。“八五”期间（1991年至1995年）的总投入达850亿元。相继完成了南浦大桥、杨浦大桥、罗山路和龙阳路两座大型立交、杨高路、内环高架和南北高架道路、外滩交通综合治理、合流污水治理工程、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地铁一号线等一批重点项目。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新客站、徐家汇、豫园等重要商业街区也是旧貌换新颜，增添了现代生活气息。新建住宅平均每年近700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达8平方米，煤气普及率达85%，电话主线普及率达14%。上海还通过土地批租等，走出了利用外资改造旧区的新路，使按照原来速度需要100年才能完成的；旧区改造，可望提前在本世纪内基本完成。

3. 上海的改革开放有了突破

进入90年代，上海的改革开放由全国的“后卫”走向了“前沿”。

首先，从浦东开发来看，自1990年4月18日中央宣布浦东开发以来，投资200亿元的十大基础工程已提前完成。目前整个浦东新区正从以基础开发为主转向以功能开发和城区开发为主。体现金融贸易、出口加工、保税区、高科技等功能的四个小区开发面积已达到15平方公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25幢大楼结构封顶，25幢大楼竣工，还有130多幢大楼正在加快建设。金桥出口加工区已投产的46家工业企业，1995年工业总产值达123亿元。外高桥保税区封关运行面积达5.5平方公里。新区经济高速增长，连续四年年均增幅30%左右，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412亿元。

其次，从大市场体系建设来看，近几年来，已建成国家级市场11个，区域性市场17个，各类初级市场580个，初步形成以国家级市场为龙头，区域性市场为骨干，初级市场为基础的市场体系。特别是按规范化、法制化要求建立起来的证券、金融、粮油、外汇等11个现代化市场，1995年交易总额超过5万亿元，表明上海市场已成为全国配置资源的重要中心之一。

第三，从对外开放来看，外贸出口连年增长，年均增幅为14%，大大超过80年代年均2.2%增速，实现了与经济增长同步的目标。利用外资通过拓展新形式、新领域、新途径，总量迅速扩大。1992年全年协议利用外资33.57亿美元，相当前十二年总和；1993年达70.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倍；1994年突破1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1995年又达105.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1%。主要特点：一是大项目多。名列世界前500位的国际跨国公司已有四分之一在上海落户。二是领域宽。过去以加工工业投资为主，现已扩展到能源、金融、贸易、运输、信息等第三产业，其中外资金融机构与代表处已达154家。三是成功率高。目前成功率已达95%以上，已投入运营的三资企业赢利面达80%以上，全国创利创汇“双优”三资企业中上海拥有182家，占全国16.14%，名列第一。上海已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

上海还在企业改革、城市“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体制、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4. 上海的城市文明有了新的进步

上海市委、市政府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党的十四大精神以及市委六届党代会精神。通过“换脑子，转机制，探路子”，在广大干部中大大增强了“抓住最后一次机遇”的拼搏意识、“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龙头”意识和“走向世界，加快接轨”的国际意识。又通过“九十年代上海人形象的大讨论”，在广大市民中形成了勤奋高效、文明礼貌、胸怀开朗、开拓进取的基本共识。开展“百万市民看上海”活动，进一步增加了上海人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在抓软件建设的同时，上海还注重抓精神文明的硬件建设。近几年来，已经建成和正在兴建的文化设施项项有“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广电国际新闻中心、上海图书馆新馆、上海博物馆新馆、青年活动中心、大型体育场等。同时，先后举办了一系列国际电影节、电视节、音乐节和群众文化活动，使上海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与此同时，上海的改革和发展中还出现了许多“第一”：

1990年11月26日，中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

1991年11月19日，上海市区第一座越江大桥——南浦大桥全面建成；

1992年5月，中国大陆第一家国家级的金属期货交易所——上海金属交易所成立；

1993年10月，世界第一斜拉桥——杨浦大桥正式通车；

1993年12月，我国沿海城市第一个特大型的污水治理工程——上海苏州河合流污水治理工程基本建成；

1993年12月，外滩综合改造工程全部完成，形成于本世纪20年代的上海旧外滩第一次得到改造；

1994年1月，中国大陆第一家外汇交易市场——上海外汇交易所成立；

1994年10月，亚洲第一高度电视塔——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基本建成；

1994年12月，上海第一条内环高架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1994年12月，上海第一条地下铁道——地铁1号线全线贯通；

1995年，纵贯上海南北的中心区第一条高架道路——南北高架道路建成通车。

证交所、金交所、外汇市场等的建立，标志着上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越江工程的相继建成，从一个侧面标志着浦东开发进入了新的阶段：高架道路、地铁的通车，标志着上海开埠150多年来平面交通历史的结束和城市立体化交通体系的开始形成；合流污水工程的建成，标志着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已摆到了重要位置；东方明珠电视塔等新的城市景观的建成及摩天大楼群落的形成，标志着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正在崛起。

上海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上海正大步迈向充满希望的21世纪。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是上海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从1992年至1994年的前三年，上海实现了“大变样”；从1995年至1997年的新三年，上海要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大提高；从1998年至2000年再三年，上海要全面实现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大推进。从而，使上海初步形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框架，为下一世纪的腾飞打下基础。

上海的崛起需要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

改革开放 15 年来，我国各地的经济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群的迅速崛起，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长期来，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全国分工合作、互相促进。为实现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的重大战略决策，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将成为上海能否实现崛起的重要条件。

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形成与城市群的发展

综观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成长与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转移有着密切的联系，必须依托于周边腹地的高速发展，并与城市群的发展相共生。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存在是城市群形成的重要标志，而中心城市的形成又不能脱离城市群的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转移，在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巨大的经济增量所产生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对城市化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当城市化的空间蔓延和能量积聚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形成由众多规模不同、相互联系紧密的一大片城市所构成的城市网络体系，即城市带。

19 世纪初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在伦敦地区和英格兰中部地区隆起了大片城市群；随着欧洲大陆的兴起，出现了大巴黎地区、莱茵—鲁尔盆地、荷兰—比利时中心地区等几大片城市群。20 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转移到美国，在美国东北沿海、五大湖地区形成了大片城市群。60—70 年代日本经济崛起，也产生了京滨都市带、阪神都市带等。

中心城市在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不断交替作用下逐渐扩大规模，增强辐射能力，当其辐射范围从国内扩展到全球时，就会从国内经济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英国伦敦地区城市带崛起伦敦，美国东北沿海城市带崛起纽约，以及日本京滨都市带崛起东京，无一不是这一过程的结果。上海要崛起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除了自身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外，还必须依托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只有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加速发展，并使资源要素在越来越大的空间范围进行配置，才能强化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加快向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转变；也只有上海从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尽快向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转变，以全面有效的服务提高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和辐射能级，才能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保持持续的高速发展。

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之间的这种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决定了上海无论考虑城市功能定位，还是考虑产业结构布局、城市基础设施网络，都必须突破原有城市狭小的空间，面向长江三角洲，联合长江三角洲各城市，共同把长江三角洲建成经济联系紧密、分工合理的现代化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为上海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长江三角洲地区处于长江沿岸与杭州湾沿岸间的三角地带，土地面积近 10 万平方公里，人口 7000 万。经过建国 40 多年的发展，这一地区已成为全国经济、科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后，在浦东开发开放和我国改革开放的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的形势下，这一地区所蕴藏的经济发展潜力得以释放。1992 年，全地

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 3448 亿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4742 元，是全国平均数的 2 倍多，并且，长江三角洲以其优越的区位条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具有一定的基础设施网络而成为新一轮国内外投资的重点地区。

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区内现有直辖市 1 个、省辖市 13 个，县级市 14 个，建制镇 658 个，城市化人口近 2000 万，平均每平方公里分布着 68 座乡镇，比全国市镇平均分布密度要高出 10 倍。在城市规模上，人口 100 万以上的城市有 3 个，50—100 万人口的有 4 个，20—50 万人口的有 7 个，20 万人口以下的有 22 个，总体上已形成了一个包括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和集镇等各具特色、多层结构的城镇体系，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初具规模。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整体优势的进一步发挥，为上海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宏观走势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整体效应将有力地推动上海创建国际经济中心目标的实现。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的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加速了上海城市功能的转换。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正持续推进，工业的内容从农副产品加工，轻工业品的制造到汽车制造，十分广泛。工业产值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会稳步提高。这不仅为上海“三二一”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二产业的转移提供了战略空间，而且也强化了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所具有的集散功能、管理功能、服务功能和创新功能，集中精力发展金融、商贸等高层次第三产业。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功能定位更加清晰、产业分工更加明确。上海正日益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生产、流通、信息、服务中心。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的经济持续发展，强化了上海在亚太城市链分工中的地位。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这里的劳动力数量大、质量高，科技教育发达，工业体系完整，资金密集型产业已成为主导产业。

90 年代全国形成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开发开放的格局，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进入开放的前沿地带，这将吸引国际资本、技术大量涌入，促进该地区更快溶入世界经济循环之中，从而也强化了上海作为联结国内外经济的“桥梁”和“枢纽”地位，并在亚太城市链分工与合作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增强了上海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长江三角洲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仍处于集中城市化阶段。据 1988 年预测，2000 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估计为 58%，到 2010 年可达到 70% 左右，城镇人口可达到 5500 万左右。届时，长江三角洲除上海外，南京人口（建成区人口，下同）可达到 300 万，杭州人口近 200 万，无锡、苏州、宁波 3 个城市进入特大城市行列；江阴、常熟、宜兴、昆山等城市的人口也将有较大的增长，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和成熟，将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增强上海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辐射，为上海创建国际经济中心奠定强有力的基础。

以区域经济和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为突破口，加快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尽管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初具规模，并且在全国目前已具雏形的几个城市群中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与国际上的一些特大城市群相比，无论是发展规

模，还是发展水平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难以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得以形成的基础支持系统。

从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几大城市群来看，能够产生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城市群都有4大特征。即 高密度的城市人口。以2500万的人口规模和每平方公里250人的人口密度为下限； 发展的枢纽。大城市群一般以国际化大城市为核心，联接国内与国外两个城市网络，城市群内的城市沿轴线发展，形成城市走廊； 发达的交通、通讯网络和其它基础设施。都有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海港、空港和高速铁路； 合理的城市功能分工。城市群内的城市布局合理，每个城市承担一定的职能，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的城市网络。

为此，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支持促进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和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促进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使上海能够依托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实现崛起又一国际经济中心的战略目标。这不仅上海长远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之必然要求。

加强区域重大项目联合投资。加快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对于区域性的交通、能源、原材料、江河湖海治理和新兴产业的联合攻关等重大项目，应从发挥区域整体优势出发，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联合投资，共同建设。要通过国家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共同投资，尽快形成以沿江铁路、高速公路、长江水道为主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和以光缆、激光、多媒体为标志的计算机技术与各种通讯手段相结合的邮电通信网络，满足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共同需要。近期上海要加强同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城市的合作，加快沪宁和沪杭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建设；规划和建设包括上海、宁波、舟山、乍浦、南京、镇江、张家港、江阴、南通等港口在内的以上海港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组合港；实现区域内通信联网，并同国际通信信息网络连接。

进行跨地区的企业联合与组织创新，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指导、市场导向，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组建一批跨地区、跨部门的大型企业集团，连锁企业和跨国集团，集各家所长，调动各地区资源优势，形成新的组合优势；通过统筹规划。加强合作，实现产业结构和布局的合理化，重点通过资源、资金、技术、产业等形式的横向联系，逐步建立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实行专业协作和综合发展相结合的区域性经济联合体系。当务之急要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集中开发建设一批大型工业区，充分利用上海的综合经济实力和老工业基地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联合长江三角洲的企业，统一组织对外招商，集中开发建设若干个工业区或工业加工区，促进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使上海现代大市场资金流、物资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辐射作用首先在这些工业区或工业加工区体现，并以此为基础扩散到长江流域。

提高区域内开放度，实行区域联合对外政策。要提高上海对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流域的开放度，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性障碍和地区壁垒。地方政府之间要加强合作与协调，对非一省一市或一个部门能解决的问题，如：拓展对外经济联系、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培育和发展区域性的要素市场体系，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之间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积极发展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形成强大的市场体系与国际市场接轨，推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实现经济一体化，强化城市群整体在对外开放中的巨大作用，强化上海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同时，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要在内部联合的基础上，联手走向世界，提高参与

国际经济活动的水平。

五 环渤海：海上升明月

环渤海地区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区域的整体优势。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无限光明，无可置疑，环渤海地区必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闪光点。

环渤海：中国经济发展的闪光带

1. 2000 年前后的经济战略要塞

环渤海经济区指由辽宁、河北、山东、山西 4 省，北京、天津 2 市及渤海海域所形成的大渤海经济区，全区陆地面积近 68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7%，人口约 2.4 亿，占全国的 20.5%。内海面积 7.7 万平方公里。北起丹东，南至青岛，海岸线长达 5800 公里，几乎是全国海岸线总长的 1/3。辽东和胶东两个半岛多为山地丘陵石质海岸，曲折多变，形成诸多天然良港，是全国港口的密集区，有丹东、大连、营口、锦州、秦皇岛、天津，黄骅、日照、烟台、威海、青岛大小港口 40 多个，港口吞吐量约占全国的 60% 以上，海上外贸出口量占全国的 78%，通过这些港口，对外与世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贸往来，对内以东北、华北、西北、华东部分地区为广阔腹地，成为中国北方内陆的结合部。这些港口是中国北部省区进入太平洋，走向世界最便捷的海上门户。环渤海地区作为中国北部的黄金海岸，是我国参与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和国际竞争的主要基地，它和俄罗斯、蒙古、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经济关系密切。环渤海地区的几大枢纽港（大连港和天津港）是“欧亚大陆桥”的东端起点，在连接太平洋与中亚、中东、西欧的经济交往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环渤海地区拥有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和管道五种运输方式，以北京为中心的陆空交通和通信干线连接全国和全世界，山西和内蒙古能源基地外运通道的主体也在本地区交汇，是全国铁路网、航空网、公路网、通讯网的中枢，也是国际交往的重要通道。环渤海地区还在不断完善交通运输和通信状况，目标是要加快形成以渤海为中心，沿海港口为“龙头”，陆上运输线为“龙身”的进出海两个扇形大通道；加速形成以北京为中心，干线机场和高速信息网为重点，通达国内外主要城市的空中运输和高速信息网络，基本形成四通八达、高速便捷、现代化的陆海空立体交通体系和高速信息网骨架。这里聚集着 420 多万科技人员，是全国科技人才最密集之地。这里有许多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城市，建有许多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了保税区，设立了外资银行，为这一地区对外开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环渤海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属资源型经济区。丰富的矿产、水产资源为发展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资源条件。据统计，国家建设急需的多种自然资源，铁矿探明储量占全国的 50%，石油占 40%，煤炭占 60%，木材占 50%。这一区域内，有大同、平朔、晋城、阳泉、开滦、胶北等大型煤矿，有胜利、辽河、华北、大港油田、还有渤海油田、海陆油田连成一片，盛产石油和天然气，原油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43.1%。有冀东、鞍山等大铁矿，储量十分可观。这里的海盐资源也非常丰富，全国四大盐区有三个在渤海地区，产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其它资源，如铜、铅、锌、铝、锰、金等稀有金属储量也十分丰富。并且这些自然资源分布集中、区位好、资源互补性强、综合利用的条件优越，不但容易开采，而且有利于全方位开发后进行深加工。这个地区还是全国重要的农业基地：华北、

辽河平原盛产小麦、水稻、玉米、大豆、棉花等农作物；辽东、胶东、辽西丘陵地带盛产花生和水果。这里矿产、土产、畜产充足，不少产品为本地区所特有。环渤海地区自然条件之优越，在我国并不多见，它是中国北部目前唯一能赶超南部的区域，在中国进一步全面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三大三角洲中唯一没有被充分开发而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经济带。尤其是在中央的经济发展战略意图要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形势下，显得更为重要。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崛起，才能真正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加快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正好与我国政府确定的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相吻合：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以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为标志），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翻一番的战略目标；长江三角洲的开发（以上海浦东为标志），将有力地带动国民生产总值的第二个翻番，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环渤海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的全面开发和开放，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开发，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又一重大举措。它必将成为我国第三个经济热点地区和我国 2000 年前后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地区。环渤海地区的大规模开发为华北、东北、华东地区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为各省市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机会。

2. 环渤海地区的两市四省都有各自的优势。

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工业、建筑业、商业、农业、交通运输、邮电业全面发展。北京是全国最大的交通枢纽，是国内外航空线和铁路线的交汇中心，公路四通八达，经京津塘高速公路可从天津港出海。具有沟通东西部，贯穿内陆与沿海的中转纽带作用。北京名胜古迹众多，旅游资源丰厚。北京矿产资源有 40 多种，包括煤、铁、铜、铅、锌、石灰石、大理石、花岗岩等。还有丰富的地势资源。北京的教育文化和卫生基础好、发展快，人才云集，科技力量雄厚，拥有 100 多所高等院校，有各类科学研究机构 470 多家，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有 10 多万人。经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已有 4000 多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完成建设投资 7.7 亿元。截止 1994 年底，开发区已批准入区项目 83 个，投资总额 6.6 亿元，其中三资企业投资 5.9 亿元。来自美、日、德、法、意大利、加拿大、荷兰等国的一大批跨国公司大企业相继在开发区建厂。

天津是我国北方综合性经济中心，是国际性港口城市，已基本形成以港口为中心，海、陆、空连为一体的大交通体系。天津港水域面积 176 平方公里，陆域 18 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人工港，集装箱年通过能力居全国之首。现在 30 多条国际航线，与海外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个港口建立了业务往来。与日本神户港和韩国仁川港有客运航线。从现在起到 2010 年，天津的国民经济要再上两个大台阶，把天津建设成我国北方的商贸金融中心、技术先进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全方位开放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大城市。近几年，天津的外经贸发展迅速，进出口额一直在华北、西北地区名列榜首。天津在环渤海地区不可替代的地位使其在吸引外资北上、西进的过程中独具魅力。随着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和知名度的提高，天津已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国际大财团投资的热点地区。据统计，到 1994 年底，已有 120 家跨国公司，大财团在天津安家落户，投资项目 158 个，协议投资额达 28,45 亿美元，其中外资 20.26 亿美元。投资领域几乎涉及天津的各个行业，投资额最多的是电子、

机械、化工及医药业。在天津投资的跨国公司中美国首屈一指，投资项目多达 30 多个，协议投资额 8.84 亿美元，外资额 6.63 亿美元。日本居第二位。其他协议投资 1 亿美元以上的有韩国、德国、英国和港台地区。他们的投资项目以工业为主，技术水平高，这些项目很快使天津创出了一批名牌产品，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技术的差距。

辽宁是东北工业基地的核心，是我国主要的基础原材料和技术装备生产基地，仅辽中南地区就座落着 11 个大中城市，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和以大连为中心的沿海城市带，相互依存，密切协作，大大增强了其幅射力和吸引力。辽中南地区正在向北方重工业经济中心、内外贸易中心，国内外交通枢纽与集散中心和金融中心迈进。大连、丹东、营口、锦州港年货物吞吐量 6000 多万吨，海运国际可通往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可抵东南沿海各港口。这一地区最引人注目的是大连，这个未来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必将会成为东北地区的工业、商贸、金融和旅游中心。目前，大连中日合资 2.17 平方公里的工业区吸引了日本几十家会社的银行投资，与台湾合资的工业城不断地把台资吸引到大连。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看好大连这块地方，再经过 20 年的努力，把大连建成北方香港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山西是全国最大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物资资源旅游资源丰富、老工业基础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军工企业多。在煤炭、冶金、化工、建材、电力诸方面都有一定优势。山西矿产资源有 120 多种，其中煤、铝土、耐火粘土、铝矾土、珍珠岩、镓和钼的储量居全国之冠；金红石、镁盐、芒硝居第二位；钛铁、钴、锆、金的储量也相当可观。山西野生生物品种繁多、数量可观，目前已查明野生经济植物，如党参、黄芪等 1000 多种，野生动物，如褐马鸡、虎、丹顶鹤等 400 余种，山西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美誉，雄居塞北的北岳恒山、佛教圣地五台山、壶口瀑布、应县木塔、云岗石窟等举世闻名。山西的原煤、焦炭、电石产量居全国第一位，煤不仅储量大，而且质量等级上乘，深加工优势明显。山西能源工业不仅面向全国，而且正在走向世界。目前山西煤炭产量约 3 亿吨，外调量达 2 亿吨，占全国外调总量的 78%。1992 年，山西输往环渤海地区的煤炭近 8000 万吨，通过华北电网向京津唐地区输送电力近百亿度，随着山西输煤与输电并重战略的实现，向环渤海地区的送电量将大幅度增加。山西煤炭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信誉，远销日本、朝鲜、泰国、英、法、美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山西的焦炭产量高、品种全、质量好，1994 年，全省焦炭产量达 2710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41.2%。全省优质焦炭出口达 264 万吨，创汇 1.85 亿美元，已成为山西继煤炭之后第二大出口支柱性商品。

山东自然环境优越，经济比较发达。自 70 年代末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以 10% 以上的速度递增。1992 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居全国第二位，农业总产值居全国第一位，出口总值居全国第四位。山东省是中国的重要工业生产基地之一，门类齐全，布局合理，比例协调。随着山东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利用外资的步伐明显加快，国际经济合作业务全面发展。青岛、烟台、威海 3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全省 5 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国内外客商投资的热点，兴办了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起点高、创汇能力强的好项目。山东还有广阔的海域，有着众多的岛屿和良港，其中最优者当数青岛，在中国经济建设布局中，青岛具有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作用，是中国通向世界的重要口岸之一。近几年来，青岛又进一步改善了软

硬环境，使青岛港具备了装卸第四代集装箱船舶的能力，现在青岛已成为我国第三大集装箱吞吐港。青岛市的沙特、韩国和中国联合开发的石油化工城总投资 25 亿美元，中国与德国西门子联合开发的高新技术电子城的投资也达 1.8 亿美元，新加坡工业区占地多达 10 平方公里。青岛是我国北方最有希望的港口城市。

河北省地处环渤海地区的中心位置，环绕京津两市，交通十分便利，具有多方面优势。河北已加快了对黄骅、唐山、秦皇岛港的建设，在沿海形成大中小相结合的港口群，年吞吐量由现在的 9000 多万吨将增加到 1.5 亿吨。随着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加速发展，城市载体能力的不断增强，必将给河北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活力。在中国环渤海地区中外经济技术合作招商洽谈会上，河北省推出一大批有市场、效益好、对外有吸引力的项目，主要集中在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园区的沿海、沿域、沿路的开发项目，并且是以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为主的大项目。河北省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外资，而大量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又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形成了良性循环。

3. 光明的前景

从国际上看，环渤海地区是东北亚经济圈的核心，圈内日本、韩国的资金、技术力量雄厚，与中国经济互补性、依存性强。环渤海地区投资环境好，经济技术合作前景广阔，许多国家都把该地区作为投资热点，日本和韩国的兴趣更大。

日本九州福冈、长崎、及鹿儿岛同我国黄、渤海沿岸地区有着良好的地缘关系。北九州是日本的四大工业区之一，尖端技术产业比较集中，有着很强的加工能力，资金雄厚并具有丰富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经验，在整个日本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北九州地区，甚至整个日本资源紧张，劳力短缺，市场狭小。因此，日本，尤其是北九州地区，对环渤海地区的投资合作与经济交流怀有极大的兴趣。

环渤海地区在同韩国的经济合作方面，优势更为明显。在韩国人看来，环渤海地区地理条件优越，拥有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较好的工业基础，外向型经济已初具规模，投资环境较好。韩国资源匮乏，为了缓解对美、日市场的过分依赖，正在积极寻求新的合作对象，以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面对中国巨大市场潜力，韩国力求以环渤海地区为据点，加快向中国进行大规模市场开拓型投资，以占领中国的部分市场份额。韩国与中国之间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依存性更强，韩国经济界人士已提出建立“黄海、渤海经济圈”的构想，以在这个地区同中国建立紧密的合作与协调关系。近年来，韩国国内资金出现剩余，急于向海外寻找出路。进入 80 年代，韩国工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急欲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海外，环渤海地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正是满足这种转移的极好条件。韩国将要推行的北方经济战略，准备在该地区投资 20 多兆韩元，开发 100 多个项目。预计 90 年代后期，韩国对环渤海地区的投资高潮将会到来。

朝鲜北部西海岸地区的新义州、南浦及海州与我国天津、烟台、威海隔海相望，与环渤海地区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沿海地区的双边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有着极大的潜力，在鸭绿江上早年就建设了中朝两国共同合作经营的水丰、云峰、渭原及太平湾等四座水电站。朝鲜目前正在推行经济改革和开

放政策，积极争取国际合作。朝鲜认为，积极参与渤海地区经济合作是十分必要的。

环渤海地区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区域的整体优势。这一地区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丰富，工业基础扎实，交通发达，技术实力雄厚。当今的环渤海地区，大型的港口码头，高等级的公路、铁路、机场、电厂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建设着，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在搞开发区、高科技园区。国家安排的跨世纪特大工程，大多与环渤海地区有关。环渤海地区举世瞩目，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国际大财团、大企业来环渤海地区投资。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无限光明。无可置疑该地区必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闪光带。

环渤海地带大中城市群的崛起

环渤海地区，分为沿海与内陆两个部分，包括：辽宁、河北、山东三个省和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及其渤海、黄海海域部分，陆地面积为 51.84 万 km²，海域面积近 8 万 km²，海岸线长达 708km。1990 年全区总人口为 20542.74 万人，非农业人口 5233.04 万人，占总人口的 25.47%。

环渤海地带，主要是指在上述范围内，距渤、黄海沿岸近的地带，以大中城市为主体，具有一定的海岸线与港口特征，并保持城市行政厦域完整性的城市群体地带而言。

1. 滨海地带城市发展概况及其优势

滨海地带，位于辽宁南部河北与山东省的东部地区的接合部，面向太平洋，背靠欧亚大陆，东与朝鲜、日本交往便捷，是我国北部东西海陆和南北陆路交通的前沿阵地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区域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区域城市发展概况

1990 年环渤海地区有 78 个城市（其中包括 2 个直辖市、34 个地级市和 42 个县级市），253 个县城镇（其中自治县 16 个），总共 331 个城镇。

滨海地带有 29 个城市，占环渤海地区城市总数的 37.2%，其中特区城市 4 个，大城市 2 个，中等城市 9 个，小城市 14 个，本地带城市化水平较高（为 49.8%）。

区域城市发展的优势

（1）地理位置优越。滨海地带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区域的北部地带，是东北、华北地区与海外联系的陆海通道。东面隔渤、黄二海与朝鲜、日本相望，威海市距韩国仅有 90 公里，有利于国际间经济、信息交流；南部紧靠欧亚大陆桥的海陆交通枢纽连云港，并与沪宁杭沿海城镇密集带相连；西与全国最大的山西能源基地相沟通，腹地辽阔，对发展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潜在的优势。

（2）海洋资源得天独厚。本地带由于临渤、黄二海，拥有 5708km 长的海岸线，近 6000km² 的滩涂，可建盐田 66.7 万 ha，港湾众多，具有适建深水泊位及万吨以上的港址条件数十处，居全国之首。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为发展海产养殖、捕捞、海洋化工、港口城镇以及海上交通事业提供了广阔前景。尤其盛产海珍产品，深受国内外用户欢迎。

（3）旅游资源丰富多彩。滨海地带，气候宜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

山海妩媚，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荟萃，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齐全，其中有些景观居全国重要地位，如大连南部海滨风景区（国家级名胜区），珍奇的生物景观（腹蛇的王国、侯鸟的驿站），蓬莱仙阁登州的水域，天之尽头成山角及驰名中外的旅游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等均具有较高的游览和观赏价值。将对城市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

（4）腹地矿产资源丰富。现已发现各类矿产 100 余种，其中有 30 多种在全国占重要地位，如山东省的黄金、自然硫、石膏等储量居全国第一位，金刚石、石油、菱镁矿的储量居全国第二位，大连的金刚石储量居全国第一位，河北省的煤、天然气、石灰石、玻璃石英等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种类多、品种全、分布广、质地优良，均为形成多职能类型城市和振兴沿海与内陆经济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

（5）区域经济基础较好。滨海地带具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大中型骨干企业较多，尤其石油、冶金、化工、机械、建材、纺织、电子等工业部门均在全国占重要地位。滨海城市现有工业企业 3 万多个，工业总产值达 2450 亿元以上，约占全国城市工业总产值的 12.1%。农业基础雄厚，粮、棉、油生产均居全国前列。同时，每个城市都兴建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办了外商投资企业 2000 多个，投资环境日臻完善，并拥有一定数量的科研开发机构，对繁荣区域经济将发挥巨大作用。

（6）较发达的交通运输系统。滨海地带基本上形成了以港口为中心的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等运输方式齐备的交通运输系统。港口年吞吐能力 500 万吨以上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和青岛 5 个港，中小型港 40 个，港口条件优越，腹地广阔，吞吐量，管理水平先进；铁路公路运输均较发达，主要铁路有沈大、沈丹、京秦、津浦、胶济、兰烟等主要干线和 11 条国道；空运有丹东、大连、锦州、秦皇岛、天津、沧州、潍坊、烟台、青岛等 10 个不同规模的机场及石油管道等，初步形成了综合运输系统，对促进国内、国际经贸交流与协作，将发挥十分重要的先导作用。

（7）政治因素。滨海地带是我国沿海对外开放的重要前沿阵地之一。近些年来，由于贯彻执行党的对外开放政策、对沿海地区实行优惠政策以及良好的国内、国际联合协作条件，与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必将振兴区域经济和繁荣。所以政治因素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2. 滨海地带城市发展布局现状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市发展、布局的现状特点

（1）城市数量多、规模小。滨海地带现有 29 个城市，在环渤海地区 8% 的土地上集中了 37.2% 的城市，其中特大城市 4 个，占滨海地带城市总数的 13.79%，大城市 2 个，占 6.9%，中等城市 9 个，占 31.09%，小城市 14 个，占 48.28%。中小城市合计占全地带城市总数的 79.31%，主要由于工业企业集中布局在城市，生产力布局不平衡所臻，因此多数城市规模小，但是发展潜力较大。

（2）城市空间布局不平衡。滨海城市除部分小城市外，全部大、中城市均分布在长大、京沈、京济、胶济、济青铁路沿线，并呈带状分布，其特点与交通运输条件和滨海地貌形态密切相关。因为铁路运输是陆路运输的大动脉，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行基础，必然吸引大量的客货流，促进城市建设

与经济发展。

(3) 城市等级规模比较齐全。滨海地带有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没有缺空层次,等级规模齐全。但是各规模级之间发展不够平衡,如 50~100 万人口规模的大城市只有两个,且全分布在辽宁省沿海地带,山东、河北、二省没有一个大城市,缺少带动中小城市的纽带和桥梁。

(4) 城市经济职能多呈综合性趋向。滨海地带各城市之间缺少横向经济联系,专业化分工与协作较差,尚未形成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网络体系,因此城市职能类型呈综合性趋向。今后应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突破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予以调整和完善。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滨海地带中心城市尚未确定。滨海地带虽有 4 个特大城市,2 个大城市,但是真正的中心城市尚未确定。天津市虽然处于该地带的中心位置,经济技术比较雄厚。但其吸引、辐射面并未达到三省滨海城市范围,又因它是直辖市,加上受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制约,更谈不上组织和扶植周围城市的发展与分工、协作,并缺少与滨海诸城市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制约各城市间的经贸事业发展,直接影响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经济,因此必须尽快确定滨海中心城市,以利于组织和协调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2) 滨海地带淡水资源普遍缺乏。滨海城市发展的突出问题是淡水资源普遍缺少。据有关资料统计,京津冀平均年缺水量高达 50 亿 m^3 。山东、河北、辽宁及京、津等省市年缺水达 200 亿 m^3 ,直接影响城市经济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应尽快突破行政界线,统一规模水资源供求问题。

(3) 滨海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不完善。滨海城市虽然具有多种交通运输条件,但是由于建设资金不足,缺乏统筹考虑和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尚未形成综合性交通联网布局体系。如滨海诸城市现有不同规模机场 10 个,各市均想扩建自己的机场,即使扩建也形不成规模,港口建设也是如此,不如集中资金,择优建设更为有利。再如秦皇岛至大连海上距离很近,但是不通客航等等。总之,应对滨海地带海、陆、空大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布局进行综合考虑,统筹规划,才有利于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

此外,尚存在城市经济基础薄弱,人才缺乏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应尽快予以解决,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其吸引、辐射作用。

3. 滨海地带大中城南发展趋向

(1) 滨海城市发展规模预测

滨海地带 1990 年有 29 个城市,其中大中城市 15 个,小城市 14 个,根据 1981~1990 年非农业人口统计资料及各城市人口发展规律和特点,并考虑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不可预见等因素,我们分别采用一元回归选优和几何增长法进行城市人口发展规模预测。

预测结果:到 2000 年特大城市仍为 4 个(天津、大连,青岛和唐山市),大城市由现在 2 个(丹东和锦州市)发展到 7 个,增加 5 个大城市(营口、盘锦、秦皇岛、潍坊和烟台市),中等城市 5 个(锦西、瓦房店、沧州、东营和龙口市)。

如果从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发展外向型经济趋势综合分析,2000 年东营市将发展成为大城市,日照和威海可发展成为中等城市,小城市发展到 23 个。总之,2000 年滨海中等城市相对较少,应重视其合理发展与布局问题。

（2）确立和完善滨海地带中心城市

环渤海滨海地带，是我国具有特殊意义的战略性区域，在全国四大油田中，除大庆外，胜利、华北（包括大港）和辽河三大油田都分布在渤海沿岸地带。盐田、海产养殖及海产品均居全国重要地位。为适应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需求，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经济一体化网络体系，综合开发滨海及腹地资源，建设港口城市，加速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进程，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突破现有行政管理体制，确立滨海地带中心城市，以利于合理组织区域城市经济分工与协作，更好地发挥前沿扶植内陆，并传递科技信息及管理经验，内陆以雄厚的物资基础支援前沿的互补作用，促进二者有机结合，共同繁荣。

由于首都和省会城市具有特殊职能，不能列入滨海城市发展，同时考虑滨海地带跨三省一市范围，确定建立天津、大连、青岛为区域中心城市，对发展滨海地带外向型经济更为有利。因为该三市均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并具有产品流通量大、商贸服务业发达、科技、文教力量强、水平高、信息灵通等开放性优势和功能，完全能起到组织、带动和扶植广大腹地城市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另外，由于三个中心城市都是规模较大的特大城市，用地紧张、淡水资源缺乏，应对其规模进行控制性发展，重点发展高、精、尖产品，改造原有企业设备，革新、挖潜、扩大再生产，提高技术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建设以天津为核心，大连为东北区前沿现代化国际性城市和自由贸易港城，青岛市为滨海地带南部中心城市，将为参与环黄海经济圈的发展奠定雄厚的城市经济基础。

（3）加强滨海地带次级经济中心城市的建设

为了缓解和控制中心城市发展规模和发展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应加强对丹东、锦州、唐山、东营和烟台 5 个次级经济中心城市的综合基础设施建设，使其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与滨海地带各城市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4. 滨海地带城市发展的几个问题

（1）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职能作用

中心城市主要起组织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尤其渤海地区滨海城市是当前发展外向型经济新的滋生点和扩展瓣滋生带的吸引、辐射源，所以必须尽早确立中心城市的地位，给予行使权力，使其尽快在集聚、扩散区域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带动全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消化之后转向内陆，充实和完善城市体系职能结构，达到沿海指导和扶植内陆经济发展，内陆支援沿海前沿丰富物资，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目的。因此，中心城市不仅起着带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开发与商、贸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且对加速国际港口城市的建设和即将开发的环黄海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走向世界，发展外向型经济创建新的滋生带。

（2）关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问题

发展外向型经济，应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目前滨海城市的投资环境普遍存在着“硬环境不硬，软环境不软”的现象。首先，需要重视硬环境的建设，如交通运输、能源供给、给排水、物资供应、邮电通讯、科技咨询、商

业服务、环境保护以及生活配套设施等系统的建设。其次，要在完善硬环境建设的同时，注重对软环境的培育，如制订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有关政策和法规等等，均应尽早尽快加以完善，方能向高科技、高层次、高效益目标倾斜，转向市场运行轨道。

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需要了解和遵循国际市场经济发展趋向和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要有风险意识，加强外向型经济信息系统的建设，及时预测并掌握国际市场的脉搏，方能使我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不会因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风云变化而波动，从而实现稳定发展。

(3) 关于城市经济开发区的建设问题

城市经济开发区是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新事物，尤其在近 10 年呈现出蓬勃之势。由于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都享受国家部分优惠政策和投资。因此，申请和建设面较广。据 1992 年考察，发现滨海地带无论大中城市和小城镇都在兴建经济技术开发区。初步统计，环渤海地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约占全国高新开发区的四分之一左右，省级开发区也较多，地级市和县城均在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点多、面广，继续下去会削弱开发区的作用和投资效益，对此问题国家应进行宏观调控与严格遵循审批程序和标准，避免“遍地开花”等过热现象发生，以保证具有一定基础和规模的开发区健康发展，并取得较高效益，使其真正成为“三高”企业的舞台。

此外，城市经济开发区尚存在性质雷同和布局不尽合理等问题，应扩展视野，既体现自身特点，又要与依托的城市区域宏观规划相结合，方能健康有序地发展。

随着滨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聚集增长和沿海产业及石油的开发，对保护滨海环境质量的良性循环问题应尽早提到重要日程，尤其渤海是近于半封闭性的内海，城市上业企业广布，污染范围居我国四大海区之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进行统筹规划，加强管理，合理开发，以保护环境和近海水域。

5. 环渤海港口城市的建设

环渤海经济区与俄罗斯、蒙古、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相邻，是欧亚大陆桥的东端桥头堡。在连接太平洋与中亚、中东、西欧的经济、贸易交往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环渤海地区的综合科技实力居全国首位，是全国科技、文化中心。该地区工业基础扎实，大中型骨干企业多，技术装备先进，门类齐全，特别是石油、石化、煤炭、冶金、机械、电子、建材、纺织等工业都很发达，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是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环渤海交通发达，是全国港口密集区，有大小港湾 40 多个。青岛、大连、天津等枢纽港都分布在这个区域，港口吞吐量占全国 60% 以上。海陆空立体交通和通信干线连接全国和世界各地，已基本形成综合运输网和通讯网，是全国铁路网、公路网、航空网、通讯网的中枢和海上航运的重心。环渤海地区属资源型经济区。首先，渤海是我国最大的内海，面积 7.7 万平方公里，为日本濑户内海的 3.5 倍，具有发展成为海湾经济区的良好条件。有丰富的海洋渔业、矿产、盐业，养殖、海上油等诸多海上资源。其次，陆地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铁占全国的 50%，石油占 40%，煤占 60%，木材占 50%，铜、锌、锰、铝、金等稀有金属也十分丰富。这些资源互补性强，综合利用条件优越。该地区还是全国重要农业基地，盛产小麦、水稻、玉米、大豆、棉花、花生和温带水果。

中国几千年历史给该地区留下了一份特殊遗产，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相结合，形成了众多魅力无穷的旅游环境。环渤海地区的综合优势，不仅在中国得天独厚，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

环海城市建立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目标体系已经形成，沿海各市按照建设国际性城市目标正加速实施。环海城市在开放中根据自身的基础设施水平、产业特点、地理位置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国际性城市的中长期目标，围绕目标实施，抓住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产业优化、加快市场体系建设等与国际市场接轨关系环节，建立起港口、机场、公路立体交通体系；兴办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区、高科技园区，努力创造引起国内外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环境和条件。各沿海城市在加速自身建设、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注重环海各市经济互补及关联效应，注重发挥与国内、国际接轨的窗口作用。

环渤海经济区内，以大连为龙头，丹东、营口、锦州为龙体，以青岛为龙头，烟台、威海为龙身的双龙环抱的环渤海地区的“龙腾”战略实施，使生产要素向龙头城市聚集，进一步突出大连、青岛两个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大连等中心城市自身的综合优势已初步具备建成国际性城市的条件。大连处于环渤海“C”字结构的一端，是从海上沟通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要冲之地，也是东北与环渤海两大经济区的交汇点。大连对辽宁乃至东北地区具有并初步发挥了类似“浦东”、“深圳”的区域性龙头作用。一是大连已成为东北地区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据国家有关部门综合评价，大连市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大城市中排第8位，是东北各城市之首。二是大连已成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度最高的城市。拥有全国第一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东北唯一的保税区，还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旅游度假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占地面积、三资企业投资总额、协议外资总额、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和出口创汇等在全国各开发区中名列前茅，全市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商社在这里设有常驻办事机构。大连已成为东北地区的国际结算中心，与国外100多家银行或金融组织开展业务往来并建立了东北地区最大的跨地区外汇调剂市场。全市拥有境外金融机构22家，其中8家为外资银行。三是大连已成为东北地区城市综合功能最强的城市之一。大连地处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在内的东北亚地区的中心位置，正位于国际、国内两个辐射面的交汇点，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集国际深水中转港与国际航空港于一身。国际机场开通国内外航线42线，开通程控电话46.7亿门，城市交通、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现代化高级服务设施发展较快。四是大连已成为与东北地区各地连结最紧密的城市。东北地区的省、市、县已在大连设立分支机构或新办企业，在经济协作中，有60%以上企业实行跨行业、跨地区横向经济联合，东北地区在大连口岸出口的货物总值占大连口岸进出口货物总值的66.3%。

6. 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战略步骤及措施

环渤海经济区内环海城市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是一项跨世纪的系统工程，必须进行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在战略步骤上，应分三个阶级进行：第一阶段，从现在到本世纪末的5年为打基础阶段，构建起国际性城市的基本框架。第二阶段，下世纪初为发展阶段，按照现代化国际性城市指标体系加

速发展，使环海城市在东北亚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达到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基本标准。第三阶段，用 15~20 年的时间完善提高阶段，环海城市的中心城市达到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高标准，即：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高效能的基础设施，高水平的城市管理，高质量的生态环境，高度的社会化分工，高度的精神文明。

按照环海城市建设成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总体目标要求和实施步骤，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增创产业新优势，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环海城市要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转向高科技、信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达到与国际产业接轨。产业接轨是市场接轨的物质基础，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环渤海地区整体经济素质，初步形成以先进工业为基础，高新产业为先导，第三产业为支柱，“三高”创汇农业发达的现代经济体系。

增创改革开放新优势，加速市场接轨进程。市场接轨是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基本条件。围绕创造市场接轨的环境，一是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形成高度开放的现代化市场体系，突破地域界限，向国内外全面开放各类市场，促进市场体系整体结构和功能的现代化，使环渤海地区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三是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强化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协调服务、管理监督等方面的职能；四是实现改革的综合配套和整体推进，深化分配、住房、户籍、社会保障几项制度和社会中介服务、社会经济监督及港口口岸管理体制的改革。推进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五是形成高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实施外向牵动战略，更加灵活地采用国际通用的引资方式，鼓励外资投向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高新技术骨干项目和第三产业项目。加强与跨国公司、国际大财团的合作，努力优化投资环境，建立与国际惯例衔接的港口及口岸管理体制，简化投资审批程序和口岸检验手段及监管方式。发展远洋贸易，实施市场多元战略、拓宽投资领域。

增创基础设施建设新优势，实现城市功能现代化。

一是高标准编制规划，高起点设计未来。首先，要以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为目标，认真编制好“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规划。其次，要把环海各市的发展规划作为环渤海经济区规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安排好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工业项目的布点，在城市功能、发展方向及产业、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等方面搞好与环渤海经济区的衔接，确定各市在环渤海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分工。第三，处理好区内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地区关系以及环渤海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发挥整体优势。按照国际惯例的要求，从城市管理、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搞好与日本、韩国、俄罗斯等东北亚国家衔接。二是加速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按国际性城市模式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在向国际性城市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中，环渤海各市要重点强化网络建设，即完善立体交通网络。（1）以港口为龙头，建立出海过边开放型交通运输大通道。大力发展沿海港口，建立起多条“出海过边”开放型综合运输大通道。第一条是沿海综合运输大通道，由沿海高速公路、铁路和沿海港口共同组成，其作用可大幅度提高沿海地区综合交通运输网水平，形成港口群优势。第二条大通道是中部运输主通道，以大连、营口两港为龙头，由以松辽运河为主的内河水运网、哈大高速铁路为主的铁路网、大连——大庆输油管道为主的管道网共同构成。第三条大通道

以丹东港为龙头，由鸭绿江水运、东边铁路、公路组成东部运输大通道。第四条大通道是以锦州港为龙头，由铁路、公路、管道等组成的西部运输大通道。

(2) 加速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及广大腹地高等级公路网及铁路网的建设。(3) 加速环海城市国际机场建设及国内外航线开通，从而形成立体交通体系。完善各沿海城市供配水网络建设，加速淡水资源利用及开发。完善各环海城市防洪排涝网络建设，完善环海各市配电网建设，完善各城市现代化通讯网络建设。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完善国际城市功能。发达的第三产业，是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重要标志。青岛、大连要建成环渤海经济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商贸展览中心、运输中心、旅游度假中心。

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高效率的管理体制和办事规则。基本内容是将已提出多年的按国际惯例办事上升为国际公法、国际协议、国际条约办事的层次上来，使各项对外经济纳入到与国际法律规范接轨的环境中，使有关国际组织机构和外国官方、半官方、民间从事商贸活动的组织机构在国际性城市的合法地位、合理权益得到保障，以开展正常的经济交流活动。

创建适应国际性城市发展要求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

在环渤海经济区内规划城市的布局上既要强调国际化的特点，又要注重保持东方文化特征；实施“育才工程”，加快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建成一定规模的高等学府、科研机构和文化团体。积极培养和引进建设国际性城市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搞活人才市场，开发人力资源；要树立良好的市风、政风，社会文明有序、精神面貌奋发向上、文化生活丰富健康。

以潜在的国际性城市为核心，形成城市圈，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国际性城市是以一个城市为核心，联系周边若干个一般大城市以及中心城市组成的城市圈。要建立国际性城市就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城市圈的有利条件和巨大优势，加强城市圈内各城市的分工和协作，形成城市圈的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以使在国际竞争中取胜。

东北亚经济圈走笔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世界经济日趋集团化、区域化、一体化，形成各种国际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即所谓“经济圈”）。目前，全世界有这样的组织 28 个，参与国家达 140 多个。为主动顺应这一时代趋势，加快我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经济的接轨，我们应该积极推动和参加一切有利于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性经济合作组织。就地理位置和周边关系而言，当前尤应积极促进“亚太经济圈”、“南中国海经济圈”和“东北亚经济圈”的形成。

1. 亚太地区必须也有条件建立“东北亚经济圈”

关于东北亚经济圈的界定和合作范围，日本、韩国学者提出过“环日本海经济圈”、“黄海经济圈”等设想。我们认为，日本海、黄海及其中国的内陆海——渤海，都是连接相通的，中国大陆的东北部与俄罗斯、蒙古接壤，

这一地区日益频繁的经贸活动与沿海地带的国际合作已经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建立东北亚经济圈，理应包括以下四个层次的小圈：

(1) 环日本海经济圈。包括日本、朝鲜半岛、俄罗斯的远东海滨地区 and 中国的吉林省、黑龙江省，其合作远景主要是环日本海的周边国家。(2) 黄海经济圈。包括朝鲜半岛、日本（主要是九州地区）和中国的辽宁、吉林、山东三省，其合作对象主要是环黄海的周边国家。(3) 环渤海经济圈。包括北京、天津和辽宁、河北、山东三省沿海 15 个城市，其合作对象主要是环渤海地区的有关省市。(4) 中俄蒙内陆经济圈。包括我国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与俄罗斯、蒙古长达 7000 多公里的国境地区，其合作对象主要是中俄蒙三国。

以上四个层次的经济合作圈，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互相联系的；既可进行各主要合作对象的“双边”合作，又可进行对外开放的多边合作，构成圈中有圈、海外有海、互相联系、优势互补的整个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目前对已经开始的合作，有关国家的政界、商界、学界已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

(1) 东北亚各国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避开非经济因素的差异，实行“经济与政治分开、民间与官方分开、地方与中央分开”的、不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广泛的经济合作。(2) 国家不分大小，平等互利，尊重各国权益，谋求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3) 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和发展水平不同，可以采取双边和多边并存，官方和民间并存，区域内和区域外并存，城市和乡村并存，团体和个体并存等多种多样的合作形式。(4) 有关各方都致力于建立更加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自我封闭和贸易保护主义。毫无疑问，只要遵循上述原则，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势必有着更加广阔的前景。

在亚大地区，建立东北亚经济圈的呼声之所以渐高和形势看好，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东北亚各国的经济现状和发展前景，在亚太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东北亚地区现有人口 4.8 亿。GDP 总额约 37800 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 18%。能源储量丰富，交通发达，海岸线长，港口众多。该地区主要工业品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是：造船（商船）近 70%，粗钢近 30%，汽车为 29%，电视机为 66%，半导体为 43.2%。据初步分析和预测，到 2000 年该地区上述产品的产量占世界的比重可能还会增加，GDP 值占世界的比重可能还会明显提高。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东北亚经济圈是环太平洋的缩影”，“没有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振兴，便不会有真正的‘太平洋世纪，’”等等，都是不无道理的。

其次，东北亚地区各国有着维护和平的一致性和谋求发展的经济互补性。中俄关系正常化，朝鲜半岛北南高层对话，中韩、俄韩建交，朝鲜与日本开始建交谈判，日俄关系也有改善等等，都为该地区的经济合作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从经济互补性来看，日本、韩国在资金和技术上具有明显优势，但自然资源贫乏，工资成本较高；俄罗斯东部拥有极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人口稀少，劳动力奇缺；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和某些自然资源优势，但缺少资金和技术；朝鲜和蒙古的农牧业及某些矿产资源有一定优势，但都缺少资金和技术。这种经济上的互补关系，既是各国谋求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又是有利于促进东北亚各国实现经济合作的物质基础。

此外，东北亚各国近年来为推动经济合作，都抱有浓厚兴趣和积极参与态度。日本早在 80 年代初期就提出“东北亚经济圈”的构想，以后实际上对

我国的东北、华北和俄罗斯的远东、西伯利亚，表现了浓厚的投资兴趣（因这两个地区都有日本所需要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韩国 1986 年制定的“北方政策”和“西海岸开发计划”，预计在 2001 年以前投资 23 亿韩元，兴建 126 个项目。我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沿海沿边开放政策，也包括东北边境和环渤海地区。俄国、蒙古、朝鲜在边境城市和周边地区，也都相应制定了一些开放政策。此外，1992 年 4 月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亚大经济社会委员会第 48 届年会及其通过的《北京宣言》，1993 年底在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主持下召开的“图门江开发计划”管理委员会会议，以及近年来在有关各国政府支持下，由民间主办的多次讨论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学术交流会议，都表明了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开发这一地区和促进其经济合作的高度重视。

但也必须承认，由于东北亚地区依然存在政治上的不和谐因素（如朝鲜半岛、中国的统一问题，日本与俄罗斯的岛屿之争等），以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恐怕一时还难以形成类似欧洲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等那样的世界经济合作组织。要使东北亚地区也能成为统一的市场和参与国际集团竞争的强劲对手，有关各方还要做出不懈的努力。目前实际上只能按照“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因势利导，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有条件的合作。在初始阶段，可以着重发展双边贸易、边境贸易、劳务合作和互相投资办企业等，然后再进行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多边经济合作，并通过各自的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保税区等，实行一定范围的商品、资金、人员的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商品、资金和人员在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实现东北亚经济合作和市场流通的一体化。

2. “环渤海经济圈”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环渤海地区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应当成为中国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角色。

第一，这一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环渤海水域内为我国的辽东半岛、辽河平原、华北平原、山东半岛所怀抱，外与黄海、日本海和太平洋相通，其南北跨度 550 公里，东西宽 346 公里，海岸线长达 3700 多公里，总面积 7.73 万平方公里。渤海内陆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山东三省和北京、天津二市，面积共 51.45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 5.4%；人口 2 亿多，约占全国的 18%（非农业人口约占 22.5%）；国民生产总值达 6500 亿元，约占全国的 22.7%；社会总产值达 10000 亿元以上，约占全国的 24.6%（工业约占 26.3%，农村约占 19.7%）。在全国 20 个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100 亿元的城市中，环渤海地区占了 7 个；有 17 个沿海地级市（平均不到 300 公里有一个大中城市）；每 100 平方公里有国有大中型企业 19 个，是我国北方唯一的人口、城市和产业密集带。

环渤海地区又位于高原与平原的交汇处，既是我国北方通向海洋的门户，又是内陆连接欧亚的要塞（向西有两条穿越西伯利亚和我国新疆的“亚欧大陆桥”）。东北亚地区处在西连中俄蒙、东通中日韩的中间地带，具有发展本地经济得天独厚的腹地基础和通往世界的海上通道。目前，在沿海建成的 10 多个大中型港口中，大连、天津、青岛、烟台、秦皇岛 5 个港口的年吞吐能力都在 500 万吨以上，陆路交通有京沪、京广、京沈等 10 多条铁路干线，和包括京津塘、沈大、济青等在内的 20 多条高速或高等级公路。空中有

以北京为中心的 10 多个机场，已开通国内外航线 100 多条。整个环渤海地区通过港口、铁路、公路、航空和正兴起的管道运输，已经初步形成了相互衔接、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

第二，工业基础雄厚，矿产资源丰富。这一地区的能源、钢铁、石油化工、建材、机械电子、轻纺等工业有着明显优势，近 10 年来发电装机总量增加约 1 倍，全年可发电 1500 亿度以上，约占全国的 23%；原油产量 5800 万吨，约占全国的 40%；天然气产量 41.4 亿立方米，约占全国的 26%。在原材料工业方面，目前原油加工能力已超过 5000 万吨，约占全国的 40%；已建在建的乙烯生产能力达 120 万吨，约占全国的 50%；钢产量达 2600 万吨以上，约占全国的 23%。这一地区已经发现的矿产资源多达 110 余种，其中 70 多种已探明储量，而且关键矿种和贵重矿种含量十分丰富。由于矿产资源分布比较集中和开发程度较高，不仅能够满足该地区经济发展需要，而且有能力和出口创汇。第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旅游资源丰富。环渤海地区处于我国暖温季风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交接区，绝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在 5~14℃，无霜期 170~220 天，年平均降水量 350~1100 毫米，气候条件适合多种农作物的生长。这一地区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的 1/5，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的 19%，棉花产量约占 36%，油料产量约占 20%，水果产量约占 28%，水产品产量约占 26%（其中海水产品约占 38%）。近些年，乡镇工业发展很快，总产值达 2000 亿元以上，占本地区农村社会总产值的 52%，占全国农村工业总产值的 30%；平均增长速度为 25~30%，仅次于东南沿海地区。此外，这一地区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许多人文景观均居全国之首。著名的长城和北京的故宫，对海内外游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秦皇岛、大连、青岛等沿海城市，都是海陆景观兼备的旅游、疗养胜地。

第四，科技力量密集，人才优势突出。环渤海地区虽然人口不到全国的 18%，但拥有的高等院校却占全国的 25%（有高等院校近 100 所，中等专业学校 300 余所）。在国家批准建设的 27 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本地区有 7 个；现有科研机构 1000 多个，各种科技人员达 130 多万（约占全国的 27%）。这一地区不仅集聚了全国第一流的科研、教学、管理、规划、设计等机构，而且是全国最大的科技信息中心和图书资料中心，掌握各种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的专门人才在全国首屈一指，这无疑是充分发展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雄厚的智力保证。可以说，环渤海地区的科技、人才优势，决定这一地区无论是科技投入能力、科技产出能力，还是在科技应用能力 and 科技潜能开发等方面，都居全国之首。

第五，有政策优势，对外开放已经出现良好势头。1984 年国家批准的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环渤海地区就有 5 个。1988 年进一步批准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为对外经济开放区，以后又批准 5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在天津港和大连港建立保税区。1991 年 3 月，决定开放东北的黑河、绥芬河、珲春和内蒙的满洲里 4 个城市，给予边境口岸特殊优惠政策。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报告又明确指出，要加速环渤海地区的开放和开发，力争经过 20 年的努力，使之成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之一。这就为这一地区的改革开放、开发建设和经济腾飞，提出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最高决策依据。

3. 制定和实施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几点建议

尽快制定和实施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是这一地区和国家有关部

门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可否这样设想，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总的战略格局是：以京津地区为中心，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为两翼，以区内腹地和陆路交通为依托，以海上交通为重点，面向东北亚，连接太平洋，力争用 20 年左右的时间，把这一地区建设成为能够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相比翼的北方产业中心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

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应以京津联合为中心，特别是要把天津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和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化港口城市。京津两大城市在地理上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又各有优势。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信息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这是天津所没有然而又有有力天津所利用的优势。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说，北京都不宜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这就非天津莫属，天津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有相当的工业、科技基础，特别是天津港位于渤海港伸向大陆的最西端，有国内能力最大的集装箱码头，有全国建设较早、发展较快的保税区（目前已吸引 500 多家外国商社在津设立了机构，开办了 8 家外资银行）。京津塘高速公路的建成，可以更好地把两市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性的高新技术开发带。天津已经建立和正在筹建的一批面向全国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为开展大流通创造了良好条件。北京的十八里店（高速公路起点），去年初也兴建了北京物流中心保税仓库，这就为这条公路带的主要小区享受类似自由贸易区的特殊政策，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作为北京的门户，天津的优势，也就是北京的优势，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环渤海地区乃至全国的优势。因此，以京津为龙头，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为两翼，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开发、开放和建设，使之在经济上成为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鼎足之势”的一极，然后共同向内地辐射，带动全国经济腾飞。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宣传层次。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竞争的经济，要使环渤海地区真正成为万商云集的“金三角”地带，没有一大批思想解放、锐意进取、有胆有识、顾全大局的实干家是不行的。不要以“我”为中心，自我封闭、搞“大而全”、“小而全”，斤斤计较所在地区、部门和企业的一时一事之得失，而要有大将风度，胸怀全局，思路开阔，立足长远。既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更要着眼于全局，着眼于未来，着眼于下个世纪。不仅把环渤海看成是“本地区”、“三北”和全国的渤海，而且要看成是整个东北亚和全世界的环渤海，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和气魄搞好“外引内联”，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同时，要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广泛宣传环渤海地区发展经济的优势及在全国、东北亚和世界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让更多的人了解渤海，认识渤海。

（2）组建机构，早作规划，给予充分的政策投入。为了推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联合，有必要组建协调机构体系，使之成为政策协调、互相开放、统一规划的区域联系格局。（1）由国务院指定国家计委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和三省二市负责人成立“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及其工作机构，负责抓紧制定全区经济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组织协调日常工作和政策导向，重大问题请示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2）可以参照股份制的形式，组建“环渤海地区经济开发集团公司”，作为“促进联合，共同开发，各方受益”的经济实体，负责全区共同关心而又不能单独解决的开发项目的审定与实施。

(3) 设立环渤海开发银行, 并考虑开设北方证券市场。拓宽融资渠道, 有效地吸收国内闲置资金和引进外资, 以便缓解大规模发展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

(4) 由各方面专家、学者组成经济合作咨询机构, 进行有关决策咨询、方案论证和各种学术研讨、交流活动。(5) 建立人才交流和培训中心, 广泛吸引人才和培养人才, 为本地区输送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同时, 国家要继续象建深圳特区和开发浦东那样, 赋予环渤海地区一切特殊优惠政策, 特别是在有关产业、外贸、税收、资金上实行必要的政策倾斜。

(3) 在创造自身发展模式的同时, 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 逐步建立统一的环渤海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大市场。加快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必须在自身发展模式和改革开放两方面, 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一是以名优产品为龙头, 发展跨地区的企业集团。按照谁有优势, 谁当龙头的原则, 发展企业集团, 并逐步形成区域内能够发挥整体优势的企业群体, 以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能力。二是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当前重点培育和发展商品、物资、科技、资金四大市场。在商品流通上, 提倡信息交流与共享, 采取互设“窗口”、联展展销等多种形式, 把买卖做活; 在物资流通上, 建设一批各具特色、面向区域和全国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 在资金流通上, 充分发挥区域内现有资金拆借市场、证券交易市场的作用, 积极探索创办区域性与外资银行合作的开放银行; 在科技、人才交流上, 开通各种渠道, 鼓励人才合理流动, 把一批成熟的、效益好的技术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4) 调整产业结构, 强化群体优势, 尽早促成区内联合。要按照“优势互补, 互利互惠, 兼顾全局, 着眼未来”的原则, 打破地区分割、条块分割界限、在区内开展各种对口支援。通过技术转让、信息交流、人才支援等多种形式, 带动和促进该地区的共同发展。做法上可以先从区内各省市的自身联合起步, 然后再向省外区际合作发展, 以至带动内陆腹地。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 可以打破一、二、三产业的一般顺序, 抓住机遇, 利用自身条件, 实现超常发展。环渤海地区有条件借助港群优势和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及发展具有先导性的科技教育、信息咨询等行业, 发展商贸、金融、保险、旅游、居民服务等行业, 使环渤海地区充分显示发展第三产业的特殊条件和优势。

(5) 充分利用渤海的出海通道, 面向东北亚和太平洋地区, 开展多形式、多领域的对外交流和经贸合作。环渤海地区应确立产品以出口为主、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发展战略。这条产业带在高新技术的开发方向上, 既要考虑国内市场需求, 更要优先考虑国际市场的需求, 产品要以外向型为主。为了进入国际市场, 不仅要充分利用外资, 而且要尽量利用外商的销售渠道, 技术引进渠道, 信息渠道和先进的、科学的管理方法, 最终形成“引进技术 消化创新 扩大技术出口”的新路子。合作的领域可以包括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开发, 工商和其他服务行业, 农林牧副渔及其加工业, 交通运输业, 水利水电工程, 商业贸易, 技术转让, 科技应用, 人才培养与交流, 劳务输出与输入, 资金信贷, 信息咨询, 旅游开发, 环境保护, 生态平衡等多领域、多方面的合作。合作方式可以是民间的, 也可以是多边贸易; 可以是合资、合作经营企业, 也可以是通过股份公司形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开发, 有关国家还可以选择一些港口或边境城市, 建立各自的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 条件成熟时再共同建立经济特区和经济共同体组织, 以至最终实现“环渤海

经济圈 黄海经济圈 环日本海经济圈”（即“东北亚经济圈”的形成）。

建设海上辽宁

海洋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纵观国际经济发展，濒海近洋国家和地区都处发达前列。二战后，世界面临资源、人口和环境的挑战，各濒海国家蜂起向海洋进军，一个以开拓海洋经济为导向的“蓝色革命”正在全球兴起。

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濒海地区对开发海洋经济逐步加深了认识。山东、海南、两广、福建、天津、上海、辽宁等省、市、区先后提出了以海兴省，以港兴市，把振兴海洋经济列入议事日程。再造一个“海上山东”、“海上广东”等等明晰的战略相继出台。八届全国人大第十九次常委会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标志着我国已跻身于全面开发海洋、管理海洋的行列。

辽宁省地跨渤、黄二海，面向太平洋，临近日本海、白令海，连通五大洋。海岸（包括岛岸）2800多公里，海域达6万多平方公里，且气候温和，深水不冻良港为全国之冠。在中国是个海洋大省，在东北亚、亚大经济圈亦居重要地位，具有开发建设海洋经济的丰富资源和有利条件。

辽宁省自1986年提出建设“海上辽宁”以来，海洋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到1995年海洋经济总值可达300亿元，约占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的10%。然而同临近的山东和周边的韩国、日本、俄罗斯（远东）比较，以及同辽宁海域具备的区位优势和资源潜力比较还有许多差距。

首先，人们的海洋经济意识，特别是各级领导还不够强。长时期来，由于辽宁是祖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人们头脑中已经形成浓郁的陆地经济观念，对海洋开发建设的认识自觉性不高。因此，虽然过去也做了一些起步工作，并取得相当的成果，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向海洋发展的战略和完整的“海上辽宁”开发建设规划。因而，事关海洋疆土测定、海洋功能规划、海洋科研、海洋法规保障、海洋开发建设、资金的筹措与投入、海洋经济内联外引的发展都没能进入系统、科学的规范阶段。这就势必影响和阻滞了辽宁海洋事业的开拓与进步。

其次，海上产业布局构成、规模、资源利用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海洋经济，囊括以海洋资源为对象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全过程。是个多门类、多学科、多功能的宏大经济与科学范畴。以产业为例就包括海上港口，航运，海产养殖捕捞，涉海工业制造，海上石油化工，盐业及盐化工，海上旅游等等。辽宁省长时期来由于对海洋资源开发规划不够，投入不足，所以从总体上产业布局构成、规模、资源利用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另外，海上经济开发与建设的体制不顺。正由于海洋经济是涉及多门类、多部门、多行业的新兴产业，因而就必然牵涉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上下左右的关系。诸如港口航运与海上养殖业；水产同盐业；工业排污和海上环保；建港与苇业；工业建设和旅游；石油天然气开采与水产以及市与市、县与县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海上经济开发与建设的体制不顺。而这诸多矛盾长期存在，不得解决，再好的战略和规划，也难免被部门、地区之间的“扯皮”而搁浅。及至现有科研力量不能集中使用，海上投入不足，海洋经济诸多部门管理水平不高等等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我们应站在世纪高度，用确立划时代的雄心来思

考“海上辽宁”的兴起。辽宁已提出实施“三大战略”、迎接新世纪，建设新辽宁的发展目标。增强海洋意识，发展海洋经济，加快“海上辽宁”建设，是我们建设新辽宁急需解决的一件大事。

首先，要从战略高度进一步认识建设“海上辽宁”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果说，建国40多年来，已经建成一个陆上工业基地的辽宁，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在进行老基地改造，持续发展的同时，还要建设一个“海上辽宁”。使之成为新世纪新辽宁的新经济增长点，使辽宁省既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工业大省，又将成为中国的海洋经济发展基地，海洋经济大省。而且在未来世纪亚太经济区形成中和东北亚经济圈内占据重要一席。为此，就必须把“海上辽宁”建设列入辽宁省跨世纪工程之一。

其次，要全面、正确、科学地理解海洋经济内涵。实施正确的领导和引导十分必要。海洋经济，它是融资源、科技、产业、信息、商贸、金融、旅游多学科多门类的综合经济，绝非仅仅是“兴渔盐之利，通舟楫之便”狭义的传统海洋经济观念。从发达国家海洋经济开发与建设观察：几乎是陆上有什么产业，海上有什么产业，陆上有多少政府职能，海上需要延伸多少职能，因此强化领导力度，理顺海洋开发建设中的调控体制是当前我省推进海洋经济上水平、上质量，向纵深发展的突破口。只有从这里迈出坚实的一步，才能为“海上辽宁”开发与建设奠定比较牢固的基础。而迅速建立省一级统一具有权威、效能和效率的领导机构（如“海上辽宁”建设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是打开局面的首要环节。通过这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决定“海上辽宁”建设的方针大计，布政施令，宏观调控，顺畅体制，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在省级领导机构的统一筹划和指挥下，制定“海上辽宁”开发建设规划，纳入省人民代表大会审定的议事日程，作为“九五”和2010年全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为保证“海上辽宁”开发建设规划的准确、科学性，当前亟应集省内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和技术力量，对辽宁省海岸、海上疆土进行海域功能勘测界定。明确海洋经济开发与建设中各业的地位，界定建设区、经营区、国防区、预留区。界定港区、航道、养殖、工业、排污、农业、商贸、旅游各业从业范围。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海洋经济开发中，港口、航运业居“龙头”地位。其他各业遇有同港航发展矛盾时，应以服从港航需要为前提。这是因为港、航产业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它每创1元产值会给其他各业创造7—8元的价值，这已为国际、国内实践所证明。这个海岸功能规划一经确立，即应通过人大立法，以示规范。这一工作可在省里指导下以沿海各市为单位走第一步，在各市界定的基础上省再判定全省的海岸功能规划。为了取得经验，亦可以先在一两个市先行试点，作为示范区。

第四，鉴于海洋世纪的到来，充分发挥港航优势，创立海岸工业带已成为当今时尚。这种产业营运方式是以吃国外资源为前提，“两头在外”。这是同国际接轨，走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作为老工业基地的辽宁，未来世纪工业布局应顺应这个世界经济的大趋势，向沿海转移和布建新的冶金、石化、建材、机械，电子各业，像宝钢那样吃国外料，出高精品，进国际市场。辽宁渤海二海的深水不冻良港待开发者为数不少，正适应重化工沿海工业带生产、吞吐的需要。况且目前辽宁省沿海六市已有相当的重化工工业基础和一定规模的港航条件，加之辽宁省沿海石油、天然气储量可观，制盐和盐化工发展潜力居优，海上耕牧和海上旅游已有相当基础，只要确立

海岸工业带的新思路，瞄准国际市场在精深加工上大作文章，辽宁省的沿海工业带将是大有作为的。

第五，组织涉海科研力量，大力开展海洋高科技项目研究，不断推出新的科研项目研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为此要建立海洋科学研究组织协调机构，设立海洋科学研究与开发基金。

第六，集中海事研究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组成“辽宁省海洋经营研究会”，作为“海上辽宁”领导机构的咨询部门。凡涉海事宜，注意征询研究会的意见或建议，以求决策之善后。

第七，海洋经济愈是发展，港航的“龙头”作用愈要加强。纵观国际、国内先进管理方式，港航的行业管理必须集中统一。故发挥“大交通”管理职能不容忽视。辽宁应强化以交通厅为主的行业管理职能，港口、航运则应以省航运局为主管部门。

第八，筹组“海上辽宁”开发建设资金，可取多渠道、多种方式、多头吸纳的办法。如财政投入，吸引外资，动员有实力的企业集团开发海上经济。

六 海南：中国级航空母舰的升火

海南，这座中国级航空母舰终于在南海上升火启航了，它驶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海洋。得天独厚的面向大海的外向型优势，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融入了中国发展的大潮，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能和亚洲四小龙决一高下吗？

海南发展的外向型经济

1. 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海南的必然选择

亚洲“四小”经济崛起的经验说明，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开放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海南作为中国开放面积最大、层次最高的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也是必然选择。海南岛地处南海，是亚太地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情况看，海南的经济发展水平太低，与亚洲“四小”的经济合作不活跃，才使它在这个地区的作用没有显示出来。利用这样的“地利”条件，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亚太地区的分工与竞争，亚太地区才有海南的“一席之地”。

(1) 海南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必要性。

海南发展外向型经济是中央给予比深圳等经济特区更特殊、更优惠、更开放的政策和自主权所决定的。早在全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从战略全局上提出了加快海南开发建设和发展的问题。1980年7月24日，国务院在批转“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的文件中指出：鉴于海南岛的特殊地位，中央决定要对海南岛的经济建设给予大力支持，1983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批转《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海南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开发建设这个资源丰富的宝岛，对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国家四化，巩固南海国防都有重要意义”。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同志会见外宾时，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建立海南经济大特区的思想，他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9页）。此后，中央根据邓小平创办海南经济大特区的重大决定，并实行比其它特区更特殊的政策。海南建省办特区后，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仅建省头三年固定资产投资达170亿元，大大超过了海南建国后三十多年全民所有制国家资产投资总和，仅1993年一年，固定资产投资就完成了169.4亿元。建省办特区五年，已实现中央在建省办特区时的达到国内平均发展水平的第一步目标。

1994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9.7亿元，比建省前的1987年增长6.44倍，平均每年增长13.6%。外贸出口总额达6.44倍，比1987年增长2.34倍。实践证明，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海南实行更加灵活开放政策，建设大特区的应有之意。

1 海南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明智的选择。

亚洲“四小”的崛起，全球经济贸易正向这一地区转移，有人断言：“21世纪将是亚洲太平洋时代”。海南岛地处南中国海，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国家的前沿地区，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其经济发展与亚太地区毗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状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7年多来的特区建设，在国内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瞩目。与此同时，海南特区的经济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

与亚洲“四小”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一些先进地区比较，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海南特区要克服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和困难，再造特区优势，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顺应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历史潮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面向亚太、面向世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借助当今亚太地区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高速发展，贸易地位上升，投资势头强劲、区域合作潜力巨大的好机遇来推动经济的蓬勃发展，这是明智之举。

2 海南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技术革命，使全球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比较利益原则的驱动下，世界各地、各地区都集中自己的资源优势生产和销售其比较利益最大的产品和劳务，而将那些利益较小的产品或劳务转让给其他国家和地区。世界上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为了加强自身的竞争力，纷纷进行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优势资源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产业的国际分工和阶梯转移，一直持续到现在。

8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影响，特别是由经济发展技术的进步，必然带来产业的升级换代和分工格局的重新调整。经济发达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经济结构调整，与此同时，也加紧产业结构的调整。进入80年代，日本迈向产业结构的第三次调整阶段，在经济结构上，实行从以出口主导型经济为主向以内需主导型经济为主的战略转变。产业结构方面，主要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服务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并致力提高第三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在发达国家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相应开始升级过程，在经济结构上，继续实行出口主导型战略的同时向内需型方向发展；产业结构方面，主要发展耗费资源较少，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经济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发达国家把高技术的投资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同时，又把那些将淘汰的产业或技术密集低而劳动密集高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机会。从而在亚太地区形成了多层次、阶梯状的国际垂直分工格局。纵观亚洲“四小”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们都是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之机，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刚开始它们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因而朝鲜和台湾在轻纺工业和重化工业部获得发展。进入80年代以后，韩国的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产值和出口总额中均超过一半。韩国和台湾的造船、化工和家用电器等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新加坡在70年代以后也形成了以炼油、造船和电子为核心的工业结构，香港已从过去的转口贸易港发展成既有加工工业又有发达的金融贸易的经济中心。亚洲“四小”经济格局新的变化，正是这一地区又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大转移和产业分工体系分化重组的反映。由于新的分工体系的形成，产业结构的跨国化，给海南特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高提供了新的契机。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来加速调整产业结构，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使海南特区参与国际经济和亚太经济的大循环，借助亚太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力态势，推动海南特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3 海南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利于大量引进外资。

加速海南开发建设的主要困难是资金的严重缺乏。按照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初步测算，从现在到 2007 年，海南建设共需资金 2000 亿元（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资金来源有三个渠道：一是靠岛内自身积累；二是内地支援（包括国家拨款贷款和内地投入）；三是利用外资。根据海南目前的基础，近期靠自身积累不可能有很多，靠国家的支持亦有限，因此，应更多地争取利用外资。亚洲“四小”的发展经验表明，外资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外资特别是来自工业国家的资本输出总是附带着新的比较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乃至新的管理观念进行的，对于加快企业技术进步，提高国民经济素质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四小”在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之初，就大量吸收国外投资或国外贷款，以弥补资金的不足，并使本国经济迅速参与国际分工，加快现代化进程。海南建省前，利用外资少，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特别是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海南远远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1980—1986 年的七年中，海南岛的“三资企业”合同规定的外资额仅 2.24 亿美元，实际利用的只有 0.67 亿美元，建省办特区七年多来，海南利用外资势头迅猛发展，到 1994 年止，全省共利用外资 46.7 亿美元。一些大财团、跨国公司纷纷前来洽谈规模大、档次高的项目。如于元平先生投资开发实行全封闭式管理的洋浦开发区，还有其他外商投资的港澳开发区、金盘开发区等，外资规模的扩大和投向的改善既与亚太地区经济和产业国际转移有关，也与海南特区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有关。因此，海南特区要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就要借助亚洲“四小”投资势头强劲，区域合作潜力巨大的有利态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更多地吸引外资，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4>海南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海南特区与亚洲“四小”中的台湾刚起步时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对发展外向型经济相当有利。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倾向愈来愈明显的今天，加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显得更为重要。它能减轻亚太国家对其它经济集团特别是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从而在更大程度上经得起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短期衰退可能对亚太国家产生的冲击。海南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加强亚太地区经济贸易合作，这对于促进本地区的产业调整，从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海南特区要以大陆为依托，发展外向型经济，面向亚太地区，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借助亚太地区贸易地位上升的有利态势，推动海南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2）海南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可行性。

目前，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局势日趋平稳，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是国际资本投资的重要区域。地处亚太腹地的海南完全可能通过扩大开放，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加速经济发展。从海南自身来看，已经在多方面具备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条件。

第一，海南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有利条件。

1 独特的地理条件

海南岛地处南中国海，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国家的前沿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目前，在亚大地区，由日本、南朝鲜、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国家组成了一条经济高速增长的“繁荣孤线”，其中有些国家和地区相线投资方兴未艾，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海南正好处在这条新月形经济增长带的中间地区，以海南的面积，人口、资源优势，只要实行更加开

放的经济政策，大力吸引外资，积极参与这一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就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使海南的经济有一个比较快的发展，从而使海南成为环太平洋经济增长带上有力的一环。

2 优越的资源条件。

海南地上、地下和海洋资源都很丰富，尤其具有发展新兴产业的潜在资源优势，旅游资源、矿产资源、热带农业资源、海洋资源都非常丰富。这些丰富的资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大规模吸引外来投资进行开发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3 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条件。

海南建省办特区以来，已经在电力、交通、通讯等多方面建起了一定规模的基础设施，这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奠定了基础。

能源——全省电力装机容量 1994 年达 120 万千瓦，比建省前增加了 3 倍，已成为电力自给省。

交通——公路通车里程达 1.29 万公里。海口至三亚东线高速公路 1994 年全线开通。68 个天然港口开发 24 个，万吨级以上泊位由建省前的 2 个增至 10 个，海口机场客流量已进入国内十大机场行列。三亚凤凰机场已开通，海口美兰新机场已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兴建，琼州海峡火车轮渡工程正在筹建，预计 1996 年火车出岛与大陆铁路干线连结。

通讯——现有长途电话 8808 条，可直拨全国 1400 多个城市和 210 个国家和地区。全省市话装机容量 26.89 万门，比建省前的 1.9 万门增加近 25 万门。全省电话普及率达每百人 3.15 部，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海口市每百人 31.1 部，成全国省会城市首位。

4 海南已具备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社会条件。

海南从地理、资源、政策总体优势来看都优于全国其他特区和开发区，海南自身的条件决定了外向型经济的程度可以更高，办法更活，速度更快。经过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实践，已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体制。

——在省一级实行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新体制，初步建立了以间接管理力主的宏观调控体制。同时，按照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按平等竞争的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转变了政府职能，对企业及市场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已大大减少。

——建立了符合国际惯例的企业直接登记制度，减少办事程度，提高工作效率。

——大力推行股份制改革，发展股份制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已初步形成。

——市场调节范围逐步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逐步形成。在生活资料价格改革上，海南率先走在全国之前。早在 1993 年底，海南就把除粮食之外的所有生活资料价格开放，并形成了包括商品、金融、技术、劳务、房地产等在内的市场体系，各类市场十分活跃。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已完成养老保险，待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公费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并以政府行政法规形式颁布实施，与海南省经济体制相配套，打破了行业，经济成份的界限，为搞活企业，促进劳务市场的发育创造了很好的社会条件。

此外，健全法制，严格依法办事是经济特区的必要条件和管理经济特区的主要形式。7 年来，海南省共颁布地方法规、行政规章 186 项，海南的经

济和社会工作开始走上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卫生等事业发展较快，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民安居乐业，尤其是广大群众的商品经济观念较浓厚，对市场竞争有一定的承受力。

第二，海南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制约因素

1 经济发展水平低，后劲不足，海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与其他沿海省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经济中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仍未改变，工业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全省还有 52 万人未脱贫。

2 陆岛交通不便。由于与大陆相隔，陆岛交通仅靠汽车轮渡联接，十分不便，客货运输成本高、周期长，这是海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3 资金缺乏，人才不足。1994 年海南财政收入 34.6290 亿元，支出 40.0117 亿元。入不敷出，还需要由国家补贴，能够投入经济建设的资金极其有限，1993 年全省共有各类专业人员 12 万人，占总人口的 2.7%，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仅有 1.8 万人，这与海南经济发展的要求、差距甚大。

4 地区发展不平衡，海南建省后经济发展很快，但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海口市是全省经济中心，1992 年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的 26.8%。扣除海口市外全省各市县平均国内生产总值 5.8 亿元。东亚、琼海，澹州、琼山、文昌和万全等沿海 6 市县国内生产总值均大于此平均值，而其余市县特别是中部山区市县国内生产总值均低于此平均值。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全省经济的发展速度。

5 海南在引进海外资金、技术等方面，与国内其他省区市特别是邻近的沿海区市将形成竞争，在保护、扩大本省产品的国际市场方面，还会遇到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的困扰。

2. 海南外向型经济模式的选择

外向型经济是相对于内向型经济而言的。主要是指一定国家或地区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大力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建立起面向国际市场的经济运行体系，以此带动和促进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1) 外向型经济模式的类型。

战后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自由经济区的蓬勃发展。所谓“自由经济区”就是指在一国内划出一定的区域，在区域内实行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的更为灵活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商外资前来从事各种生产性和商业性的经营活动。从而达到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参与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并以此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对外经济联系的桥梁，推动全国经济发展。这种自由经济区，主要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我国称为“经济特区”。

战后世界自由经济区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上增多，也表现在自由经济区种类和功能增加，如贸易和转口贸易区，出口加工区、工贸结合、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自由区，以及与旅游、饭店、服务等其他各项事业相结合的综合性的自由经济平等。总的来说，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不同，设立自由经济区的目的及功能不同，各国自由经济区的称谓也不同。在国际上，自由经济区大体为自由港、自由区、转口区、自由关税区、保税区、

保税仓库区、自由贸易区、免税贸易区、边境区、自由边境区、落后地域开发区、科学工业园区、硅谷、自由货币金融区、自由旅游区等。

1 世界外向型经济的类型

世界上外向型经济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按照其产生及功能的不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a.自由港。也称自由口岸，它有完全自由港和有限自由港之分。前者对所有外国商品进口一律免税或实施不同程度的贸易管制。如直布罗陀、汉堡、香港、新加坡等均属有限自由港。自由港都划在一国关境之外，外国商品免税进口后，可自由仓储、改装、挑选、加工、制造和销售，只是在从自由港进入所在国海关管辖区时征税。

b.自由贸易区。又称免税区，对外贸易区等。

它是在自由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自由港在区域上的扩大和功能上的发展。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从其海关管辖区划出来一部分地区，其主要功能与自由港基本类似，以转口贸易和发展对外贸易为主，对外国商品免征进口税，在区内也可自由储存、分装、加工、制造等，然后再免税出口。

c.出口加工区。又称客户工业区，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港口或邻近港口、国际机场等地方划出一定范围，对外商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外国企业在区内投资设厂，生产以出口为主的制成品的加工区域，以扩大对外贸易，发展外向型经济。

d.科学工业园区。又称高技术园区、科研工业区、科学公园、科学城等，是世界上出现较晚的一种自由经济区。科学工业园区是指一国有具有较集中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工业区的地区划出一定范围，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新技术和高级人才，进行产业开发，并以消化先进成果带动传统产业进步。

e.自由边境区。自由边境区是指在一国的边境地划出一定的范围，按照与自由贸易区或出口加工区类似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国企业投资设厂，开放边境地区的自由区域。

f.保税仓库区。又称促税区，指一国海关设置或经海关批准注册的特定地区和仓库，外国商品出入库不缴纳进出口税，在该地区可自由存储、改装、分类、加工制造等。存储时间各国有所不同，设立保税仓库主要是为了发展转口贸易，增加有关各项费用收入。

2 世界外向型经济的特点

战后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重大变化之一是，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其势头至今方兴未艾。进入 80 年代以来，世界自由经济区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可归为五个方面。

a.自由经济区的功能在日益综合化。战前自由经济区的功能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减免进出口税等手段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战后，特点是 70 年代末出口加工区的兴起，使自由经济区由过去传统的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发展贸易扩大为以出口加工工业为主，同时还经营农业畜牧业和渔业产品的加工，后来又发展经营旅游业，金融保险业以及科学文化等事业。

b.科技工业园区的发展势头在日益加速化。科技工业园区最早产生于 50 年代，经过 60—70 年代的发展，到 80 年代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浪潮，各国竞相兴办科学工业园区。科技工业园区是一种以知识、人才、技术高度集中和教育、科研、生产和经营一体化为特征的新型自由经济区。

c. 发展中国家出口加工区的产业结构日趋多元化和高技术化。出口加工区是在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功能不再是单一的为了扩大对外贸易，而是在继续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发展出口加工工业，以及其它服务业。

d. 自由经济区本身的投资环境日益完善化，在国际竞争尖锐和经济生活日趋国际化的情况下，各设区国力争夺外资和先进技术，都竞相采取一系列对外商优惠的政策并表现“优惠条件战”的现象。为此，使世界自由经济区的投资环境不断完善和提高。

e. 建立自由经济区的行为主体不断出现跨国企业，也可以通过购买股票、债券等有价值证券进行投资。外商可租赁承包海南各企业。根据海南发展需要，境外金融家可以设立外资银行和合资银行。

f. 对货物进出，资金进出，人员进出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2) 海南特色的外向型经济模式。

确定海南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从海南资源特点和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关于设立海南省的议案中指出：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面积 3.4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 700 多万。海南岛海域广阔，资源丰富，雨量充沛，是一块热带、亚热带主地。建国 30 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海南岛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受很多条件的限制，海南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与全国其他沿海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海南岛资源丰富而经济落后的特点。

根据海南岛自然资源丰富，面积大、人口多，与大陆经济联系密切，作为国内最大的热带作物生产地区和具有“不可替代”地位等特点，决定了海南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的矛盾将十分突出。而海南现在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工业是简单的资源粗加工，这都是海南经济从内向型转向外向型的必然。台湾从内向型向外向型，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科技密集型发展的几个阶段，促进经济迅速发展。这方面，台湾的经验是值得海南借鉴的。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台湾的工业化就经历了一个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的转化过程。50 年代，台湾生产力水平低，工业落后，物资供应紧张，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台湾推行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进入 60 年代的台湾，利用世界科技发展，西方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有利时机，迅速使内向型经济转向外向型；进入 70 年代中期，台湾外向型经济又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和科技密集型，进行“工业升级”和“技术升级”。

生产力水平落后于台湾的海南省，要发展外型经济也必然要经历一定的过程。海南的发展不能忽视国内市场，不能忽视国内投资，应以外向型为目标，并注意把出口导向同进口替代有机地结合起来。海南作为中国最大、开放层次最高的经济特区，所要建立的是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合作方式和管理方法可以试行，这必将加快海南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1 海南模式与亚洲“四小龙”模式的异同

海南岛与亚洲“四小龙”在地理条件、人文条件以及发展的环境上有许多相似和共同的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基础、政策、体制、速度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共同点：

a. 相似的地理条件

海南和亚洲“四小”具有极为相似的地理条件。它们都是岛屿型的区域，同在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航线上，海洋成为它们之间联系的纽带。同时，热带地理环境也极为相似。它们都处于热带或亚热带，有相同的热带动、植物资源，有酷似的热带风光，有相同的气候条件。

b. 人文条件相似

海南岛与亚洲“四小”不仅地理条件相似，而且人文条件相得益彰。海南和“四小”都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

c. 历史上都曾被入侵或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二战前，台湾岛曾被日本人统治长达 50 年之久；中英鸦片战争后，1841 年香港被英国占领，并沦为殖民地；新加坡是 19 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斯但弗海·莱佛士在这个岛登陆时，与该岛当时统治者天猛公谈判，最后以 3000 两西班牙银元买下的。1965 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成立了新加坡共和国。海南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被国民党统治，1939 年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垄断和掠夺，至 1950 年才获得解放。

不同点：

a. 基础条件不同

海南岛与“四小”的台湾岛都有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垄断和掠夺的历史。日本占领海南岛有 6 年左右时间，而盘踞台湾则长达 51 年。在这半个世纪中，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台湾农业生产有巨大的增长，工业也出现了飞跃。解放前夕，大陆的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大批地流到台湾，而人民政府接管的是一个破旧、混乱的海南。海南岛自古米谷不足，由大陆输入，而台湾在清代前期就做到稻米自给有余，并大量输往内地；1939 年日本占领后海南才修铁路，1940 年台湾铁路已达到 907 公里；1922 年海南岛上才开始筑公路，而 1920 年台湾就有公路 3553 公里；1939 年台湾工业生产额超过农业居各产业之首位，而直到 1950 年海南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大约是 10%。1949 年前后，台湾的农业总产值、动力、交通、出口额比海南高得多。通过这一比较，我们会发现，历史上琼岛与台湾岛的开发其基础不同。

b. 策略方面不同

据 1962 年 4 月 27 日《海南日报》援引新华社的报道，美国军舰又侵入我国西沙群岛海域，我外交部提出严重警告。报告还说，自 1961 年 1 月至今，美国军航和飞机侵入我国领海领空的军事挑衅活动平均每月达 6.8 次之多。这就是海南在五、六十年代面临的外部环境。面对这种特殊的外部条件和海南特殊的战略地位，毛泽东同志提出：“加强防卫，巩固海南”。由于出于军事的考虑或政治的原因，海南岛的开发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1970 年以后，因为南海海域战略形势的改变，以及为了对付越南的需要，海南岛的经济的发展受到重视。1980 年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比照深圳、珠海特区的办法，开放海南岛的对外经济活动。1988 年 4 月 13 日，海南建省办特区，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海南更加特殊的政策，旨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

亚洲“四小”深谙本地实情，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从事外向型经济和转口贸易的开拓。60 年代初，正值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第二浪潮掀起，“四小”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适时将其经济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型转向出口导向型。由于发展策略明确，它们的出口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率都很高，新加坡一般为 130% 至 150%，香港亦在 110% 以上，台湾和韩国分别力

50%和 35%左右。它们承接从日本、西德传递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合本地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和出口。以此带动经济增长，从而造成了“四小”腾飞的“启动机制”。

c. 体制方面不同

从地理条件、资源特点、经济联系看，海南岛是一个整体，但体制上却是奇特的“多元化”，人们对此的形象说法是“三国四方”：即地方（又分为汉区、自治州）、农垦、驻军，它们各自为政。其行政计划体制特征是“多头齐下”。这种体制使海南全岛不能协调一致，进行综合平衡，强化了重复布点，盲目建设，加剧了内部的相互封锁和原料争夺，增加了各方面的摩擦，对于海南的整体开放的建设极为不利。建省办特区使海南的体制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但不合理体制对海南的不利影响毕竟长达三十七年，使海南失去很多投资建设的机会。

亚洲“四小”在战后 40 多年间，其经济起飞，它们顺应当时的世界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际性的剩余资本的转移流动，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呈现持续发展趋势，把握机遇，从而登上了世界经济的舞台，这是国际环境有利的作用。同时，“四小”都不同程度地增创体制上的优势，重视市场机制的灵活调节作用。香港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使市场价格能及时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由市场来引导企业的生产和销售；80 年代韩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到“民间主导型”体制的转移。1980 年提出了“五五”计划，重视国际市场的信息反馈和自由竞争机制，调节了过去单纯注重金融、税制、汇率等方面对出口部门的扶植方式，强调用技术革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全面加强整个国民经济的国际化水平。

d. 发展速度不同

海南原是一个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海岛，经过解放后多年的开发建设，海南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由于众多的原因，直到建省前海南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总体水平大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以人均工农业总产值而言，

1986 年海南为 662.30 元，仅为全国 1256.70 元的 52.7%。主要原因是：第一，历史上的海南岛经济发展很缓慢。比如说，海南岛与台湾岛面积相差无几，海南岛自然资源比台湾岛丰富得多，但历史上台湾岛的开发比海南岛要早一、二百年；第二，海南地处国防前线，50 年代至 70 年代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加强防卫，巩固海南”；第三，行政管理体制不合理。建省前，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多元化”，即地方、农垦、驻军，它们各自为政，这使得海南宝岛不能协调一致进行综合平衡，对于海南的整体开放建设极为不利；第四，开发建设海南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多次出现失误。“大跃进”使海南的经济建设遭到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又几乎把海南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1985 年发生的海南“汽车事件”延缓了海南对外开放和经济开发的进程。

改革开放对海南最直接的意义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省办经济特区 7 年来是海南开发建设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实现了中央提出的“争取三、五年赶上全国平均经济水平”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社会生产力水平、综合实力和人均国民收入都比建省前有了较大的提高。一个开放型、外向型的经济体制基本形成。但海南原来的经济基础差，底子薄，与全国其他各经济特区相比，享受优惠政策时间最短。直到目前全省仍然属于从投入到产出的过渡期，国民经济尚未能发挥出应有效益，综合国力仍然十分薄弱。与亚洲

“四小”相比，差距还很大。

2 中国特色的海南模式的特点。

中央决定海南岛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因为它贫穷落后，在“天时、地利、人和”的要素中，海南岛占有“地利”的有利条件。这种“地利”又不仅仅是毗邻港澳，而在于它是我国一个很具特殊性的地方：第一，特殊的自然环境。海南是一个“岛”，“孤悬海外”，是中国整个“黄金海岸”的“外国”，不但毗邻港澳，距离东南亚也最近，历史上与那里的联系也较广泛。因而，开放海南岛可利用它做为海岛地区的一切优势，来促进与内地各省、市及海外各国（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加快经济的开发进程；第二、特殊的自然资源。海南是中国唯一的一块大面积的热带地区，在自然资源方面在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的开放建设，应该为 12 亿人口保留足够的热带栖息空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海南岛的开放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热带资源拥有量的极大不相称，以及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应有的作用尚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要解决这些问题，使海南经济“活”起来，关键的是海南要有一个高度开放的模式。亚洲“四小”的发展经验表明，建立自由贸易（出口加工区、自由港等）区是发展中国家开发落后地区的一个重要方式。比如，南印度洋的岛国毛里求斯总结自己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后，找到了向现代化进军的新路——自由区。自由区建立，使该岛已初步建成了一套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其纺织品服装加工、电子，精密仪器以及珠宝首饰的加工都用上了现代化先进技术，产品达到先进水平，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竞争力。要使海南的经济“活”起来，应尽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由经济区。

a. 建立海南自由经济区的可行性分析

当前，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局势日趋平稳，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是国际资本投资的重要区域。地处亚大腹地的海南完全可能通过扩大开放，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加速经济发展，从海南自身来看，已经在多方面具备建立自由经济区的条件。

首先，海南有独特的地理条件，便于“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搞经济特区，没有隔离就不可能安全特起来，不隔离就不便于给特殊优惠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南岛最具实行特惠，建立自由经济区的条件。海南岛四面环海，这种自然封隔的地理条件决定它拥有其他特区所没有的对外开放的优势。由于有琼州海峡这道天然屏障将其与大陆隔离开来，只要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管理“二线”，海南岛全面对外开放就不会对内地产生冲击。

其次，海南优越的资源条件，是建立自由经济区大规模吸引外资的重要基础。

海南地上、地下和海洋资源都很丰富，尤其具有发展新兴产业的潜在优势。其旅游资源、矿产资源、热带农业资源、海洋资源等非常丰富。这些丰富的资源，为建立海南自由经济区，大规模吸引外来投资进行开放投资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再次，海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具有建立经济区的投资条件。

海南建省办特区 7 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建省前 36 年的 4 倍多，基本建设投资为前 36 年的 87.23 亿元的 3 倍，仅 1993 年一年的投资超过了前 36 年的总和。已经在能源、交通、通讯等多方面建起了一定规模的

基础设施，这为建立海南自由经济区、大规模吸引外资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海南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建省以来，实行的股份制改革，企业登记制度改革、税收征管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取得较好的成效，这为海南建立自由经济区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b. 建立海南自由经济区的意义评价

二战以来，日益发展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迫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目前世界上开放度最高，经济发展最成功的自由经济区——自由港的经济发展表明，在经济活动日趋国际化、多元化的今天，不仅要有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还要有一整套适应国际经济活动的自由外汇、金融、贸易制度与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还要有良好的投资环境相配合，才能全方位大规模吸引外资，推动经济全面发展。海南要想大规模吸引外资，推动经济全面发展，就必须比照世界自由港政策，在继续改善投资环境的同时，全面实现货币兑换自由、资金进出自由、商品进出自由。亚洲“四小”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成功经验也说明，开放与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联系。经济开放，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上，使本国或本地区经济迅速加入世界经济循环，一方面为利用外资创造条件，一方面在内部建立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而这反过来又促进国内资本动员、推进经济发展。海南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金投入。大规模引入外资，就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资料表明。目前利用外资取得较好效益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利用外资的水平平均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1/3 左右。亚洲“四小”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外资利用水平更高。建立海南自由经济区，比照世界自由港模式，在海南建立一种原则上完全放开的自由贸易制度，将对商品货物减免进出口税，使其在岛内自由输出输入，着重于发展转口贸易、旅游、建筑、交通运输以及通讯等。而在主要构成上，将对引进项目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并利用自由经济区船货出入的方便条件，建立各种出口加工区。这样，在自由区内，将打破工商分家，产销脱离的状态。与其它特区不同，海南岛 3.4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绝大部分是农村，700 多万人口中有 500 多万是农民，如何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保证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特区开发建设的展开亦有不断提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海南建省办特区 7 年多来，海口、三亚的开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广大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地区，不但比较落后，特区经济发展中城乡“二元”结构现象还相当明显。海南特区是 700 多万人民的大特区，只有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特区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才能充分体现海南最大经济特区的全面发展。从这一点来说，只有建立海南自由经济区，才能逐步地解决特区经济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为此，通过建立各种贸易公司，全面推行工贸结合、农贸结合、技贸结合，使农、工商和内外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有力地推动和促进海南经济的起飞。

建立海南自由经济区，不仅对海南的经济发展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大局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提供大量的热带、亚热带作物产品；有利于 21 世纪大西南、大西北的大规模开放；有利于加强与港澳、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广泛联系，扩大国际影响；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南疆的繁荣和稳定，巩固南海国防；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之与经济特区，

开放城市和地区在一起，促进社会主义的“全方位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平方式不只是“一国两制”，还有“共同开发”的方式。因此，建立海南自由经济区，还将有利实现“共同开发”这一光辉构想。

3. 海南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对策

海南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就是充分发挥海南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资源优势 and 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步形成具有海南特色的以工业为主导的、国内市场为基础、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工农贸旅并举、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的外向型综合的经济结构。

(1) 海南外向型经济发展目标。

1 近期发展目标

国务院在国发[1988] 24 号文件中要求海南紧紧把握住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加快经济开发建设，争取在三、五年内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到本世纪末达到国内发达地区水平，进而为赶上东南亚经济发展较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而努力。

根据国务院提出的要求，结合对九十年代海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分析，《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纲要》中确定，海南九十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是：199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997 年提前达到小康水平，2000 年力争达到全国先进地区水平。

2 远期发展目标

从 2001 年至 2010 年，海南的国内生产总值要到 1815 亿元，人均 GDP 达到 2000 元。达到东南亚（除“四小”外）较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

3 实现目标的可行性

海南岛要在近二十年内赶上东南亚较发达国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必须达到 12.5%—13%，虽然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发展速度，但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因为：

第一，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许多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200 美元左右提高别 2000 美元左右，一般需要 15—20 年的时间，海南岛用近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4 年）的 580.7 美元，提高到 2300 美元左右，应该说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目标。

第二，从经济发展速度看，海南岛要在近二十年内赶上东南亚较发达国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必须达到 12.5%—13%，这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曾经达到或大大超过的速度。

第三，从海南建省办特区以来经济发展速度看，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预计由 1990 年的 95 亿元增加到 1995 年的 361.5 亿元（1990 年价格），年均增长 17.2%。“八五”期间预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730 亿元。比“七五”期间增长 5.6 倍。其中基本建设投资 430 亿元。更新改造投资 48 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 197 亿元。一批重点建设和技改项目陆续建成投产，主要产品生产能力不断扩大，新产品、新品种不断增加。特别是炼油厂、化肥厂、水泥厂、钢铁厂等动工建设，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口保税工业区和亚龙湾国际旅游开发区的批准设立和开发，将为今后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四，海南岛虽然具有发展经济的相对优势，但也存在着制约经济发展的相对劣势。这些劣势主要表现在：经济技术落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资金和人才紧缺，台风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不稳定等。

（2）当前的政策取向。

海南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外向型、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这将要求亟需产业政策的指导。因为，决定宏观经济效益的关键，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企业经济机构的合理化。而解决这个问题要靠产业政策和企业组织结构政策进行干预。海南要发展外向型经济，关键就是要通过产业政策的诱导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高度结构化。

1 产业发展方面

产业发展政策是加强宏观调控，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素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期间，要从产业组织、产业技术和产业布局等方面，不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引导社会投资，适度超前发展基础设施和市场建设，加快发展支柱产业，带动特区经济的全面振兴。

a. 产业组织政策。要通过企业合理竞争，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协作，形成适合产业技术经济特点和市场经济要求的产业组织结构。对海南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要积极扶持，加速发展，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形成有海南特点的产业。鼓励企业通过平均竞争和合并、兼并、相互持股等方式，自由进行联合改组或组建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乃至跨国经营的企业集团。

b. 产业技术政策。要在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同时，大力引进科技人才，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地增加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加强应用技术开发并鼓励应用技术研究走向市场，引导应用技术研究部门参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国产化工作，把应用科研的重点转到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技术创新上来，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的速度，以法规形式定期公布必须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

c. 产业布局政策。要逐步形成以环岛港口城市和交通干线上的城市为中心，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合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进行联合开发、技术合作、对口支援和人才交流。在发展中心城市的同时，因势利导地引导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形成大、中、小城市结构协调和布局合理的城镇建设体系。

2 对外经济方面

在全国已初步形成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以及特区的政策优势逐步减弱以后，海南的对外开放要通过重塑体制优势和率先实现与国际经济接轨，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和提高素质，把对外开放的侧重点从优惠型向功能型转变，引导对外开放向高层次、更宽领域纵深化方向发展。

a. 发展参与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分工和合作，架设起海南与大西南经济合作的桥梁，把海南建成为大西南对外开放的主要门户和通道。在地域的开放上，发挥海口、三亚等城市在对外开放中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快中西部等市县的对外开放步伐，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在开放层冰上，除了洋浦模式和保税区外，要办好和搞活边境贸易点。放宽政策，拓宽对外开放的领域，逐步推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举措，把海南的对外开放推向更高的层次。

b. 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要采用各种方式，积极扩大利

用外资的渠道，特别要注意引进国际上知名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来海南投资。要创造条件在重要的国家和地区设立商务机构，组织国际性跨国公司，积极举办各种形式的交易会、展销会、对外贸易洽谈会。用足用活国家赋予海南的边境贸易和互市贸易政策，拓宽与港澳及整个亚大地区的经贸关系。

c. 鼓励企业直接参与国际竞争。要允许有条件的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到海外直接投资办企业。要鼓励企业发展劳务输出，承包工程和国际间经济合作业务，开展跨国经营，提高海南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d. 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要实行基本放开经营的外贸政策，积极扩大出口，改善出口结构和经济效益。

e. 加强利用外资工作。要按照国际惯例规范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对外资进琼要有所选择，禁止引进有环境污染和破坏自然资源的项目，对带入先进技术的项目要给予优惠，但必须附加国产化的条件，其他各类外资企业要与海南企业适用同一税制，享有同等待遇。

3 地区经济发展方面

目前海南区域发展不平衡，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差距较大，今后地区发展政策应是：

a. 加速海口、三亚两个最大的经济增长极的发展。以海口为中心的大海口经济网正在形成，在今后资源及要素配置中应当充分考虑扩大这种聚集和扩散效应。三亚市的规模在迅速发展，应成长为海南南部的经济增长极。

b. 除海口、三亚外，在西北和西南部将形成洋浦、八所两个经济增长极，其经济实力的增长将来自大型石化、钢铁项目的建立。东部将形成以琼海市为中心的东部经济区。

c. 中部山区要从实际出发，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要在政策、资金方面给予倾斜，要大量吸引外资，以求更大发展。

4 财政金融方面

今后一个时期，协调运用财政和金融这两个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创造宽松的经济环境，扩大资金筹措，理顺供需矛盾，保持总量平衡，保证资金合理调度、分配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

a. 财政政策。要积极推进和完善财税制度改革，促进财政合理分配，实现各级政府财权和人事权统一，权责利相结合，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在税制改革上，应保持并完善内外统一、普遍公平、特定优惠的税收政策。应强化税收征管，避免税收流失，发挥税收聚财，调节经济的职能。

b. 金融政策。要加快改革、发展和完善金融组织机构，全面完成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实现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并存，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有效分离。应积极发展合作银行体系，建立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扩大和规范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加速外资银行、财务公司等等的建立，逐步扩大外资银行经营范围。

拓展和完善金融市场。按照国际惯例，建立一套完善的金融法规制度，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应实行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基础上的市场利率体系。逐步建立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多功能、国际化的金融组织体系，把海南建成全国的金融中心之一。

5 社会发展方面

要增加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加快科技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改善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3) 主要采取的措施。

1 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促进对外开放

a. 进一步花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抓好机场、港口，公路、邮政、通讯、供电、洪水等基础设施建设。

b. 抓好软环境建设，借鉴港澳及国际经验，建立健全各项经济法规，使国内外企业均按国际惯例进行运作。分期分批培训各级干部，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努力转变职能，减少层次，改进作风，提高办事效率。

c. 利用海南近傍香港，遥望台湾，位于日本到新加坡中段，南面对东南亚的特殊地理优势，近两百万华侨的力量，扩大与港澳及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交往。

d. 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积极举办各种交易会、展销会、对外贸易投资洽谈会，扩大海南特区的国际知名度，拓宽国际国内市场和利用外资渠道。

2 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a. 要扩大商品现货市场规模，大力发展以热带作物为主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建立若干个物质配套送中心，积极发展规范化的商品期货市场，加强集市、仓储、批发交易机构，大型商场，运输网络等市场硬件建设。

b. 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促进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轨，在管住货币总量的前提下，扩大其贷款自由权，发挥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功能，完善和发展证券市场。

c. 搞活劳动力市场，加强组织和管理，积极开展职工岗位前培训、岗位培训和转岗位培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覆盖面，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

d. 要加强房地产市场的管理，使之进一步趋向规范。

e. 稳步发展产权交易市场，实行公有制法人互相持股，允许不同经济成份互相参股持股，对国有中小企业在实行承包、租赁的同时，应进一步鼓励拍卖和兼并。

海南要用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实现与国际市场接轨，来再造特区优势，发挥其特殊作用，保持体制创新在全国领先的势头。

3 重视科技教育的发展，加快“科技兴琼”的步伐。

a. 把“科技兴琼”放在发展战略的首位，逐步增加科技教育的投资。

b. 充分发挥岛内现有人才的积极作用，提高科技开发能力，同时加快科技人才培训。

c. 以优惠政策吸收国内外科研机构和科学家来琼工作的，开展高科技研究。

d. 支持中外合资、集体集资，个人筹资来琼兴办各种科技实体。

e. 加快引进科技新成果的消化、推广、吸收、创新工作，促进科技——经济的结合，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进程。

4 加快市场经济立法步伐

a. 要规范市场主体资格、权利和义务的法律。

b. 要调整市场主体关系，规范市场运行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

c. 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法律。

d. 保护所有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法律。

e.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促进对外开放法律。

此外，以往制订公布的法律、法规有的可根据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加以修

订或增加新的内容，有的基本不适合发展需要的，要及时依法废止。

5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良好的特区风貌

a. 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形势教育，发扬五湖四海和献身宝岛，艰苦创业的精神，开拓创新和求真务实精神，树立良好的特区精神状态和精神风貌，增强为特区建设争做贡献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b. 积极改善服务质量，努力提高服务水平。要树立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基层服务的观念，积极开展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教育，制订职业道德的公约或守则，并使其变成实际行动。

c. 抓好新闻出版工作，繁荣海南文化创作，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文化阵地。

d. 积极推进廉政建设，惩治腐败现象，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净化社会空气，美化社会环境，让人民群众和海外投资者有一个全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使特区建设朝着预期的战略目标前进。

世纪之交海南特区的经济发展

1. 牢牢把握经济特区的时代经纬

在中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本世纪 90 年代初。然而在 80 年代，几个经济特区就已率先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成为全国市场经济体制发育最早的地区。迄今为止，他们创造了市场经济运行与管理的许多经验，初步构建起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框架，为其健康发展和不断完善奠定了基础。但也应看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层构造任重道远：诸如市场的规模程度，市场结构完善程度，市场主体神圣地位的确立，市场交换手段的成熟程度，市场物质技术条件的提高状况，市场交换中人的素质的提高状况，市场区域一体化程度，区域市场辐射半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程度，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状况，市场规则的建立和普及情况，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市场中介机构的建设情况，市场价格等参数的稳定可靠程度，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操作性等，有些环节还相当薄弱，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就要求我们：在跨世纪的进程中，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国情、省情、区情进行创新，拿出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系统的而不零碎的，既有特殊指导意义又有普遍推广价值的新鲜经验。

同其他 4 个经济特区一样，海南经济特区从创立起，就采用了“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的运作方式，力求在本省范围内创造一个适宜自身发展的“小气候”。但是，“小气候”是受“大气候”影响的。时下，对于完全以市场建设为改革取向的经济特区而言，政府“控制”的成分有所加大。我们正面：临既有新体制同化旧体制，又有旧体制同化新体制的双重问题。不少新的可行的做法，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开始走样，特区初创时期的那种创新精神有所退化，尽管机构精简，职能集中，人员减少，但是“公章”没有减少，红头文件继续盛行，特区与非特区在体制上的差距不论其相对程度还是绝对程度都在缩小。由此可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新体制没有全面到位的情况下，“用非特区方式管理特区”是最令人担忧的事情。

外在世纪之交的海南经济特区，若想继续保持和发扬特区风格、特区气派，以社会新构造、市场新构造为核心的深层改革，依然是现在乃至未来 5

至 15 年需要牢牢把握的时代经纬。

目前，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构造主要是： 社会保险机制，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 社会中介机构，如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职业介绍所、资产评估机构、信息咨询服务机构、劳动就业培训、劳动争议仲裁等； 社会行业机构，如商会、同业者协会、消费者协会等。

市场构造大体包括：市场体系，如生活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企业产权转让市场；市场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市场法规，如投资法、公司法、证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反倾销法等。

微观领域不深入到市场构造的细枝末节，宏观领域不触动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将无法再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

我们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目前在海南，经济活动中政企不分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政社不分的问题尚没有很好解决。从改革的方向看，政府至多是各种社会机构的最终担保者，但不应该是直接组织者，大量社会职能交由民间机构或半官方机构去执行。一方面政府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搞好宏观经济的调控和监督，另一方面出问题由政府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去处理，通过经济政策、经济规则和经济杠杆影响市场行为，弥补市场缺陷，维护市场秩序，保持市场走向与政府意向的一致，从而有效地维护政府的权威性。

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阶段，都需要有特定的“造势”领衔主演。从改革的连续性上看，海南经济特区的体制优势已呈“短腿”状态。根据“木桶效应”原理，海南市场经济体制的最明显的优势将取决于其中最弱优势的作用程度。因此，体制创新抑或体制优势的构造，应当从一般地实施整体改革转向充分把握改革试验权，通过对薄弱环节具体细致的设计、试验，在时间、规模、程度、质量和可操作性上体现出自己的优势，而不再仅仅局限于给出一个提法，一个大政策。按照这样的思路去把握改革的切入点，真正属于我们的成功和成熟的东西就会多起来。7 年多来，体现在体制表层的容易改的东西已经触动得差不多了，而深层的不容易改的东西有的尚未触动，有的只是刚刚接触到，重头文章还在后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改革中诞生的经济特区，其生命力首先在改革，如果说，前 7 年我们尝到了改革先发性效应的甜头，那末，未来的 5 至 15 年中更应保持改革的先发性。建省以来，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的，实现未来 15 年的奋斗目标，关键仍在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是经济特区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生产方式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升级的动力源。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目前特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在于为下世纪的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需要我们牢牢把握的时代经纬，就是以发挥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力核心的海南跨世纪经济发展。

世界上大凡经济特区的生成和发展，都与它所具有的优势的地理位置及其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的天然经济联系有关，是国际贸易发展和自身地理位置的“结合体”。这是作为一个经济特区所独有的特殊的“内因”。

地处环太平洋西带中心位置的海南，不仅拥有中国连接欧洲、非洲、澳洲和亚洲的南部国家最近的海上航道，而且是航空线、航海线以及陆路交通线的潜在枢纽。为了将海南真正建设成中国联系国际市场特别是亚太经济圈

的一大桥梁和纽带，成为该地区经济循环网络中的重要空间节点，其发展的“参照系”应当而且必须立足于全国的发展，进而把特区纳入到国际经济体制这一大背景下去构筑经济运行机制。所以，按国际惯例开放，按国际惯例运作，始终是大特区体制创新的基本指导思想，我国经济的未来增长将对能源、原材料提出更大的需求。这些基础性资源产品的供给有必要向加快能源基地、原材料深加工基地的建设倾斜。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渐成事实，沿海地区的特殊政策虽然会受到国民待遇的制约，但对不发达地区的资源开发实行特殊政策。则是世界各国的惯例。海南既是经济特区，又是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老、少、穷的问题比较突出，还有 70 多万人口尚未脱贫），有着同全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一样需要扶植、需要倾斜的理由和条件，在总体上不应以“经济特区”为由，一概而论地视全省为发达地区、应当注意：在海南，属于前者的特殊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弱化，属于后者的特殊政策应势在必然地强化；我们须抓时机，坐上“经济特区基本政策不变”、“加快不发达地区建设”两班车，并行不悖，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海南需要加快发展。她所面对的经济环境不能不使人对发展树立紧迫感和危机感，但不等于说发展可以蛮干。我们需要对今后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发展作出整体规划，明确发展的近期、中期、长期目标，应当分哪些阶段？每个阶段做什么？各个环境如何配合才能使发展过程有效运作？前一时间有一种倾向，认为发展问题就是确定以这个为龙头，还是以那个为先导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这只能说对了发展问题的一部分，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这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预先的规划、设计，就会失之盲目。我们主张，持不同发展观的人们都来把自己的思路贯彻到底，设计出发展目标、步骤和具体方案，进而在各种方案之间进行比较，加以取舍，最后制定出统一的方案，步调一致地贯彻推行。

今天在多极化的世界经济中，经济发展的奇迹往往是那些抓住了发展的后发性效应的国家和地区创造的——它们抛开工业化进程的传统做法，直接利用先进工业化国家的资金、技术，跻身于较高的发展层位。

这一“新规则”同样适用于海南。长期以来，海南农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居高不下，工业表现出依附于农业的性质。由于原有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一部分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依靠内陆供给；同时，资源优势却十分明显，如高品位的铁矿、产量可观的橡胶、丰富的南海油气资源、热带旅游资源以及反季节农副产品等。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资源有所开发，并与大陆形成了特定的分工关系，即海南原料大陆加工，运出原料运进成品。由此形成了以农业原料供给和矿产资源开采与初级加工为主的低技术型工业结构。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采用“成片开发”这一有别于其他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模式，积极利用其政策优势和资源优势，努力向经济优势转化，取得了较好地实践效果，并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在这里，她的每一步推进都离不开外资的引入，尤其是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更是需要吸引华人大资本、国际跨国公司，以便顺利进入南亚华人经济圈，参与该地区的经济分工。外资企业，特别是国际跨国公司对投资环境的稳定性、未来变化趋势，以及海南开放的进程和经济发展的宏观条件十分关注。从当前看，我们具备与国际跨国公司合作的企业并不多，条件还不完备，因此，作为经济特区，应在按跨国公司要求的国际标准改善投资软环境方面下大力气，有大动作。

总之，改革的先发性效应与发展的后发性效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是海南经济特区在世纪之交中要牢牢掌握的时代经纬。

2. 战略目标实施过程中应当深入研究的若干问题

战略目标是个经济发展概念。在经济特区，它可以用数量、质量两方面的多种经济发展指标来衡量和表现，也可以用建立特区的战略构想是否正确，发展成功与否，市场准入度大小，以及对外开放窗口的实际效应究竟如何来衡量。没有“战略目标”的系统，是一个混乱的系统，其系统的运行必将因无确定的目标而处于紊乱状态。

海南经济特区世纪之交的战略目标，可概括为两个中心、三根支柱、六大基地。即：国家级现代农副产品批发中心，橡胶、化肥全国交易中心；以热带作物、冬季瓜菜和海洋水产力主要特已的高效农业，以化肥生产和石油加工为主的石化工业，以热带滨海为特色的旅游业；以汽车和摩托车制造为中心的机电工业基地，以水泥和玻璃制造为重点的硅酸盐建材工业基地，以饮料和热带农副产品加工为特色的食品工业基地，热带作物、繁种育种、冬季“菜蓝子”生产基地，南海石油天然气开采和加工基地，冬季休闲度假旅游基地。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地区两级宏观经济模型系统”的计算和分析，90年代海南的总体经济实力及发展水平，投资信贷、社会总产值等项指标的增长速度均属全国第一。尽管经济发展各项指标的绝对值大体保持在全国第20至24名次，但总体实力明显增强，发展速度的名次排位将大大提前；到2000年，海南人均GDP将由1992年的全国第15名升为第5名，紧随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成为最有活力的省份。

另据海南省计划厅的计算和分析，未来15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4—15%。其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4%，建筑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9.3%，第三产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1.4%。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由1990年的44.9%、19.6%、35.5%调整到1995年的35.4%、24.3%、40.3%，2000年将调整为25.8%、30.8%；43.3%，到2010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850亿元，人均2万元左右。

这些全新的战略目标在实施过程中无疑会遇到纷繁交错、多如山积的大小问题。对于一个日趋成熟的理论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经济决策者来说，驾驭全局的要领不能靠兜圈子浮盖在表象上的公式，而应辟入本质层次去研究去把握。我们认为，目前有以下5个本质层次的问题亟待研究。

(1) 经济发展思路与经济发展政策的关系

经济发展思路、经济发展政策是主观见诸于客观过程的两个依次出现的环节，前者必须向后者转化，光有好的经济发展思路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进行经济发展的政策设计。经济发展的政策设计之所以必要，就在于规范性的研究应当同实证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通过经济发展思路的政策化，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应当如何去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把理论上的东西变为实际生活中的东西。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决不止一两项，而是一个大系统（如农业发展政策、工业发展政策、旅游发展政策、投资政策、金融政策、外资政策、人才政策等等）。在这一系统中，政策有主有辅，有重点有非重点，需要相互协调；不同阶段的中心政策，需要先后衔接。在经济发展的政策设计中，应当弄清：如果我们确定了海南的热作农业、资源性

加工业、热旅游业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它的发展决定着市场半径的扩大和整体经济素质的提高，推进这些产业的政策应在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中占据王要地位。那末，就需要进一步弄清三大支柱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还是发展速度？是结构优化还是数量驱动？当二者不能兼得时，究竟以哪个为主？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来说，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是主导性的？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是从属性的辅助性的？在确定这一主从关系时，理论依据又是什么？

自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一直被岛内外人士视为“特殊政策之地”。如今，各地的开放政策正趋向“中性”，“特殊政策之地”正由最特殊到次特殊再到不特殊。一时间，我们对此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大多数人在思想上心理上缺乏足够的准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特殊政策形成源的理解是片面的。辩证地看问题，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是一种创新行为，既有来自中央政府的创新，又有出自当地政府的创新。如果后者的创新不定，前者的创新就难以被用足用活用好，这也是如何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在中央政府给海南的许多特殊政策最后期限临近时，认真梳理一下便不难发现，有一些特殊政策由于我们相应的创新工作没能很好地跟上去而收效甚少，现在回过头来看，只要中央允许经济特区“继续试验，先行一步”，那末，就是给了特殊政策，我们也要进行政策创新，即使少给或不给特殊政策，我们更要大胆地进行政策的一系列创新。今后十几年中，要有步骤有重点地由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创新转向经济发展的政策创新上来。

（2）经济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关系。

宏观经济状态是社会上所有经济主体行为的共同结果。在经济制度既定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出会随着所有经济主体总投入的增加而增加；而在经济制度正在变革的情况下，不仅存在与投入相对应的经济增长，还存在着由制度效率提高导致的经济增长。经济制度处于变动之中，宏观经济变动就不仅会体现为常规增长，而且还会体现为经济发展条件的某些突破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超常规提高，可见，经济发展以资源配置的结构变化为特征，以制度变革为动因。既然宏观经济状态是人们的行为及其制度变革的结果，那末毫无疑问，研究宏观经济的变化，必须到制度变革及其导致的经济发展中去寻找线索。海南在“九五”期间旨欲直接进入“现代标准的工业化”阶段，为此，不仅需要做到经济技术准备，还需要做好必不可少的甚至是最重要的经济制度准备，要弄清我们已经具备了哪些制度条件，还缺少哪些制度条件，如何通过创新去满足这一阶段的到来。

（3）经济发展的价值判断标准。

近年来，国内有一种经济发展观颇为流行，即主张，从我们存在大量富余的廉价劳动力这一现状出发，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依托，充分发挥这一比较优势，去带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然而眼前的事实是，国内外市场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要在不断递减，仅占国际贸易总额的25%，并且亚洲“四小龙”及东盟国家有着强劲的竞争力，加之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把产品打出去已是困难重重，所以，上述主张似有失之一厢情愿之嫌。

海南不仅有为数众多的廉价劳动力，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把眼光放在本世纪内，古典的“比较利益学说”尚能适用一时，但是站在两个世纪的衔接和下世纪全省经济腾飞的高度看问题，站在效用最大化地利用每一种资源的角度去思考，就不难达成共识：真正适用于海南开发建设的是“产业

结构高级化学说”。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外向型经济顺利发展的“发动机”，只有始终不渝地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其在动态中不断走向高级化，经济发展才能伙得真正的成功。由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能使海南出岛产品的附加值以及带来的国内收入呈现倍增的稳态趋势，所以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的视点不能仅停留在进口替代，光注重产业结构合理化，建立门类齐全但层次较低的工业体系，而忽视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具体地说，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主要是科技、质量、效率和效率较量的时代，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项目，要搞高技术起点的独特项目；在引进外资中，不去追求单纯的数量级数，而是把重点转到与质量、规模、效益相适应的乘量级数上来。如果我们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30—40%是靠与外资相伴而来的先进技术取得的，那么，就可以掷地有声地说：海南已经走上了生产要素优化选择的道路，建起了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主要支撑点的对外开放构架。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核心是技术结构的高级化，所以要制定相应的技术政策，当前技术政策的要点是：积极发展高新技术；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明创造尽快走出实验室，变成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产业结构高级化还要通过重点扶植大型外向型企业集团去实现，因为只有经济技术实力雄厚、知名度高的大企业集团，才能担负起实现出口战略的重任。换言之，外向型企业集团是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主要载体，只有创造一切条件让它们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第一线，参与国际竞争，才能不断优化我们的产业结构，才能有力地带动特区经济迅速发展。

经济发展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经济过程的“生态学”。应当看到，上游产业（产品）与中游产业（产品）和下游产业（产品）、主流产业（产品）与支流产业（产品）的关系如同在一个山区牧场放牧过量引起植被破坏并导致邻近稻田的洪灾一样，是一种“强制约”关系。这一点，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规则中要有科学的体现。

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一样，需要尽一切可能直取其“核心”部位，而不只是在边缘上搞“多样化”。上述的“产业结构高级比”、经济过程“生态学”，就是其“核心”部位，我们要紧抓不懈。

（4）经济发展的机制转换。

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若干方面的机制转换，并以每一项机制转换为目标去寻求一组相互配套、互相关联的措施群。这些措施群反映的是对原有结构或组织的调整、新因素的投入或旧因素的削弱，并能完成机制转换的要素控制和过程控制。

其一，由指挥管理机制向服务型管理机制转换。目前从特区政府宏观管理机制看，直接管理机制已经失灵，间接管理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或在建立过程中有所走样（推诿刁难服务对象，颐指气使、办事效率低下、设租寻租等现象在某些实权部门有所抬头，旧体制下那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的劣习正悄然回归），它除阻碍着政府宏观管理机制全面进入有序状态，如此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大特区初创时期刚刚萌生起来的高效廉政的政府管理机制会在新旧劣习叠加中荡然无存。因此，应在立法的基础上建设克腐治败、廉洁高效的服务型管理机制，明确提出“政府形象也是生产力的要素”；设立专门的管理系统，制定详细的公务员法，使官员的选拔、考核、升迁、培训、待遇、调动等行之有据；树立“要得到第一流的公务员必须求助于竞争”的旗帜和坚持公平、平等、择优的原则；严格按职务类别对公务员进行

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不参加培训者以读职论处，除行政系统内部定期对公务员进行工作能力、态度、数量、质量、创造性、决策能力、适应性、潜能等评定外，要通过人代会质询、司法审理、利益集团施加压力等方式进行监控。

其二，由决策音定论型机制向社会参与型机制转换。在“九五”即将到来之际，最重要的莫过于就海南跨世纪发展问题在全省范围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启动社会各界参与磋商。建省7年多来，我们在发展问题上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走了一些弯路，付出了不少学费。现在特别需要有一个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气氛，避免用以偏概全的报道、片面的民间抱怨代替深入的科学分析，为跨世纪的发展作好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经济理论研究者和经济部门工作者不应沦为现行发展政策片言只语的诠释者，而应成为研究经济决策的顾问人，要形成鸣而有争、有建设性批评的风气，不靠大家的集体智慧去确定发展的优先顺序，就容易选择风险最小、见效最快而对长远经济发展来说未必是最佳或次佳的方案，倒可能是隐患无穷的下策。

其三，由人才准入型机制向人才激发型机制转换。海南建省办特区，率先创造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人才准入机制，但所引进的数以万计的人才未能充分地成为生产力的要素。究其原因，集中到一点，就是还没有真正形成一种能将各类人才的智力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激发机制。美国的硅谷所以成为硅谷，不仅因其学府林立，人才济济，更为重要的是它形成了将智力转化为生产力的激发机制。我们应当以此为镜，首先想到和主要着力的是如何建立起一种鼓励人们去寻求知识和使用知识的人才激发机制，并相应地调整和制定一系列有关政策。长期以来，海南的穷主要不是穷在物质资源上，而是穷在人的智力的开发和利用上。对于一个落后地区来说，仅以它的物质资源、借来的资金和引进的设备，要想彻底改变面貌是不可能的，当前新技术革命的走向更强化了这一趋势。我们既要扬物质资源丰富之长，更要避智力资源激发不足之短，通过720万人民的“脑——手”高度开发，变人口素质低下为智力资源丰富。总之，只有善于激发人才，才能使人才培养获得源源不断的再生动力。

其四，由数量型驱动机制向质量型驱动机制转移。从1991年末到1993年初被炒得火爆的房地产瞬间转为萧条、凋蔽，到1994年以来发展热带农业和进军现代工业的呼声不绝于耳，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在宏观调控上，我们习惯于使用数量型驱动机制。数量型驱动机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总量扩张，二是总量收缩。同结构调整、结构优化相比，这两方面的调控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由于它很难顾及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保护，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成长的制度性问题。所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要特别重视建立质量型驱动机制，从产业扶植、项目上马列产成品开发都要以“质量”为中心，在发展时序上妥善安排，在经济发展质量的内生变量方面多做文章，以免重蹈扩张冲动——“快了还要求快”的覆辙。从这一要求出发，宏观调控的要义与其说是“扩张——收缩”，毋宁说是“修错——理顺”。

(5) 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从目前的情况看，海南经济具有“短缺经济”的特征，整个“九五”期间处在“紧运行”的状态，其主要表现：工业化起步阶段的资金需求总量始终大于供给总量；超常规发展条件下的各类专业人才实际供给小于实际需求。

先以引进外资为例。“八五”期间，海南全省实际利用外资 45.5 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34 亿美元，利用国外贷款 11.54 亿美元。据有关部门分析，为了适应工业化的起步，“九五”期间需利用外资 100 亿美元，比“八五”期间增长 1.1 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75 亿美元，利用国外贷款 25 亿美元。

应当看到，“八五”期间的宏观背景是中央对海南特区“优惠政策”的有力启动，以及由此引致开放步伐的高歌猛进。“九五”期间这一宏观背景将基本改变。于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摆到了面前：采取哪些措施，才能确保外资引进的增长势头？我们认为：第一，同全国许多省区相比，海南在“九五”期间总体上仍是低赋税地区，要有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紧迫感，用好用活用足尚有的特殊政策，去引进外资。第二，除对新项目继续招商引资外，要对在建或建成投产的项目进行招商，采用 BOT 方式转让已投资项目的全部或部分产权，去吸引外资。第三，开辟新的国际融资渠道，做好对外举债工作。第四，建立项目市场。按国际惯例对招商项目进行评估、包装、并与国际项目市场联网，发布招商信息，把对外招商工作推上制度化、标准化、经常化的轨道。第五，可考虑有选择地以海洋资源的让利开发、合作开发，去吸引国外资金。

再以专业技术人才数量和分布结构为例。1989—1993 年，全省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6 万余人，加之原有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截止 1994 年底，全省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有 11.28 万，占总人口的 1.59%。这一比重仅是全国的平均水平，远低于北京（1993 年 6.43%）、上海（1993 年 4.3%），甚至低于新疆（1993 年 2.66%）。不仅如此，专业技术人才的产业分布（包括行业分布）畸形严重：第一产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 1994 年为 2.75%，低于青海（1993 年 4.88%）和新疆（1993 年 6%），第二产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 1994 年为 12%，无论同两个最发达的地区北京（1993 年 44.66%），上海（1993 年 46.01%）比，还是同两个较落后的地区青海（1993 年 28.2%）、新疆（1993 年 24.85%）比，均相距甚远；科研力量 1994 年仅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 0.43%，既低于全国 1993 年 1.84% 的平均水平，又明显落后于青海（1993 年 1.51%）和新疆（1993 年 1.24%）；目前，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的 70% 集中在政府机关和各类学校。

显而易见，无论从总量个量上看，还是从结构分布上分析，海南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现状与全省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的要求相比，差距太大，矛盾突出，已成为制约我们在本世纪末跻身于全国五强之列的一大“瓶颈”。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拓宽“瓶颈”？这又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第一，各级政府要像抓“菜篮子”工程、“米袋子”工程那样，全力以赴地抓好“百千万人才工程”，迅速建立起一支跨世纪的中青年科技带头人队伍，将其视为全省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去珍视他们，关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及时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第二，生物工程、工程力学、应用电子、应用化学、应用数学、计算机、海水养殖、热带作物、橡胶制品、金融，外贸、法律等领域的应用性研究，要作为各级财政支付机制转移后的直接受体，全力扶植。第三，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应把数量、质量、结构比例、使用岗位等目标参数纳入到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计划，严格执行。第四，中、高等教育的专业设制、课程设置、学历设置、实验室设置，

要向智能教育、通才培养的方向转变。大企业、科研单位应先行建立“终身教育”制度。第五，社会保障制度中应增加对人才保护的政策含量。

自海南省建办特区以来，上到政府决策部门，下到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广到经济理论研究者，习惯以“超常规发展”为座右铭，去研究、去构思、去实践，并且潜移默化地溶进了自己的思维定势。然而，倘若叫真地问上一句：“超常规发展”为何意？则应者寥寥。今天，当人们即将步入大特区开放开发第九个年头的时候，有必要对“超常规发展”作一明确的界定。我们认为、对海南来说，所谓“超常规发展”，就是在资源配置、目标模式，管理办法、运行机制、科研组织、实施步骤等方面别出心裁、独具匠心，独辟蹊径，开辟既异于今我又高于今我，既异于他人又高于他人的发展道路，尽快自立于中国现代化之林。引申开来，“超常规发展”也是一种空谷足音的全新思想方法。要寻求超常规的发展，就得先有超常规的思想——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换脑筋”，换掉一切不合时宜的陈规旧习、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增强综合省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力唯一标准，理直气壮地说新话，闯新路，开辟新的天地，脚踏实地地把一个规模最大的中国经济特区带入 21 世纪。

七 马来西亚：全面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80年代末 90年代初，马来西亚连续7年的年增长率居世界第二位；人均收入居世界第十八位；失业率仅为2.9%，几乎实现了全民就业；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九位，是世界第十九大贸易国；政策透明度独居全球第一宝座。

惊人的发展成就

1994年马来西亚的经济取得很大发展，1995年的财政预算经济增长率定为8.5%，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事实上，在1987~1992年间，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居世界第二位，使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达到8850马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是8050美元，居世界第18位，略低于韩国。韩国的人均收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居世界第17位。马来西亚的失业率仅2.9%，可以说是已经实现全民就业。

马来西亚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到342亿美元居世界第9位。在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外债减少。外债偿还率降低到只占国民总产值的4.7%（1986年是18.9%）。马国是世界第19大贸易国。尽管经济蓬勃发展，但马国的通货膨胀率仅3.7%，可说是相当低了，而马政府仍将采取措施进一步抑制通胀率。

马国的经济成就是建立在高水平的竞争力之上的。由于马国储蓄率高，政治稳定以及政府的政策透明度高，1992年，马国在全球经济竞争力排名第17，马国与香港并列世界第五位；马国和瑞士一起，在世界最没有风险的国家中名列第三。在政府政策透明度方面，马国名列全球第一，第二、三、四名分别是挪威、丹麦和新加坡。

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马来西亚经济虽然取得许多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经常帐赤字可能会增加。1993年，马国的经常帐出现64亿马元赤字，预计1994年将会增加到117亿马元。这些赤字被长期资金的流入所抵消，且有盈余。但值得注意的是必须处理好国际收支中的结构性弱点，否则将可能导致经常帐赤字的增加。这样一来，在外来投资减少的年头，为了融资这种与年俱增的赤字，必须增加外债负担。

（2）制造业工资增加的比率超过了生产率的提高。1994年7个月，工资的增长率是6.7%，远远超过生产力的增长率（2.2%）。要是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马国的制成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将会迅速衰退。

（3）劳工短缺，尤其是熟练劳工与半熟练劳工短缺。据马国人力部预计，从1990~1998年，制造业对这类熟练和半熟练劳工的需求将达到23.35万人。其中，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需求将显著增加，如生产、机电、软件和环保等领域的工程师。由于目前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所以造成很大的工艺差距。这是教育方面偏重文科而忽视工科和基础研究领域的结果。

（4）存在潜在的通货膨胀危险。由于经济的蓬勃发展及很高就业率，通货膨胀的潜在危险肯定存在。

来自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挑战

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可能给马来西亚带来的一些冲击：

(1) 工艺技术改变迅速。我们看到，从蒸汽机到信息高速公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工艺技术的改进是爆炸性的。

(2) 生产不再是以资源为基础，而是要依靠智慧。电讯和交通的迅速改善，使得人们能够把生产分成几个阶段，并把每一个阶段设在一个资源最适宜的国家。

(3)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使国际贸易进一步自由化。但贸易冲突的威胁依然存在，因为这些经济强国扬言要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4) 国与国之间对市场和外资的竞争将加剧。

(5) 在国际贸易中，服务业——诸如银行、金融、教育等领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6) 区域经济将经历劳工及金融资金的跨国界的大规模迁移。

迎接挑战的措施

为迎接挑战，进一步加强马国的反弹力和提高马国的竞争力，马来西亚将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分为中短期措施和长期措施，并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1. 中短期措施

(1) 当务之急是处理经常帐赤字问题。政府已在 1995 年财政预算中给予船运公司和保险公司一些税务奖励，以鼓励船运业和保险业提供更多的服务。因为马国在进出口货物时都依靠中国的船运公司和保险公司，使大量的资金外流，这是造成经常帐出现赤字的原因。

(2) 提高国内投资比重。在服务帐项中，出现更大赤字的是投资收入(外国投资者汇出的利润、股息和利息)。在过去几年中，外资是带来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来源。在今后几年，这种赤字额会更大。要在更长时间内减少这种赤字，必须提高国内投资(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

(3) 重视高等教育，给高等教育以更多的投入，同时要吸收私人更大程度地参与投资高等教育。

(4) 必须采取措施使工资的提高与生产力的提高一致。

(5) 抑制通货膨胀必须是改革过程中最优先解决的问题。抑制通货膨胀，仅采取管制物价和紧缩货币的政策来抑制过份的需求是不够的，必须结合增加供应的措施，包括改善农业提高粮食总产量，提高生产力，生产出足够的社会需求品。

2. 长期措施

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在 2020 年把马来西亚变成成熟的和完全工业化的先进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一项加速工业化的计划，同时维持由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下，马来西亚必须通过用更高的生产力来竞争，以抵挡国际经济发展给马国带来的冲击。这样的一个竞争经济必须有以下各点：

(1) 多元化和平衡的经济必须拥有成熟的和基础广泛的工业部门，现代化的和成熟的农业部门，以及有效率、生产力高和同样成熟的服务部门；

- (2) 扎实的经济，能够迅速应变的供应、需求和竞争形态；
 - (3) 工艺很精纯，完全能够适应创新与投资，也就是说，有利于工艺密集化，向越来越高的工艺水平方向发展；
 - (4) 在整个经济体系中，要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工业连锁作用；
 - (5) 经济要由智慧、技术和勤劳的人来推动，他们应拥有丰富的信息，懂得做什么和怎样做；
 - (6) 在每一个生产环节中都要维持高生产力，而且要不断提高；
 - (7) 要具有企业精神，自力更生；
 - (8) 经济的特征是低通货膨胀率，低生产成本，让市场力量全面运作。
- 据估计，要实现完全工业化的先进国经济，从现在到 2020 年，马来西亚的经济必须每年实质增长 7%。

3. 产业结构的转变

马来西亚要实现 2020 年的宏愿，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改变：

(1) 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服务业所占的支配地位提高，原产业和政府服务在总产值中所占比例长期下降的趋势将继续下去。农业除在总产值中的比例较小外，农业生产的性质也将大大改变，要偏重于更高的增值，要商业化和土地集约化。

(2) 制造业要迅速增长，到 2020 年它将占总产值的 40% 左右，而目前仅占 30%。到 2020 年，马来西亚的生产结构应以工业为主。

(3) 在未来 25 年内，现代化的服务业将迅速增长，以弥补政府服务的下降。这样，整个服务业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将从 1993 年的 42.62% 提高到 2020 年的 50% 左右。随着人民收入的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休闲、健康、私营教育及娱乐有关的服务业也将增加。

整个生产结构，不论是原产业还是工业或服务业，预料将逐渐转向更高的增值，更高的技术以及更加注重知识与工艺的结合。

从现在到 2020 年，肯定将是给国内外企业家带来令人振奋的投资机会的时期。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机会将更多。除制造业外，非政府的现代化服务业也可能得到强劲的发展，同时也就提供了很多投资机会。这类服务业包括金融、运输、储存和通讯、咨询及广告业。与此同时，支援贸易的服务业，如船运、交通、货运以及保险业等，也将会有类似的发展。当然，这些服务业将开放给国内外的从业者竞争，而马来西亚的服务业要争得一席之地，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总之，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基础雄厚，潜力很大，只要措施得力，把握好时机，一定能够实现宏愿，到 2020 年把马来西亚变成一个完全成熟的先进的工业化经济国家。

八 泰国：耀眼的新星

80年代，泰国经济以神通般的速度迅猛发展，创造了30年不败的东南亚奇迹。有人曾断言泰王国很可能成为21世纪的“小龙”之一。

三十年神话：泰国不败

近年来，泰国经济因一直保持着7%~8%的高增长率，而倍受国际经济界注目。仅就其外贸情况看，今年头四个月出口总值为4070亿铢，比去年同期增长19.3%，进口额为4990亿铢，比去年同期增长20%，逆差为920亿铢，主要是由于美元贬值所致。

1. 利用金融手段，严格控制通货膨胀

目前，泰国经济增长较快，如果通货膨胀、财政赤字、贸易逆差等问题解决不好，可能会对经济发展起抑制作用。1994年，泰国的经常性财政赤字累计已达2137亿铢，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9%，外汇贪图虽有330亿铢，但通胀率却达到了5.4%。为了控制通胀的进一步升高，泰国银行已决定采取四项金融措施予以调控，这四项措施是：（1）调高标准利息率，鼓励存款；（2）调高收购公债市场利息；（3）增设商业银行，灵活处理资产，调整资产利息；（4）发行公债，回笼部分闲置资金。

目前泰国国内涨价的主要商品有：食品上涨1.3%、副食品上涨3%、蔬菜水果上涨1.7%、烟酒上涨5%、娱乐品上涨3.2%、服装上涨1.1%、住房上涨0.5%。

最近，泰国看守内阁财政部部长说，泰国将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加强与邻国的经济合作，平衡国家财政，吸纳储户资金，以利于资金周转。此外，国家银行还将严格监控各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下半年的信贷投放增长情况，以免刺激通胀的进一步提升。

目前泰国的银根已有所松动，但纸币仍偏紧，这主要是由于边贸大都用泰币结算，而且老、越也开始流通泰币。因此，泰国家银行正在建第二纸币厂，并将于1998年建成使用。

2. 轻纺原料成本上升，将严重影响产品出口

据泰国纺织协会的报告指出，目前，由于泰国劳工的日工资已调高到145铢，同时，主要原料，如棉纱、化纤及造纸箱的价格都在逐步攀升，再加上棉花产量下降，使纺织品的生产成本上升了5%，也使纺织品的价格相应上扬。此外，美元的疲软和汇率的动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泰纺织协会主席说，“由于以上原因，泰纺织品在出口方面受到了考验，第二季度纺织品出口下降了2%”。受影响较大的是现货交易，期货交易却有所上升。

从国际市场方面看，欧洲市场基本持平，日本市场稍有上升，下降的主要是美国及其他市场，尤其是墨西哥市场，由于墨西哥为了解决国内金融危机，挽救国内产业生存，将成衣、纺织品、皮革及鞋类的进口税提高了35%，致使泰国对墨西哥的纺织品几乎陷入停顿，至少损失了10亿铢。上述商品占泰国输入墨西哥总商品的40%，目前泰商业部正在研究对策。

泰生产商正在设法解决纺织品成本的上升问题。如提高生产效率、进口先进纺织机械等，并呼吁政府削减原材料进口税和引进廉价劳动力，特别是印支国家的劳动力。否则，生产成本降不下来，泰商可能会考虑向国外转移生产基地。因此目前泰国每年约有 1 万名技术工人出国打工。引进劳工还可以解决泰国技术工人因出国“淘金”引起的本国技术工人不足的问题。

另外，泰国纸张和泡沫塑料的短缺及价格的上扬也加大了商品包装的成本。泰国纸箱的价格从 1996 年 6 月 1 日起又上升了 25%，由原来每个 28 铢上升到了 35 铢，其他纸盒的价格也由每个 20~22 铢上升到了 25 铢。

纸张价格的上升，同时还对报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大报正在考虑减少版面以降低报纸的成本。

3. 采取措施，振兴农业及农产品出口

农产品一直是泰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所以泰国很重视对农业的进一步开发。上半年泰国的农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性问题，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1) 提供优惠贷款扶持农业并紧急进口饲料。泰国农业合作银行是泰国农业信贷专业银行，为了进一步扶持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的深加工，今年决定为农民增加农业贷款 170 亿铢，用于农产品、手工艺品的加工。1~5 月份，泰已出口大米 287.9 万吨，比去年同期上升 34.64%，而且其价格每吨高达 4100 铢（国内上市价格也由每担 460 铢上升到 480 铢），到年底大米的出口可达 500 万吨。由于泰国玉米的减产及饲养业大力发展，使猪、鸡饲料供不应求，涨价幅度达 11%。猪肉价格每公斤为 10 铢，而玉米则维持每公斤 5~6 铢的水平上。因此，泰商业部委托豆饼进出口协会负责，分两次进口 40 万吨玉米。据称，这次玉米进口税仅为 7.5%，不收特别例费。不过泰国饲料协会称，至少需要 60 万吨玉米才能满足需求。

猪肉涨价已使泰国政府决定从马来西亚进口生猪，以平抑物价。同时，泰国政府也将促进猪肉出口到日本和新加坡等市场。

此外，泰国还将大力推广冷冻食品和发展快餐业，并向印支国家辐射。为此，联合农场将投资 25 亿铢在全国开设销售点。

(2) 运用 12 亿铢，进口 30 万吨化肥。这也是政府振兴农业的重要举措之一，其主要意向是向韩、马、菲、印尼等国购买。泰国每年化肥的需求量约为 400 万吨，总值 200 亿铢，而泰国内仅能供应 60 万吨，即使 1997 年建成的化肥厂投产后，也只有使泰国产化肥达到 100 万吨，缺口仍相当大。这势必引起化肥涨价，同时将加大农产品的成本价格。

(3) 开放国内黄豆市场，拨款扶持豆农。泰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后，承担了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义务。这使泰国的黄豆生产和市场都遇到了较大的压力，今年泰政府批准进口黄豆 17 万吨、豆饼 46 万吨，并拨出 7500 万铢补贴豆农进行价格干预，使黄豆价格不致低于每公斤 8 铢。所拨款项出于联合基金，不计利息，以免豆农遭受过重的打击。

(4) 整顿咖啡市场，严格收购标准。上半年，美、欧等国家纷纷指责泰国咖啡产品不符合标准，而且质次价高。这主要是由于咖啡农为赶上国际市场的高价位时间，将不干的咖啡出售，由于湿度大而发生了虫蛀和霉变现象，此外，还有混入杂质问题。为此泰国咖啡出口协会决定，今后将以国际标准向咖啡农收购产品，否则，将会严重影响泰国咖啡豆的出口价格，并失去市

场。

(5) 抓紧机会，促进木薯出口，今年泰木薯产量将达 1869 万吨，比去年增长 3%；而欧洲方面的木薯将减产，价格上升，估计平均每吨达 248 ~ 252 马克（或离岸价为每吨 139 美元）。目前泰国的木薯价位是：木薯粉每公斤 10 铢，鲜木薯每公斤 1.13 铢，木薯丝每公斤 3 铢。因此泰国商业部已协议，抓住这一时机，大力促进对欧洲的木薯出口。

4. 鼓励投资，决心建成生产基地

泰国促进投资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今年来泰投资总额将达 5 千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00%，其中日本投资占 40%，其他依次是美国、香港、韩国、台湾和法国。投资的主要领域是石油化学工业、电子、汽车及配件工业。今年前四个月投资最多的石化工业超过 1000 亿美元，但到三类开发区投资的商人都埋怨建厂地皮价格太高。泰国工业院正在研究这一问题，可能将下调三类开发区的地皮价格，以免影响外商长期投资的意向。

另据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披露，目前世界各大汽车公司纷纷前往泰国考察并申请投资汽车业。近年来，泰国汽车零件工业发展很快，而且潜力亦很大，是世界上十大最佳投资基地之一。除原来的裕达、本田、泰伦等汽车公司外，现提出投资申请的有美国的福特、克莱斯勒、通用等公司和日本的日产、马自达等公司。相信未来五年后，泰国将建成东盟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可年产汽车 110 万辆。

另外泰国工业部还颁布了国内生产汽车发动机使用国产汽车配件比较的补充规定，将逐步提高汽车的国产零件使用比例，并强制使用国产汽车缸套、活塞、连杆、曲轴等。

此外泰国汽车协会目前正密切注视美日汽车贸易谈判的进展情况，因为泰国担心日本被迫开放汽车市场后，将影响到本国汽车市场的发展。

5. 大力解决能源问题

据泰国汇商银行的报告指出，由于国内家庭用电及工业、商业、农业等用电的增长，使泰国电力需求每年增长 12%。

1994 年 10 月 ~ 1995 年 3 月间共生产电力 1.33 兆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 2.58%，其中电力机械发电 12.07 兆千瓦，大众电力公司的罗执发电厂发电 1.232 兆千瓦，北位水电站发电 34 兆千瓦，夜莫发电厂发电 300 兆瓦。估计全泰用电量要达 1.88 兆千瓦，缺口很大。为此，泰国政府决定向老挝购买电力，目前双方正在商谈之中。据泰电力机构透露，泰国计划向老挝南廷第一和第二水电站购买 156 兆瓦的电力，并送往泰东北地区，为进一步开发东北提供能源。此外今年泰国将动工兴建四座发电厂。

近年来，由于燃料紧张，泰国的燃油走私相当严重，从而引起油价下跌，为此，泰政府加大了打击力度。除加强缉私外，还采取了严惩油料走私的措施，并规定了沿岸油库要每周报告一次油轮出入数量，沿岸 259 艘油轮也要报告每周的送油数量。实行这些措施后，近来油价上升了 30%，而石油机构的销售量也增加了。

6. 泰南部水泥恐慌，泰东北建筑工紧张

由于今年泰南部水泥生产能力仅为 210 万吨，而需求量则为 370 万吨，

需求缺口为 160 万吨，泰中部生活能力为 344 万吨，自给有余 60 万吨，仍不能满足泰南部水泥之需。由于泰水泥公司等向泰南部输入水泥过程中表现迟缓，也无法完成所给配额。因此引起了泰南部水泥紧缺。为此泰商业部决定紧急从马来西亚进口水泥，并降低进口关税，以解燃眉之急。

由于泰国的水泥厂必须持有政府颁发的石灰石开采执照，还须经国家环境委员会批准；而一些厂商持有的执照到明年将到期，如执照得不到顺利批复，将会严重影响泰国水泥生产，尤其是南部地区，所以目前泰水泥商正在敦促政府制定长期计划。

在泰东北部建筑业方面，则由于劳工严重短缺使那空帕农、莫的限等府的建筑工程几乎陷入停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东北部工值低，内地劳工更愿到曼谷以及国外去打工，而且建筑工程的投标大都安排在 4~5 月份举行，中标后又正赶上农忙季节，使中标公司难以招募到建筑工人，有些劳工招募后又回家参加农忙。另外建筑材料成本也比去年上涨了 30~40%。鉴于此，一些建筑公司要求政府允许从老挝引进廉价劳工。老挝劳工的日工值仅为 20 铢。

另外，泰水泥公司已计划在北京、天津、南京投资 50 亿铢建水泥厂、砖瓦厂，泰方持股 60%。泰国还准备到印尼、新西兰投资纸浆厂。

7. 旅游业活跃，而旅馆业不景气

在泰国的游客中，日本、中国大陆、朝鲜游客占 56.46%，而且逐年增长，特别是中国大陆游客增长甚速，预计 1997 年全年旅客将达 620 万人。

目前有的泰旅游商只顾眼前利益，欺骗游客，已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1996 年是泰皇登基 50 周年大庆，泰旅游界将以此为机会，大力吸引外国游客，现已开展宣传攻势。为保持泰旅游业的常盛不衰，泰旅游机构还找出了 23.5 亿铢予以支持，并注重食品中心和购物中心的建设与宣传。

在旅馆业方面，但由于近年来旅馆业发展过速，而旅客大部分是亚洲节俭型客人，多住廉价客房，又多是短期逗留，使旅游业获利不多。目前泰旅馆业已展开了一场价格大战，以争取更多的房客。曼谷现有 46664 间客房，今后两年还将新增 5000 间客房。这对整个旅馆业并非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大多旅客往往因曼谷交通拥挤不堪而缩短在曼谷的逗留时间，更加重了旅馆业的过剩。目前曼谷高级旅馆的住客率为 65~70%，普通旅馆的住客率仅为 35~40%。不难预料，旅馆业竞争的结果可能会导致一些旅馆倒闭或出让。

未来三年泰国经济发展趋势

1994 年至 1999 年，泰国的经济虽不可能像 1988 年至 1990 年那样发展较快，但经济增长率仍将达到 8~8.5%，为该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储蓄和投资增长较快是导致泰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

1993 年泰国的储蓄和投资分别增长 27.1% 和 43.5%，估计今后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泰政府在努力改善教育和开发人力资源，各种专业培训人员和大量的专业工程师进入社会，将使经济逐步转向稳步增长的结构。

未来五年，泰国的经济增长将更趋稳定，除出口和投资会受外部因素影

响外，国内消费需求将极大地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

制造业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经济的恢复，将促进制造业的出口。政府对工业的支持，也将使本地产品能逐步取代进口商品。

由于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服务业可能变得更加重要，兴盛的出口将促进对有关贸易服务的需求，诸如商业、运输和金融服务。有着价值的运作和变化，用于服务业的生产投资可能增加，对社会和个人服务的需求也将迅速增长。

另一方面，在这五年内将有更多的国家开放市场，农产品的出口前景将会更加光明。

1994年至1999年，泰国经济增长将有两个周期性的上升。第一个的周期性的上升将出现在1995~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接近和超过9%，到1997年，由于国内需求降低，增长率可能放缓为7~7.5%。另一个周期性上升约在1998~1999年，由于消费的增加和出口的恢复将促进投资的增长，到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再次超过9%。

1994~1999年间，民营消费增长估计每年度为7~7.5%，在截至1993年的前五年，年度增长率为7.0%，因城市和乡村人均收入增多，到1995年，私人消费增长将进一步上升到8.0%。到1996~1997年可能稍有下降，非食物通胀可能会抑制消费增长。

另外，分散到内地各府投资的政策，也使各府的收入锐增，由于乡村相当贫穷，大量的盈利将促进消费。在曼谷，有良好教育的中等阶层的形成也将促使消费增长。

除了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期间外，泰国的物价一直相当稳定，估计在未来五年，通胀仍能控制在低水平。

政府的政策使目前的开支增长放缓，为了改善政府的金融状况，谨慎的财政政策能使金融政策更灵活地对付通胀，以免除经济增长的压力。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政府的开支尚不为多，仅是在近几年迅速增加，但仍然低于其他需求成分的增长，1994~1999年间，估计政府的消费增长每年度约为4.5~5%。

未来几年，民营在经济方面虽然将起主要作用，但为了提高市民参加城市服务的积极性，政府还应使公务员工资更具吸引力。另外，逐渐提高员工技能已日益紧迫。这些都将需要大笔开支。

在投资增长方面，虽然不可能达到1988~1990年间的20%，但1994~1999年间，应从1992年的低水平恢复到每年度的9.5%。对于促进短期需求来说，较高的投资增长十分重要。

固定投资的进一步增长，主要取决于基础建设开支，六十至七十年代期间，政府曾大量投资于改善公路和灌溉系统。

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家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拖延了总体增长，因为政府要求减少财政赤字。九十年代初，由于基础建设不足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主因，基建投资再次增升。

国外对泰国产品的强烈需求，将使民营制造商增加投资以扩大生产力。面对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诸如中国、印度和越南，政府必须改善投资环境。

随着目前形势的发展，进入1995年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利率的

稳定和更加开放的投资环境将使投资增长率升至约 9%。

到 1996 年至 1997 年，估计世界经济的放缓会对泰国造成出口下跌，工业投资可能减少。虽然如此，大量的基础建设开支将有助于总体投资增长保持在 8~8.5%。1997 年以后，估计国际经济环境进一步好转会使世界对泰国产品的需求转旺，到 1999 年，投资增长率可望反弹到 13.5%。

1990 年，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8.5%，到 1993 年，来往帐赤字逐步减少到 GDP 的 5.4%。该下降趋势持续到 1999 年，赤字将减至 GDP 的 2.0%。

商品出口和原材料进口增长的减缓将使商贸赤字得到控制；当服务业得到更好发展时，隐形赤字也将下跌。

再者，整个预测期间来往赤字的下降应胜于资金流入的补偿，这将导致外资储备的进一步建立。

1989~1993 年间，年平均出口增长率为 18.1%，1994~1999 年在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年平均出口增长率应达到 16~16.5%。1995 年的出口增长估计可达 20%。泰币兑其他主要货币币值的下跌也将促进出口。

不过，1996~1998 年间，持续高涨的出口增长可能降至 14~15%，预计 1999 年将反弹到 16.5%。为了促进泰国产品的出口，必须致力于市场销售以及在技术方面更多的投资，以改善储存和运输状况。

泰国以往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外国投资，过去的第一次经济繁荣，都伴随着大量的进口，随着国内工业对本地需求的日渐满足，这种情形将逐渐改变。

在平衡方面，预计 1994~1999 年每年进口增长将达 15~15.5%，比 1989~1993 年的 17.9% 稍有降低。由于经济处于上升之势，在未来 12~18 个月内，进口仍将保持目前的水平。

造成今后进口增长放缓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工业结构的问题，现在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工业投资的措施，并已获得了成效。

由于出口增长稍快于进口，到 1997 年商贸赤字将从 1993 年的 43 亿美元降到 30 亿美元以下。到 1999 年，商贸赤字将稍增至 48 亿美元，但仍低于 1990 年的 68 亿美元。

隐形赤字在 1994~1995 年上涨之后，随着服务业变得更具竞争力而可能逐渐下降。

在资金流动和外债方面，1995~1999 年，来往帐赤字将被流入的资金超过，其将使整个收支平衡处于剩余状态。

虽然在周期性的商业活动高潮之后投资会出现短期波动，但许多因素将使外资继续流入。

首先，良好的商业机会、增强的基础设施和政策的刺激将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

第二，对基础建设投资的高需求，意味着本地资金不足以支持计划的工程。不久的将来，或是直接引进外国资金和证券投资，或是大规模的贷款。

第三，可能允许外国人更多投资股市。泰国信托基金已被批准于 1995 年建立，将能使外国银行业的外资流通更容易。

泰国和海外利率之间的差异（尽管由于竞争利率差将缩小），将提供资金流动的规定，将使银行业的外资流通更容易。

同时也将提供套利机会，由于泰币稳定，不会出现较大的汇率风险，总

储备金将从 1993 年的 245 亿美元增至 1999 年的 520 亿美元。

部分外资将以贷款形式流进。由于经济更富足，泰国公司的信贷信誉得以改善，从外国借贷变得更容易，1993 年，总外债为 428 亿美元，到 1999 年估计为 670 亿美元。

1994 ~ 1999 年间，通胀仍将平缓，年平均为 4 ~ 4.5%，1995 年，虽然非食物通胀可能导致国内需求增强，但食物价格稳定使总体通胀趋于缓和，两年之后经济活动趋弱，将会进一步抑制通胀，1997 年通胀将低至 3%。但到 1999 年，经济的恢复可能再度使通胀升至 4.5%。

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短缺和工资增加的结果，可能导致产品价格上升。另一个潜在的危险是由于金融自由化和现有的汇率体制，使控制资金流动和左右资金供应变得更加困难。

估计未来几年对信贷的需求会很强，除了基础建设方面的大量开支，工厂设备的投资也将增大。虽然资金市场持续发展将带来更多的融资途径，但银行信贷仍将是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泰国国家银行应考虑改变汇率机制，使其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估计到 1995 年中，泰铢兑美元将为 24.5 ~ 24.6，到 1997 年底为 25.25 ~ 25.50，到 1999 年底，由于通胀和利率的上升会降到 24.25 ~ 24.50。

综上所述，未来五年泰国经济发展的各种有利因素在顺利增长，国民生产仍将获得稳步发展。

九 菲律宾：世界飘移的棕榈油

菲律宾是一个热带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有着非常良好的世界市场，其棕榈油、三合板行销世界各地。但由于政局的动荡和世界霸权主义的横加干预，已使菲律宾进入了日趋维艰的境地。但不可否认，它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它在东盟中的地位是不可小觑的，同样在亚洲经济发展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菲律宾经济现状、问题及前景预测

1. 菲律宾经济从呆滞走向复苏

1994年是拉莫斯总统执政以来经济成长最鼓舞人心的一年。菲律宾终于摆脱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呆滞，步入希冀已久的经济复苏。根据菲律宾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94年菲律宾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5.1%，比1993年的2.6%增长了约一倍，超出了4.5%的预期增长率，使菲律宾经济成长自1990年以后首次超过了该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扭转了十几年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持续负增长的颓势。

几乎所有生产部门的经济活动在1994年都获得了较好的效益。工业平均增长6.1%，远远超过1993年1.6%的增长率水平，亦是1990年之后从未有过的最高增长率。其中制造业的增长率为5.1%，建筑业为10.9%，公用事业部门为13.8%，只有矿业部门的生产情况为7%的负增长。1994年农业部门的增长率为2.4%，高于前一年的2.1%。

投资与出口的增长也超出原先所预计的指标。菲律宾1994年投资增长率为10.1%，出口增长率为19.5%，进口增长率为17.9%，大大超出原先预计的3.4%、6.2%和12.2%的水平。

1994年国内资本形成为1890亿比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64%，比1993年的23.34%高出1.3%。经菲律宾投资局批准的外资投资额为600亿比索，是前一年的4倍。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增长133%。

菲律宾政府在财政方面实现了181.7亿比索的预算盈余，这不仅突破了原计划47.6比索的预算赤字，而且是政府在20年以来首次出现的财政预算盈余。

2. 促进菲律宾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

虽然与东盟其他国家1994年经济增长情况相比较，菲律宾的经济增长仍嫌稍慢，但是，毕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扭转。菲律宾去年经济之所以会取得多年未有的增长实绩，除了受益于美国、欧洲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强劲的经济复苏的拉动，并得益于农业在去年的好收成等外部或偶然因素之外，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至关重要。

首先，菲律宾国内政治社会环境已趋稳定。为了给菲律宾经济复苏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拉莫斯总统执政伊始将和平、和解及政治稳定作为其优先工作和重要政纲。二年多来，拉莫斯政府坚持不懈、主动地与国内各界，尤其是反政府力量进行对话与和谈。其间，拉莫斯总统对全国43个省份进行了75次视察，对17个城市进行了29次视察，并举行了5个全天候人民协商日，就社会改革、选举改革等问题广泛征求人民意见。促进了国家的稳定与团结，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曾在 1989 年联手发动军变的三股右派叛军革命爱国联盟、菲律宾人民士兵、青年军官联盟目前正在与政府谈判。在政府和平攻势的感召下，叛军力量已处于涣散状态，失去再度发动军变的能力。

曾严重威胁菲律宾政府的菲律宾共产党因内部分裂、派系林立，力量已大为削弱。同时，菲政府与菲共的谈判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双方于 2 月 24 日在荷兰举行的预备会上签署了安全与豁免保证联合协议，同意今年 6 月在比利时举行正式会谈。

菲政府与穆斯林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的正式和平谈判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双方曾达成停火协议，谈及建立棉兰老自治政府及建立军队等实质性问题。第三次正式会议将于今年年中举行。虽然穆斯林极端分子仍在与政府交战，但已不碍大局。

曾对菲律宾尤其是大马尼拉地区带来恐惧的勒索架案件在政府的打击下有所减轻。以 1993 年和 1994 年 1 至 10 月相比较，政府对犯罪案件的处理有效率从 80.7% 升至 83.4%。

其次，社会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拉莫斯执政后，一直强化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拉莫斯总统于 1994 年 1 月 20 日颁布了 109 号行政令，设立旗舰项目总统委员会，以协调和监督基础设施项目的执行情况。截至 1994 年 9 月，经确认的旗舰项目共有 85 项，总额达 2200 亿比索。其中 51 项正在进行之中，资金额为 1100 亿比索，其余 34 个大型项目正在计划之中。私人部门参与的大型旗舰项目投资为 1390 亿比索，占 63%，其余 810 亿比索的项目则由官方开发援助提供。目前已完成的旗舰项目共 8 个。拉菲斯总统利用国会授予的解决电力危机的特权，成功地通过 BOT 方式，鼓励外资与菲国家电力公司和私人电力公司联合投资建立新的发电厂。由于政府的开放政策和私营部门的积极参与，在不动用国家财政支出的前提下，解决了困扰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长达 18 个月的电力危机，并尚有 300 兆瓦的储备电能。

再次，经济开放与改革进一步深化，成效显著。拉莫斯上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开放与改革的重大举措。比如，原先受到严格投资比例限制的矿产资源开发部门，如炼油业、发电业、石化业、汽油业；公用事业部门与农业和资本市场；水泥与建筑供应；食品业等现已对外开放，外商在这些部门最高可拥有 100% 的股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正在进行。

1994 年 5 月 18 日通过的 7721 号菲律宾共和国法令，允许 6 家至 10 家外国银行在今后五年中在菲建立分行，或购买当地银行 60% 以下的股份，或建立辅助银行。保险业也已对外开放，外国公司可拥有保险公司 100% 的股权，为了进一步吸引外商来菲投资，菲律宾还将外商在菲租赁房产和土地的使用权延展至 50 年，并可再延展一次 25 年。

1995 年 3 月，菲政府颁布了共和国第 7916 号特别经济区法令，设立了菲律宾经济区，规定凡在菲律宾任何经济区所给予在区内的永久居留权。在区内投资的外国企业可自由选择独资或合资的形式，从事任何工业、国际贸易或商业投资，并可享受优厚的免税和减税待遇，同月颁布的菲共和国 7918 号法令对参与 BOT 基建项目的外资企业给予更为优厚的减免税收优惠，并重新恢复了曾于 1994 年 12 月 31 日被取消的对进口资本设备免税，为购买本国资本设备提供贷款的有关规定。

菲律宾政府正在努力推行促进贸易自由化方案，进行具有实质性的贸易体制改革。根据 1993 年颁布的 470 号法令规定，菲政府已排除了对 2720 种

进口商品实行数量限制的非关税壁垒。目前，除了对 180 种进口商品仍然实行进口许可证配额或产品配额制，对农产品中的糖、谷类、幼稚工业的中间产品征收 50% 的保护关税外，其他进口商品分别征收 3% 至 30% 的四重关税。从 1996 年至本世纪末，菲律宾的关税结构进一步简化为两重关税结构，将取消中间产品与制成品之间的关税差别。菲政府还积极参与东盟共同有效的优先关税计划，在 15 年内使东盟成为自由贸易区。根据该项计划，东盟国家在 1993 年至 2008 年的 15 年内，所有主要制成品和加工产品的进口关税降至 0~5% 的水平。菲政府已经同意对 4451 种产品进行减税，占全国减税商品的 79.6%。

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政策的调整正在进行。菲律宾创立了中央货币机构，菲律宾中央银行取代了原有的中央银行委员会。新创立的中央银行在相当大程度上摆脱了原中央银行委员会在马科斯时代欠下的 300 亿比索国内债务的束缚，能够独立有效地起作为菲律宾金融体系的监督和协调机构的作用。同时，菲政府又进一步放宽了对银行设立分行的控制政策，使现有的银行能在扩展其市场的和扩大业务服务方面享有更多的灵活性。菲政府解除了实行 40 多年之久的外汇管制政策，使商品与劳务出口商可以自由支配他们所得的外汇，菲律宾人对外投资的资本额上限从 100 万美元进一步放宽至 300 万美元。外汇管制的解除也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在菲所赚得的利润，除了缴纳所得税之外，可以自由汇出和自由撤出其投资本金，表明了菲政府促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决心。

最后，打破垄断，鼓励私人参与经济建设，阿基诺政府执政时期虽然也许诺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运动，但进展缓慢。据统计，截至 1992 年 4 月，资产私有化委员会在阿基诺执政的 6 年期间仅出售了 19.6 亿美元的国有资产，约占其许诺的 50 亿美元私有化指标的 1/3。拉莫斯执政后，一方面极力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创造出售条件，另一方面放宽外资对这些部门投资的限制，在 1994 年一年，便出售国有资产总额为 520 亿比索（约合 21 亿美元），为过去年平均出售额的 4 倍。使 1987 年以来政府国有资产出售的总收益达 1280 亿比索（约合 50 亿美元）。1995 年私有化的几家最大的国有企业为：菲律宾最大的钢铁厂，国营国家钢铁公司的 75% 的股份已出售给私营界，总收益为 151 亿比索；马尼拉电力公司 3870 万股的股份已被出售，总收益为 136 亿比索；菲律宾造纸工业公司的 72% 的股份亦被出售，总收益为 24 亿比索；菲政府在东方石油公司和矿业公司拥有的 194 亿比索的股份也已出售给私营界。今年 2 月，菲参议院又通过电讯改革议案，开放电信局。排除阻碍中小型私营电力公司经营电信业的障碍，以改变菲电讯业的落后状况。菲律宾国内最有影响的工商联会在一年一度举行的商业集会时指出，“随着政府对商业政策的改善，菲律宾私营界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火车点”。

3. 菲律宾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虽然菲律宾经济在 1995 年取得了多年不遇的景气，但是，菲律宾经济能否摆脱以往“繁荣—衰退”所谓菲律宾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进入经济持续和快速发展时期，仍有很多有待克服的困难。

（1）必须促进国内外直接投资，将资本引导到本国具有实质性经济发展的部门。

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虽然去年菲律宾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

绩，但是若作进一步考察便可明了，菲律宾经济增长并不主要是依靠国内外直接投资增长而获得的。1995年外国在菲律宾的投资总额为41.1亿美元，但是其中的32.3亿美元，即占投资总额的78.55%，是投资于利率稳定和回报率高的国库券与证券投资。直接投资仅为8.8189亿美元，占21.45%。主要投资于有固定投资回报率与能源有关的公用基础设施与建筑业部门。投资于制造业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为数不多。由于制造业部门的振兴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能促进出口，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因此，如果吸引国内外资金投资于具有实质增长意义的制造业部门是实现菲律宾经济持续增长所必须克服的难题。

(2) 必须提高生产力，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改变贸易长期逆差状况。

菲律宾能够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还取决于菲律宾的对外贸易逆差地位能否改变。由于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货物和中间产品大部分依赖进口，进口所需的外汇主要靠本国出口取得，加上菲国内市场狭窄，生产的扩大必须依赖国际市场。因此，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和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是极其重要的。因菲政府常年来忙于应付国内发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忽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科技发展，菲律宾的生产力水平在15年间进展甚微。在亚洲国家中，菲律宾的生产力水平居倒数第二位，仅次于孟加拉国。以菲两项最主要的出口拳头产品电子和纺织品而言，因资本货物和中间产品均依赖进口，出口净创汇并不多，生产力低下和依赖进口使菲律宾出口产品价高质次。加上菲律宾工资成本较高，大量追求高利率的外国热钱流入，迫使菲币升值，使菲律宾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削弱了。贸易收支逆差状况继续恶化，不仅给比索带来压力，亦使外国投资者驻足不前，成为危及经济持续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

(3) 必须提高国内储蓄率，要避免爆发墨西哥式的货币危机，必须提高国内储蓄率，增强外汇储备，对政府的财政赤字采取有效行动。由于菲国内低投资率、低生产率和低收入，使其储蓄率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左右，仅及新加坡同一指标的30%，马来西亚的38.1%，泰国的39%和印尼的38.4%。国内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差额只能依赖外来投资弥补。可是，菲律宾直接投资环境欠佳，外资的主体是短期资本投资，此类资本风险很大，一有风吹草动，便会轻易爬出。菲对外贸易巨额逆差和巨额外债本金偿还一直是菲外汇储备赤字主要缘由，近年来海外劳工巨额汇款和短期外资流入，改善了菲律宾外汇储备状况。但避免外汇危机的根本解决措施是扭转贸易逆差状况。近年来菲政府削减关税的改革虽然有利于提高控制财政赤字和通胀率，限制了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旨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值税法尚有待大理院对其合理性作出裁决。由此可见，菲政府财政收支危机仍有可能发生。

(4) 必须加速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

虽然菲律宾社会基础设施在近二年间有了很大的改进，并基本上解决了电力短缺问题。但是仍然不能跟上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步伐。目前，菲律宾又面临着用水危机。大马尼拉区有些地方，断水时间长达5~8小时。交流、电讯设施的落后状况亟待改进。据世界银行估计，假如菲律宾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4%至5%，从1995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需要400亿至500亿美元。其中电力部门需投资150亿至200亿美元；电讯部门50亿至70亿美元；交通部门140亿至180亿美元。目前已承诺的以

BOT 方式承建的基础设施总投资约为 88 亿美元（合 2200 亿比索），但仅占所需投资总额的 17.6%，尚有 83.4% 的资金无从着落。只有对私营部门进一步开放被国家垄断的发电业、供水、港口、道路、城市交通等建设服务，并向私营部门开放提供有关基础设施的开发融资，才能使滞后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跟上经济发展的要求。

4. 菲律宾经济展望

菲律宾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水平？菲律宾政府下属的社会经济研究机械与私营智囊机构的预测基本上一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可达 6% 至 6.5% 的水平，理由如下：

（1）因菲律宾近年来经济发展情况较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同意放宽 1995 年对菲政府提供 6.5 亿美元贷款的附加条件。主要内容为放宽菲政府对货币供应的增长上限；允许菲政府以较不带强制性的方式执行扩大增值税。这必将有利于今年经济的发展。

（2）随着投资环境的日益改善和投资政策进一步放宽，今年将有更多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菲律宾。据报道，截至 1996 年 2 月份在菲律宾各类出口加工区注册的外资已达 23.52 亿比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 9 倍。由于菲律宾投资署已将有关 BOT 方案列入 1995 年优先投资方案之内，并给予电讯业以更多的优惠，以 BOT 方式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会进一步扩展，社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必将带动和推动其他一系列产业部门的发展。

（3）对外贸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贸易逆差额可望减少。拉莫斯政府为促进贸易和减少贸易逆差，在出访期间极力推销本国商品，并与各国签订贸易合同，得到很多国家首脑的承诺，在大量进口菲律宾商品的同时，采取具体措施减少菲方逆差。从今年起，旨在促进出口和货币贬值措施已经生效。菲币已经贬值了 6%。菲币的贬值将有利于菲产品的出口。此外，为削减贸易逆差而采取的措施还有补偿贸易政策。政策规定，凡政府部门进口或购买 100 万美元以上的资本设备、机器、商品和服务时，必须以补偿贸易、产品赎回、抵债贸易或其他安排形式出口相同数量的菲律宾商品。

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经济发展尚存在诸多不利因素。自墨西哥爆发货币危机之后，菲律宾国内很多人对本国的经济发展前景表示担忧，认为菲律宾也有可能爆发货币危机。这一信任危机极其不利于今年的经济发展。此外，贸易逆差也不是单靠“友谊”所能解决的，其前提是进行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调整，有待于国内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最后，菲政府目前的财政收支很难保持继续盈余。因为以往政府的预算盈余主要来自于国有资产的拍卖，大部分具备私有化条件的国有资产已开始实现了私有化。眼下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收入将会大为减少，加之政府的债务偿还负担依然沉重，所以菲政府的财政开支能否平衡前景不容乐观。

十 印度尼西亚：千岛之国的雄起

印尼是与中国有着传统友好往来的邻邦，其“亚麻”布走遍世界无敌手，由于过去依赖石油天然气的出口，其受世界市场的波动影响较大。通过若干年宏观经济的调整，印尼终于以快节奏的经济发展速度为世人称道。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千岛之国的自然状况，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薄弱已成为该国的“瓶颈产业”。

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

印尼独立之初，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进行建设，决定将国民经济置于政府绝对控制之下。一方面，通过没收西方国家在印尼的产业建立起重要的民族工业，并使之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骨干作用；另一方面，制定严格的经济发展计划，通过国家预算与税收政策对国家经济生活进行多方面干预。

苏哈托上台后，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政府重点扶持和鼓励私营企业及外资企业的发展，一些新型私人企业集团异军突起，国营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有所改观。

进入 80 年代以后，印尼宏观经济政策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又发生了明显变化。政府逐步减少了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传统方法，更多地采用财政预算、税收及其他经济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在促进微观搞活的同时尽量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与稳定。其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稳定宏观经济环境

80 年代中期以来，印尼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并逐步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但是，它并没有放松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而是通过平衡预算及严重的信贷政策来建立稳定的经济环境，把遏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尽管近年来其经济发展一直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但国内通货膨胀率始终控制在 10% 左右。这不仅避免了通货膨胀过高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2. 调节个人收入

政府通过税收等宏观调控手段来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避免两极分化。最近几年，随着经济发展，各阶层之间贫富悬殊问题较为突出，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少数私人财团和一批高薪阶层（公司职员）成为首先致富者，其收入往往是普通工薪阶层收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经济改革虽然使大多数人获得了实惠，但从全国范围来讲，贫困问题依然十分严重。据估计，现在印尼大约有 3000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全国人口的 17%，这就凸现了贫富悬殊的严重性。

为逐步消除贫富悬殊，印尼政府从 80 年代中期起即尝试建立以个人收入调节税及产品附加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以调节各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根据新的收入调节税，全国纳税的个人与公司猛增至数千万，税收自然也就大幅度增加。苏哈托于 1990 年 1 月提出了一个“均匀同等化”计划，要求各大公司将其股权的 25% 出售给合作社，并协助合作社成员走上共同致富之路，现在印尼大约有 3800 个大大小小的合作社，社员大多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工

人，农民，社员人数近 2000 万。政府希望通过改善合作社的生产和经营状况来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尽管这一政策作用有限，但它毕竟对缓解贫富悬殊有些帮助。

3. 调整产业结构

进入 80 年代以后，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大幅度下跌给印尼经济带来了重重困难。为了改变这种被局面，印尼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把扶持出口导向型企业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促进非石油产品出口，以出口贸易为龙头带动整个经济发展；改造国营企业，鼓励私人经济发展等。这些政府措施给印尼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其经济结构也趋于合理，这也是其经济腾飞的重要前提条件。通过这些改革，大大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特别是非石油、天然气产品出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段时期，印尼制造业开始起步，机械、汽车以及钢铁工业发展迅速，而轻纺工业则成为出口创汇的支柱性产业。

从 1994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重点是扶持一批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力争在本世纪末使印尼高科技企业迈上一新的台阶。

4. 调整地区经济发展布局

印尼政府对地区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以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使全国整体经济布局趋于合理。由于历史及地域等方面原因，过去经济发展的重点一直是围绕爪哇岛进行的。爪哇岛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 7%，但那里却生活着 60% 的人口，工业产值也占全国总产值的 80% 以上。边远的摩禄古群岛以及西伊里安查雅等地，尽管地域宽广、资源丰富，但因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经济发展一直停滞不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印尼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对这些边远地区进行开发。例如建立国家移民基金，以鼓励爪哇岛的居民前往定居；规定外资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给予一些政策优惠。与此同时，印尼政府还积极与菲律宾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合作，努力在东部地区建立新的“东部成长三角”，促进这些地区的开发。

宏观调控的手段

印尼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印尼政府从 1969 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到目前为止共实行了 5 个五年计划。1984 年开始第四个五年计划时，由于石油价格再次下跌，石油收入明显减少。这段时期，印尼对税收体制、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进行全面改革。通过这些改革，国内外资本投资大幅度上升，一些高科技产业开始起步，而私人企业则开始在国民经济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其投资规模占投资总额的 45%；这段时期非石油产品出口增长迅速，1988~1989 年度，非石油、天然气产品占出口总额的 60% 左右，已成为其主要出口产品。

从 1989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行第 5 个五年计划，印尼继续进行财税和金融体制方面的改革，以前的改革也开始产生明显效果，经济结构继续得到改善。

1994 年 4 月 1 日起，印尼开始执行第二个 25 年社会发展规则及第六个

五年计划（1994～1999）。印尼政府已经把发展高科技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目标，同时对基础产业的投资也将略有增加。

2. 政府的财政预算

财政预算一直是印尼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从 80 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政府鼓励发展私营企业，同时积极吸引外资，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有所减少，但通过财政预算来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仍是政府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

首先，政府通过平衡预算，减少财政赤字，控制全国整体投资水平，并努力使通货膨胀率降至 10% 以下。从 80 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经济发展迅速，通货膨胀的压力也非常大。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后，通货膨胀率仍然高达 9.24%，远远高于政府“六·五”计划规定的 5% 的控制目标。印尼一直将对付通货膨胀作为其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除了采用高利率政策之外，实行严格的财政收支平衡，控制全国整体投资水平，是控制通胀的法宝。另外，印尼将外国援助作为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政府的实际收支真正保持平衡。

其次，通过财政预算实现全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平衡，并优先鼓励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以及出口创汇型产业的发展。根据 1995～1996 年度财政预算方案规定，政府投资在 10 亿美元以上的产业有：扶持边远地区经济发展，其中包括开发性移民所需经费；交通运输业；能源、采矿业；文化教育事业等。该年度政府在农业和林业方面投资达 5 亿美元，主要扶持农副产品加工及出口创汇农业的发展；在制造业方面投资为 2.6 亿美元，重点扶持汽车及机械工业发展；政府还在科技方面投资 3 亿多美元，以鼓励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3. 税收

1994 年 10 月 14 日，印尼人民协商会议又对现行税进行了全面修改，主要增加征税范围，如对粮食制品及部分纺织品征收增值税，增加土地使用税以抑制房地产业的过快发展。税率由则 15～35% 减少到 10～30%。对制造业、建筑业以及燃油业，印尼政府规定凡用于出口的上述产品免征增值税，以鼓励出口贸易的发展；而对于国内市场上并非国计民生所急需的产品，政府则以征收特别消费税为手段尽量控制其过快发展。

4. 国营企业及政府职能部门

80 年代以前，国有企业一直是印尼经济的骨干力量，而且也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最近几年，国有企业因为面临私营企业及外资企业的竞争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营困难，但它们仍然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如交通运输、能源及金融业）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府通过这些国有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及地区经济发展布局方面，起一定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另外，政府还通过一些职能部门，制定和执行有关金融、投资、税收和劳动的法律法规，对经济发展起指导和管理作用。

十一 越南：希望向深处延伸

可以预言：越南如能保持目前的改革开放的势头，又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国际环境，它的经济发展必将有一个大的飞跃。尽管它的前面困难重重，但它毕竟已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越南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与外国的经济合作不断扩大，目前已几乎覆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据越国家合作投资委员会估计，到 2000 年国外在越投资总额将达 200 亿美元，主要将用于工业、农业和基础建设项目。为此，越合作投资委员会建议，要合理使用外国投资，以 30 亿美元发展石油和油气工业，以实现到 2000 年达到生产原油 2 千万吨的目标；以 50 亿美元用在胡志明市、广南—观港、海防等地建设集中的工业联合企业；以 20 亿美元用于发展现有以及新有消费品工业；以 30 亿美元用于建造年生产量可达 800~1000 万吨的四、五家水泥厂；其余投资资金则用于冶金、化工、电子工业及农业、林业、渔业等方面。

在胡志明市，1994 年外国投资总额为 11.8 亿美元，与 1993 年相比增加了 15%。另据越国家投资合作委员会透露，近期批准了河内市的 67 个外国投资项目，使河内目前的外资项目达 171 个，总投资资金 22.7 亿美元。其中工业部门投资占 27.2%；交通、通讯方面的投资占 14.5%，旅游业占 20% 左右，其次是农业及林业发展等方面的投资。胡志明市的投资速度有所放慢，而附近省份的投资却迅速增加。同奈省 1990 年只有几个外资预案，到现在已增加到 33 个，总投资额达到 2.46 亿美元。小河内省目前有外资预案 31 个，总投资为 2.11 亿美元。据《大团结报》报道，由于胡志明市严重的官僚主义及冗繁的手段，正阻碍着外国投资的增长，外国投资者的申请往往要盖 30 多个公章还未必得到批准，所以许多人担心胡志明市吸引外资的计划将会陷入困境。但就整个越南而言，外国投资正如日中天。

1. 外国投资热不断升温

1994 年 11 月 15 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支援越南发展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多个有关的国家和组织，他们是法国、瑞典、英国、德国、澳大利亚、芬兰、韩国、美国、新加坡和文莱及 7 个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除此之外，还有 8 个联合国组织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由越南计划委员会杜国岑率领的越南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越南的经济发展、援助越南的合作与管理，越南对外资的需求及援越的义务分担等问题。

另外，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帮助下，到目前为止，外界已向越南援助 110 个投资项目，总投资额为 5.8 亿美元。投资的大部分项目集中在化工、医药、机械制造、冶金及食品加工等领域。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以前在越南主要进行技术转让，而现在主要是促进对越的外国投资。此外，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还将支持并帮助越南国内中小型企业，发展地方工业及中部不发达地区的工业项目。

去年 11 月 22 日，越南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还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该组织将对越工业商业政策提供咨询服务以促进国营及私营企业

现代化。此外，该组织还将在技术转让、自然环境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援助。为此，双方已同意成立一联合委员会，每年在维也纳、澳大利亚或越南召开一次年度会议以推动合作的持续发展。

去年 12 月 27 日，越南国家投资与发展委员会在河内正式向两家在海防的联营公司颁发许可证，一个预案是与日本联营，一个是与台湾联营。1994 年间，海防市共向外国投资颁发 12 个许可证，至此，海防的投资预案已达到 29 个。总投资额达到 8.02 亿多美元。

越南的首家微生物农药生产厂最近已在胡志明市雅贝县举行开工仪式。这是越南杀菌剂公司与两家中国企业进行联营的一个农药厂，合资期限为 20 年，资金 200 多万美元。越南方面出资 40%，并负责设计，而技术设备全部由中国方面提供。预计该厂每年将生产 2500~3000 吨微生物农药。

1994 年 9 月 25 日，日本希空逊（音）公司与越南河静省成功缝纫厂签署联营生产出口成衣合同。根据合同，希空逊公司将投资价值 5000 万美元的 5 万台缝纫机，合同期为五年。这是该公司第二次与越南公司联营。1991 年希望空逊公司曾与越南另外一家缝纫公司在越南南部的头顿建成了一家联营公司，日前这家公司已雇用了 1000 多名当地工人。

1994 年 11 月 18 日，中国河北省建设局在谅江县香山乡开工兴建一座年产量为 8000 万吨的水泥厂，这是河北省至今最大的境外工业工程，工程投资总额为 507.26 亿，预计 1996 年第一季度投入生产。从整个情况看，外国对越南的投资正逐步进入高潮。

2. 大量外国贷款涌向越南

据越统计总局报告，现在越南共有约 4500 家私人企业，主要集中在商业、旅游、工业和消费工业领域，其中有 17% 的私人企业资金在 5000 万盾以下，30% 的私人企业资金在 20 亿盾以上。各私人企业只有固定资产，流动资金要靠银行贷款，所以银行信贷吃紧。为此越南正在大力争取外国贷款。

据亚洲发展银行菲律宾支行说，该行已同意同越南提供 8000 万美元的贷款和 140 万美元的援助，以帮助越南实现朝市场经济过渡的农业计划和帮助越南私人企业在大米出口和化肥进口方面站稳脚跟。这笔援助款项将主要用于设立市场和农业税收的通信系统。这笔 8000 万美元贷款属无息贷款，还款期限 40 年。

一位访问过越南的亚行官员称，1995 年至 1997 年，亚行将向越南提供 12 亿至 14 亿美元贷款和 5000 万美元的技术援助，仅明年就将向越南提供 3.75 亿美元信用贷款和约 1100 万美元的技术援助，旨在帮助越南进行经济与行政改革。1994 年国际社会承诺向越南提供的援助已达 18.6 亿美元。在巴黎会议上，许多发达国家及国际财政组织已保证向越增加贷款 20 亿美元，其中有 20% 为无偿贷款，其余为低息信用贷款。

1994 年 12 月 16 日，亚洲银行代表团访问了河内，讨论了 1995 年和 1996~1997 年的援助计划，亚洲银行正商讨向越南提供 4 亿美元借款和 1700 万美元无息贷款的计划。亚洲银行除在 1996~1997 年财政年度援助计划中保证继续向越南借贷 12~14 亿美元外，还将再向越南提供 5000 万美元的无息贷款。

又据消息，1991 年以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向越南贫困地区援助 1 亿美元，以帮助贫困的母亲及儿童。在过去几年中，在该基金会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援助下，越政府已完成了许多有关儿童教育及健康的项目，如目前正在

进行的提高儿童免疫力的项目等。

据胡志明市统计局的资料表明：截止 1995 年 1 月底，该市银行系统共拿出 110000 亿流动资金，国营银行系统占总流动资金的 57%，已贷出资金 18%，合资银行、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占总借贷的一半。

在债券方面，去年 10 月 6 日，越南投资与发展银行已开始发行第一阶段银行债券。债券在全国 24 个省市发行，全国各地踊跃认购，有 5 家省级投资银行债券在当天就发售一空。

同时，为了巩固越币的地位，越政府已正式颁布了禁止美元在国内流通的法令，并于 1994 年 10 月 1 日生效。总的来说，美元已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据经济观察家认为，这个新的决定可能会造成混乱，因为越南民众由于越币的不断贬值，已习惯于使用美元和黄金。

另外，遵照政府总理对外汇管理的决定，去年，在越南最大的两上城市河内和胡志明市的各大宾馆饭店和主要商业中心安装了 350 多部外汇兑换器。目前，胡志明市已有 200 部计算器投入工作，进行外币与越南盾的直接兑换。

3. 越南呼吁外国投资水产生与加工业

越南（自称）拥有 3260 公里的海岸线和 100 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因此将水产列为重点发展项目。预朗越水产业将得到迅速发展，前景广阔。

越南 1994 年水产出口金额达 4.6 亿美元，比 1993 年增长 24% 以上，其中许多单位取得较高效益，如国家水产进出口公司创汇 1.28 亿美元，明海省创汇 1.14 亿美元，芹苴省创汇 2800 万美元等，其中 75% 的水产品出口到香港、日本、新加坡等传统市场。此外，越南水产品也已打开欧洲和北美市场。目前，越南全国有 164 家水产冷冻厂，其中有些厂家已使用了较现代化的加工工艺，保证了产品质量。

据越通社报道，越南目前正呼吁外国对 20 个水产项目进行投资，这些项目包括水产养殖、水产加工、渔船建设及养殖技术，从现在到 2000 年共需投资 2.1 亿美元。位于湄公河三角洲的茶荣省的 1 万公顷的养虾项目投资巨大，计划年产虾 1.1 万吨。在越南中部建设渔村的计划，预计投资 2600 万美元。其他还有在庆和省进行公海捕鱼合作项目，将投资 1000 万美元。还有一个对虾培育基地和一个年处理 2000 吨虾的冷冻中心，共投资 2500 万美元。

另据报道，越南第一艘美制拖网渔船已于去年 12 月 11 日在美国亚拉巴马的莫宾下水。这是按照签订的合同，由美国生产制造的第一艘大型渔船。该船总载重量为 12 万吨，船上有一容纳 4.2 吨水产品的冷冻室。该船被命名为“船长号”。船上还配备有先进的探测仪器，可观察海面以下 100 米处的鱼群，可在海上连续作业 45 天。美越合同规定，在三年内美国将为越制造 50 艘相同型号的拖网渔船，第二艘已于今年 2 月造成。

4. 外国积极参与能源等基础设施投资

越南基础设施落后，能源、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工业亦跟不上经济的发展，所以大力吸引外资对这些基础工业的投资；各国投资家也看准了机会，大力进军越南基础工业市场。

在能源建设方面：去年 11 月 8 日，越南大熊油田开始产油，这是越南石油与油气公司与一些国际公司共同勘探开发的。大熊油田位于头顿外海 250

公里的大陆架上，是几年前由越一苏石油公司勘探发现的。为了进一步促进大熊油田的勘探与开发，1993年5月16日，越南石油与油气公司与一些国际公司签定了联营合同进行投标开采大熊油田。参与开发的公司包括BHP公司、马来西亚国营石油公司、法国托塔尔公司、日本住友公司和俄罗斯扎卢本内里公司等。BHP石油公司为经营者。经过18个月的开发，大熊油田于去年10月14日正式生产，这是越南第二个正式投产的油田。

据越南《投资报》报道，由于燃料税的增高，越南航空公司将在今年提高票价。越南航空公司担心此举将给财政带来严重的损失，并将失去客户。越南的燃料税从10%增加至40%，每吨350美元与邻近各国的每吨220或240美元的价格相比，使得越南成为东南亚地区燃料价格最高的国家。据越南航空公司的财政经理阮友育说，越南将把国内航线中越南乘客的机票价提高至外国人所购机票一样的水平，即从120美元提至300美元。据悉，尽管去年越南航空公司无法再垄断国内航线，但仍获利2100万美元。

另外，根据政府总理决定，从1995年1月1日起实施通过油价来征收交通费的制度。据说，采取新办法后所收取的款项每年将达到9000~9500亿盾，与采用旧办法收费相比增加了好几倍。

据报道，由俄罗斯设计的越南和平水电坝(站)已经落成，从现在至2000年，该水电站将提供国内一半的电能。和平水电站被认为是越南与前苏联友谊的象征。水电厂的8号机组也就是最后一台机组的功率为2000千瓦。去年12月20日举行了和平水电厂落成和移交仪式，该厂于15年前正式动工，边建设边经营，迄今已向全国供电213亿千瓦时，1995年的目标是生产65亿千瓦时。

在交通建设方面：越南政府已允许75家越南公司参加总价值为3.19亿美元的修缮道路合同投标，并将以财政稳定的标准来选择这些公司。道路修缮的头两段是河内至荣市段与胡志明市至芹苴段，美国7家公司正设法投标承包。另外，还有19家韩国公司、5家法国公司、7家中国大陆公司、2家台湾公司争取投标承包上述两项道路。世界银行将向其贷款1.75亿美元用于修缮道路；亚行将提供大部分必要的信用贷款，并向其贷款1.44亿美元用于修缮胡志明市至芽庄的道路等；日本将拿出3540万美元来帮助修缮36架桥梁，各援助国家将在巴黎举行会议进行研讨。

在电信建设方面：去年8月31日，越南邮政与电信公司与德国西门子公用通讯网集团及设在台湾的西门子电信有限公司在河内签署协定，联合生产程控电话转换设备。这是越南与德国西门子公司签署的第二个协定，总投资额280万美元，其中包括160万的法定投资，越方占法定投资的40%。合资公司将在未来12个月里投入生产，向越南邮政和电信公司提供程控电话转换系统以更新越南现有的通讯网络。1989年西门子公司与越南河内至岷港数字微波电话公司联合对越南电信网的多项工程进行了改造。

同时，越南邮政和电信公司与韩国电信公司在河内签署了电信商业合作协定，这是越南在该领域内与外国签定的合作投资发展、管理、开发电信网的第一个商业合同。根据协定，韩国电信公司将投资4000万美元在海防、广宁省及海兴和前南北方地区安装四万条线路，合同期为10年，包括3年的安装和生产。韩国电信公司从1989年已开始培训了40名越南技术人员。

在航空及港口建设方面：越南航空公司、南方航空服务公司与新加坡航空公司所属的新加坡航空服务公司于去年8月30日在河内签署协定成立航空

货物联营服务公司。

联营公司将在越南商业航空港口一新山机场提供货物装卸服务。第一阶段将设计建造一个新的货物集散站，占地 2.2 万平方米，1996 年完工投入使用。预计年货物集散能力可达 10 万吨，是现有货物集散能力的 3 倍。

越南航空公司是该联营公司最大的股东，占 55% 的股份，南方航空服务公司占 30%，合同期为 2~5 年，预计投资 1500 万美元，其中 700 万美元将用于第一阶段的工程，第二阶段将根据需要再修建货物集散站。

另外，日本国际合作机构与交通运输部目前已结束了对广宁省丐邻港（音）建设方案的可行性研究。到 2000 年，通过港口的年货物流量将达 270 万吨，到 2010 年年货物流量将达 1430 万吨，届时将成为越北部最大的交通运输枢纽。该预案总投资金额为 1.7830 亿美元，该港口有 7 个码头，可以接纳 1 万至 4 万吨级的轮船，并拥有其它辅助工程及现代化的运输装卸设备，工程将于 1998 年初开始施工，2000 年结束。

5. 外国青睐于越南工业区和钢铁工业的投资

不久前，越政府已通过了龙平工业区草案，这个工业区还称为哈马达（音），它将由越南联合工业区发展公司和一家泰国的公司合资兴建。龙平工业区占地 700 公顷，位于胡志明市东北 30 公里处，总投资 3 亿美元，现在已有 60 家公司注册在这个工业区从事开发。

河内市制走了 2010 年城市发展计划。根据规划，市中心建筑遗产将得到保存，楼房的高度将受到限制，同时，城市各街道将实现现代化管理，以减少交通堵塞。

另外去年 9 月 1 日，海防市人民委员会与日本 NU—MO—RA 集团在河内举行了成立海防工业区开发联营公司的签字仪式。该工业区将为国内和国际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场地和各种便利条件，并按照新工业区的形式进行管理。该工业区建在海防以北，面积 153 公顷，预案总投资额约 1.2 亿美元，已于 1995 年初动工。外方投资 70%，越方占 30%。

在外国对越南钢铁业的投资方面，据越《投资报》去年 12 月报道，到 2000 年越南钢铁行业的发展目标是：增建建筑用钢厂、DI 型钢板生产厂，提高工厂效率，改造钢生产线，进口设备，增加大型钢炉，使年产量达到 100 万吨，到 2000 年达到 250 万吨，而国内钢铁需求量为 300 万—350 万吨，因此，仍需要进口一些优质钢材。

1994 年 11 月 8 日，日本 KYOEI 钢铁有限公司主席高岛访问越南，与越南签署了在南部省份巴地—头顿建一个年产 24 万吨的轧钢厂的协议，该厂预计今年 9 月份投产。越南陈微良副总理向日本实业家保证，越南政府将为日本公司提供机会以促进双方在该领域内的合作。另据日本 KYOEI 钢铁公司代表办公室称，该公司正实施一项在砚港建立轧钢厂的方案，初期年产量为 33 万吨，最后将达到年产 70 万吨，总投资额达 1.2 亿美元。在此之前将投资 500 万美元先修建一座港桥。

6. 旅游业逐步兴旺

1994 年 1 至 9 月，到越南的外国游客已上升到 65 万人，主要是法国、日本、美国和台湾的游客。据越南旅游总局局长杜光说，从 1991—1993 年，到越南的国际游客人数增长率为 20~50%。另据越南旅游总局的统计材料，

1991年外国游客是30万人，1992年是44.4万人，1993年是67万人，1994年近100万人。

另外，巴地一头顿还制定了到2010年建成5个旅游区的计划，包括开发龙平区、禄安区、明碳开发区的海滩游泳场和文化遗产，在平州、福表区开辟200公顷荒地蓄养野兽，在营山氏怀区开发48公里的山间旅游区。这些旅游区共投资20多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占60%以上。

越南工会旅游贸易公司和河内市发展公司还与日本于今年1月4日在越南劳动总联合会签署了建设旅游贸易区的联营合同。旅游贸易区将建在河内词廉县肆连乡，占地10公顷，投资总额为4亿美元，其中包括2栋办公楼，每栋30个房间；2个宾馆，400个房间；1个有660个租房的区域和1个5公顷大的公园。这是越南工会经济活动领域中的第一个投资项目，合作双方希望各有关机关提供帮助以便使该项目尽快地得到实施。

7. 越南经济展望

(1) 化肥缺口大。今年越南进口大约130万吨尿素，有26家商业单位获准进口这批化肥，其中，中央农业物资总公司负责大约60%。

(2) 越南与世界大米市场。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1994年世界各国需要进口大米1460万吨，比1993年增加80万吨，而部分亚洲产粮国又减少其稻谷生产增长率，即从3.5%降到2.1%；马来西亚计划只生产能满足国内需求量的65%（现在为75%）。虽然泰国出口大米500万吨，美国出口270万吨，越南出口200万吨，然而世界大米市场仍然供不应求，且优势米价格将上扬。

1994年越南稻米产量计约2245万吨（北部827万吨，中部201万吨，东南部89万吨，九龙平原1126.5万吨），今年虽稍有下降，但仍有能力出口200万吨大米。

(3) 越南国内各黄麻厂亏损严重。河内黄麻厂已于1994年3月中旬关闭，而其它黄麻厂已只生产一个班次，只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工人有事可做，上班的工人每月也只能拿到10多万越币的工资。1993年，全国8家黄麻厂亏损100多亿越盾，今年，亏损可能更严重，8家黄麻厂价值3000万美元的设备正被荒废，成千上万的工人和黄麻种植农户无事可做。黄麻企业和黄麻业劳动者希望有关机构采取措施，帮助黄麻业解决困难，如资助资金，创造就业，以及在目前市场机制下，为黄麻种植者和各直属企业，制定妥当的政策。

(4) 越美贸易将有新突破。在克林顿总统宣布取消对越贸易禁令之后，许多美国公司已开始与越南做生意，截止1995年1月份，仅胡志明市就有37家公司获得了活动许可证，1994、1995年两年内，美国公司对越南市场的投资与出口大约为26.75亿美元，到1998年将达82.22亿美元以上。越南方面已有151家公司企业到美国举行贸易展览。不久前越美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越南商品要打入美国市场并非易事，因为越南尚未享受最惠国待遇，商品将要被征收高额关税。

越南经济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越南经济改革始于80年代，但实质性的改革从1986年开始，90年代进

入全面深化阶段。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框架将在越南形成。越南的经济改革对我们具有较大的借鉴参考价值。

1. 价格改革基本完成，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

越南的价格改革始于 1981 年。1981 年至 1986 年，由单一的国家定价转为国家定价与市场价并存，对实行市场价的产品价格放开，对国家定价的产品采取调价的方法使之接近市场价格。从 1987 年开始，越南逐步打破多种价格，实行统一价。1988 年，粮食取消了双重价格和票证，允许在市场上自由议价买卖。

90 年代以后，将钢、煤、汽油等生产资料价格，也提高到国际市场水平。到现在为止，除电力、铁路运输、邮电、自来水和公房租金等实行统一定价，化肥、水泥、汽油和部分重要金属等实行最高限价，以及大米、原油实行最低限价以外，其余价格已基本全部放开，由市场形成或随国际价格浮动。通货膨胀也逐步下降，1989 年为 90%，1990 年为 70%，1991 年为 67.5%，1992 年只有 15% 左右。今年有可能降到 10% 左右。

2. 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很快，越币币值趋于稳定

严格区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职能。1990 年 5 月，越南就建立起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工商、农业、投资和外贸四家专业银行为支柱的国有银行体系，由于职责不清，其作用未能很好发挥。

1992 年，他们严格实行了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职责分开的制度。中央银行只负责稳定货币，不再承担财政的借款与透支，也不再从事经营性业务；专业银行完全实行企业化，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不再负责对亏损和没有偿还能力企业的贷款与资金供给。

发展多元化的金融体系。除国有银行外，已先后成立了 20 多家股份制银行和财务公司，私人 and 外资都可入股，办起了 10 多家外国银行的分支行和数家合资银行，并允许外资银行从事越币的经营业务。

坚持利率明显高于物价指数的政策。如 1992 年通货膨胀只有 15% 左右，但存款利率为 25% 左右，贷款年利率为 28% 至 30%，以利于增加存款、稳定经济。

实行比较灵活的汇率政策。过去，越南对外币一直实行固定牌价，国家定价与市场价的实际汇价差距很大，最高时达 10 倍以上。

1992 年以后，改为每天按胡志明市和河内两个外汇市场的价格确定牌价，并在有效管理下允许外汇买卖。现在不但企业可以到市场或银行购买所需的外汇，居民只要持有出国护照，就可以到银行自由兑换 3000 美元以下外汇，任何人携带 3000 美元以下出境不再报关。

3. 工资货币化改革取得成效，对职工的分配关系接近理顺

过去，越南同我国一样，各种福利补贴名目繁多、标准不一，职工工资透明度很差，远不能反映其真实的收入水平。从 1992 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已着手通过工资货币化改革，将房租、公费医疗、退休养老、教育费、交通费五项补贴纳入工资，合理理顺这方面的分配关系。

1993 年全部到位，其基本做法是：

房租。将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月租金，从 25 盾提高到 1350 盾，同时增

加大对职工（包括住私房的职工）的工资补贴。从国家主席到一般职工，都参加房租改革，只是对烈属和 1945 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可以分别减免增加部分的 60%至 70%和 100%。同老干部住在一起的成年子女不享受减免，按照新的标准交纳房租。

医疗保险和退休保险。将原来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改为国家和个人共同负担。其中，医疗由企业或单位交工资的 20%，个人交 1%；退休职工由企业或单位交工资的 10%，个人交 5%，并相应提高其工资水平，同时国家分别指定卫生部门和专门养老保险机构负责统一管理、发放与结算，不再继续吃国家的“大锅饭”。教育和交通费也基本如此，国家分别增加职工工资的 15%和 10%。

4. 对比较好的国有企业实行放开经营，对经营不好的企业强制淘汰破产

越南的国有企业比重较大，在工业中仍占 60%。但经营情况普遍不好，盈利、盈亏持平和亏损的大约各占三分之一。为尽快扭转这种局面，减轻国家的负担，从 1992 年下半年开始，对国有企业采取重新登记的办法。即对那些经营较好，产品有销路，能够盈利的，重新发给许可证。然后让企业放开经营，政府对企业除任命厂长（经理）和审批重要发展规划，依法征收产品税、所得税和资产占有税（不同行业实行不同税率）以外，其他事情包括企业领导副职的人选、生产、销售、价格、进出口、劳动用工、内部分配和机构设置等基本上都不管，全部交给企业厂长（经理）负责。企业的党委书记，由职工党员选举产生，报地级以上党委批准，在企业起保证监督作用。并打算进一步将国有改造为股份制企业，1992 年已组成 100 多家试点，1993 年以后逐步推广，自前股份制改造比较顺利。

对生产经营不好，没有发展前途、亏损甚至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则一律不予登记，强制淘汰。其出路是，有的可加入效益好的企业，有的可以租赁给其它企业或个人，有的可能解散或出卖。对于无法安置的职工，按工龄一次性发给一个月工资的办法予以遣散，有条件的可另外加发 1—3 个月培训费，自谋出路。对于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无法清偿的债权一律先记下来，以后再处理。据估计，这种登记不上的企业约占三分之一。如胡志明市，原有国有企业 800—900 家，最终登记上的只有 400 多家。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中，淘汰率是相当高的。

5. 机构改革比较彻底，政府管理职能逐步转换

由于经济改革发展的需要和国家财政很紧张，越南的各级政府机构已经作了很大的精简。中央一级的政府机关，已经从 60 多个减少到 30 多个，没有撤销机构的人员也已经压缩了一半左右。地方机构和人员精简的幅度更大。如龙安省，过去有省级政府机构 50 多个，现在已减少到 20 个。过去从省到县，共有干部 4800 人，现已减少到 2000 人。对于精简下来的人员，有的到了基层，有的转入其他部门，有的也按照一年工龄一次性发给一个月工资和另外加三个月培训费的办法，予以遣散。对于愿意兴办经营实体的，国家在可能范围内给予一定优惠贷款。

政府管理职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国家计委，虽然名称未变，但管理职能和管理方法已经大不一样，过去，对企业要下达 11 种指令性计划，现在

只规定上交税金一个指令性的指标。过去，要拟定一系列计划指标和规章，来直接干预经济方面的经济活动，现在主要是研究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必要的政策和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等，为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条件。过去，可以直接决定建设项目和投资，现在因为资金基本上依靠贷款，对竞争性项目计委也不再审批，完全由企业和工商银行根据效益确定；对需要政策性贷款的项目，计委主要是负责审核提出能上和不能上的意见，具体是否贷给资金建设，也全由投资银行决定。但投资银行无权给未经计委审核的项目贷款，目的是引导资金的有效和合理使用。

越南已进入经济改革的快车道

八年多来的经济改革，使饱受战争创伤的越南经济得到了初步恢复；与美、中两国关系的改善，又为越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尽管在这个国家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不少障碍，但其经济飞跃是可以预见的。

越南的经济改革路线是在 1986 年 12 月越共第六届代表大会上确立的。以阮文灵为代表的温和派上台执政后，承认越南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困难，并表示要推行下放管理权，允许有限度地开办私营企业为主要内容的革新政策。以武文杰为首的改革派比较重视金融和法律改革，使外商对其抱有较大的信心。

越南当局多次强调，目前的改革方针是“在国家营运下，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市场机制”，并一再重申越南不会实行多党制，共产党是该国唯一的合法政党。不过在拥有 161 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中，来自南方富裕地区的代表人数正在不断增加，打破了过去由北方代表垄断的惯例。一个空前的例子是，河内一家国营电子厂的经理因从商成绩卓著而晋身于中央委员会。

越南初期的经济改革特别重视农业和轻工业，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政府开始把改革开放的方向转到财政金融制度和引进外资方面，以便发展工业。曾经担任过越南中央银行政治顾问，现为南龙集团董事的龙安志认为，越南在金融法律改革方面进展不错，由最初只有中央银行到现在拥有私有资本的股份银行不断涌现，可以看出改革的活力。政府通过利率和金融管制，使通胀率从 1989 年起稳定在 10% 左右。不过，他指出越南在工业化方面发展比较缓慢，这表现在国营企业的管理观念仍相当保守，股份制的试验还很不成熟，市场上的商品大都是国外走私品，本土产品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为了发展工业，越南近几年来积极寻求外资，以期吸纳资金，创造就业机会和改善贸易平衡，同时也努力引进国外先进管理办法和有关市场业务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自 1988 年开始，越政府准许在越南成立独资企业，并规定外商在与越南公司或政府办合资企业时，至少应提供 30% 的资金。越南政府还保证，对在当时投资的外国机构和个人的资产，绝对不会被征用或国有化；对属于优先投资类别的外资企业，在开始获利的头年起，最多可免缴两年的利得税，其后两年还可获得公司税减半的优惠。

目前，台湾和香港是越南最大的投资来源。截至 1994 年底，台湾岛在越南的总投资额接近 20 亿美元，而香港商人的总投资额则为 18 亿美元，位居第二。1994 年可以说是越南经济改革取得大丰收的一年，经济增长连续三年超过 8%，达到 8.5%。在美国解除对越贸易制裁后，进入越南的外资项目多达 891 项，预计投入资金 83 亿美元。外商在越南的投资项目以合资企业数目

为主，而且集中在劳工密集型的轻工业、酒店及旅游业、原油及天然气开采三方面，其中最吸引外商的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原油是越南目前第一大出口商品，1994年石油出口总值超过8亿美元。自1988年以来，越南批准的石油天然气投资项目，总值达30亿美元，占获准外资项目总值的四成。日本、马来西亚、俄罗斯、英国以及美国的公司都在积极地为越南勘探石油和天然气，而韩国现代重工企业在去年初开始为越南铺设首条天然气管道。

经济改革固然使越南发生了世人瞩目的变化，但其发展道路上存在的种种障碍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外贸呈赤字状态、财政预算亦赤字严重，对政府造成很大威胁；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增长下降，今年预计只有3~%，而工业增长将达到12%；金融制度和法规不能予人信心，尽管越南现有四、五十家银行，但很多人怕政府追究而不敢将钱存入银行；虽然政府大力鼓励私人投资，但国内外的商人都明白，只有与政府合作才有可能赚钱；国内基础设施落后，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此外，执法人员素质低劣，贪污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等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越南经济的发展。

经济和政治是密切相关的，越南政府的对外关系也直接影响着越南经济，而越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近二十年的贸易禁运给越南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过，随着美国克林顿政府作出突破性宣布，解除对越南的贸易制裁，美国商人开始涉足越南市场，越南商品也可以销往庞大的美国市场，这无疑给越南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越美两国正积极筹备互设办事处，两国关系将逐步迈向正常化。

此外，在苏联解体后，越南政府意识到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性。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越中边境日趋兴旺，1994年8个月的贸易额高达三亿美元。1991年中越双方恢复高层接触，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越南，两国签署三项贸易及经济合作协议。尽管两国关系不可能恢复到过去的水平，但两国间的经贸往来肯定会逐步加强。不过，有关南沙群岛的主权纠纷仍是中越关系中的最大变数。

可以预言，越南如能保持目前的改革开放路线，又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它的经济发展将会有有一个飞跃，登上一个新台阶。

十二 日本：盛者必衰

日本实在是一个奇迹。战后，满目疮痍，沉苛遍野，但它却以其“大和”的民族精神和“武士道”般的敬业精神站立起来，“第二经济大国”是日本的美誉。但是日本是个能源极其缺乏的国度，99%的能源依赖进口，它虽然是经济大国，却依然要仰仗世界经济的补给。这种跛脚的经济一旦被世界断粮，就得断“炊”。应汲取什么，应借鉴什么，不是明摆着吗！

日本经济走向何方

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处于萧条之中。据日本12家民间机构预测，1995年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约为1.5—2%，仍将处于“低空飞行”状态。据1994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日本已将连续占有8年的首席宝座让给美国而屈居新加坡之后名列第三。日本经济好像应了日本的一句谚语：盛者必衰。

然而，日本经济并未就此而日薄西山。实际上，日本自1985年日元几度大幅度升值以来，其经济增长的型态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按美元计算的日本经济规模仍在急剧膨胀。日本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并有可能在今后10—20年向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发起有力的挑战。

1. 以出口竞争力为背景的“日元升值带动型”经济规模扩大模式

1970年至1994年，按日元计算，日本经济规模增大了4.8倍。但由于日元对美元升值，按美元计算的日本经济规模则增大了11.8倍。日本工业制成品强大的出口竞争力造成其对外贸易盈余不断增加，是导致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的根本原因。1992年日元对美元的比价为127:1，1993年为111:1，日元对美元升值了约16%。1993年以来日元再度狂升，1994年已突破1美元兑换100日元大关。结果，虽然1993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减少0.2%，但因日元对美元的升值，按美元计算的日本GDP达4.25万亿美元，仍比上年增长14%以上，人均GDP达3.3万美元，首次名列世界第一。这堪称是“日元升值带动型”高速增长。1994年日本经济增长率约为1%，而日元对美元升值率为11%，按美元计算的日本GDP高达4.7万亿美元，相当于1989年美国的水平，同年日本人均GDP约达3.7万美元，堪称世界首富。

90年代，日元对美元比价将呈波浪式上升趋势，因而，这种“日元升值带动型”经济规模扩大的趋势也难以发生逆转。一则自1971年日元开始升值以来虽有浮动，但总趋势是上升；二则日元升值的根本原因—日本对外贸易盈余居高不下，各国仍希望通过日元适度升值来削弱日本产品出口的价格竞争力，据以往日元升值的规律估计，今后5年日元将在波动中保持目前对美元的比价。即1美元兑换100日元上下；如果日本对美国贸易出超局面仍得不到根本改善，在本世纪结束之前还可能出现一次较大幅度的日元对美元升值；相反，如果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渐趋减少，亚太地区不发生重大国际冲突，目前的汇率比价水平便可能会维持更长一个时期。

在日本国内经济萧条期间，日元却大幅度升值，这看上去似乎不合逻辑，但实有其内在联系。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市场陷入萧条，商品库存积压导致企业设备投资下降，出现“就业难”，直至1994年下半年

才出现微弱的回升。然而，正因日本国内市场不景气，所以日本进口才受到制约，而日本企业也才更需要通过加强出口来谋求生存和发展。这势必导致日本对外贸易整体出超态势的加强，特别是日本对美国贸易黑字的攀升，从而连连引发日元升值。在今后 10 年，上述趋势也许难有根本改变，如此发展下去，即使美国经济增长率略高于日本，到 2010 年按美元计算的日本经济规模也可能与美不相上下。

据 1994 年 2 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测，90 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为 2.7%；2000 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达 530 万亿日元，按 1 美元兑换 100 日元计算将达 5.3 万亿美元，美国将为 6.06 万亿美元，中国将为 8090 亿美元。届时，日本的经济规模将达到美国的 87% 以上，约为中国的 6.6 倍。从 2000 年至 2010 年日本的 GDP 将达 7.5 万亿美元，几乎与美国的 7.7 万亿美元持平，将是中国 1.6 万亿美元的 4.7 倍。据此预测框算，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 2000 年将为 20% 2010 年将为 22% 美国将分别为 23.5% 和 22.7%；中国将分别为 3% 和 4.7%。日美经济力量对比将趋于均衡。2000 年日本人均 GDP 将达 5,2 万美元，居世界之首，超过美国 30%，比德国多 20%。但由于日本物价水平高于美国，所以调整日美价格差异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日本人均 GDP 届时约为 3.5 万美元，实际只有美国的约 88%，日本人的实际生活并不像人均 GDP 数据所表现的那么富裕。

2. 贸易盈余大国和世界头号债权大国的地位

据日本政府预测，1994 年日本对世界出口额为 3960 亿美元，进口额为 2460 亿美元，贸易盈余达 1500 亿美元。1994 年 12 月底，日本外汇储备达 1228.5 亿美元。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估计，90 年代日本出口年均增长率为 6.7%，进口增长率为 8.7%。这样，到 2000 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将达 10628 亿美元，出口 5557 亿美元，进口 5071 亿美元。日本在世界贸易进出口中所占比重将分别为 7.9% 和 8.3%。作为理想目标，2010 年，日本将大体实现进出口均在 8600 亿美元左右的水平。

据预测，2000 年日本出口的地区分布为，美国占 28%，亚洲占 26.9%，西欧占 15%，中国占 10.5%，中东占 6.5%，前苏联地区占 3.6%。2000 年日本进口的地区分布为，亚洲占 28.1%，美国占 24.8%，西欧占 14.6%，中东占 10.9%，中国占 10%，前苏联地区占 1.6%。从总体趋势上看，日本同美欧的贸易往来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同东南亚及中国的贸易将有较大幅度增加，日本石油进口的 60% 以上仍需依靠中东。

日本外贸结构也发生着深刻变化。资本货物在出口中所占份额明显增大，已从 1980 年的 40.1% 升至 1993 年的 57.6%，集成电路（IC）等电子元件，电脑、传真机、复印机等办公设备及汽车零件等出口旺盛；进口制成品的比重也不断扩大，从 1980 年的 22.8% 升至 1993 年的 52%，日本进口了大量服装、家具、电子元件、办公设备、家电和汽车等。其中有许多是日本在亚洲投资生产的产品返销日本。日本与亚洲各国贸易正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日本正向工业制成品“进口大国”迈进。

日本不仅是商品输出大国，而且是资本输出大国。日本对外资本输出包括政府和民间对国外的借贷和投资。1989 年，日本便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政府对外开发援助大国”。目前，日本每年向世界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总额为 100 亿美元以上，其中 80% 以上是双边援助，并主要集中在

亚大地区。日本若有诚意在 2000 年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将 ODA 提高到占本国国民生产总值(GNP)0.7%的目标,则日本每年向世界提供的 ODA 总额将达 300 亿美元以上。

70 年代以来,日本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最快,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测,90 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 13%,2000 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将达 8023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 8869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的 17.8%。预计 2000 年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将达 1534 亿美元,其中 18%投向亚洲,25%投向欧洲,46%投向北美。在投资结构上,不动产及商业将有所发展,分别占日本海外投资的 23.4%和 16.3%,制造业中最多的的是电器和汽车业,分别占 9.3%和 3.8%,另外,日本对海外证券投资数量更大,1993 年累计已达 6960 亿美元。

从以上日本对外债权中减去国外对日本的贷款及投资等负债,便是日本的海外净资产。1993 年日本净资产额达 6108 亿美元,比上年增加 18.4%,比 1989 年翻一番,创有史以来最高纪录。其中民间净资产力 4488 亿美元,政府净资产为 1620 亿美元。日本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成为世界头号债务大国,1993 年美国的海外净债务为 5077 亿美元。随着日本对外资本借贷和投资日增,其债权大国地位将更加巩固。按过去 5 年的速度发展,2000 年日本的海外净资产将达 1 万亿美元以上。

3. 面向 21 世界日本经济面临的新考验

第一,日本如何针对“产业空心化”之战,调整产业结构,应付来自美国的反击和亚洲新兴工业国(地区)的追赶。美国在冷战后得以避免以往那种同苏联的大规模军备竞赛,而将加强出口竞争能力及开展同日本的经济竞争置于首位。美国政府计划 2000 年时将本国对外贸易赤字从 1990 年的约 1200 亿美元压缩掉一半。1993 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日本,以汽车产量为例,美国汽车产量在世界汽车产量中所占比重从 1992 年的 19.8%升到 1993 年的 22.5%,西欧则从同期的 30.3%降到 25.7%;日本也从同期的 25.3%降至 23.2%。1994 年美国汽车产量超过日本,重居世界榜首。很明显,日本汽车工业受到了国内经济不景气与日元升值削弱国际价格竞争优势这双重打击的影响。

同时,自 1985 年以来日元几度升值,日本制造业为减轻日元升值带来的成本压力,突破国外的贸易壁垒而纷纷向海外投资办厂。北美和亚洲是日本投资的重点,纺织、家电等海外产业在 90 年代中期逐步形成对日本返销的出口能力。这一方面引起日本进口结构的变化,同时也使一些人担心日本经济出现所谓制造业的“空心化”。亚洲“四小龙”的某些产品开始对日本构成挑战。

上述问题已引起日本政府和企业的的高度重视。

1994 年 12 月发表的村山内阁经济政策报告《我国经济结构改造的基本方向》,提出了面向 21 世纪对付经济“空心化”的总体思路,即放松对民营企业的限制,支援中小企业开发创造性技术,以光导纤维网为基础完善通讯基础设施,推进“科技创造立国”,实现日本产业结构高级化,开拓国内新市场。面向 21 世纪,日本正加强高科技开发。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已列入日本政府的议事日程。日本邮政省 1994 年 11 月向美国提出日美两国政府和民间共同建立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网的建议,计划于 2010 年实现。具体目标是首先

由日美欧 7 个发达国家的政府、研究机构等建成相通的信息高速公路，其次是将企业与家庭普遍联网。这预示着日本第三产业将有更大的发展。

第二，从中长期看，日本国内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由于日本社会人均寿命普遍延长（1992 年男子约为 76 岁，女子约为 82 岁）和出生率下降双重原因，导致日本人口结构迅速老化。这势必影响经济发展并加重社会养老负担。日本人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

据日本厚生省推算。1994 年日本人口总数为 1.25 亿，65 岁以上老人达 1755 万人，占 14%，就业人口为 6595 万人，占 53%，大约平均每 4 个就业人员抚养 1 个老人。日本《2010 年委员会报告》称，2010 年日本总人口将达 1.29 亿，其中 18 岁的年轻人将从现在的 200 万减少到 120 万，而卧床不起的老人将从现在的 70 万人增至 140 万人。厚生省人口研究所预测，今后日本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加快，到 2010 年日本 65 岁以上老人将占人口总数的 28%，日本将成为 10 个人中就有近 3 个 65 岁以上老人的“超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将引起日本社会及经济结构产生一系列连锁性变化。首先是社会福利负担的加重，需要通过合理的税制改革等加以解决；其次是年轻劳力的短缺，今后将通过延长老年人就业年限、吸收女子就业、适当向国外开放劳动市场等予以弥补，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进一步向海外转移；第三是消费市场的变化，从住房到医疗保健服务、保健食品等市场将扩大。

“瘸腿大国”小日本

在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日本正在对经济体制、产业结构进行全面调整，以便继续保持经济上的竞争力，为其走上“大国”之路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战结束时，日本经济濒临崩溃，城市千疮百孔，工厂纷纷停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据当时的统计资料显示，以 1945 年的价格水平计算，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1057 亿日元。战后初期，日本国内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失业严重。当时的币原内阁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日本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出现了恢复的转机。50 年代末期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60 年代末，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英、法、德等西欧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与此同时，日本在国际收支盈余、海外投资等方面也显示出绝对的优势：在 1990 年全球 50 家大银行中，日本占了 24 家；截止到今年 7 月，日本外汇储备已达到 2122 亿美元，连续 33 个月居世界第一……，凡此种种，被世人形容为“日本奇迹”或“日本神话”。然而，进入 90 年代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陷入了战后少有的尴尬境地，时至今日，当多数西方国家已经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而日本经济的复苏仍然是举步维艰。但对于日本来说，这也许并不完全是件坏事。

日本这次经济衰退的确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造成这次危机的原因至少有三方面：首先是周期性因素，其次是结构性因素，即日本的产业结构存在缺陷，但更为重要和深层的原因是日本的经济体制。战后 50 多年来日本所奉行的是一种赶超型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很特殊的，它不同于鼓励自由竞争的“盎格鲁—萨克森模式”（以美英为代表），也有别于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河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吸收和

保护，吸收是指它对上述两种经济模式的学习和借鉴以及对先进生产力的快速应用；保护则是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法规，一方面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企业和国内市场。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日本交通部门规定，汽车在使用一定时间之后，必须到指定的地点接受全面检测，目的是确保交通安全，然而，进口汽车的检测费用却比日本本国生产的汽车高出许多，此项规定实际上起到了保护本国汽车工业的作用。同时，日本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也非常严格，据粗略统计，日本目前限制经济活动的法规有 1 万多条，在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下，日本经济根本没有什么自由竞争可言，外国企业要想进入日本更是困难重重。这种经济体制虽然使日本经济在过去 50 年中实现了飞跃的发展，但是，它却很难适应冷战以后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新局面，并逐渐成为制约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次经济危机说明日本的经济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关口。

从日本政府最近几年来采取的一些措施看，日本的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将发生如下重大变化：就体制而言，放松限制，创造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将是核心问题；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将继续奉行前日本中央银行行长撰写的《前川报告》中提出的方针，即把“重、厚、长、大”型产业移向海外，在本国发展“轻、薄、短、小”型产业及高技术产业，同时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完成从赶超型经济体制向领先型经济体制的转变，以便为日本在 21 世纪成为头号经济和科技强国并尽可能为长久地保持这种领先地位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也为其谋求所谓“名副其实的大国”地位奠定基础。

在日本这个经济巨人的头脑里膨胀着大量的政治细胞，并迅速向其全身扩散，与此同时，军国主义的幽灵也在蠢蠢欲动。

1989 年 1 月，由日本作家、鹰派议员石原慎太郎和企业家盛田昭夫合写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出版，立刻在日本国内和整个世界引起巨大轰动。该书将矛头直接指向美国，认为凭借日本目前的经济实力，在处理日美关系时日本应该改变战后 40 多年来一贯唯唯诺诺的态度，理直气壮地对美国人说“不”。这本书的出版向世人发出这样一个信号：日本已不把曾以占领者身份“君临”日本的美国放在眼里，它也要在国际舞台上当主角。

近年来，日本积极谋求所谓的“大国地位”，其所依据的内在条件是雄厚的经济实力，而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则为其提供了外部环境的可能。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日本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出击。早在 1990 年，当时的日本外相中山在出席联大会议时就与 60 多个国家的外长举行了会谈，为日本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制造声势、寻求支持。在此后几年中，日本又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方式提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桥本担任首相后，加快了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并采取了一些新的步骤和策略，概括起来说是“远交近代”、“日元开道”。今年 8 月，桥本出访拉美诸国，其间与拉美 5 国签署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 1130 亿日元的贷款，以争取它们对日本在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问题上的支持。外相池田行彦则对中东进行穿梭访问，俨然以一个大国姿态参与中东和平进程；而在亚太地区，日本先与韩国在独岛（又称竹岛）主权问题上发生纷争，并几乎兵戎相见，之后，一批日本右翼分子又在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钓鱼岛上擅自建立灯塔，而日本政府则公开为他们撑腰壮胆。这些举动的目的一方面是向亚洲邻国炫耀实力，同时也是一种试探。

亚洲国家之所以对日本谋求“大国”地位的举动如此关注是因为直到今天日本军国主义仍然阴魂不散，靖国神社依旧妖风四起。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又何在呢？

二战结束后，德国对纳粹法西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而同样作为法西斯阵营一员的日本却始终没有做到这点，这与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有直接关系。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为了防止日本“赤化”和稳固其对日本的领导统治地位，置亚洲人民的感情和强烈要求于不顾，断然决定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网开一面，不仅保留了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天皇，而且赦免了大批甲级战犯。这些双手沾满亚洲各国人民鲜血的战犯出狱以后，摇身一变又投身政坛，他们不仅借助“言论自由”的幌子结成右翼党派、团体，还在战后历届政府中出任要职。因此，可以说，是美国给日本留下了军国主义的尾巴。

缺乏文化底蕴难免会使日本成为“瘸腿”大国，但“论语十算盘”的东方商业文化却能够闻名世界。与此同时，夹杂着大量糟粕的“日式文化快餐”也在影响着周边国家的青少年，包括中国在内。

若干年前，一位日本学者撰文指出，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已是既成事实，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也只是时间与时机问题，其真正缺少的是作为大国应具有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

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和模仿，但不善于创新的民族，这在文化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明治维新以前1000多年中，日本文化形成、发展主要靠吸收中国文化，近代以后则学习了西洋文化（其中以德国为主），二战以后又受到美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因此，可以说，日本文化是一种“杂种文化”。但就像生物学上存在“杂种优势”一样，日本在学习借鉴东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也“制造”出了一些亚文化，如被称为“论语+算盘”的企业文化。目前，日本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独特方式已经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80年代中期，当大量的日本电器潮水般涌进中国市场时，一些有识之士曾发出“保护民族工业”的呐喊。今天，我们又面临着一次“日货”的冲击。不同的是，这次涌进国门的不是彩电、冰箱，而是一些“日本文化快餐”。

前不久，日本光荣软件公司驻天津分公司的日方经理要求4名中国职员完成一款名叫《提督的决断》的电脑游戏的汉化工作，遭到4名中国职员的断然拒绝。因为这款游戏的情节严重歪曲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同时还大肆美化包括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在内的战争罪犯。这4名职员的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赞扬，日本软件公司的天津分公司也受到处罚。这仅仅是日本不良文化产品严重危害国内市场的例子，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市场上流行的日本电脑游戏中不乏篡改中国历史之作，例如，同样由光荣公司生产的《三国志》系列游戏把三国历史“改写”得面目全非。另外许多游戏则赤裸裸地宣扬色情和暴力。而这些游戏的消费者绝大多数是青少年，其危害可想而知。

另外一种“日式文化快餐”是卡通漫画，这种小画册因其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倍受青少年的喜爱。据对北京一所中学进行的调查，一个班里热衷于读日本卡通的学生比例高达85%，有的学生拥有五六百本之多。而这些书籍中同样不乏暴力、色情等不健康的内容，有些则公然宣扬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

有关人士指出，上述现象的产生虽与国内及境外的不法商人有关，但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产品。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已经有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士认识到了这点，并已开始采取行动：今年5月，北京前导软件公司投资80万元推出第一款中国大陆自己设计制作的“原汁原味”的三国题材游戏——《官渡》，并将其打入了日本市场。于去年10月份创刊的“100%中国货”的《北京卡通》杂志在各界支持下，发行量已突破10万份。前导公司总经理边晓春先生和《北京卡通》副主编阎宝华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他们致力于电脑游戏软件开发和创办卡通杂志除了商业目的之外，也是要以实际行动抵制日本“快餐文化”对中国的渗透。

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对日本的“大国”动态十分关注，它们强烈要求日本深刻反省历史，坚决奉行和平外交，并为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每当日本政要、学者就历史问题大放厥词或日本政坛出现军国主义逆流时，亚洲国家都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桥本参拜靖国神社以后，中国、朝鲜、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政府和媒介纷纷提出强烈谴责。另一方面，亚洲国家与日本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这使它们对日本的未来走向更为关注。

作为一个缺乏自然资源，以贸易立国的国家，日本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辐射状，这一点在亚大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过去20年中，日本将许多生产基地从本土移到海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这一做法在客观上促成了“亚洲四小龙”等亚大国家的经济腾飞。现在以及今后，日本的投资重点之一也还在亚洲，1990年日本在亚洲的投资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12.21%，199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4.3%。因此，许多亚洲国家与日本形成了“痛恨、担心但又密不可分”的关系。日中关系在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波折，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始终不能深刻反省历史，同时又置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关系于不顾，跟在某些国家后面对中国内政横加指责和干涉。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亚大地区的格局而言，日中关系就像一条船的锚一样重要，两国关系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明年是日中恢复邦交25周年，由中日两国具有非凡战略眼光的老一代政治家缔造的两国关系能否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亚太地区能否获得持久的和平与稳定，从而迎接太平洋世纪的到来，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将取决于日本今后走上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亚太地区各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在用关注的目光注视着日本，并由衷地希望日本能够在深刻反省历史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坚决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为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的国家。

日本经济增长的新特点

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历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1945—1955年是以个人消费为主的经济复兴期；1955—1970年是以内需为主导的高速增长期；1970—1990年是以出口（外需）为主导的稳定增长期。从1991年春天开始，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1992年至1995年连续4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实际增长率都很低，1992年为0.2%，1993年为-0.4%，1994年为0.5%，1995年为0.7%。面对日元的急剧升值，美、日、德3国于1995年8月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致使美元升

值，并突破 100 日元大关。为此，日本经济复苏出现了新的转机，企业设备投资缓慢回升，个人消费逐渐摆脱下降局面，预计 1996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达到 1.9%，1997 年将达到 2.6%，从零增长向低经济增长期发展。对于日本这一经济增长期的新特点，有必要加以研究。

1. 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及技术进步。1966—1990 年的实际 GDP 年平均增长率为 5.45%；其中，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占 8%，大大低于同期美国 40% 的劳动投入水平。1992 年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为 1.5%，是战后 50 年以来的最低水准。由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和平均寿命的不断提高，目前在总人口中 65 岁以上高龄者已占到 14%，预计到 2025 年将达到 25% 的高水平。人口构成的不断高龄化，使劳动人口增长度不断下降，势必引起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降低。90 年代以后，包括劳动时间的缩短等因素在内，日本的劳动投入量按年 0.5% 的速度递减，如果劳动生产率和 80 年代一样按每年 3% 的速度递增，那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每年仅为 2.5%。

对企业来说，年青一代劳动力投入的减少，中高年从业人员比例的增加，使劳动者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型，而中高年从业人员工资偏高，创造力下降，加大企业的成本负担，相对降低了竞争力。从整个社会来看，人口高龄化而使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费用急剧上升，财政支出增大，企业和个人的税赋加重。目前，税收和社会保险金合计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国民负担率）为 38%，到 2000 年将达到 50% 的危险线。北欧一些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国民负担率超过 50%，则整个经济的活力趋于下降。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廉价且教育水平高的劳动力的存在。现代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增大不仅对社会总供给方面，而且对社会总需求方面以相当大的影响。因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移动，使家庭数量增多，造成了广泛的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支撑了战后作为经济增长和循环的中心——设备投资与资本的积累。而现在情况恰恰相反，人口增长逐渐减少，现有的家庭耐用消费品及小轿车的普及率已经很高，接近饱和。因此，国内消费需求的低靡，必然使企业设备投资率降低，资本大量过剩，经济增长机制陷入困境。

面对人口高龄化的社会，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动向就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J.R.Hicks）的理论，当资本—劳动比率（ K/L ）一定时，比较技术进步前后的变化。可以根据劳动边际产量（ MPL ）和资本边际产量（ MPK ）的比值（ MPL/MPK ）不变，递增或者递减将技术进步进行分类。如果技术进步以后， MPL/MPK 的比值不变，那就是“中性的”技术进步；如果 MPL/MPK 比值增加，那就是“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如果 MPL/MPK 的比值减少，那就是“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也叫“资本使用型”的技术进步，即在技术进步以后，劳动对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 $MRTSLK$ ）下降了，这种技术更多地使用了资本，从而节约了劳动。从日本的实际情况来看：（1）资本充足。众所周知，一国投资率的高低是由其储蓄率决定的，日本的高储蓄率一直是资本的最主要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测算，1992 年日本的储蓄率为 34%，投资率高达 30%，而同期美国这两者的数值均为 15%。高

投资率特别是用于机械设备的投资增加，就会提高人均资本占有率，结果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上升。(2)从劳动力的价格和资本的价格来看，根据美国学者的测算，包括福利费在内的劳动力成本，1992年日本平均每小时为23.05美元，美国只有21.30美元。但是，从资本的价格即利率来看，日本目前的再贴现率只有0.5%，是全世界最低的，长期贷款利率为5%，而美国的再贴现率是5.25%，长期贷款利率为9%。因此，对于日本来说，用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资本，来替代相对昂贵的生产要素——劳动，则是势在必行。(3)中国大陆、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的崛起与亚洲国家分工体系的重组。为了适应日元升值，日本所有企业都着手经营框架的重新构筑。具体包括零件、半成品、成品的海外供给扩大，生产向海外转移的加速，海外生产据点的零件当地供给的增加等等。其趋向是亚洲“四小龙”被重组为定点生产和零件供给基地，东盟和中国被重组为组装加工基地，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逆进口商品数量的上升。1993年，日本从东亚各国的产品进口额达449亿美元，与从美国的产品进口额341亿美元相比，超过了100多亿美元。东亚各国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随着产品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彩色电视机、空调器等电器产品在全世界各地的输出比率已经超过日本。这就使得日本必须加大科技投入，生产出技术含量更高的、高附加值的新产品，以节约逐渐稀缺的劳动力资源，保持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2. 支柱产业的衰退与产业群体的均衡发展

所谓支柱产业就是对经济增长最具重要性的产业。如60年代的重化工业，70年代以后的汽车和电气机械工业，对于日本的经济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支柱产业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要有相当大的产业规模。例如，1990年汽车和电气机械工业产值占制造业的1/4左右。在出口方面，1991年汽车出口额为548亿美元，电气机械为593亿美元，分别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7%和19%。(2)对其他产业诱发的乘数效果也大。根据1990年的投入产业表计算，汽车、电器工业的生产每增长1%，钢铁业增长2.6%，运输机械增长2.7%。反之，如果支柱产业不景气，其他相关产业必然受到相应的冲击。(3)劳动生产率水平高。1966—1992年，日本产业平均技术进步率为2%，而电气机械业为12%，汽车工业为5%。

日本特有的开发、设计与生产现场出色结合的机制，使得其家用电器、小轿车等批量生产的机械产品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竞争能力极强。在批量生产的机械中，原理完全改变的产品很少，多数是靠逐步改良发展起来的。“日本在逐步的、连续性的、代谢性的技术发展方面具有超群的能力。但是在以长期研究开发为基础的突变性技术方面，就显得能力不强”。日趋激烈的“贸易摩擦”和日本国内消费市场的饱和，使得那种以大量生产、大量销售、大量消费为代表的支柱产业的增长达到了极限。同时，随着汽车工业、电器机械等加工组装业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留在国内的光电技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也很难形成大批量生产。日本社会的高龄化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医疗保健等福利事业，并不能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而消费者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得充满个性的商品受到重视。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将不是由一、两个支柱产业决定，而是产业群体的均衡发展。

根据三菱综合研究所对日本产业结构的预测，到本世纪末主要产业的增长率差别将缩小，出现产业群体均衡发展的态势，其中，情报机械、生活文

化等为高增长群，年增长率为3—3.5%；交通运输、商业服务、通讯网络等为中增长群，年增长率为2.5—3%；而原材料、一般耐用消费品等为低增长群，年增长率为2—2.5%；面向21世纪的12个新型产业（生物工程、通信技术、生活福利等）的市场规模，1993年为130兆日元，到2000年为210兆日元，2010年为350兆日元，而电气、机械、原材料等4个传统部门的规模仅从1993年的280兆日元增加到2000年的310兆日元和2010年的380兆日元。

产业结构的变革，首先是提高非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从80年代以来，日本制造业的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4.8%，一直高于非制造业的2.1%，加上日元不断升值，内外价格差进一步扩大。以耐用消费品为例，除纽约以外，东京比世界上主要城市——伦敦、巴黎、柏林等都便宜，而食品、住宅等非制造的产品，日本的价格则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如果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指数为100，1993年日本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90，建筑业为80，服务业为70，运输、通信仅为40。因此，提高非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缩小产业各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别，是确保经济增长的重要步骤。其次是大幅度增加国家的研究开发费用，加速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日本通产省、文部省和科学技术渐在1995年下半年拟定了在2000年之前使国家研究开发费用翻一番的计划，即由现在的一年2万多亿日元增加到4.3万亿日元，以加强生物工程和信息通讯等尖端领域的基础研究和独创性研究，改善国立大学和研究所陈旧的研究设施，支持产业、学校和官方联合进行的基础性研究开发，把振兴科技放在国家战略的位置上，确保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发展。

3. 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战后日本政府在经济计划、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方面的成功，一直被许多国家所借鉴。但是，目前日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其政治体系、管理机制乃至价值观念都面临着一场不可避免的变革，出现了所谓的“制度疲劳”。从1992年3月开始，日本政府推出了一连串的总额为60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综合经济对策”等财政政策。中央银行（日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是连续降低再贴现率，从6%降到了目前0.5%的历史最低水平。但是，这些扩张性的对策并没有达到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预期目标。1994年政府预测GDP的增长率为1.7%，但实际上只有0.5%。出现这种“政府的失败”其原因主要在于：（1）当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增加时，产品与货币市场均衡的模型（IS—LM模型）中的IS曲线（产品市场均衡的曲线）会向右上方移动，也就是说利率也会提高，这就带来海外资本的流入，而使日元升值，总需求所增加的部分被纯输出的减少所抵消。因此，财政支出的增加，短期内可以提高社会总需求，但从长期来看并不能达到刺激经济景气的效果。

（2）减少所得税的效果由于消费者长期的消费习惯而难以实现。因为，根据长期消费函数的稳定性理论，减税虽然可以使可支配收入一时提高，但国民减税所得部分都变成了储蓄，并不能增加总需求。（3）乘数效果的降低。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公共投资的“乘数”在2—3年以后会达到两倍以上。但这以后，“乘数”则逐年下降，到90年代“乘数”已降到一倍多的程度。乘数效应低下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公用事业的构成从修路、建桥等基础产业向第三产业等服务设施转移，这样就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波及效果自然

降低。另一方面是由于日元的急剧升值，推动了进口物品的增加，国内总需求增加的大部分被对海外输入产品需求所代替，1994年这一比率曾高达70%。（4）不管是增加公共投资还是减少税收，都会使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因此，一般公众预期政府会增加税收以弥补赤字，从而抑制当前的消费，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这种合理预期的效应使得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进一步降低。

此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国际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超越地理条件的制约，进一步在空间统一起来。业务交易的同步化、瞬间化，使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更高。这样，在高度的货币市场上的经济活动，就和把它限制在一定界限之内的政策控制的主体——“国家的经济”对立起来。这实际上就是，本质上无政府的世界经济和以一定国界为序的国民经济之间的对立。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本质上是以一国为单位的，在这种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中，就显得无能为力了。一国的经济政策波及到其他国家，其中效果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究竟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很难简单说清，国内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也由此而显著提高。例如，1993—1995年，虽然日本银行一直都在降低短期利率，以刺激景气的恢复，但是长期利率却一直难以下降，原因就在于美国担心通货膨胀的复燃，从1994年2月到1995年2月连续7次提高短期贷款的利率，致使长期利率上升，并波及到日本，使日本的景气对策难以奏效。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绝大部分大公司已经变成了跨国公司，它们在某一个国家名义资产和利润已越来越少。这些大公司已经超越了任何政府的管制，给一国贸易和生产的格局带来变化的往往是跨国公司，而不是政府的决定。

日本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已经开始变化。一方面，是放宽国家的限制，增强民间部门的活力，以建立自由、透明、公正的市场社会。传统的市场理论以均衡的概念为中心，市场具有趋向均衡的机构。而今天的市场社会，由于经济软化（情报化、服务化、国际化，金融经济的扩大化和投机化等）的进展，不确定性与偶然性明显提高，它要求各种市场规则必须对应于环境的变化，具有自律的、迅速的、柔软的机制。另一方面，是加速制度创新，以建立一个精简而有效率的政府。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在决定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之间需要相互协调，尽快达成有机的结合，而决定“协调成本”大小的就是制度。因此，纠正内在价格差别，建立新的市场价格体系；推进行政和财政税制的改革；尽快恢复信用秩序和金融政策的民生化等等，都是今天日本新经济增长期所必须解决的紧迫课题。

十三 韩国：汉江边上的经济奇迹

韩国充分利用了自身的优势，借助美国的庇护，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上站立起来。虽然它势单力薄，也无丰富的资源可言，但它却以其高速增长为“韩国奇迹”，这不仅是我应该借鉴的，就是它的“师傅”——“山姆大叔”也开始向它求教了。

汉江边的经济神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韩国，由于受朝鲜战争的影响，其经济恢复时期，长达 15 年之久。直到 60 年代初，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才达到 24 亿美元，人均仅 94 美元。当时，其生产结构明显呈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之典型特征：1962 年按 GDP 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 43.3%、11.1%，45.6%，而工业内部消费资料产业与生产资料产业的附加值占全部工业附加值的比重则分别为 63.1%和 36.9%（1960 年）。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韩国人民励精图治，仅用了 30 年时间，便将本国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国”。1990 年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高达 2364 亿美元，约为其 30 年中的 99 倍。按世界银行估计，自 1965 年至 1990 年韩国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是 7.1%，为世界各国之首。1990 年韩国在 GDP 方面居世界第 15 位，在对外贸易方面居世界第 12 位，“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发展的国家之一。它具有经济进一步稳定增长的良好前景。”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动下，韩国的国民生活质量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按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莫克尔提出的“现代国家主要指标”看，90 年代的韩国已经实现了国民经济现代化。

纵观韩国近 30 年的经济发展可以发现，这一被誉为发生在“汉江边的经济奇迹”反映在韩国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方面。

1. 成功保持下去的良好宏观经济效果

韩国经济奇迹的最重要方面是其在经济恢复期后至今的 30 年里能够相对有效地解决了宏观经济的一大难题：“既较好地解决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又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获得一种相对令人满意的宏观经济稳定状态。虽然宏观经济稳定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但是“如果离开了它，其它所有的努力也只是徒劳的。”

东亚、南亚主要国家重要经济、社会指标比较（1990年）

	莫尔克斯标准	韩国	中国	印度	菲律宾	日本
人均 CDN(\$)	> 3000	5400	370	570	730	25430
第三产业在 GDP 所占比重(%)	> 45	46	31	38	43	56
非农业就业人口中全部就业人口的比例(%)	> 70	76.4 (1986)	n · a	n · a	n · a	> 90 (1986)
受过基础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 80	> 95	27	23	10	> 95
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	> 15	38 (1989)	2 (1989)	n · a	28 (1989)	31 (1989)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 50	72	56	31	43	77
平均人口预期寿命(平)	70	71	70	62	64	79
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 1	< 1	1.5	1.7	2.2	0.4

50年代末60年代初，韩国失业人口约占总就业人口的40%，完全失业人数高达240万；失业率超过20%。然而，自60年代中期始，韩国失业率便出现迅速下降的趋势：1968年为5.1%，1978年为3.2%，1989年为2.6%，1995年为2.1%，和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同期指标（1970年7.1%、1980年为7.7%、1990年8.3%、1995年为9.2%）相比，韩国无疑保持了一项最重要的经济成就——为穷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加了穷人参与的程度，从而极大的减轻了贫困问题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压力。上述成就的取得一方面源于韩国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例如该国制造业的发展使这一部门吸收劳动就业的能力在1985年到1995年间提高了一倍，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增长对全社会劳动力增长的比率高达36%，而同期印尼、巴西、泰国、印度、肯尼亚、阿根廷的同一比率则分别为23%、19%、13%、5%、4%和—21%；另一方面也取决于韩国政府政策有力的支持，多年来，韩国政府不仅相继颁布了诸如《职业安定法》、《职业训练法》、《职业训练促进基金法》等旨在扩大就业，推动人力资本开发的法规，而且通过扩大政府对社会公用事业的投资，鼓励私人加大对第三产业投资等方面来吸收剩余劳动人口。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在处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上，也成功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曾出现过的两种失误：一是强调重化工业的增长而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造成非农业劳动就业长期处于萎缩增长状态，表现为产业的就业弹性（劳动就业的百分比变动对经济产出的百分比变动）过低（如1985—1994年突尼斯为0.2、巴拿马为0.27、新加坡为0.12），出

现高增长、低就业问题；二是强调给新增劳动力安排“工作”而不考虑这种有偿就业是否真正具有经济上的需要，造成人均劳动装备水平下降，人均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也变碍相对缓慢，表现为产现的就业弹性过高（如1985—1994年巴基斯坦为0.62、肯尼亚为0.92、智利为1.55，喀麦隆为1.57），发生高就业、低增长问题。韩国这一时期的产出就业弹性为0.37（以色列同期为0.48），具有较好的合理性，即实现了较高的产出增长率与较高的就业增长率相配合。这是因为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选择了一个经济增长与减轻贫困相结合的综合发展方案，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贯彻之。如走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转化的工业发展道路，以及政府一贯地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等等。

韩国的消费物价、名义工资、真实工资上涨率（%）

年份	消费物价	名义工资	真实工资
1975	15.9	26.9	9.3
1980	2.3	18.0	14.3
1983	15.3	34.7	16.8
1986	18.3	28.6	8.7
1988	28.7	22.7	- 4.7
1990	7.2	14.7	6.9
1992	2.3	8.1	5.7
1994	2.3	9.1	6.7
1975 ~ 1996	13.2	21.9	8.0

虽然韩国在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上和解决失业问题相比，没有取得同样巨大的成就，但在控制通货膨胀恶性发展，以使其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能够降到最低程度方面所做的长期努力和取得的实际效果，至今也仍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敢企望。

韩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低通货膨胀率国家之一。由于劳动者名义工资的上涨率长期高于物价上涨率，多年来韩国的真实工资上涨率仍是较高的。就是说，韩国通过名义工资上涨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60年代以后的物价上涨给国民福利带来的不利影响。

从动态角度看，韩国相对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主要应归因于其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推行了一种稳健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目标极其明确的金融政策（按产出发展战略分配信贷资金和刺激国民储蓄）。长期以来，韩国政府不断加强政府收支管理——以提高收入、节约开支、控制财政赤字的规模为重点。例如，80年代的税制改革使政府收入从原先占GDP的15%上升为18%，其财政赤字规模一直被控制在占GDP1%—4%之间（经验认为这是政府支大于收但又不会过度诱发通货膨胀的安全标准），而且赤字补偿手段也以发行公债或海外借款为主。韩国的金融政策时常具有明显的扩张性特征，其广义货币持有M2的年均增长率在1970—1985年间为35.5%，在1985—1995年间为21%。但是，如果考虑到该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国内总投资和私人消费的高速增长现象（1970—1995年间年均增长率分别约为14.5%和12.5%），那么合理的判断是，货币供给量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大于其对物价上涨的作用。

基于以相对较高的就业率和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为特点的宏观经济环境，韩国经济实现了长期的稳定的高速增长：GDP 年均增长率在 1970—1985 年间为 9.9%，在 1985—1995 年间为 9.7%，分别高于同期全世界 GDP 的平均增长率 5.9 个和 6.5 个百分点。正如世界银行专家所说：“稳定的宏观经济基础是政府能提供的最重要的公益之一”。它不仅能够有效刺激国内私人投资的增长，而且为本国经济带来更多的额外利益，韩国的事实即如此。

2. 有效高积累作用下不断优化的经济结构

韩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要素积累规模的不断扩大，综合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改善，其中前一因素至少在 80 年代以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按 H·钱纳里等人的估算，1980—1993 年间，韩国 GDP 年均增长率为 9.7%。其中要素投入（资本与劳动）的作用平均为 57.7%，综合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力 42.3%。这期间劳动投入、资本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6.6%、5.5% 和 4.1%。总的来看，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纪录主要是靠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方式取得的，这与主要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增长阶段曾经出现过的情况基本相似。但是，韩国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使国家积累率维持在 30% 以上（1995 年达到 37%），并且没有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在某种意义上确是一种奇迹。这与该国能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相对有效地推行工业化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高积累作用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在韩国表现为：（1）产业结构的日趋合理化。按 GDP 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从 1965 年的 38%、25%、37% 转化为 1995 年的 9%、45%、46%，这一结构已经接近了日本的水平（3%、42%、56%）。

（2）工业结构中轻重工业的相对比重从 60 年代初的 73.2% 对 26.8%，70 年代初的 58.2% 对 41.8%，转化为 1993 年的 41.2% 对 58.8%，呈明显霍夫曼比例下降趋势。按 1986 年的霍夫曼系数（41.2/58.8）为 0.7 计，韩国工业结构已具工业化第四阶段特征，即已步入了重化工业结构高级化进程。

（3）部分地实现了重化工业高级化，即在重化工业中从以原材料制造业为主的部门内部结构开始向以加工组装业、高加工度组装业为主的部门内部结构转化。（4）实现了出口产品结构高级化。韩国 1960 年出口产品以矿石、畜产品、生丝、蔬菜等初级产品为主，出口总额仅为 3,300 万美元，到 1994 年出口总额上升为 330 亿美元，90% 以上的出口产品为制成品，其中机械与运输工具、电力机械、交通设备等划归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S7 的产品占全部出口总额的 68.1%。长期维持的较高出口增长率（1970—1985 年平均年增长 27.2%，1986—1996 年平均年增长 12.8%）反作用于国内产业、产品、就业结构的转论与优化。

当然，韩国高积累作用下的经济结构迅速转化是在特定经济环境下（60 年代的世界经济高速增长，70 年代国际银行相对充裕的资金供给，以及美韩特殊关系造成的进入美国市场的便利等等）完成的，这一“奇迹”恐怕再难于出现在其它国家和地区。不过，应该承认，仅就高积累与高速工业化联系起来所取得的客观经济效果看，在这方面韩国的确比大多数（包括实际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

3. 巨额科技投入推动新兴产业相继崛起

80 年代以前，韩国经济增长中的技术作用度是相对较低的。按韩国发展

研究所 (KDI) 的估计：1966—1976 年间和 1972—1983 年间在 GDP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9.7% 和 8.2% 的情况下，技术作用率仅分别为 7.2% 和 7.3%，而劳动作用率则分别高达 48.5% 和 39%。很显然，这与韩国科技投入一直偏低有着直接关系——直至 1980 年，其技术开发投产占 GDP 的比率仅为 0.86%，研究开发投资占销售总额的比率更低，为 0.47%。

韩国部分工业部门的生产增长统计 (生产指数：1985 = 100)

		1987	1993	1996
全部制造业		146.6	171.3	186.5
加工组 装业、高 加工度 组装业	非电动机械	180.7	225.9	259.3
	电子、电机机械	216.4	271.3	290.3
	科学、计量设备	229.0	225.7	270.3
	运输设备	161.5	211.3	260.3
原材料 制造业	木材及产品	123.5	149.7	151.6
	纸张及产品	136.5	168.8	180.1
	非金属矿产品	131.1	164.7	175.4
	化学品及产品	127.6	154.8	172.9
	组合金属产品	126.3	139.2	150.2
	钢	122.1	145.9	163.7

上述状况在 80 年代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政府与企业均在技术的自主开发方面投入了巨大力量：一是健全与完善国家的技术开发资金援助制度，二是实质性地增加了技术开发与技术引进的投资。这样，在发达国家政府与企业对高级技术转移实行有力控制的情况下，韩国逐步踏上了自主开发技术的道路，不仅使其参与国际技术分工成为可能，而且促使其新兴产业的相继崛起，二者带来技术赶超效应。

韩国 1981 ~ 1986 年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主要指标与专项基金的建立情况

年 度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科技投资 (亿元) 占 GDP 的%	4129	5551	7282	9577	12862	16663
	0.86	1.09	1.23	1.44	1.77	1.99
每个研究人员的“R 与 D” (百万圆)	14.2	16.1	19.4	22.5	27.9	32.4
研究人员数 (千名)	20.7	28.4	32.1	37.1	41.5	47.0
技术引进支出 (百万美元)	107	116	150	217	295	441
企业建设研究所 (个)	65	92	124	152	183	290
专项基金建立年份						
机械工业振兴基金						
纤维工业现代化基金						
电子工业振兴基金						
中小企业技术开发基金						
工业发展基金						

自 60 年代后期起，韩国加快了重化工业的投资速度，先后建成了自己的钢铁、机械、造船、汽车、电子、石化等现代化工业，尔后在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近 20 年的基础上，自 90 年代以来政府开始重视优先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通商产业部为此制定了“1990—1994 年知识密集型产业部门发展 5 年计划”，并拨出 388 亿美元来实施。其中 164 亿美元是用于微电子、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精细化工、激光技术、光学设备以及新材料等领域的技术开发；224 亿美元用于促进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的现代化和建立有效利用最新技术的工业综合体。按有关专家估计，从现在到本世纪末，韩国将在电子、电机工业、汽车工业、造船工业、机床制造业、航空航天工业、化学工业等方面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极有可能成为最发达国家之一。

韩国主要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前景预测

部 门	90 年代初（1990 ~ 1993）	90 年代末（1999）
电子 电机 工业	产值达到 550 亿美元，居世界第 3 位；生产出存储容量达 64 百万字节的电子元件。	生产出容量为 1 千兆字节的、可任意选择的长期存储器。
汽车 工业	年产量达到 130 万辆以上，年外销 50 万辆以上。	年产量超过 380 万辆（包括轿车、载重车和公共汽车），居世界第 4 位。
造船 工业	生产能力保持年 300 万总载吨以上，一半左右为大吨位油轮。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船舶生产国。
机床 工业	金属加工设备年生产额力图超过 10 亿美元。	发展并生产出适应性极强的生产系统、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航空 航天 工业	生产各类零部件、航空发动机、机身、翼梁等。	生产飞机、直升飞机，并且准备发射宇宙火箭。
化学 工业	现有产品力图保持住在亚大地区国家中的主导地位。	细陶瓷、工程塑料、合成树脂等新型材料的生产达到规模。

新兴产业的崛起给 90 年代的韩国经济带来的主要好处是：作为传统产业的替代产业，使韩国在国内劳动成本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至迅速丧失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1987 年，知识密集型产品在韩国加工工业产品出口中占 11.1%，1997 年将达到 30%。在世界知识密集型产品市场上，韩国公司所占比重亦会从 1987 年的 1.4% 提高到 1994 年的 2.3% 2000 年的 3.2%。此外，随着新兴产业的崛起，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被以资本输出形式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周边发展中国家，成为韩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部分，为其力争到本世纪末成为净资本出口国创造积极条件。

4. 迅速走向国际市场并确立制成品出口国地位

韩国是较早实现“出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自 1958 年起开始从“进口替代”逐步转向“出口替代”，并于 1964 年正式提出“输出立国”的方针。从此以后，韩国积极吸引外资与从事技术引进，通过扩大出口贸易，在其带动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率不断提高的影响下，进一步推动着本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韩国较高的出口增长率一方面源于其出口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另一方面源于政府有关政策对出口企业的扶持，而且前者与后者又是密切相关的。文泰克·洪指出，为实现“出口替代”发展战略，韩国政府主要利用了低息贷款方式向国内各产业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作为“……推进产业结构转换的主要手段，……新兴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他估计：“相当于CDPI0%的国内信用补助；对韩国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足以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在政府贸易推动政策支持下，韩国先是实现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同时完成了资本密集型原材料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尔后，资本密集型产业产品出口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韩国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出口占总出口产品的比重，在60年代初各占86%和14%，到60年代中期改变为40.6%和59.4%，80年代后进一步改变为8.8%和91.2%。在制成品出口中，直至1984年前仍以劳动密集型工业品为主，其中衣类、纤维制品所占比重为最大，平均约占全部制成品出口的25%。重化工业产品大量出口始于70年代初，到1986年出口商品中化工、机械、金属、电子以及钢材、船舶、汽车等重化工产品所占比重超过了50%。至此，韩国在国际贸易中基本上确立了制成品综合出口国地位。

韩国成功地推动“出口替代”发展战略，不仅部分地实现了韩国民族“经济独立”的夙愿，有效地摆脱了对发达国家资本供给的严重依赖，而且通过不断扩大对外贸易，特别是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开拓，使其国际收支结构明显改善，所有这些都助于该国继续扩大对高新技术产品及现代工艺技术的进口，有助于它及早偿还全部外债，从债务国变为资本输出国，据原苏联经济学家B·安德利安诺夫估计，1990—1997年，韩国出口将从720亿美元上升为1270亿美元，进口将从680亿美元上升为1190亿美元，其外汇余额也将从1990年的256亿美元下降至1994年的177亿美元挑战四小龙元。韩国将提前还清全部外债，加快资本输出的步伐，到90年代中期其国外直接投资总额可积累达到30亿美元，到2000年将进一步上升为80~100美元。届时，韩国将实现自新兴工业化经济向（以取消与商品贸易和劳务有关的一切外汇限制，实行自由兑换制度为基本特点的）新兴成熟型经济的重大转变。

韩国出口增长率与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变化 (%)

年 份	出口增长率	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 GDP 比例
1979	34.2	24.7
1980	27.8	22.5
1981	52.1	20.4
1982	18.6	23.2
1983	38.5	25.6
1984	13.9	25.3
1985	51.8	24.4
1986	30.2	27.3
1987	26.5	31.3
1988	18.4	33.2
1989	16.3	32.3
1990	21.4	28.7
1991	2.8	30.5
1992	11.9	31.3
1993	19.6	31.3
1994	3.6	30.8
1995	14.6	31.3

现代经济增长与韩国的“经济奇迹”

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韩国是在近似于一片废墟的基础上（因日本人撤离导致当地 40% 的加工工业企业和 90% 的采掘工业企业倒闭）开始了它的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资源贫乏，农业用地有限，人口过多等）和不久发生的朝鲜战争的破坏，使这一进程在最初阶段变得极其艰难。然而，在尔后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1960—1988 年），韩国便从传统农业社会演变成为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并且（按 1988 年 GDP 1720 亿美元计）进入了世界 20 个主导国家行列。作为一种“奇迹”，韩国的经济成就之产生并非出于偶然性因素的作用，即使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有非标准性特点，但仍有（绝非仅具学术研究价值的）规律性可循。

1. 韩国经济奇迹的规律性

战后韩国现代经济增长活动的历程及其创造的“奇迹”不仅检验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极大地丰富了这一理论。它为目前真正渴求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的国家和政府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财富。

第一，落后国家，无论其是否具有国家主义传统，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必须领导经济。这倒不是因为政府及其首脑比广大国民更高明，而是因为早期阶段，经济过程中市场的分散决策（自由经济）的作用与政府的集中决策（政治领导）的作用同等重要。当然，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政治领

导作用来源于有能力的政治领袖。韩国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部分地证明了O·帕克的想法，“政治领导作用在于保证国家的稳定，实现政治、人口、机构和教育朝着能保证经济发展的方向变革……。”另一位学者B·桑格在研究了韩国经济发展问题后，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精明强干的领袖人物的政治决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其意义重于其它经济因素。

第二，实行发展计划政策，即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将国民经济发展纳入某种有计划的状态，它有助于使发展中国家在较短时期内使经济从长期落后状态摆脱出来。当然，这种计划不应百分之百地从外部强加给其国民，而且也不应成为基本上不考虑经济主体利益的东西。韩国在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过程中既吸收了法国的指示性计划的经验，也吸收了日本的指导性计划的经验，并结合于本国的实际发展了自己的计划协调机制。

第三，及时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过渡，在与世界市场保持密切联系的基础上，引进外部竞争力量，可以较早地使国民经济从粗放化发展及时改变为集约化发展。当然，这种转化的及时性一方面取决于内部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速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内部经济对外部经济变化能够做出反应的敏感程度。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它能够较早地推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既与其60年代前后曾有效地实行过进口替代战略和同样有效地利用了外部资金有关，又与6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出现有关，不过，相比之下，抓住时机更重要。正因为抓住了机遇，韩国经济发展才能在有关政策支持下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必须对经济政策的社会定向做出谨慎的平衡选择，即有关经济政策能够为满足符合人的尊严的基本消费（包括食品、衣服、药品、教育等）做出积极的影响。它既是客观经济稳定的基础，又是提高微观经济活力的必要手段——把经济权力适度地分散给经济活动主体中的“弱者”，增加他们的经济自由，这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最终是有利的。韩国不仅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公开提出“打倒贫困”的口号，而且，经过20年的努力（1965—1985年），使其贫困线下人口从占人口总数的41%下降到7%。韩国政府明白：“其大多数人口是贫穷的国家，肯定会失去发展的动力。”

把以上创造韩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视为使相对落后国家加速现代经济增长的带有规律性意义的普遍适用经验，似应无言过其实之嫌。不过，应该指出，各国经济体制与韩国并不完全相同，生搬硬套韩国经验肯定不会获得同样的经济效益。正确的作法是：在技术加变革方面，创造性地运用发展理论与别国成功的经验。

韩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

经济体制是指经济社会用其有限资源去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时，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资源配置途径、动员国民从事经济活动的手段，以及生产决策方式所做的一整套选择性安排。和目前所有发达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韩国的经济体制属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生产资料以私有化为主，资源配置以市场化为主，生产决策以分权化为主，以及用经济刺激为主要手段来动员国民积极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市场经济必须具备的四个基本特征。在这一微观经济基础上，韩国推行的市场经济原则也大体同发达国家相同：自愿交换、自由竞争、全部经济过程以市场机制调节为主。

然而，在宏观经济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上，韩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在发达国家是市场调节为主，辅之以政府有限干预；而在韩国则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并重。具体他讲，韩国在这方面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在发达国家，工会（或其他工人、雇员组织）、厂商与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它们之间原则上不存在着依次隶属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大容易成为绝对的发号施令者，但是，二次大战后，特别是自60年代以来，先以朴正熙，后以全斗焕为首的军政府一直通过强权措施（如行使立法权，支配政府和司法大量取缔左派势力，限制工会运动等等），着手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在韩国出现了长达20余年的所谓“开发专制”现象——“为了实现开发政策，采取强权措施也在所不辞。”“开发专制”不仅导致政府对经济过程的广泛介入，而且也使从民众、雇员到厂商的许多经济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受政府强制性政策的摆布。“开发专制”现象虽然在80年代中后期随民选政府的产生而消除，但韩国市场经济体制在“开发专制”下逐步形成了一种以政府为中心，政府几乎成为“万能的指导者”的经济模式。理论界称之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

第二，与诸如日本的政府指导型市场经济、美国的政府可调节型市场经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模式中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方式、方法、手段选择相比，韩国政府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在性质上表现为更广泛、更直接和更具强制性。它通常实行集中的宏观经济决策并以此规定产业、企业的发展方向；通过指示性（而非指导性）计划和控制经济参数，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以推动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实施。它也借助经济立法，在许多场合下采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行政府的主要经济决策。应该承认，韩国经济这种宏观控制方法发挥过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即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初期，资本、技术、管理人才无严重短缺以致无法依赖民族资本的积累来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情况下，政府大量介入经济过程并且承担尽可能多的发展义务是必要的。当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使韩国政府能够发挥出如此巨大作用的前提条件是，以实现经济增长需要政治稳定为借口，把限制民众参与政治改革加以合法化。由此产生的韩国经济奇迹尽管不应予以过低的评价，但是，正如朴一在其《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结构》一文中所指出的“在牺牲民主主义的条件下来开花的经济繁荣是不值得过分称赞的”。

第三，由于实行“开发专制”，而政府又广泛干预经济过程，与发达国家相比，韩国宏观经济方面至今仍存在着两种缺欠：（1）政府对经济过程的某些过度干预造成部分生产要素难以自由流动（如政府集中控制的信贷资金），价格信号不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变化（如政府长期推行物价控制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国内的统一大市场尚未完全形成，进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相对缓慢（表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缓慢）。（2）虽然韩国自60年代以来开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其对外经济联系中至今仍保持着明显的出口导向性，而在对外商品开放国内市场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歧视性。就韩国尚未对进出口采取不偏不倚政策和仍在推行非自由兑换政策这两点来看，还不能说韩国已经实现了全面的对外开放。这导致韩国政府在处理对外贸易关系中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处理双边问题，而非多边问题上。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力，会造成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摩擦进一步激化，给本国经济发展在经营、资源、资本、技术等方面带来更多的困难。

第四，同发达国家一样，韩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方式、方法等也不是僵

化的，而是可调整的，但调整速度相对较慢。针对自 80 年代以来越来越明显暴露出的政府宏观经济干预过度的种种弊端，韩国经济界提出了调整现行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迫切要求（这一体制中的主要弊端是：企业对政府依赖性加强，导致内在管理素质提高很慢；市场作用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佳，产业结构出现畸型发展趋势；长期强调不均衡增长战略，导致部门间、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等等）。为此，随着总统直接选举制的实施，韩国在由“开发专制”向民主政体过渡的同时，韩国经济体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时期——从政府主导型向民间主导型的转化过程。但是这种转化并非是对原有体制模式的否定，其主旨是：适当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相应加强市场调节作用，以更有效地增强企业活力，促进经济的合理化、高效化。有人认为目前韩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政府主导向民间主导过渡型市场经济模式”。不过，考虑到这种过渡的完成时间可能会延续到 2000 年前后，所以就当前及 90 年代里韩国经济体制运行情况看，准确他讲，它仍然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

含有上述特点的韩国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作为一种模式，在理论上它能较好地政府宏观经济控制与市场调节机制有效地结合起来。然而，这种市场经济模式一方面要求政府成为国民经济的综合管理者并有力干预经济运行，另一方面又要求给个人、企业以较大的生产决策权、经营管理自主权，以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二者之间实现长期有效结合的确具有一定的困难，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有较高的公共行政管理能力与效率，以及经济主体对其外部经济环境变化能够做出及时、合理的反应。

韩国全面推进世界化战略

自 1993 年金泳三总统就职以来，韩国朝野各界积极推进世界化战略，志在以一个新的国家形象步入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目前，韩国的世界化战略已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东北亚各国的浓厚兴趣，人们关注着韩国推进其世界化战略的进程。

韩国世界化战略，有时也被称为国际化或全球化战略。开始时它只是金泳三政府的一个战略性目标或动员口号，够不上一套计划缜密的行动方案。但是，随着后来逐渐补充一些具体的行动纲领，很快为韩国各界接受，几乎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充分显示出它的鼓动功效。

90 年代的韩国，从其国内建设的角度看，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上。一方面，自 60 年代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已创下惊人的经济业绩。另一方面，长期积累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病垢已成为严重的发展障碍。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开始了以摆脱贫困为中心目标的经济建设新时期。这一时期的战略就是千方百计地推进工业化，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必须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应当说，韩国在推进工业化战略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进入 90 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反省这 30 年的发展，深切地感到，工业化并不等于现代化，10000 美元的人均 GDP 并不意味着韩国已成为一个先进国家。韩国人，从总统到百姓，都为“韩国病”所困扰，经济满负荷的高速增长，伴随着通货膨胀和劳资冲突等问题。工资上升太快，消费势头过猛，房地产投机愈演愈烈，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各种各样危及社会安全的事

故屡屡发生。仅 1994 年这一年，只有 4000 万人口的韩国因产业灾害就有 2600 人死亡，8500 人受伤，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过万，伤 30 多万。1995 年更是祸事频仍。4 月大邱煤气管道爆炸事故，死伤达 100 多人。仅隔两个月，新建成的三丰百货大楼又顷刻变成一堆瓦砾，造成惨不忍睹的悲剧，这些接连不断的事故和丑闻，集中地反映出韩国社会在制度和管理运作上的滞后和低能。用韩国前总理李洪九先生的话说，“社会的硬件已经先进化了，而其软件还没有跟上，这种现象随处可见”。

90 年代的韩国，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韩国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曾准确地捕捉住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成功地开发国际市场，在彩色电视机、洗衣机、汽车等产品的国际竞争中形成相当的优势。但是，面对 90 年代的世界，特别是韩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新形势，韩国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适应也暴露出来。从总体上说，韩国的国家竞争力还不高。据国际经营开发研究院（IMD）发表的资料，1994 年韩国的国家竞争力只排在世界第 30 位。从各种投入要素对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判断，韩国经济的质量还不算高。据韩国经济研究院洪性德研究员的《韩国经济增长要素分析》显示，1963—1992 年间，韩国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为 8.26%，其问，对经济成长的贡献度最大的是劳动部门，达 31.9%，资本投入的贡献度达 20.9%，规模经济效益的贡献度为 20.5%，资源配置改善的贡献度为 8.9%，技术进步及其它要素的贡献度为 14.1%。根据这一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前 30 年韩国的经济成就主要是由劳动和资本支持的，而科技要素的作用还不大。这和美、日等国家经济增长主要靠科技要素支持的形态，还是两回事。从今后的经济发展趋势看，韩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也不少，其中包括储蓄率低于投资率带来的本国资金供给不足，贸易赤字增加。劳动力特别是生产第一线人力不足，48% 的出口商品无自己品牌，57% 的出口商品进入“成熟、衰退期”等等问题。此外，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也不能令人满意。据对访韩外国人的调查，35.9% 的人士认为韩国世界化程度是 70—79 分，20.6% 的人士认为是 60—69 分，23.0% 的人士认为是 50—59 分，12.8% 的人士认为是 50 分以下，只有 7.7% 的人士认为超过 80 分，接受调查的人士，大体上否定韩国的经济环境。他们认为，主要障碍因素就是政府的规定和官僚主义，不赞成开放韩国市场的舆论和缺乏专业人才等等。

对上述内外部条件，韩国的许多有识之士作出了清醒冷静的分析。既看到现有的经济发展成就，又承认自己和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差距，感到非有一个重大变革不足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样的见解，已成为社会共识。汉城大学金世源教授指出，“近几年，韩国的发展是较快的。通过在技术、资本、文化、贸易等方面的对外交流，扩大了国际上的影响。但和国际发展形势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只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水平，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才能保持实现先进国的条件。”这番言论，可以说很有代表性。

自就职以来，做得有声有色的金泳三总统适时提出了以世界化为标志的 90 年代韩国新的国家发展战略。金泳三对世界化概念用一句话解释为“要适应世界的变化，进一步参与管理世界”。认为这个概念的核心是要提高国家竞争力。为实现世界化的目标，需作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方面是改变民间意识，包括树立开放性的思维方式；掌握国际性信息；加强外语学习；关心科技，扩大海外研修；积极参与和利用国际性机构；提高支援国际经济的自信心。第二个方面是提高企业的能动性，包括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提

高经营的连续性；掌握进口国消费者的情况；克服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扩大和国外企业的合作；加强企业内部的技术开发；积极引进先进技术。第三方面是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包括改变官僚意识；尊重民间的自律性；保持国内法规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扩大 SOC；促进教育的世界化；扩大 R&D 支援；加强情报体制的世界化；加强技术人员的作用；积极靠近 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强和 EU（欧洲联盟）的合作；发挥在 APEC（亚太经合组织）中的核心作用；积极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韩国政府在 1994 年底，正式公布“制定世界化推进委员会规程”，以促进在 1995 年稳步地把金泳三总统的世界化战略构思落实。1995 年新年伊始，青瓦台便宣布成立由国务总理任委员长、由政府要员、学界权威、社会名流组成的世界化推进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堪称汇集了韩国世界化方面的一流智慧，而且设计周详、运作稳健。与此同时，韩国政府还推出“世界化指标”。把一个国家战略分解为一个个的量化指标，固然有简单化之嫌，但也确有利于公众把握和理解的好处。据透露，韩国的“世界化指标”的基准时点置于 2020 年，目标是国家竞争力成为世界第 5 位。指标草案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分为现在、2000 年、2010 年、2020 年等不同时段，分别制定出各阶段要达到的水准比率。在政府的上述工作中，包含着韩国学界的智慧。梨花女子大学金锡俊教授所做的关于世界化指标的研究报告，无疑为政府的世界化指标提供了学术性基础。

更为引人瞩目的是，“世界化”已不再是纸面上的纲领或指标，而正在变成韩国方方面面的改革行动。

首先发生重大变化的是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在金锡俊教授的世界化指标研究报告中，韩国目前的各项世界化水平分别为：经济 40%、文化 15%、社会 10%、政治 5%。可以说，政治是韩国最落后的领域。有人形象地把韩国这方面的问题描绘成“红包、事故、乌纱帽共和国”。确实，以行贿受贿、玩忽职守和官僚主义为典型特征的腐败风气已成为长期困扰韩国的社会公害。金泳三总统把清除腐败作为他当政改革的首要任务。自就职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受民众欢迎的措施打击腐败行为，也见到了相当的成效。事实上，1993 年推行的“金融实名制”，意味着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有利于从根本上切断政经勾结权钱交易的通道。它规定所有的金融活动必须以真实姓名进行交易，使政界人物不能再以假名帐户收取贿赂，也可以防止企业或财团匿名设立秘密政治资金，从而堵塞了营私舞弊的渠道，为消除大宗非法金融交易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接着，韩国政府又颁布实行了“不动产实名制”，以有效地防止在不动产这一重要经济领域中进行投机和获得非法收入。除了建立健全法制之外，金泳三政府还着手进行机构改革。为促进世界化战略，确立“小而强政府”的方案，将 60 年代以来的在政府主导性体制下形成的政府机构改革为适应多边国际化协作的新行政机构。在清除腐败上，金泳三政府局限性表现出很大魄力 and 决心。金泳三就职后不久，就因“行为不端”免去汉城市长、法务部长官、保健社会部长官和建设部长官四名高级阁僚的官职。到 1994 年 12 月 8 日，拘留的腐败分子达 506 名。尤其是最近对二名前总统的逮捕和起诉，震惊世界。这些都说明韩国的世界化战略中关于政治一项，得到了切实的执行。

最重要的领域是经济，它从根本上关系到韩国世界化战略的成败。在这方面，韩国打算实行“新时代的出口支援政策”，其要点是适应国际贸易组

织(WTO)的要求,既要维持与强化从前的出口规模,又必须放弃以往的以数量和特惠条件取胜的作法,寻求一条通过提高经济质量扩大出口的新路。为此,首先要认真解除企业活动的绊脚石,减少政府对企业的非必要干涉。在资金投入上,政府要以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为考虑问题的基点,多予支持。其次,强调出口应有质的改善,企业要开发出唯独自己能够生产的特色产品,确保在国际市场中的不可取代地位。再有,要树立对贸易收支的新观念,不能排斥进口,不能只把眼光放在缩小短期贸易收支的赤字规模上。从长远着眼,应当通过技术开发,培育部件及素材产业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理应一如既往地给企业提供一切服务。韩国企业界对政府的世界化战略普遍持欢迎态度。企业家们对政府干涉企业大多积怨已久,现在政府有改变的决心,企业自然喜不胜收。大企业也大都制定了相应的世界化战略。三星集团计划到2000年把企业信用提升到世界水平,海外总销售额计划达到600亿美元。届时将在北京、东京、新加坡、纽约、伦敦建立5个地区本部,在世界各地建10所综合性生产基地,对电子、机械、化学、贸易、金融保险、工程技术等领域的海外投资将达120亿美元,各区域要构成“开发——生产——市场——物流——销售——流通”的一套工作体制,三星集团也许是韩国企业中行动最积极、计划最大的企业,不过,从中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出其勃勃雄心。

从根本上说,韩国的世界化的基础在于教育与科技,因此,韩国政府和教育科技界也做了很多工作。韩国的教育投入一直长期不足。把教育看成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受惠部门而非动力部门,这种观念很普遍,针对“经济是90年代的,教育是60年代的”这种落后局面,金泳三总统提出“为世界化的教育”构想。新教育构想的目的是激励教师,推动教育改革。新教育分为多样化教育、需要者为中心的教育、自由中心的教育、容易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教育、21世纪型教育等5个基本方向,金泳三总统打算在任期内,分批增加教育投资,使之达到国内总产值的5%。同时还提出师资培训、学校基础设施现代化,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强化措施。近一年来,韩国教育界已有相应举措。但教育毕竟是一种长周期生产活动,不会立竿见影,马上显出成效。

韩国的科技事业也不能令其满意。面对被挤出亚洲“四小龙”的窘境,韩国科技技术翰林院长赵完圭先生感叹“如果曾经在各种情况较好的情况下,把资金投在科技教育方面、加强竞争力的话,不至于出现目前的情况。”为实施世界化战略,为了培养世界水平的科技人才,金泳三总统提议,设立高等科学院,并许诺1996年科学技术部门的预算比1995年增加25%,为科技发展助一臂之力。更为重要而且实惠的是,韩国政府提出产业技术发展5年计划期间,投入1.1兆韩元,配合民间自筹的1.1兆韩元,以支持产业界在700多个领域进行战略性开发。各大企业纷纷拟定自己的技术开发计划,中小企业也千方百计通过技术开发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如果这一系列计划得以实现的话,韩国真的可以令世界刮目相看了。

韩国推进世界化战略,实质上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综合性改革。“韩国病”积垢日久,其中各阶层的利益各不相同,即得利益者人数虽少但实力不可低估,因此这场改革中风险颇多,韩国政府和支持改革的人民还须谨慎行事,稳健扎实地把世界化战略推进到终点。

APEC：韩国重振经济的催化剂

韩国经济属于对外依附性较强、以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结构。8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区域化及集团化的迅速形成与发展，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的日趋严重，对韩国经济的发展构成极大的威胁。为此，韩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努力寻找打破困境的途径与办法，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局面的出现，为韩国经济的发展再次提供了机遇。于是，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率先提议建立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试图通过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重振经济，提高在全球中的地位 and 影响力。

到目前为止，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是韩国唯一正式加入的区域性经济合作机构，对 APEC 寄予极大的希望，并把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促进其发展，作为今后韩国对外经济、外向政策的重心。

1. 韩国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看法与立场

(1) 基本看法

韩国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是个区域性较广、成员国间政治、经济差别较大、合作潜力较深的非排他性的经济合作体，就象一个“球心体”，把区别内的国家联在一起，并以“火车头”的作用带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

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与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化、集团化合作组织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属于“差异性”和“非排他性”的经济合作体。即区域内会员国在文化、宗教、政治、经济水平差别较大的情况下进行双边或多边经济合作，同时积极吸纳区域外国家参与合作，谋求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而后者则属于“同质性”和“排他性”的单一经济合作体、即由文化、宗教、政治、经济水平较接近的国家组成小地区性的经济保护主义联盟，为保护本集团利益而共同排斥区外国家。所以，两者间具有积极与消极、开放与封闭、全球性与集团性等意义上的区别。

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成功与发展，会对“小地区主义”、“排他主义”及“区域集团化”的扩散起到牵制效应，是重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一面进行旗帜。

目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取得的成果虽然还不十分明显，但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各项议案正在推进中，合作目标越来越明确及具体化，保障区域经济合作的组织机构已进一步完善，成员国间初步形成相互尊重、和气协调、求同存异、寻求合作、共同繁荣的局面。

特别是，从 1993 年 11 月西雅图会议之后，相继召开了数次成员国部长级会议，就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磋商，为下届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作了大量准备工作，促使 1994 年 11 月第二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了《茂物宣言》，它标志着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行了一个新的阶段，故具有里程碑意义。

但是，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还存在一些争论点及不尽人意之处，如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速度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急于想看到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成果，而 ASEAN 及中国则较消极；在区域贸易自由化方面，美国主张全盘贸易自由化，相反，澳大利亚、新西兰则强调首先实行农产品市场自由化，日本虽支持开放工业产品市场，但拒绝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在技术转让方面，发达国家对技术转让持消极态度，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发达国家扩大

技术转让，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缩小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此外，APEC 机构设置过多，业务重叠，对 UR 等地区主义及排他主义牵制作用不明显，力度不够。上述问题如不尽快解决，将会影响区域内经济合作。

(2) 韩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立场

韩国认为，各成员国之间减少壁垒、开放市场、扩大贸易往来，是经济相互依存的客观需要。各国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同时也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发展经济，应取长补短，共同繁荣。因此，韩国赞成在区域内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支持发达国家在 2010 年、发展中国家在 2020 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方案。同时主张自己应属于发展中国家，依据是按 GATT 农业领域划分标准，发达工业国家从事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 2%—3%，而韩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15% 左右。

	CATT	APEC	APEC	EAEC	NEAEC	NAFTA	OECD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开放化)			×	×	×		
缓和经济磨擦				×	×		
确保市场			×	×			×
经济交流的多边化					×	×	
防止地区主义扩散					×	×	

注：1. ；为积极的效果； 为虽有积极的方面但效果下一定明显；×为无任何效果或否定效果

2. APEC 及 APEC 分别为成功推进和维持现状时

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保持中立国立场，做矛盾调解人，提出易被各方接受的弹性方案，以利于韩国与各成员国保持融洽的合作关系，提高其影响力。

此外，反对日本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成为“主导国”，以致引发美洲国家排他主义的抬头及亚洲国家的不安全感。

2. 韩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韩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有较重要的位置。它不仅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创始国之一，还被选为贸易、投资议长国，故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韩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属于中间势力，不仅同美国等发达国家建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较融洽。所以，韩国较易发挥调节人的作用，提出一些带有弹性的方案。而其他三个处于中间位置的香港地区、中国台湾省、新加坡则不同，它们均不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其中香港地区、中国台湾省受中国的牵制，新加坡国家较小，属于东盟成员 (ASEAN)。显然，上面三个成员的中间调节作用远不及韩国。

另外，韩国经济规模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中居第 6 位 (美国、日本、加拿大、中国、澳大利亚、韩国)，具有一定的资本及技术输出能力，是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及技术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韩国具有与发达国家经济合作的经验，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吸收、消化能力较强，一些尖端技术经

过韩国吸收、消化后，再转让给发展中国家，较易被接受。故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中发挥中介及桥梁作用。

目前，韩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额为 1440 亿美元（1992 年），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68.5%；在亚太地区投资累计额（批准项目标准）64.7 亿美元，占其对外投资累计总额的 80.0%，大大高于区域内会员国的平均水平。故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解决贸易纠纷，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等方面的作用也较突出。

韩、中、美、日对亚太地区的贸易现状（1995 年，单位：亿美元）

	出口 总额	对亚太 地区 出口额	对亚太 地区 出口比重	进口 总额	对亚太 地区的 进口额	对亚太 地区的 出口比重	对亚太 地区的 贸易比重
韩国	674	463	69%	766	523	68%	68%
日本	3400	2250	66%	2330	1447	62%	64%
中国	862	662	78%	818	535	66%	72%
美国	4475	2191	49%	5526	3221	58%	54%
APEC	14961	9807	66%	15112	10096	67%	66%

3. 韩国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基本战略

（1）把参与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作为重振经济、发展外交、提高国际地位的基轴和引力

过去，韩是靠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改变其贫穷落后面貌，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可是，现在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一些发达工业化国家不仅首先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地区主义政策，而且还要求韩国在国际市场上与发达国家同等竞争，因此，韩国必须选择加入世界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在其保护与协调下，谋求新的生路。

从目前情况看，韩国加入特定的地区集团较为困难，APEC 是其唯一的选择。正如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院长柳花熙所说的那样：“韩国经济在亚太地区市场以外已无活路可寻”。亚太地区市场庞大，经济活跃，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 55%，贸易额占世界的 40% 以上，是 21 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轴。韩国参与亚太地区经济组织后，不仅可以缓和同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确保和开拓海外市场，减少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还可通过 APEC 推进的投资活力化方案，加速海外投资，扩大外商在国内的投资规模，引进尖端技术，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提高产品竞争力。所以，今后韩国国会倍加重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这块阵地，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谋求各种利益，其中认为投资及技术转移是韩国获益最大的两个领域，故将侧重参与上述两个领域的经济活动。

（2）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坚持中间立场、保持中立，是韩国的重要战略之一

韩国鉴于自己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的地位，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寻求平衡，可借助双方的势力获得双重利益，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采取依靠方式，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同情、支持方式，以赢得双方的好感，既利于从发达国家引入资金及尖端技术，确保美、日市场，又可惜助发展中

国家的力量减轻美国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防止超级大国势力抬头（指日本），扩大对外贸易，投资市场，改变对美、日过分依赖的局面。同时，斡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最易显露才能及发挥作用的方式。

（3）积极谋求多边经济合作，提高协商能力

韩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已把开展多边合作作为主要交流方式，以克服协商能力较弱的缺陷，扩大合作范围。为此，计划与不属于 APTA 和 NATAA 成员的中国、日本、中国台湾省与香港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地区性的协商机构，以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前，集中成员的意见、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以提高共同协商能力及影响力。此外，1996 年加入 OECD 和 NAFTA 机构，对现有的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和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BEC）等进一步侧重民间经济、外交的参与力度，调整过去忽略东盟国家的政策，将扩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及技术、设备转移，以英国和发展同东盟各国的纽带关系，减少日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韩国对以东北亚地区的国家为对象而建立的协调机构将持慎重态度。原因是怕由此引来美国同东北亚各国的经济摩擦，同时把美国排斥在外，会造成东北亚地区安全保障上的不均衡。另外，韩国还将扩大同亚太区域外国家的经济合作，主要以欧共体及东欧、独联体等一些国家为对象，以实现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为主，区域外经济合作为辅，全面发展的经济、外交战略。

（4）根据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逐渐调整同美、日的合作关系

韩国认为，过去反对日本势力在亚太地区膨胀的政策是对的，但随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各国在该区域合作中的利益、立场及政策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故需要重新理顺同区域内各国的关系。目前，从日本对外经济政策走势看，其与亚洲排他性的小地区主义相比更趋向多边合作，这与韩国的主张不谋而合。为此，韩国除反对日本主导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政策不变外，将适当减轻对日本的牵制力度，进一步加强同日本的经济合作，促使日本尽快接受和推行多边主义和开放主义政策，成为反对地区保护主义的一员，同时使日本在消除区域内贸易不平衡及推进贸易自由化等方面分担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日本是韩国的第二大经济合作伙伴。韩国长期苦于找不到解决同日本庞大贸易逆差的办法，故打算通过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迫使日本加速开放国内市场及技术转移，以减少对日贸易逆差，获得尖端技术。为此，韩国同日本的经济合作，将从过去依赖中的牵制转为合作中的警戒。

同美国的关系。韩国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样对韩国经济及国家安全较有利。但同时又认为，80 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以强化本国竞争力、改善贸易收支及牵制 EC 为目的而同一些国家签订的贸易协定，是促使亚太地区的小地区主义抬头、影响多边合作关系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与韩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政策很不相符。为此，韩国将联合日本、中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加速推行多边合作方针，以减轻同美国的贸易摩擦、防止地区主义的蔓延。同时调整对美国一边倒、随附性的依赖政策，建立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积极主动性的合作关系，通过扩大同中国及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实现出口振兴及产业结构调整，谋求同美国建立对等的经济、外交关系。

（5）促使朝鲜对外开放，实现朝鲜半岛统一

韩国希望通过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力量，特别是中国的影响力，促使朝鲜早日对外开放，加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行列，借助外部力量，恢复发

展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减少南北统一费用。为此，韩国将支持美、日同朝鲜的接触及发展经济合作关系，以利于早日恢复南北朝鲜政府领导人对话，发展和扩大南北朝鲜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

十四 台湾：一亩三分地里的大槟榔树

台湾，拥有林涛云海的阿里山，风光旖旎的日月潭。但这个拥有 3.6 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宝岛，50 年代还是个农业省，这个人口只有广东的 1/3，面积只有广东的 1/5 的岛屿，岛内生产总值却是广东的四倍，人均生产总值是广东的 12 倍。台湾——海岛经济的一大奇迹！

总体经济呈稳定中速增长

进入 90 年代以来，台湾总体经济的增长率除 1990 年的 5.4% 略低外，1991—1994 年大致维持在 6—7% 之间，各年分别为：7.6%、6.8%、6.3%、6.5%，1995 年为 6.4%，表现出稳定中速增长的特点。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台湾经济难以达到以往的两位数高速增长的水平，另一方面则因台湾当局尚能在新形势下调整经济发展策略，使经济维持中速增长。

台湾经济是海岛型经济，海外市场是其发展的主要依托，因此，台湾经济与国际经济环境具有很大的联动关系。90 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对台湾的不利影响主要有：1. 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不景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台湾外贸尤其是出口的扩张。美国经济在 1990 年陷入衰退，至 1992 年才逐步回升。而西欧主要国家则在 1993 年出现经济衰退，欧洲共同体 12 个成员国中有 8 个国家出现经济负增长，其中包括德、法、意等大国。日本经济亦在 1993 年陷入了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衰退，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国，欧洲市场也是台湾近年来努力开拓外贸市场的主要目标，这些国家经济不景气甚至衰退，无疑会严重影响台湾外贸的增长，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2. 世界经济区域化的加速发展，使台湾主要外贸市场面临更大挑战。9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化进入了实际运行阶段。1993 年 1 月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成立；1994 年 1 月北美自由贸易区开始运作，此外，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在 1993 年启动运行。各类地区经济集团都具有对内互惠、对外排他的双重性质，这种排他性对台湾传统的外贸市场产生了很大威胁。3. 在国际市场上，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对台湾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80 年代以前，台湾出口导向经济具有“抢先”优势，之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以自身的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工业，加入国际市场竞争，台湾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受到严峻挑战，90 年代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以海峡两岸产品在美、日市场占有率来看，从 1986 年至 1995 年 2 月，台湾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占有率自 5.35% 下跌到 3.82%，而大陆则从 1.29% 上升至 5.75%；同期，台湾产品在日本市场占有率自 3.71% 略升为 3.89%，而大陆则从 4.49% 猛升至 9.85%。上述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台湾 90 年代以来外销增长显著放慢。与此同时，台湾内部经济环境亦存在种种问题，一方面，劳工成本上升，土地价格高涨，劳工短缺，再加上环保和治安问题等，使台湾投资环境恶化，民间投资意愿不高；与之相关的另一方面，已经推动了 10 多年的产业升级，进程不够快，以致较高附加值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尚无法及时替代日趋衰退的低附加值产品。由此可见，90 年代以来，台湾经济难以实现高速增长是因受到了内外两方面不利因素的制约。

尽管如此，台湾经济持续五六年呈中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是台湾及时

将出口市场转移到香港及大陆地区。近年海峡两岸经贸关系迅速发展，1994年两岸经香港转口的贸易额已达98.09亿美元，1995年达120亿美元左右。而实际上，两岸贸易除了经香港转口外，还有许多货物经香港但采用转口以外的其他贸易方式，如转运、过境货物等，也有货物是直接通航，或经过香港以外的其他中介地。若将这些贸易活动计算在内，两岸贸易的实际数量远远超过香港的转口贸易统计数。据此，台湾一些学者作了“重估两岸贸易流量”的研究，其结果表明，1993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值占台湾外贸总值的比率已达10.26%，其中，台湾对大陆出口值占台湾出口总值的比率从1986年的1.9%上升至1993年的16.1%。1994年台湾对大陆出口值占台湾出口总值的比率为16.60%；1995年为16.45%。尽管这些数据未必十分精确，但足以表明大陆市场对台湾的重要性，表明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是近年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另一个维持台湾经济中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是90年代以来公共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外部需求及民间投资的不足。鉴于岛内公共投资长期不足造成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剧变，从1991年起台湾实施规模空前庞大的“建设6年计划”，大力推动各项重大公共建设工程。

90年代以前，台湾固定资产投资占总固定投资的比重基本在20%以下，90年代以来这一比重逐年上升，1995年达31.9%。公共投资持续扩大，带动了内部需求大幅扩张。

1986年至1990年台湾内部需求占岛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为86.4%，到1995年这一比率已提高至96.9%。显然，若没有固定投资的持续增加，台湾经济也难以维持中等增长速度。

总体说来，在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台湾经济尚能维持中速增长，表明其经济仍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经济发展渐趋成熟。

1. 服务业成为经济主干，制造业结构改善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在内部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服务业蓬勃发展，1986—1990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9%，1991—1995年平均增长率亦达8%左右。服务业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工业及农业，并高于经济增长率，其结果，服务业占岛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节节升高，1986年为47.3%，自1989年起超过50%，到1994年高达59.1%；而工业与农业所占的比率则分别由1986年的47.1%与5.6%下降至1994年的37.3%与3.6%，服务业明显成为台湾经济的主干。对于台湾产业结构变化如此迅速的现象应怎样看待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在总体经济中的地位相应提高有其一定的必然性。近年台湾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对总体经济的增长、就业的增加等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台湾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尚未达到成熟阶段，服务业过于膨胀未必是健康现象，综观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大都是在建立了较完整的和独立的工业体系后，在制造业已经较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资本才逐渐向服务业转移。台湾长期片面地发展加工装配业，并没有建立起较完整和独立的工业体系，产业结构之所以“过早、过快”调整有其较特殊的背景：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逐渐失去竞争性，企业便纷纷转移到海外投资发展，岛内制造业因此出现萎缩趋势。另一方面，台湾银行、证券、保险及大众传播媒体等行业长期受到严格管制，自80年代中期后陆续大幅开放，

形成竞相投资的局面，促使服务业快速膨胀。由此看来，台湾产业结构的变化并不是一种正常而自然的调整。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过于萎缩将使“产业空洞化”的担心演变成现实，进而使台湾经济发展失去稳固的基础，而服务业发展过快难免加重“泡沫经济”的成分，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

1995年以来，由于金融业及房地产业的衰退，经济增长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便是很好的证明。

在整个产业结构调整变化过程中，台湾制造业结构的调整改善较引人注目。一方面，制造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率由1987年的38.9%大幅降至1995年的29.0%；另一方面，在制造业内部结构中，资本及技术密集型工业所占比率由1987年的50.1%迅速上升至1995年的73.8%（其中资本密集型工业占42.5%、技术密集型工业占31.3%），而劳动密集型工业所占比率则相应的从49.9%大幅降至26.2%。台湾制造业内部结构如此剧烈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是，随着大量劳动密集工业的外移，台湾岛内劳动密集工业日趋衰败，外销不振，生产停滞，1993年生产指数年增长率为-4.5%，1995年也仅达1.3%。而资本及技术密集型工业则因产品附加价值较高，仍具外销竞争力，生产发展较快，1993年生产指数年增长率为7.0%，1995年更达9.9%。由此看来，台湾制造业结构的调整改善，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的因素，更有加强发展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因素，其产业结构的升级还是有所进展的。不过，这里有两点应该指出：其一，台湾有关产业划分的标准未必科学。台湾所指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包括基金金属及其制品、化学材料、纸浆、石油炼制、化学、塑胶及橡胶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中原料工业；技术密集型工业包括机械、电子电机器材、运输工具及精密器械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则指除上述以外的工业。这种以行业来划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不够科学的。因为在同一行业，既可能生产技术密集产品或资本密集产品，也可能生产劳动密集产品。其二，生产技术中自创技术比例的高低是个重要问题。产品技术层次的提高可以靠自身研究开发，亦可靠引进技术，若是前者比例高，则产业升级的基础牢固、自主性强，是较高层次的产业升级；而若是后者的比例高，则产业升级的基础脆弱、依赖性大，是较低层次的产业升级。从台湾对日贸易逆差连年扩大的趋势来看，台湾所需技术仍然主要依赖于日本。而实际上台湾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少、基础科技研究薄弱也基本上是公认的事实。

2. 对外贸易发展放慢，外贸市场重心转向亚洲

对外贸易是台湾经济的命脉，其发展状况如何对总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90年以来，台湾外贸发展的主要特点如下：

（1）对外贸易发展速度减缓

如前述及，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剧烈，台湾内部经济环境亦存在种种问题，这使得台湾外贸特别是出口贸易年增长率由1991年的13.3%持续下滑到1993年的4.2%，1995年才回升至9.4%。1995年由于国际经济景气复苏加快，加上日元大幅升值，大批外销订单流到台湾，台湾出口增长加快。进口贸易方面，由于近年公共投资扩大刺激进口需求，再加上推行经济自由化“国际化”政策，岛内市场逐步对外开放，其增长速度相对快于出口，1991—1994年（除1993年外）基本维持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出口与进口这种相互消长的变化，使台湾外贸顺差逐步缩减，由1991年的133.18

亿美元降到 1994 年的 77.0 亿美元，1995 年进一步缩减。

台湾外贸的上述变化，对台湾总体经济影响重大。其一，由于出口增长明显放慢，岛内民间投资意愿备受影响，这是近年台湾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二，外贸顺差缩减、国际收支转趋平衡，使新台币汇率由升而稳，并略为贬值，1991 年新台币对美元汇价为 25.75:1，其后略有升贬，于 1995 年 12 月维持在 27:1 左右。

（2）亚洲市场成为台湾外贸重心

90 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经济景气持续低速及经济区域化的迅猛发展，台湾对传统的主要贸易国家的出口发展困难重重。与此同时，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却景气旺盛，特别是中国大陆经济蓬勃发展，进口需求扩张。随着台湾对大陆及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持续大幅增长，由此所衍生的机器设备、零部件及原料的出口迅速增加，因此，台湾与亚洲地区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亚洲市场已成为台湾外贸的重心。台湾对亚洲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由 1986 年的 25.9% 迅速上升至 1994 年的 49.4%，其中对香港的出口，由于两岸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缘故，增长速度最快，所占比重从 7.3% 上升到 23.0%，1995 年升至 24.1%，香港一举取代美国而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在进口方面，亚洲市场的比重变化不大，1994 年，台湾自亚洲进口占其总进口的比重为 48.0%。由此可见，台湾不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基本上有一半市场已在亚洲地区。

（3）外贸商品结构改善

随着近年台湾产业结构主要是制造业结构的调整改善，台湾外贸商品结构相应发生了较大变化。1993 年，在出口贸易总额中，重化工业产品出口额比重首次达到 62.02%，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趋势则为，农工原料仍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但其所占比重已从 1986 年的 75.5% 降至 1995 年的 70.6%；消费品进口比重则由 1986 年的 9.4% 上升至 1995 年的 13.4%；而资本设备进口比重仍基本维持在 16% 左右，由此变动趋势大致可以看出，台湾岛内生产农工原料的能力已有所提高，但资本设备的自制力却无明显进步，至于消费品进口比重增加的趋势，基本上可以反映所得增加及生活品提高的趋势。

3. 财政连年巨额赤字

台湾财政一向采取“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预算政策，财政收支经常维持盈余状态；但从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起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1991 年度台湾财政赤字达新台币 3667 亿元，而 1992 年至 1994 年度财政赤字高达新台币 4000 亿元以上，各年度赤字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25.88%、25.85%、23.82%、21.47%。换言之，近年来，台湾每年财政支出大约 1/4 的财源是依靠举债而来，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原因，是迫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需要，台湾当局放弃传统的平衡预算政策，采用扩张性赤字预算政策，以大幅增加公共支出。一方面，由于公共支出增长长期落后于所得增长，造成公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居住环境和治安情况恶化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成为阻碍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瓶颈；另一方面，90 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出现发展力减弱、增长速度放慢的趋势。因此，台湾当局期望以扩增财政支出逐步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同时，通过赤字预算外的扩张性效果，加速公共投资，带动内部需求，从而刺激经济持续增长。除了支出方面的原因，税收收入等增长缓慢，无法相应满足公共支出增长的需要，亦是近年台湾财

政连年巨额赤字的重要原因。由于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税制改革困难及非经济因素等种种原因，90年以来台湾税收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占其财政收入的比重节节降低，由以往基本60%以上逐年降到1993年度的51.9%，1995年度才回升至55.2%。

赤字庞大、财政困难无疑是当前台湾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客观地分析台湾财政收支的这一巨大变化还是很有必要的。其一，台湾近年扩增财政支出、加速公共投资，有其一定必要性。如上分析指出，台湾经济发展至90年代，面临转型时期，种种问题都迫使台湾当局改变以往较为保守的预算政策，而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事实上，9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尚能维持6%左右的中速增长，经济结构也有所调整改善，说明台湾当局预算政策转折性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调节作用。但是，迄今为止，台湾赤字已达相当大的规模，而且逐年扩大的赤字累积已使台湾财政的债务负担日益不堪承受。其二，台湾财政赤字主要是资本账赤字造成的，目前财政基础仍较稳定。分析近年台湾财政收支状况可以看出，其经济性收入足以应付经常性支出，且有很大结余，1995年度经常账目结余数达新台币2786亿元。这表明台湾财政基础还较为稳定，其财政赤字主要是用于资本支出，即其用途是生产性的。这种支出对经济建设有直接效益，其中部分支出也是有偿性的，因此从长远看有利于经济发展。其三，短期内台湾财政难以扭转赤字趋势。财政赤字日益庞大问题目前已经引起台湾当局的重视，并开始采取控制公共支出措施。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种种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台湾社会福利支出等出现的增长趋势，台湾财政赤字状态将因此难以改变。

4. 宏观经济政策“计划性”加强，但成效不尽人意

进入9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生活中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当局有关的“计划”、“方案”等接二连三出台，宏观经济政策的“计划性”一时明显强化。先是1991年1月开始实施的规模空前庞大的台湾“建设6年计划”；接着1993年7月出台“振兴经济方案”；1995年1月又正式推出“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尽管各种规划的目标、内容等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都是针对台湾所处的内外环境，力图解决台湾经济现存的问题，为台湾经济的转型升级寻找道路。应该承认，这些规划的制定与实行对台湾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台湾“建设5年计划”扩展公共工程建设，加速公共投资，有利于增加岛内需求和刺激经济增长。“振兴经济方案”的实施对提高民间投资意愿也有一定成效。但从“计划”这一角度来看，这些规模都是不成功的。台湾“建设6年计划”初期规划时，总经费需求新台币8.2兆元，计划项目775项；1993年“期中检讨”时，则将总经费压缩为5.4兆元，项目削减为548项；到1994年7月，则进一步减缩为“12项建设项目”经费降至2.9兆元。原来为期3年的“振兴经济方案”，在实行1年多之后也销声匿迹了。至于正式推出的“亚太营运中心”计划，海内外舆论亦是疑问重重，无不担忧其重蹈台湾“建设6年计划”草草收场的覆辙。何以会如此呢？从经济的角度去考察，最主要的原因大致有两方面：

其一，计划规模庞大，不切合实际。台湾“建设6年计划”是“大而无当、不自量力”的典型，这几乎是海内外所公认的了。除了规模巨大、内容庞杂外，其政策形成过程、计划内容、可行性及财务规划等也早就备受抨击。因此，该计划以压缩、虎头蛇尾为结局并不出人意料。现行的“亚太营运中

心”计划，号称为“跨世纪大工程”，其政策的形成不算草率，也没有编制庞大经费预算，因而不易出现资源误用等弊端。但其目标之大、内容之多却是可以与“建设6年计划”相提并论的。它计划从1995年至2005年使台湾成为亚太地区各种区域性活动，包括制造、海运、空运、金融、通信、传播活动的中心点，计划内容囊括了台湾地区大多数进行中或规划中的建设项目。然而就客观条件而言，台湾成立亚太营运中心的条件远不如新加坡与香港（如新加坡行政效率高、香港自由化程度高、两地公共建设与通讯服务条件均较好），而在发展潜力上也不及大陆的上海。比较而言，台湾仅在制造业方面有相对的优势，但目前岛内投资经营环境又问题堆积。至于在金融中心或其他服务中心方面，由于交通、通信、法规制度、行政效率、资金及人员的管制、税赋等问题，台湾的条件更远不成熟。因此，人们对“亚太营运中心”计划持怀疑态度是有其道理的。

其二，行政管理效率低落。计划的实施能否成功，行政部门的管理能力及效率是举足轻重的。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台湾，近年来行政管理效率出现每况愈下的趋势，这是各类“计划”、“方案”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建设6年计划”实施后，因行政作业延误、建设用地供给困难、工程及采购管理问题等，各项建设实施进度一直严重落后，据统计，到1993年6月，在已核定的554项计划中，进度落后者有152项，其中落后幅度达10%以上者38项。“振兴经济方案”出台后，在土地供给、技术开发、资金融通、公营事业民营化等方面，执行绩效也均未达到预期目标。显然，行政管理效率问题亦是“亚太营运中心”计划推行的重大挑战。从目前情况来看，前景很难乐观。仅以增修法规的效率为例，台湾当局在推出这项计划的时候，即提出配合计划实施，需要修订及新颁布的法律约40项、行政命令则多达134项。预定1995年底以前完成29项立法工作，1996年年中完成全部立法工作。但至1995年10月止，已送“立法院”审议的法案仅19项，其余的都尚待有关行政部门草拟。至于已达至“立法院”的法案，何时能完成立法程序，亦是很大的未知数。

展望90年代下半期，台湾经济发展的趋势将取决于岛内经营环境、国际经济环境及海峡两岸关系三大因素的综合作用。

内部经营环境，从支持经济增长的供给面看，劳动力、土地与投资等系影响生产的主要因素。近年来，劳动力不足已成为台湾各业尤其制造业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短期内难以改变。土地方面，由于土地管理政策不当，加上投机者炒作，多年来工商业土地供应不足、地价高涨问题一直困扰着投资者。凡此种种，都说明台湾当前的投资环境已大不如前，对制造业的发展尤其不利。再从需求方面来看，由于连年财政赤字庞大，“政府”消费支出增长困难，1993—1994年“政府”消费年增长率大约在2—3%的水平，1995年只有1.9%甚至更低。公共建设投资将会继续进行，但投资预算势将减少。至于公营事业的投资，在民营化既定政策之下，也不会有多大增加。民间方面，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民间消费的增长已随之放慢了。1995年以来因股票价格与房地产价格持续大幅下滑，民众的资产价值大幅缩减，消费支出势必更为减少。由此可见，今后几年台湾内部经济环境对总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利因素多于有利因素。此外，近年来非经济因素干扰台湾经济发展的趋向亦日益突出。

展望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趋势，近期对台湾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有所增

加，联合国《1995年世界经济与社会调查》指出，199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达2.75%，1996年可望提高到3.25%。而台湾外贸出超已逐年减少，近来资金外流加速，国际收支顺差因此明显下降，甚至可能出现逆差。这种状况将使新台币汇率继续维持稳中趋贬之势。如果国际美元再回升的话，新台币贬值压力就更大。所有这些，将有利于今后台湾出口的增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岛内需求的下降，支持经济增长。但在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的加快发展，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趋势，仍是台湾拓展外贸的严峻挑战。

近年来海峡两岸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并成为支撑台湾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今后这一因素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种种政治因素可能造成两岸经贸关系的暂时挫折，但就总趋势而言，基于经济利益的驱使与和平统一的认知，两岸加强经贸合作与交流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两次经济奇迹的对比分析

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出现了两次经济奇迹，这就是中国的大陆和台湾经济高速增长，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据公布的统计数字，台湾GDP年增长率在70年代为8.1%，80年代为6.7%；大陆在前26年（1953—1978年）GDP为6.1%，改革开放以来16年（1979—1994年）约为9.0%。中国的大陆和台湾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创造如此辉煌的经济奇迹的呢？

中国台湾经济增长概况 (1970 ~ 1989 年)

年 度	GDP 增长率 (%)	人均 GDP (美元)	消费者物价上涨率 (%)
1970	11.3	387	3.6
1971	12.9	441	2.8
1972	13.3	519	3.0
1973	12.8	690	8.2
1974	1.1	913	47.5
1975	4.3	956	5.2
1976	13.5	1122	2.5
1977	10.1	1288	7.0
1978	13.9	1559	5.8
1979	8.5	1895	9.8
1980	7.1	2312	19.0
1981	5.7	2632	16.3
1982	3.3	2597	3.0
1983	7.9	3744	1.4
1984	10.5	3046	0
1985	5.1	3144	- 0.2
1986	11.6	3784	0.7
1987	12.3	5275	0.5
1988	7.3	6133	1.3
1989	7.4	7109	4.4

中国大陆经济增长概况（1979—1994年）

年 度	GDP 增长率 (%)	人均 GDP (人民币元)	消费价格上涨率 (%)
1979	7.6	416	1.9
1980	7.9	456	7.5
1981	4.5	477	2.5
1982	8.7	509	2.0
1983	10.4	564	2.0
1984	14.7	669	2.7
1985	12.8	816	11.9
1986	8.1	909	7.0
1987	10.9	1051	8.3
1988	11.8	1274	20.7
1989	4.4	1415	16.3
1990	4.1	1552	3.1
1991	8.2	1744	3.4
1992	13.4	2084	6.4
1993	13.2	2634	14.7
1994	11.8	3650	24.1

1. 大陆与台湾经济高速成长的异同

中国的大陆与台湾经济高速成长的状况表明，虽然都是高速增长，但大陆和台湾的环境和条件是大不相同的。例如：

——两地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大不相同：

——大陆幅员辽阔，约 960 万平方公里，东部、中部与西部三个经济带差别极大。《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考察》（熊映梧主编，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三大地带的划分从总体上反映了我国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差异这一客观现实。东、中、西部面积之比约为 1:2:4，工农业总产值之比正好相反约为 4:2:1；按人均国民收入计算则为 3.55:2.15:1。从生产力发展条件和要素分析，就固定资产、基础设施、技术、经营管理以及信息等资源看，大体是东高西低，由东而西依次递减。就矿藏、水力、土地等自然资源看，大体上是西丰东贫，由东而西依次递增。呈现两个反向梯度，形成三大阶梯。

台湾的土地面积只有 3.6 万平方公里，为大陆的 1/266，不难想象，两地在大小悬殊的空间内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其难度自然是大不相同的。

但是，同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两地经济高速增长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1）两地都迫切需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才能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两地都是从 1953 年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大陆从 1953 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至 1995 年将完成第八个五年计划；台湾从 1953 年开始推行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如今已是实行第十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发展的宏伟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到 21 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台湾业已是一个工业化的地区，下

一步目标是经济自由化国际化。

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产值密度 (万元/平方公里)		人均工农业产值 (元/人)	
	1991年	1995年	1991年	1995年
东部地带	32.27	53.54	1019.32	1610.93
中部地带	7.89	12.31	632.73	948.02
西部地带	1.98	3.21	460.80	724.20
全国平均	7.80	12.67	751.84	1164.00

(2) 双方都抓住了有利时机，先后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大陆在前30年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再加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类运动的破坏作用，使国民经济的运行极不正常，付出代价很大，得到效益很小。1979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断然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虽然我们丧失了前一次发展的良机，亡羊补牢，终于抓住了这一次机遇，从而走上高速成长的道路；台湾则较早地抓住了国际上快速发展的良机，这与他们较早地吸取了历史教训有关。

(3) 两地均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改革，为经济高速成长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可以说，大陆和台湾原先均属统制经济的模式，后来由不同的方式走向市场化。例如，两地均对国有企业（公营事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造，使它们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得以生存发展。

(4) 双方都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引进外资，拓展对外贸易。这是经济高速成长的一条重要经验。

大陆在46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半封闭（1949—1959年）、全封闭（1960—1978年）和开放（1979年至今）三个时期，明显地表现出开放度与经济成长速度之间的正相关规律性。

台湾更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如今，两岸经贸关系蓬勃发展，可谓相得益彰。今后，台湾更加需要大陆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大陆也需要台湾的技术和资本，两岸若能进一步形成密切合作的共同市场，将为双方长期、稳定的经济成长奠定基础。

2. 大陆和台湾经济高速成长期的特点

(1) 双方都是在总结了失败的历史教训和基础上进入高速成长期的。以大陆而言，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沉痛的教训才大彻大悟。痛下决心改变路线，坚决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中兴之路。似乎台湾和大陆都有“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这是经济高速成长的精神动力。

(2) 台湾是在稳定中经济高速成长。高希钧、李诚主编的《台湾经验四十年》对此有详尽、深刻的分析。1970—1989年有20年间，除去1974年和1975年两年受世界危机影响，台湾经济增长率为1.1、4.3，1981和1982年为5.7、3，3之外，其余16年增长率均在7%—14%之间，经济运行的轨迹是比较平稳的。再从人均GDP的稳定增长（1970年为387美元，1989年达到7109美元），物价上涨幅度不大（1974年是例外，可能受世界石油危机的猛

烈冲击，物价上涨 47.5%，1980 年上涨 19%、1981 年上涨 16.3% 也有特殊原因），零或负增长有两年，0.5%~3.0% 有 8 年，3%~6% 有 4 年，7%~10% 有 8 年。应当指出，在国民所得大幅度增长的条件下，物价平均上涨率 3~5%，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大陆在 1979~1994 年期间，GDP 成长率多数年份在 7~15% 区间波动，有两次因宏观政策紧缩而跌落，如 1981 年为 4.5%，1989 年为 4.4%，1990 年为 4.1%。再从人均 GDP 看，大陆国民所得不仅在绝对量上远比台湾低（1989 年人均 GDP，台湾是 7109 美元，大陆 1415 元人民币），而且增幅也小（大陆人均 GDP 1994 年比 1979 年增长近 8 倍，台湾 1989 年比 1970 年增加 17.4 倍）。因此，大陆居民对于两倍数的物价上涨率就难以承受了。

《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考察》一书曾对大陆 40 多年经济运行的轨迹作过全面的分析，指出：新中国在经济上创造了少有的高速度，但是经济运行的轨迹显示出很大的跳跃性、波动性。

我国营业总产值指数，若以 1952 年为 100，则 1949 年为 56.3，1988 年为 2261.8，即 40 年内增长 39.2 倍。其中，工业总产值指数 1949 年为 40.0，1988 年达到 5525.4，增长 134.4 倍；重工业更快，1949 年为 30.3，1988 年为 80035.8，增长 265.3 倍。可是，中国经济运行的轨迹很不正常。如果考察一下 1953~1988 年期间中国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可以看到这样一组耐人深恩的数字：

36 年中，社会总产值增长率有 3 年是超高速（>20%），17 年是高速（>10%），7 年是中速（>5%），5 年是低速（<5%），4 年是负增长，如果革考察同期工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那末，波动性就更大了。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在 30% 以上的有 5 年，在 20% 以上的也有 5 年，在 10% 以上的有 12 年，在 5% 以上的有 7 年，在 5% 以下的有 3 年，有 4 年是负增长。1958 年增长率高达 54.8，1961 年是—36.5，彼峰与谷底相差 90.4 个百分点。如果说，台湾经济的波动主要是受石油危机一类的国际影响所致，那末，大陆经济波动的基因是宏观决策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因此，周期性陷入了“高投入、高速度、低效益、高通胀——紧缩、低速、滞胀”的怪圈。显而易见，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经济高速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时期仍然有着不小的影响。

（3）台湾在高速成长期内，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均有很大增长。其 GDP 由 1953 年的 14 亿多美元增加到 1992 年的 2200 亿美元，人均 GDP 由 1953 年的 167 美元增加到 1992 年的 10200 美元，增加 60 倍，进入世界发达地区的行列；而大陆经过 16 年的高速增长，虽然国民经济总量有巨大增加，而人均量仍处于低水平。《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考察》对中国社会生产现状的总体评价，概括了 4 个特点：<1>“三元结构”生产力的特殊格局，<2>国民经济的总量大、人均量小，<3>局部先进，整体功能差，<4>在封闭系统内看，经济发展迅速，但同急剧变化的外部世界相比，中国还是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得多。1994 年大陆 GDP 为 43800 亿元，折合 5277 亿美元（根据《经济日报》1995 年 6 月 28 日公布的外汇牌价，1 美元换 8.30 元人民币），已进入世界前十名；但人均 GDP 仅 2634 元，折合 317 美元，仍属于世界低收入国家。

（4）台湾经济高速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小，如环境恶化、金权政治等等；而大陆是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浩劫之后进入高速成长期的，由于道德规范、法律秩序和信仰等方面受到严重破坏，有些人便借体制转轨之机，

为非作歹，腐败、欺诈盛行，新的三大差别（地区差别、城乡差别、行业差别）突出，犯罪率上升，伏下不可忽视的社会危机。总之，大陆为改革开放、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太大。

台湾出口导向型经济透视

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绝大部分国家都面临国际收支逆差的压力，为兼顾国际收支逆差的制约及高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成为两种典型的发展策略。自 60 年代以来，台湾出口成长率远高于经济成长率，被认为是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个例子。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科技的应用及进展，国际经济展现空前的变化，随着地球村的形成，科技发展及贸易扩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尤其是战后初年，除美国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面临国际收支逆差的压力，在此逆差压力下追求经济成长是很严肃的课题，为兼顾国际收支逆差的制约及高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是两种典型的发展策略。

原西德及日本是两个典型的经济奇迹的创造者。战后的原西德处于废墟状态，采用贬值及低估市值的策略，以扩张出口带动高经济增长；日本则采用进口替代策略，先巩固国内市场，继而伺机将进口替代产品转变为出口品，也产生了高经济增长的效果。原西德及日本成功的例证并不能普遍应用于其他国家。意大利采用类似原西德的发展策略，结果带来长年的通货膨胀威胁；拉丁美洲很多国家运用进口替代策略，其经济发展一直未能令人满意。战后台湾经济也陷入困境，以美元计算的人均所得在 1960 年为 154 美元，较 1952 年的 196 美元少 22%。据估计，1960 年实际人均总生产尚较 1936 年少 32%。故台湾的经济发展只能溯及 1960 年，且因为出口成长率还高于经济成长率，产生相当高的出口依赖现象，被认为是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个例子。

1. 出口导向发展策略的基本条件

经济发展始终是不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从而发展策略须随客观环境的变迁而有所调整。不过，在市场经济下，有三个基本条件是不能或缺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策略也不例外。

第一，需求市场在存在。供给与需求孰先孰后是经济学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就像鸡生蛋或蛋生鸡一样难有定论，然而就外向型经济发展言，需求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条件，因为如果没有需求，或市场被管制，卖方总是无能为力。战后原西德采用贬值的促进出口政策获致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国际贸易正在扩大中，原西德有机会在国外市场找到膨胀中的需求，从而出口导向型发展策略才能奏效。

第二，供给能力。面对扩大中的市场，须拥有可满足市场需求之商品，才能参与争夺市场的竞争，乃至占有较大市场占有率。意大利因为产业结构较僵化，市场竞争力较低，从而难与西德采用类似策略，其经济及贸易成长始终逊于西德。拉丁美洲及多数开发中国家大部分出口是系与土地有关联的初级产品，供给能力受到土地数量的制约，故出口也不易成长。因此，商品供给能力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

第三，基本设施的配合。基本设施包括多项要素，与经济发展最有关系

的是：交通、运输、仓储、通讯及教育。因为商品须自供给地运至需求地，运输费用及运输时间都是重要的竞争因素，涉及贸易因同一种产品常有很多竞争者，与运输有关的基本设施当然是很重要的决胜因素。而贸易在动态成长中必然是贸易商品结构的改变，也可简化为由劳务密集产品朝技术密集产品演进，为顺应这种动态进展而调整，教育便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2. 台湾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阶段

根据法国经济史学者 Paul Bairoch 的估计，第三世界的人均所得在 1950 年为 203 美元，1960 年为 250 美元，故台湾在 1952 年人均所得 196 美元及 1960 年的 154 美元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平均水准。可以说直到 1960 年为止，台湾仍是贫穷落后的经济体。

尤其是，当时美国因其国际收支由顺差转变成逆差，已决定在数年内停止已执行多年之久的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台湾须寻求自力更生之路。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在 50 年代台湾经济安定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在当时台湾依赖砂糖出口，而国际糖价又常有巨幅升降波动，从而藉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偏低，且又变动无常。自 1950 年至 1960 年累计出口金额约 14.59 亿美元，平均每年出口金额约 1.33 亿美元，其中砂糖出口平均占 56%，米又占 13%，出口困窘情况可想而知。而同一期间，台湾的累积进口金额约 22.67 亿美元，平均每年进口金额 2.06 亿美元，年贸易入超金额约 0.73 亿美元。同期美援累积进口金额 8.68 亿美元，平均每年约 0.79 亿美元，补充贸易入超金额后，尚有少许馀裕可供台湾累积一点赖以生存的外汇。

美援对当时台湾经济安定的助益不限于弥补进口所需的外汇。一方面美援物资中的机器设备、各种食品、农工原料，乃至西药，弥补了台湾主要物资的供需缺口，平抑经常存在且蠢蠢欲动的物价；另一方面又藉出售美援物资所获新台币相对基金的安排，除了控制货币供给额的膨胀之外，对指挥资源运用的方向有相当大的支配力。对 60 年代加工出口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启发作用。因而一旦美援宣告停止，台湾所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例如，在美国正式宣布即将停止对台经援后，著名经济学家王作荣便这样表示：“美援停止对我们的经济影响便很明显：由于每年减少几千万美元的进口物资与劳务，于是在公私投资上的物资与劳务少了，因而经济增长率小了；或者是用在消费上的物资与劳务少了，因而生活水准降低或上升速度减缓了；或两者兼而有之。……应付美援减少的方法，不外：争取美援以外的国外公私资金。减少公私投资，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因为阻碍了经济发展，更加重以后的困难。降低消费水准或减缓消费水准上升的速度，这是我们所寄望的一点，现在来看有无能力做到。……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有无办法使人民在 1963 年的生活水准降低 2.2% 和有无办法使自己节省的 12 亿台币变成 3000 万美元，这就要看财经方面的措施。实情是降低人民生活水准会使当时生活困窘的台湾居民更为困苦，而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下，台湾也无力争取国际金融组织的资金援助，吸引外国民间资金几乎是处绝地被迫所做的唯一选择。而当时台湾居民购买力低，外国资本来台的目的是加工出口，在民族精神上是一时的屈辱，但外来资本不只弥补了美援停止后台湾的资金缺口，而且大幅提高台湾赚取外汇的能力，为台湾经济发展开创新的生机，就这种意义来说，台湾经济是绝处逢生的。

吸引外国民间资金并不容易，因为资本家所追求的是利润，除非给予安

全且高利润的机会，外国资本绝不会自动投怀送抱。在 50 年代，台湾曾经千方百计奖励华侨及外人来台投资，但成效极微。60 年代起，除了美国拥有对外投资实力外，战后重建成功的西欧及日本也都有能力对外投资，产生了跨国公司时代。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国家纷纷出现环保、劳工、社会改造等社会问题，且有相对工资偏高的压力，而在运输技术进步之下，生产者能在国外选择有利的加工基地，再把产品回销本国或第三国，除了避开国内环保压力外，也具有降低工资成本的利益。台湾吸引的外资以美国及日本居多，在美国方面，是因为在美国经援台湾期间，正如其他受援国一样，增进美国人对当地产业及金融实务的知识，更熟悉当地的地理、语言、法律、习惯及市场，更重要的是与政府的当权者及社会精英建立密切的关系，这些都是有助于资本家继续累积国外投资的无价资产，在日本方面，除了本世纪前半期台湾曾是日本的殖民地外，一位日本经济学家曾经特别指出：当时台湾拥有低廉而优秀的劳工，人民没有排外心理，地理位置接近日本有低运输成本的利益，从而部分日本的加工出口产业将其生产基地转移到台湾。尤其是为配合吸引外资政策，1965 年台湾的高雄有东亚第一个加工出口的设置，外商以其资本雄厚及国际市场资讯的优势，对台湾的投资趋于活跃。在台湾本身人均所得仍然偏低的制约下，初期来台外资大部分都是加工出口业，台湾加工出口型经济发展借以发展。

如果勉强地区分为几个阶段，1980 年台湾人均所得超过 2000 美元是一个分水岭。在 1965 年，台湾商品出口占岛内生产总额的比例是 16%，1980 年为 48%，1994 年回降至 38%。换句话说，自 1965 年以来，台湾都被称为加工出口型经济，以 1980 年作为分界线，前后两个阶段是不同性质的加工出口型经济。

自 1965 年至 1980 年，台湾的经济发展纯粹是出口导向的，且市场很明显地集中于美国。以具体数字来说，自 1965 年至 1980 年，台湾的平均每年实质经济成长率为 9.8%，但以美元计算的平均每年出口成长率则为 26.9%。在此 16 年间，台湾对美国累积出口金额占总出口金额的 35%，大部分的出口品都是低工资商品。更重要的是这些低工资加工品，不论是成衣或电器制品，大部分原料或零组件都是由日本进口，虽说在此期间，每年自日本进口金额占总进口金额的比例约自 40% 降至 30%，累积平均对日进口依赖比例仍达 35%。因此，约自 1971 年起，除 1974 年及 1975 年因承受第一次石油危机油价暴涨影响而仍产生贸易入超外，台湾已步入贸易出超年代，且随着出口金额继续快速成长，1973 年新台币兑美元汇率自 40 元升值为 38 元，1978 年又自 38 元再升值为 36 元，贸易出超仍然存在。甚至，在 1980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再度冲击下，该年仍能维持少许出超，随后在 80 年代，对外贸易出超金额年年扩大，自 1965 年至 1980 年间，累计净贸易出超金额为 32.18 亿美元，这是目前台湾经济能保持稳定成长的很重要的资产，也是台湾经济能摆脱温饱威胁的阶段。美中不足的是，台湾加工出口所需原料及零组件大部分由日本供给，而日本市场向来较封闭，且台湾又欠缺可供对日出口的产品，因而在这 16 年间台湾年年对日本都有大量贸易入超，累积入超金额达 162.89 亿美元；而在同一期间，台湾对美国贸易很快就因加工出口发展的关系，贸易入超很快转变成贸易出超，16 年间的累积净贸易出超金额为 124.54 亿美元，但较对日累积贸易入超尚少 38.35 亿美元。换句话说，当时台湾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日本厂商的加工基地，在千辛万苦中累积成长的教训，吸

收国际资金，为另一阶段的发展预做准备。虽然其后的发展，代工基地本质未有重大突破，但在高科技继续支持下，总是开创了又一个新纪元。

80年代是这个新纪元的起点，且仍继续处在动态进展中。这个新纪元的特点是自1980年起，台湾厂商开始出现对外投资的活力，对外投资的继续增加带动了台湾机关机器设备、加工生产用零件及原料的出口成长，因而在纯粹加工出口经济之外，多出了对外投资诱生的加工出口发展，而且由于台商对外投资偏爱东亚，诱生的出口因而以出口至东亚居多，从而台湾的出口地区亦有明显的变化。这阶段得依1987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87年是台湾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该年不但放宽了外汇进出的管制、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而且多年来存在的外资净流入在该年划上了休止符。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该年外来投资金额为7.15亿美元，而台湾帮商对外投资金额为7.04亿美元，两者几乎相抵销。在此之前，台湾年年都有净外资流入；在该年之后，则年年都有巨额的净对外投资。

台湾厂商开始大量对外投资多少受到1980年第二次国际石油危机的影响，因为台湾的石油自给率只有1%，几乎全部石油都仰赖进口，国际油价暴涨对台湾经济定会产生许多影响。二次石油危机发生之际，台湾当时工资水准已相当高，部分劳力密集加工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能力已备受威胁，油价再度暴涨后，一般物价水准上涨带动了工资及土地涨价，使劳力密集加工出口业者难以生存，纷纷转到邻近工资相对较低的国家寻求企业的第二春天。政府虽在1982年把新台币由36元兑1美元贬值为40元兑1美元，并不能阻止厂商对外投资的活动。尤其是自此之后，台湾的环保、劳工、妇女等社会运动愈演愈烈，不但工资水准继续上升，随着劳动基准法、全民保健等措施的酝酿及实施，企业主的负担加重，再加上1987年至1989年间因巨额外汇累积而致新台币对美元猛烈升值至新台币26元兑1美元，生产厂商对外投资便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依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估计，自1980年至1994年间，累积的对外投资金额为258.14亿美元。其中1988年至1994年的累积金额为247.40亿美元，占96%。因此，就直接投资而言，虽然因为台湾市场仍不断膨胀而能年年吸引数亿美元的外资，在1980年至1987年，扣除对外投资后的净外资累积金额只有10.79亿美元，而1988年至1994年，扣除外人来台投资后，则出现累积净对外投资164.05亿美元的现象。

在1980年，台湾的出口依赖已经定型，唯有出口成长才能保持经济成长，从而台湾经济活动便与国际经济脉动发生关联。而在这一期间，世界经济至少有两次明显的衰退，一次是80年代初期的石油涨价后的衰退，另一次是90年代初年的后冷战期的经济衰退，外向型的台湾经济成长状态就较前一阶段差得多，自1980年以来年平均经济成长率只有7.58%，1987年仍是很重要的分水岭，自1980年至1987年8年的平均年经济成长率为8.1%；但自1988年至1994年7年的平均经济成长率则只有6.6%。除国际经济景气盛衰变化的影响外，对外投资扩大所产生的长期资本外流不无关系。

1987年也是另两项台湾经济发展动向变化的关键年份。一是自1965年以来几已年年上升的商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980年升至48%后仍保持上升趋势。在1986年及1987年都升到53%，为台湾有史以来最高的出口依赖比例。其后，台湾的出口依赖比例就急转直下，到1994年已降至38%。经济成长率由高转低，出口依赖比例亦由上升转为下降，这当然是出口部分出了问题，以具体数字来说，在1980年至1987年，台湾仍维持平均

每年 16% 的出口增长率，在 1988 年至 1994 年间降至 8%。这当然不能说与 1987 年之后台湾劳务密集产业加速外移无关。二是与劳力密集产业加速外移有关的对美国出口依赖的下降。因为台湾系在纯粹加工出口导向阶段对美国扩大出口而产生高经济成长，而对美国出口产品又以劳力密集产品居多，在劳力密集产业加速外移过程中，对美国出口能力自然大为减弱。具体地说，台湾在 1980 年对美国出口金额为 67.60 亿美元，1987 年扩大到 236.84 亿元，年增加率 19.5%，但自 1987 年至 1994 年间每年对美国出口都不超过 240 亿美元，可说对美国出口成长已呈停顿状态，从而对美国出口占台湾总出口的比例乃自 1987 年的 44.1%，降至 1994 年的 26.2%。对美国出口成长停顿，同时却能有每年 8% 的出口增加率，这当然不能不归功于对外投资厂商诱生的机器设备及加工用零组件出口的成长。可是，生产这些机器设备及组件的关键原材料仍然控制在日本手中。因此，自 1980 年至 1986 年，台湾对日贸易入超金额平均每年只有 30 亿美元，1987 年扩大为 48 亿美元后，年年对日贸易入超金额都大幅增加，至 1994 年对日贸易入超金额已达 144 亿美元。换句话说，台湾出口继续成长、出口地区转换、出口商品结构改变，但仍然是日本厂商的加工基地。

在这加工出口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台湾骄傲的是外汇存底的累积。在 1950 年前后，台湾的外汇存底几等于零，而 1971 年台湾对外贸易虽由长期入超转变为长期出超，且年年的国际收入虽时有顺差，但以逆差年份居多，直到 1981 年起才出现长期国际收支顺差现象，其后才由此累积了大量的外汇存底。如假设 1950 年年底台湾的外汇存底为零，依年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累计，1980 年年底为 53.24 亿美元，1987 年年底为 662.19 亿美元，1994 年年底再继续累积为 878.78 亿美元。可见台湾的外汇存底大部分都是在 80 年代以来所累积，而短期内累积巨额外汇存底，曾经引发了严重的金钱游戏问题，差一点引发不可收拾的金融风暴。

3. 台湾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台湾的经济发展向来被归类为出口导向型，且也被认为是成功的典范之一，然而，如上所述，即使一贯都是出口导向，但随着时间推移，其本质一直在变化中，且台湾的经济发展是否成功仍有待更长期的观察。倘若我们把现状视为成功的典范，其主要决定因素为下列五项：

第一，相对完善的基本设施。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确过着悲惨的生活，但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榨取台湾有限的农林资源，至少必须建设交通及电力，这些设施绝大部分在终战时并未受到严重的损害。终战时，只有 36000 平方公里的台湾，拥有 895 公里的国营铁路、3024 公里的私营铁路、154 公里的公营铁路、3024 公里的私营铁路、154 公里的林业专用铁路，公路长度 17408 公里；北有基隆港、南有高雄港，都拥有近代的港口设备；最高发电量 38 万千瓦。在西部平原，几乎任何一个村庄，都能在一天之内把产品运送到南北两个港口，故在跨国企业到台投资时，几乎只考虑劳动力供给较充裕的村落即可建设工厂，毋需担心交通及电力问题，农村里的农民开始时也有利用农闲兼工的机会。目前台湾几个大型城镇、诸如桃园、板桥、新庄、楠梓、中坜、三重等，在终战之际仍几乎是村落，而今人口数都已超过三、四十万人，便是基本设施普及的利益所赐。

第二，国际经济长期处于繁荣状态给台湾助一臂之益。出口导向型的发

展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特别大。国际经济景气繁荣时，国际市场在扩张中，出口导向厂商较易争得产品市场；在 60 年代，台湾开始走向加工出口型的发展政策时，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经济强权，且正处于美国经济史上的空前的繁荣又扩张的年代，据称自 1961 年 2 月至 1969 年 11 月的 108 个月，美国经济处于长期繁荣状态，国内市场扩张迅速。台湾在此时期，陆续自日本手中争得日商因高工资而不得不舍弃的出口商品市场，大举增加对美国出口。因出口带动经济成长，人均所得不断提高，而台人素有节俭美德，年年愈来愈多的民间储蓄，透过尚称有效率的金融机构，经由民间企业家的创业投资活力，终于创下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三，50 年代开发的部分进口替代产业扮演着无名英雄的角色。进口替代产业使国际收支陷入困境，为节省外汇支出，减轻外汇长期不足之苦的国家不得不采用的措施，由不同角度会产生不同的评价。蒋硕杰教授就认为 50 年代台湾的进口替代产业政策与南美诸国所推动的政策一样是失败的。不过，直到目前为止，进口替代政策仍有其一定的功效。正如战前日本的纺织业及其战后的汽车工业一样，国内市场规模不大的国家，在国际收支捉襟见肘之际，总是须选择一些有前途的产业，在进口替代政策掩护下进行投资，虽须负担一些经济代价，至少能克服当时的国际收支困窘状况，有朝一日可能成为主力出口品。台湾加工出口经济出现至今，纺织品出口一直具举足轻重角色，而台湾的纺织工业则是在 50 年代借美援棉花支持而发展的典型进口替代产业，故问题不在于进口替代产业政策对或不对，而在国际收支压力下，是否选对了该保证的进口替代产业。

第四，外人来台投资带动了台湾民间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台湾居民原无企业家，日人在台期间所投资的公私日人企业，在战后都被台湾政府没收而成为公营事业。公营事业有很多缺点，欠缺开创性是其一。然而，二次大战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不断推陈出新的新时代，保守的公营事业很快就会落伍，并使整个经济体相对落后于世界潮流，台湾当然不例外。幸亏，自跨国公司来台之后，不但引进生产、管理、行销等技术，而且也使一些与跨国公司人员并肩工作或相互竞争的实业者能够接收到较新的产业及市场资讯，这些有远见的民间企业家配合当时开始累增的民间储蓄，积极继续开发新产品，使台湾的加工出口成长得以维持而不坠。

第五，产业结构不断地调整。二次大战后，开发中国家发展加工出口产业的主要利基是相对低廉的工资，但工资一定会随经济成长而上升，从而加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便不能死守定型的产业结构，而应视国外市场变化而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才能继续借出口成长推动经济成长。在 1990 年之前，台湾的产业结构大体上能保持良性的调整，从而出口成长、经济成长、物价安定，乃至外于外汇存底的累积尚能令人满意。但是，在民间厂商对外投资激增之后，台湾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步伐已趋缓，出口成长大幅减退是很重要的信号。虽然如此，由更长期来思考，目前台湾的低出口成长是否为再出发前的预备期，仍有待时间的考验。

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与大陆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实施不同的经济制度，自然有不同的经济发展轨迹。况且大陆是大型经济体，台湾是小型经济体，两者的基本经济发展条件大不相同。即使是台湾在艰辛的状况下，能够摆脱二次大战后那十几年艰苦的岁月，以出口导向策略带动经济成长造成了今日的经济格局，这并不表示如采用相同的策略，亦会有相同的成效，这是经济

发展理论的基本常识。虽然如此，与许多其他开发中地区一样，台湾在二次大战后都经历了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发展历程，却是少数可说尚能达成较好之经济表现的经济体之一，其中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是基本设施的建设，故倘若台湾经济成长果真对大陆未来的经济发展有所借鉴的话，就是大陆经济政策当以加强基本设施为首要之务。

十五 新加坡：2030 年赶超美利坚

曾经有过辉煌，现在依然辉煌，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多次访华，也无不沾沾自喜。新加坡也曾与克林顿叫板，表示了它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不斐。新加坡以法治国的方略，早已闻名于世。但是在今天，与迅速崛起的亚洲其它国家相比，它那整洁的街道，有序的管理是否还能为人称道呢？且看今日之新加坡。

新加坡在九十年代的发展战略

新加坡经济取得的成功是举世瞩目的。特别是近 10 年来，新加坡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据世界银行最近的统计表明，在从 1985 年至 1994 年的 10 年内，新加坡人均 GNP 的增长率为 6.9%，其增幅仅次于泰国和韩国，与我国并列为世界第三。另据新加坡总理在去年年底的《新年贺词》中称，新加坡 1995 年的人均 GDP 已达 2.4 万美元。目前，新加坡已成为世界重要的电子工业和化学工业的生产基地，成为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它的通讯、机场、港口和道路等基础设施相当完善，是一个综合竞争力很强的高效率新兴工业化国家。

新加坡自 1986 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 %

年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增长率	1.8	9.4	11.1	9.2	9.1	6.7	6.0	10.1	10.1

1. 90 年代新加坡发展战略简述

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东亚地区的国家有很大的启发，那么，新加坡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呢？如果说在 90 年代以前，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成功主要是采取了众所周知的引进外资和出口导向战略，那么其政府在 1990 年前后提出的以下发展战略对新加坡 90 年代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增长三角形”战略。80 年代，新加坡已面临工资成本上升的问题，其劳动力费用低廉的优势也已失去。为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新加坡急需将工厂迁往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地方。为此，新加坡于 1989 年提出了“增长三角形”的构想，即与马来西亚和印尼一起，共同开发柔佛（马来西亚）—新加坡—廖内群岛（印尼），将此建成一个综合统一的工业地带。

这一构想得到了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热烈响应，由于两国政府的支持与合作，“增长三角形”战略的实施较为顺利。如在廖内群岛开发中，新加坡和印尼双方先共同对巴淡岛进行投资。该岛位于新加坡以南约 20 公里处，开发的目标是将其建成一个工业小区。在这一轮合作时，新加坡主要负责工业小区的水、电、通讯、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并负责工人住宅和娱乐设施及小区商业中心的设计和建设。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该小区建设相当顺利，在合作协议签订后的第 14 个月（1992 年 4 月），第一家厂商就进入了小区。据统计，至去年 5 月份，在该小区开业的厂商已达 71 家，雇佣员工 3350 人。这 71 家厂商的总部多数在新加坡，但其生产线的一部分或全部则转移到了该工业小区。这一事实表明，巴淡工业小区已成功地达到了开发的目的。

上述战略的第二步是对宾坦岛的开发。宾坦岛位于新加坡东南约 60 公里

处，是廖内群岛最大的岛屿，其面积约是新加坡的两倍。对宾坦岛开发的指导思想是以轻工业为主，并充分发掘岛上的旅游资源。为此，计划在岛的西北部建立一个以纺织、家具、玩具和塑料等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小区，小区生产的产品由渡船通过新加坡销往世界各地。目前，该小区已对 100 公顷的土地进行了开发，除土地平整和厂房建造以外，还建设了员工宿舍和医疗诊所等设施。据悉，第一家厂家已于 1994 年 7 月在该小区投产。对宾坦岛开发的另一个重点是对岛内旅游资源的开发。计划在 26 年内，在岛的北部建成一个总面积达 23000 公顷的旅游观光胜地，以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从而也使这些游客在新加坡滞留的时间有所增加。1994 年 10 月，该项目开始动工，目前正着手进行水、电、码头、海上体育中心以及海味餐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美、日、法等国也计划在此投资一流饭店和高尔夫球场。从长远看来，此地有望成为东南亚旅游观光和综合性的度假区。

在该战略计划中，还有一个项目是开发回哩木群岛。该群岛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入口，周边海水深达 15~30 米，可停泊大型船只。根据这一优势，计划将该地建成船舶修造业和石油产业的基地。1996 年 3 月完工的第一期工程中，建成能建造和修理大型油船和集装箱运输船的工厂。一期工程完工之后，就可以开展船舶的运输和修造等业务。另据悉，向海外招商的计划也已在酝酿之中。开发加哩木群岛的另一个目的是将其作为新加坡石油产业的转移基地。由于该群岛距离新加坡只有 40 公里，且又有较好的港口等条件，所以是新加坡石油精炼及石油综合化工的理想转移地。石油基地的建设也于去年开始动工，最终计划形成石油精炼能力为日加工 12 万桶的生产规模。

(2) “区域经济化”战略。推进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是新加坡经济向外发展的第一阶段。在总结这一阶段经验的基础上，新加坡又提出了“区域经济化”的发展战略，其实质是进一步将新加坡的部分产业从东盟地区扩展到中国、越南、缅甸和印度等东亚和南亚的发展中国家。该战略最早是在 1992 年提出的，其背景是由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特别是香港对内地投资的增加，使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上升，也使新加坡认识到，如果将经济合作仅限于周边的东盟国家，在未来的竞争中将处于不利的地位。

“区域经济化”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

- 1>以对外投资的方式，积极参与对方的经济发展。以城市发展和工业小区建设的成功经验来推进在基础设施、饭店和商业中心等方面的对外投资。
- 2>投资拟采取政府和第三国大企业联手的方式进行，以加大投资的实力与规模。
- 3>通过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完善新加坡的产业结构。如在印度班加罗尔投资建设的信息工业技术区，就充分利用了当地软件开发的人才优势，以满足新加坡软件开发公司在这方面的需求。
- 4>政府积极充当投资企业的中介，以提高对方的信赖度。

在新加坡的“区域经济化”战略中，投资形式比较主要的是工业小区的开发。其主要投资项目如表 2 所示。在得到了新加坡经济开发局支持，预算总投资达 300 亿美元的苏州工业园区项目中，新加坡的 CSSD 公司和 SsTD 公司出资 65%（其余的 35% 由中国投资），计划在 15 年内建成一个占地面积为 70 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园区的基础设施于 1994 年开始动工，11 平方公里的第一期工程预计在 1997 年完成。目前，已有 62 家外资公司进入了该园区，引进的外资总额已超过了 202 亿美元。

无锡工业小区由中、新两国共同投资，其中新加坡出资 70%。

工业小区的面积为 1000 公顷，第一期工程 100 公顷土地的开发已于 1994 年 6 月动工。新加坡方面负责该项目的是 sTIC 公司，开发方法与巴淡岛和宾坦的开发相同，开发商主要负责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各厂商进入小区提供诸如注册申请、员工招聘、交通运输、员工宿舍、职业培训等一揽子服务。

新加坡在印度卡纳塔克邦投资的班加罗尔信息工业技术区也是一个较大的项目。在总投资额为 6.7 亿新元（新元与人民币的比价约为 1 : 5.8）中，新加坡占了 40%。2500 万新元的新一期工程于去年 5 月动工，预计到今年年底即可完成。该项目的建成，不但可以吸引一批电子产业及信息通信产业的厂家到小区落户，而且还可弥补新加坡软件开发业的不足，满足新加坡软件市场的需求。此外，新加坡还在东亚和南亚地区投资了一大批饭店、高尔夫球场、写字楼等等。

（3）“IT2000”战略，未来的竞争是高技术的竞争，谁能掌握高技术，谁就掌握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新加坡深深地了解这一点，政府早在 1981 年就成立了国家计算机局，专门负责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和计算机应用的推广。1991 年 8 月，新加坡制定了“IT2000”战略计划，其最终目的是以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进入政府、企业和家庭为标志，将新加坡建成一个“智能岛”式的、具有更高竞争力的、富裕的城市国家。

“IT2000”战略的目标包括：<1>以发达的通信设施将新加坡建成全球性的人才、物资、服务、资金和信息交流中心。<2>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来支持新加坡的综合竞争力，使其在制造、建筑、商业和旅游等领域创造出更高的生产效率。<3>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电化教育，给更多的国民创造学习和进修的机会。<4>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开发新的服务项目（如非现金购物、电子购物、电子预约订票、工作家庭化、智能大楼等等），以增加人们的闲暇时间休闲和娱乐的方式，在“IT2000”战略的实施方面，在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新加坡已在 1993 年 9 月完成了连接马来西亚、香港、台湾和日本等地的全长为 7500 公里的海底光缆，并在第二年开通了联结东南亚—中、近东—西欧的海底光缆系统（即 SEA—ME—WE2 系统）。花费 7.5 亿美元的 SEA—ME—WE2 系统全长约 18000 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光缆系统。通过该系统，新加坡就可经印度洋和地中海直接与法国的马赛进行联系。

在 1994 年 12 月至 1995 年 8 月间，新加坡还在其中央商务区建成一幢带主配线盘（MDF）的大楼，并打算以此为中心通过光缆连接 75% 的住宅区，计划到 2005 年能连接新加坡的所有家庭，为迎接多媒体时代的到来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为满足日益增多的信息量，国家计算机局还投资 300 万新元，支持开发新一代非同步传输模式（即 ATM 模式）的网络。

2. 新加坡发展战略的可借鉴之处

新加坡 90 年代以前的发展战略，已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90 年代提出的发展战略，虽还没有全部完成，然而，从部分已建成的项目来看，以下做法可供我国借鉴。

（1）发展战略必须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新加坡 90 年代新的发展战略能得到较为顺利的贯彻，是与新加坡政府的全力支持分不开的。在“增长三

角形”战略中，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由政府

新加坡在东亚和南亚地区的主要投资项目一览表

投资地点	项目名称	投资额	出资比例	备注
中国江苏	无锡工业小区	第一期工程 2亿新元	25%	1994年动工
中国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70KM ²)	300亿美元	65%	1994年动工
中国山东	工业小区(40万M ²)、蔬菜 水果加工、冷冻冷藏设备制造	4100万新元		
中国福建	福清市元洪工业小区	1500万美元		1996年5月建成
印度卡纳塔 克	班加罗尔信息工业技术区	6.7亿新元	40%	一期1997年完工
印尼廖内群 岛	马淡岛工业小区	6亿新元	30%	1992年部分开业
印尼廖内群 岛	宾坦岛工业小区	2.5亿新元	15%	1994年部分开业
中国昆明	饭店、写字楼、高尔夫球场		64%	1996年完工
中国上海	30层的写字楼	1000万美元	36%	1998年完工
马来西亚	柔佛省的工业小区、住宅等	20亿吉兰特	18%	2010年完工
印尼廖内群 岛	宾坦岛的饭店、高尔夫球场	3亿新元	51%	1996年完工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的公寓、高尔夫球场		25%	1997年完工
缅甸仰光	旅游饭店	0.5亿美元		1996年完工
中国江苏	苏州天然气生产项目	第一次投入 4000万美元		1996年4月起年生产 为6~7.5万吨
柬埔寨	可口可乐、啤酒生产项目	1200万新元	75%	1993年4月完工
越南	汽车生产项目	7000万美元	22%	1996年年初投产
越南河内	可口可乐、啤酒生产项目	1730万新元	70%	1995年6月完工
尼泊尔	可口可乐瓶罐生产项目	370万新元	49%	

间协议所确定的，开发商也是由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关联公司来担当的。在“区域经济化”战略中，政府也积极充当投资方和被投资方的中介。政府的中介作用，使得项目更易得到对方的信赖，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打好了基础。在“IT2000”战略中，国家计算机局是推进该战略的主体。计算机局通过招标等形式，组织各企业共同参与该战略计划的实施。

(2) 发展战略同国内产业结构的转移相结合。新加坡在90年代提出这些发展战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发展战略与国内产业结构转移是紧密相联的。“增长三角形”战略的提出，其背景就是国内劳动力费用上升，为降低成本，不得不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的邻近国家。“区域经济化”战略，并含有将部分制造业转移出去的内容。由于新加坡面积狭窄，产业结构要升级换代，就不得不将一般性的加工制造业转移到海外。通过“区域经济化”战略，在海外建立工业加工区，就是实现产业转移的重要一环。

“ IT2000 ” 战略就是为迎接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准备条件的。

（3）对投资额较大的项目则争取与世界一流公司合作，共同参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新加坡政府深知，新加坡的企业无论在技术还是财务上，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为增加投资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同时也为减少投资风险，新加坡在一些投资额比较大的项目，常采取与世界一流公司合作的方式。如与奔驰等公司合资在越南投资的汽车生产项目；与川崎重工、三井造船等公司合作在菲律宾投建的项目等等。

十六 香港：怎么那么香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出口地区；这里是东南亚地区的空运枢纽；这里是万商云集的繁华都市；这里是世界转口贸易的中心。弹丸之地的香港，以“东方明珠”之美誉而名噪全球。

香港经济繁荣的原因

香港经济的发展，在短短的 10 年间，经历了传统转口贸易港——工业城市——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 3 大发展阶段。我们在认识香港经济成就的同时，更希望探索香港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原因，以保持长期的稳定和繁荣。同时，也希望从中获得对中国内地社会经济发展有益的借鉴。

1. 地理条件

香港位于中国东南海岸、珠江出海口之东，大致介于深圳河以南，北纬 22° 09' 以北，东经 113° 30' 之间。它北连中国大陆，南邻东南亚，东濒太平洋，西通印度洋，地处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有利的时差区内，为东西半球及南北交往的交汇点。有利的地理位置则使香港与纽约、伦敦连接成全球 24 小时的金融市场。横跨深圳河的罗湖桥以及文锦渡、沙头角、落马洲（皇岗）等陆路交通口岸，通往蛇口、盐田等地的水上交通，把香港与深圳紧密地连结起来，使香港变成国际经济与中国内地联系的重要桥梁。维多利亚港水深港阔，风恬浪静，终年不冻，为世界上最优良的三大天然深水港之一。吃水 12 米的远洋轮船可以自由进出。面积达 6000 公顷的海港可以同时停泊 150 多艘万吨级轮船。在九龙湾畔填海而成的启德国际机场，维多利亚港和葵涌货柜码头，以及遍布于新界、九龙、港岛上的陆上运输系统，形成了香港完整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使香港成为世界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和中国南方对外交通的门户。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一直是香港营造自由港，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因素。

2. 历史机遇

有利的国际环境与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为香港的经济起飞提供了重要的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导致了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高速增长时期。在这场经济结构的转变中，它们逐步放弃了轻纺等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工业部门，因而在世界经济结构中产生了“空档”，正好为香港等发展中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50 年代香港制造业的起步首先就是以劳动密集型的成衣，纺织业为先驱的，并先后在欧美等国开辟市场，奠定了出口导向工业的基础。另一方面，20 世纪 40 年代末，中国内地工商界特别是上海、广州等地的部分厂家，因内地局势的变动而转移到香港设厂生产。同时，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人才。据估计，1946~1950 年间，以商品、有价证券、黄金和外币等形式从中国内地流入香港的金额达 5 亿美元。在 1949 年第一季度申请登记设厂的工厂中，约有 60% 是从中国内地迁港的。

在亚大地区，则由于先后爆发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东南亚的局势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动荡之中，而香港则相对较为稳定，因而大量的资金流入香港。据统计，在 50 年代流入香港的 30 亿元资金中，来自东南亚地区的便超过 10 亿元。大量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的流人为香港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朝鲜战争和对华禁运使以转口贸易为主的香港经济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同时也迫使香港充分利用已有的资金、市场、技术和管理人才等条件，在 50 年代的短短 8、9 年间，将香港经济从传统的转口贸易港时期转向工业化时期。从 60~70 年代开始，英、美、日本等国家又竞相利用香港，在大量投资香港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方法。这些都是香港经济起飞的有利因素。

3. 中国因素

长期以来，中国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对香港都有直接与间接的作用和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照顾有关方面的利益，从政治上稳定香港，在经济上支持香港。在政治上，中英两国的关系相对来说，在较长的时期内也是比较友好的，这对于香港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投资环境是相当重要的。40 多年来，香港除了 1967 年曾有过短暂的波动外，政局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强大的中国在东方的崛起，其本身就是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地位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依托和保障，使香港从祖国在不同时期对它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政策中取得多种优势。中国政府关于“一国两制”方针的制定，以及 1984 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正式签订，更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经济上，内地一直以比较优惠的价格向香港提供大量的主食、副食、日用品、工业原料、燃料以至食用水等，使香港能够长期保持相对稳定，能够保持一个较好的投资环境。而香港的青壮年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人才也有大量来自中国内地。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仅来自内地的移民便超过 100 万。内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为香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1978 年香港与内地的双边贸易额为 108.45 亿元，1992 年达到 6284.12 亿元，14 年间增长了 57 倍，平均每年递增 33.7%。1993 年便达到 7400.89 亿元，比 1992 年增长了 17.8%，中国内地在香港的贸易比重中已达到 34.93%，内地已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近年香港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讲主要是中国因素直接作用的结果。国际上视香港为最具活力的地区、世界最佳商业城市、最有希望的经济地区，总是以其是国际经济界进入目前经济发展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中国的主要途径为理由的。中国因素对香港的外贸、金融、制造业、房地产建筑、航运、旅游等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贡献。

4. 内部机制

香港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除了上述三种因素之外，还有其内在的机制在起重要作用。其中包括——

（1）香港政府的经济政策。

香港经济成功运作，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英当局所制订的一系列适应香港实际情况的经济政策。香港是远离英国本土的“殖民地”，港英当局采取较为自由的地区性经济政策，不致于引起英国本土经济的动荡。采取较为保守的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不致于增大英国的财政负担。香港经济是一种

属于海岛城市型的经济，宜于实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英占香港后不久，即宣布香港为自由港。从本世纪 70 年代起，香港政府在经济上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即以积极的态度坚持不干预主义，依靠市场调节以求得经济的稳定增长，又在市场自由调节失灵、严重损害公众利益时进行必要的直接或间接干预。目前，香港只对油类、酒类、甲醇和烟草四类货品征收关税，以及征收汽车首次进口登记税，实行贸易自由政策；取消外汇管制，资金、黄金进出自由，货币兑换自由；企业经营自由，竞争自由，人员流动比较自由；采取审慎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实行简单而低税率的税制；采取“接受外资，繁荣香港”的方针，大力引进外资等等。香港政策在经营管理上的高效率与少干预，既使香港原有的各种与经济运作有关的有利因素得到较好的发挥，也使若干不利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化解。

（2）香港居民的勤奋努力与聪明才智。

在香港的 602 万人口中，中国人约占 97%，他们保持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刻苦耐劳、勤奋拼搏的优良传统与聪明才智，灵活应变，善于捕捉机遇，植根香港，建设香港。香港居民中的大多数来自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海外关系比较密切。他们中既有技术水平较高的普通劳动大众，又有经营丰富、技术精良、善于经营的工商业家、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他们多数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善于与外商共事合作，共同拓展香港的经济。不论是原有的香港居民，或后来移居香港的内地人士，以及在港的其他国籍人士，都在不同程度上为香港经济的繁荣作出可贵的贡献。

（3）相对健全的立法、司法制度。

香港实行司法独立，保障个人在法律容许范围内的自由权利。在香港，法院的审理和仲裁制度、律师制度都较为完备，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和程度，包括一系列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同时，政府多数公务员和市场都养成一定的法制观念，形成遵法、守法的文化和习惯，营造了一个法治社会的较为良好的气氛。在香港的 500 多章成文法中，约有 40% 直接与经济活动有关，而且多数能与国际惯例接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香港这样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提供了自由竞争且有法可依的经济大环境，这对保持香港经济的繁荣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4）比较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

香港政府虽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不多，但对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颇为重视。近几十年来，香港在海港建设、航海运输、航空运输、陆地交通、邮电通讯、水电供应、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公共住宅等方面，都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其现代化水平在亚洲甚至世界上，都是屈指可数的。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对于保持香港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稳定发展，对于吸引外来的投资，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

促使香港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原因，实际上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其中既有外因，又有内因；有人为的努力，也有历史的背景与机遇。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人们在探讨其繁荣机制的同时，也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当然，香港经济也有它的忧患和弊端，在其繁荣的背后，同样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和局限性，面临一系列的困难与挑战。香港的经济结构已向以金融等服务业为中心的方向转移。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但是，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财政区域，经济上过份依赖外部条件，将经不起世界经济波浪

的冲击。香港经济属于海岛型经济，对外贸易是香港经济的生命线，其外贸依存度高于美国、日本等经济大国，而在港产品出口的市场构成中，欧美市场一直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香港对欧美市场存在严重依赖，因而当欧美市场出现疲软或萧条时，当外国采取有关的贸易政策时，都会对香港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已对香港经济构成直接的威胁，香港内部存在的众多抑制经济发展的因素日益突出。经营成本高，经济地域狭小，人口渐趋老化，近年更出现劳工短缺。港府官方对香港经济的转型与高科技产业的支持不力。香港制造业自进入 80 年代以后，未能从整体上更快地由劳动密集型走向技术、资本密集型，并以新的态势参与国际分工。香港的通货膨胀率较高，特别是住宅楼价格不断攀升，已对居民造成极大的压力。这一切都困扰着香港经济的发展。

敢拿香港作赌

众所周知，香港不仅是一个自由港，而且是东亚重要的金融中心，作为欧洲和亚洲金融市场的“中途岛”，在国际金融业中起着枢纽作用，其金融地位排名纽约和伦敦之后，居世界第三。此外，它还是一个现代化的制造业基地。其重要性还远远不止于此，对于内地而言，香港还是未来带动其经济腾飞的“龙头”。过去十多年间，香港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第二大金融期货市场。与韩国、新加坡、台湾和泰国有所不同的是香港没有经过进口替代型经济发展阶段，而是直接发展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其产业主要以外向型贸易为主，独特的自由开放经济体制以及港英当局在经济决策、管理上执行的“积极的不干预主义”和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外汇、自由企业经营、自由劳动力市场，也为香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保证。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协作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贸易、招商引资、合资办厂等方面均有了大幅度提高。1985 年以来，内地已上升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同时香港也成为内地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据透露，内地 75% 的外资项目来自香港。因而从长远来看，如果内地需要继续不断吸引外资，就不能缺少香港这一“龙头”。反之香港若要在远东保持其经济优势就必须与祖国的发展携手并进。事实证明，香港经济可以远离英伦三岛，却不能离开“中国因素”，香港与内地的政治和经济依存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香港对内地的直接影响，首先表现在香港加速了珠江三角洲和南粤地区工业化进程，使南粤地区提前进入工业化进程，使南粤地区提前进入产业转型阶段。在历史上，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一直有着广泛联系，除地缘外，双方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经济模式、生活观念。50 年代后这些联系被人为地割断了，1979 年之前，香港、澳门和珠江三角洲分属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双方生产、体制、观念都有较大差异，同步发展已不可能。香港的崛起和中国的开放是促进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同步趋势的首要条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亚洲时代到来之际，这种发展与历史上相比又有了质的飞跃。

在金融方面，“中国因素”原本在香港股市中影响甚小，近年来却迅速增加，红筹股、中国概念股、H 股增加很快；1993 年有 9 个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占股市的 6%，来头颇猛，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资股总值将跃升到全港股市总值的 15%。在投资方面，十多年里广东向香港筹集了 9366 亿美

元资金，目前香港和澳门是南粤地区资金的主要源流。深圳、珠海等特区与香港经过多年合作，已初步达成了金融运作的沟通共识。大陆在香港开设银行，下设 14 家银行 366 家支行，员工近 2 万人。

1991 年香港东亚银行、华侨商业银行也分别在厦门、汕头等地开设分行。据悉，最近又有一批香港银行获准在上海、北京等地开设分行。

1994 年 1 月 1 日，人民币官价汇率的并轨，也促成了双边金融领域的合作，将有利于港商来内地投资、旅游，有利于加强资金核算。在工业方面，香港和澳门一直是广东省的最大市场，广东每年通过港澳的出口额占广东省总产值的 18%；港商在广东投资 90 多亿美元兴办了各种企业 25000 家，雇佣大陆劳工 300 余万人，相当于香港制造业工人的 5 倍，仅此一项每年即可节约工资 1650 亿港元，从而使香港产品成本降低，国际竞争能力提高。1978 年中国沿海地区在港资的投资下，兴办了一批出口加工型企业，由于发挥了沿海特区优惠政策和港、澳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企业发展很快，工业制成品所占比例有明显提高，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工业进程大大加快。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沿海地区利用地理优势与香港、台湾进行了大规模的资金和技术交流，为配合内地产业政策调整在资金和技术上作了准备。1991 年深圳同外商签订的 900 项合同中，大多是同香港台作的，估计高新技术项目约 300 个。在贸易方面，香港和澳门每年从广东等沿海省市输入商品 200 多亿美元，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也从香港进口商品。在旅游业中，越来越多的旅客来自内地，据香港旅游协会最近披露，1993 年来港旅客 893.75 亿万人次，其中内地 173 万人次，占第二位（略低于台湾），但增幅最大，比 1992 年上升 50.8%，1994 年内地旅客总和增幅都跃居首位，预计增幅还将更大。与此同时，深圳、香港两地还进行了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沟通。

1997 年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基本法》的通过使香港地位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中国政府明确保证维持香港原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 50 年不变，香港正处于过渡期。

从全球角度来看，亚洲国家的崛起使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东移至太平洋区域。而香港正处于沟通欧美与亚洲两大经济区的焦点，位置极其特殊。在环太平洋地区崛起的同时，一方面香港制造业和金融业会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在中国内地经济后备力的推动下，通过对产业多元化的进一步努力，将使香港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级大都会。

（1）金融业

环太平洋地区的崛起，使日资和合资打破了长期以来英资和美资的垄断局面。世界经济中心东移，促进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间的交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大幅度提高，1983 年美国同太平洋（地区）国家地区的贸易额比欧洲高出 289 亿美元，这是经济中心东移的最初苗头。与此同时，金融业也向太平洋地区扩展推移。美、日等强国都加强了在香港的角逐。目前香港的美元成交额为 20 多亿美元，日元交易仅次于东京居第二位，而马克成交额则占整个东南亚地区的 50%。香港金融界经过 1973 年股市狂潮、1979~1981 年的地产危机和 1982~1983 年港元危机的教训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港英当局对金融业实行三级制和指导性利率后，对金融业的管理能力有所加强。无可质疑，香港经济的外向型及其广泛的国际联系一直是维系并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主要支点。有利的国际环境则是促使香港逐渐走向国际金融中心的优越条件之一，对东亚

特别是中国内地金融起着稳定性作用。

(2) 制造业

过去，制造业居香港产业的主导地位。20多年前，香港劳动力、智力和财力多集中在纺织、服装、玩具、原材料加工等劳动密集型部门。经过多次产业调整，局面发生了变化。在今天，电子、精密仪器、通讯设备、机械制造、深度加工、地产、金融业已成为吸引智力和资金的主要行业。据统计，60年代末香港电子电机产品产值仅占总产值的1.42%，70年代初则已逾17%。这一质的变化为香港70年代后期的技术升级和更新换代奠定了基础。1979年香港“经济多元咨询委员会”曾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香港工业政策的重点将放在促进“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高度技艺型”转变上。这一结论性报告基本道出了香港以金融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特点。

(3) 外贸

至1993年底，香港向内地转移的资金额已超过200亿美元，与往年同期相比呈上升趋势。香港一直有着同美洲、欧洲、澳大利亚、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广泛交往，对发展香港的对外贸易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过去十年间，香港出口值始终占生产总值的75%以上，1985年曾一度突破90%。以前香港进出口的对象主要是欧、美、日等国，中国内地在其进出口贸易中仅占次要地位。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以及香港推行多元化外贸政策，双边贸易关系有所加强。1988年香港对内地出口总额2885.7亿港元，占总出口值的29.1%，超过对美国的出口，对日本、德国、英国的出口额都不足总出口额的6%。同年香港从内地进口1556.3亿港元，占香港总进口额的32%，居各国之冠。据测算，1979~1988年十年间，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值平均每年以39.9%的速度递增。同时，内地是香港转口货物最大的来源地，香港每年从中获利近百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颇大比例。与十年前相比，经香港转口的贸易额猛增了117倍。香港对内地的转口贸易增长速度，曾经超过本地产品的出口。研究1992~1993年亚大国家贸易资料就会发现，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东盟国家出口纷纷下降的形势下，唯独香港的贸易额持续上升，其原因就在于香港加强了同内地的贸易伙伴关系，这不能不说近年来香港多元化外贸政策的调整和中国的外国开放政策有直接关系。当然这一态势能否保持，能保持多久都很难说。但从香港拥有新加坡、韩国、台湾更为广阔市场——中国内地这一着眼点来说，双方密切关系必然会进一步加强。

虽说“九七”政权交接对于中英双方均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并且其结果对内地和香港的经济有何影响还一时难以揣测，但从目前双方的经济形势来看，还看不出导致双方经济出现大波动的明显迹象。根据以往多年一贯的经济形势预测，在“九七”后，如果政治比较稳定，双方的贸易还将持续上升。内地继续开放不但会有利于自身的发展，也会刺激香港在许多领域的进步。

内地与香港经济交往之深，合作之广，可说是唇齿相依、血肉相连。去年中国30%~40%的外汇收入是从香港直接或间接得到的，中国在香港的投资额已超过美国。因而保持内地与香港的共同繁荣，加强双边经济往来不但是互惠互利的，而且也是双方共同的需求。内地能够充分利用香港在国际经济中享有的威望，开辟通往西欧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香港这一“中途岛”，加强和台湾的合作。而对于香港，好处也是多方面的：

(1) 香港可以内地为依托, 增强在国际中的政治、经济地位。香港是一个以进出口为主导的地区, 地域狭窄, 本地市场狭小, 生产原料依靠进口, 产品销售依靠出口。中国的对外开放, 对香港是十分有利的。香港可以充分利用内地广阔的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 仅从运输上就可以节省大批开支, 同时由于有内地的原料供给, 可使生产周期大为缩短。

(2) 内地整体经济实力和巨大的经济潜力有助于稳定香港的经济和金融。东京作为亚太地区金融中心之一, 在其强大经济实力的保证下, 日益紧逼香港; 刚刚崛起的新兴工业国新加坡亦野心勃勃, 欲取香港而代之。若香港和内地的经济能发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则香港自身的经济 and 金融地位也就越加稳固。若今后和台湾、澳门等地有机结合, 则其发展更不可估量。

(3) 香港可凭借内地的科技力量, 实现产业升级。内地的科技发展较快, 有不少尖端产品, 却苦于没有充足的经费和使科技产品化的相应体制。而香港的企业又多属中小型企业, 多数无尖端开发机构, 香港可以利用内地的开发机构, 实现产业升级, 因而双方都存在着合作的基础。

香港经济是成功的, 但目前也存在某些问题和隐忧。

(1) 过分依赖主融

金融是香港经济成功主要支柱, 但也可能成为导致产业发展不平衡的要求因素。在金融和贸易极端发达的形势下, 香港许多传统行业逐渐萎缩, 近期毫无再度复兴的可能。香港金融与美国、日本和欧洲金融相比, 有一明显的不利, 那就是香港并没有与其金融实力相匹配的经济基础, 其金融的发达主要是由于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造成的, 在东亚整体经济实力和亚洲国家间直接交往发展到密切阶段时, 这种优势必然受到削弱。

(2) 贸易优势正在消失

香港的贸易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极大, 尤其是转口贸易更显重要。香港对东南亚和中国内地展开的广泛的贸易活动是其崛起的保证。可是伴随着南亚国家同西方的往来日益频繁, 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老对手的新加坡, 处于马六甲海峡之滨, 扼太平洋到印度洋要道, 控东西方之咽喉, 地理位置同样优越。1985 年其对外贸易额猛增至 675.2 亿美元。1990 年则已突破 1200 亿美元, 按这样的发展势头计算, 不久的将来就有超越香港的可能。另外, 由于过去大陆和台湾的紧张关系, 海峡两岸的联系需要通过香港起中介作用。随着两端关系的好转, 双方也逐渐可以自由通商。因此随着东方国家经济的日新月异, 西方和东亚的贸易还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依靠香港中转, 还很难说。

(3) 制造业所面临的挑战

西方国家需要优质产品, 可以向日本、美国和西欧购买; 而亚洲国家正在崛起, 也极力要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 不会象过去那样大量进口香港产品。尤其是新加坡、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工业迅速崛起, 也为落后国家进口产品提供了多方面的选择。70 年代初, 韩国制造业还很落后, 可是 20 年后的今天, 韩国的造船能力已位居世界第二, 拥有 100 万吨级的船坞 1 座, 70 万吨级的船坞 2 座。韩国汽车年产量超过 200 万辆, 今年可望达到 240 万辆, 本世纪很有可能跻身于世界汽车工业五强。在电子技术方面, 韩国已继美国和日本之后, 成为第三个能制造一兆位记忆晶片的国家, 预计到 1995 年韩国还将拥有自己的通讯卫星。和香港一样, 70 年代以前新加坡也采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模式。可是到 80 年代中期, 电子业已成为支柱性产

业，1993年新加坡电子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40%以上，个人电脑、各种软件、集成电路和磁片多销往欧美。台湾也利用美国的援助，大力发展民用科技，建立了以新竹为核心的科技园，到目前为止，园内共有电脑及相关企业37家，半导体集成电路企业31家，通讯设备企业18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不能不说是香港制造行业的一大威胁。

总之，香港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依赖于稳定的政治局面和有效的经济政策。“九七”香港的顺利回归和“九七”前后香港经济的稳定繁荣，将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

十七 跃出地平线的中亚

中亚五国，在海路开通之前，是东西交通和商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东西文化接触和传播的通道，素有“世界文明十字路口”之美誉。广阔的土地、重要的地理位置、迅速增长的人口，使之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区域。

中亚五国独立以来对外经济关系

中亚五国独立以来，凭借自身的重要战略地位、雄厚的自然资源和潜在的经济实力，在加速国内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也打开国门，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拓展国际经济活动空间，把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以改变其在工业和技术等方面处于落后地位的状况。

1. 独立之初，就确立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

五国在各自改革纲领中，均将发展对外关系置于重要地位。哈萨克、乌兹别克等国领导人频频出访东西方主要国家，争取在国际上树立全面开放的形象，并为战略思想的实施创造有利国际条件。

2. 积极制定了有关对外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政策法规

这些政策和法规大体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旨在争取对外经济关系独立自主的法规和政策。二是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提供基本准则和依据的法律，如《对外经济活动基本原则法》。三是以优惠条件为核心的具体法规和政策，如《外国投资法》、《自由经济区法》、《外汇调节法》等。这些国家的投资法规大大简化了外商办理投资业务程序，扩大投资范围和外商投资权利，保障外商利益，并在税收、房地产、利润汇出等方面提供广泛优惠条件。如哈萨克斯坦在其《外国投资法》中，允许外国投资者向任何领域，以任何形式投资；投资利润可以外汇自由汇出，也可自由进行再投资；外国投资者在企业中投资份额只要高于 30%，在获利后五年内免税，再五年按税率的 50% 课征；用于慈善目的的支出，可从利润中扣除等等。近来，针对对外经济关系中，特别是对外贸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亚五国又先后制定了一些调节性法规，力求以法律手段调节对外经济关系发展。

3. 积极参与国际多边经济组织活动

中亚五国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开发银行的成员国。参加国际多边经济组织，有利于中亚各国扩大影响，争取外援，把国内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系。

4. 参与区域经济合作

一是中亚五国内部经济合作。早在 1992 年 4 月，五国领导人就在比什凯克聚会，提出五国应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建立密切合作的新关系；1993 初，五国首脑又在塔什干会晤，就进一步加强相互间全面合作及建立统一的中亚市场等主要问题进行了商讨，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建立“中亚人民联盟”；1994 年 1 月，乌兹别克与哈萨克又签署了建立统一经济区的条

约。二是五国在独联体范围内同前苏联国家的合作。这个层次的合资，涉及对外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至今仍为中亚五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最主要部分。三是中西亚经济合作，特别是同土耳其、伊朗之间的合作。其成果是建立了“黑海经济合作区”、“黑海合作区”、“经济合作组织”等区域性经济组织。四是同周边国家，特别是同中国的贸易与经济技术合作迅速发展。

5. 重视改善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条欧亚大陆桥的贯通，进一步提高了中亚五国的战略地位，也为中亚五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提供了新机遇。中亚五国已准备联合改造哈萨克至中国的铁路口岸站。中亚国家还同乌克兰等国联合倡导开辟欧亚公路大陆桥。土库曼正与伊朗合作修筑全长 300 公里的土伊铁路。日本三菱公司已同土库曼签订了修建输油管道的意向性协议，计划铺设一条全长 6700 公里的输油管道，将土库曼的天然气输往日本。这一切无疑将有助于打破中亚五国深居内陆，缺少出海口的限制，为其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提供物资基础。

6. 全方位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战略的贯彻已取得一些实效

首先，对外贸易从过去完全依附于前苏联市场，逐步转向独立自主，实现市场多元化。如乌兹别克过去几乎只与前苏联有贸易关系，现在已同世界上百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产品出口到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哈萨克同 56 个国家建立了对外业务。各国贸易地位也有所改善，1993 年，土库曼、哈萨克、乌兹别克均为出超。仅 1993 年上半年，哈萨克的贸易顺差就达 5 亿美元。其次是中亚五国的经济潜力已引起国际投资者关注，吸引和利用外资取得进展。到 1993 年 9 月，哈萨克境内已有合资企业 1140 家；同年 4 月，哈和美国“谢夫隆”石油公司建立联合开发田吉兹大油田的石油合资企业，合同期为 40 年，总投资 200 亿美元。这是目前独联体内最大的一家合资企业。截止 1993 年底，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境内的合资企业数目分别为 900 家、154 家、400 家。1993 年底，哈萨克政府分别向美国、日本、德国、土耳其、俄罗斯、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提出资金援助要求，已有 26 个国家在 1994 年内向哈萨克提供了总额达 13 亿多美元的贷款和援助许诺。这些贷款利率为 2.99% 到 7.5% 不等，期限为 20 至 25 年。再次，同各国经济技术合作取得明显进展。中亚五国同俄罗斯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在经历一段曲折和低潮后，已出现回升趋势；同中国的贸易与合作进展更为迅速，到 1992 年，中国已成为中亚五国除独联体外第一大贸易伙伴，当年哈萨克同中国的贸易额占该国外贸总额的 40% 左右；同美、日、欧等西方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关于鼓励和保护投资及贸易合作协议。最后，中亚五国的对外经济活动，特别是对外贸易规则，正在逐步向国际通行惯例靠拢。过去独联体内各国往往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优惠价格相互供货。各成员国既想使自己的产品高价售出，又想从别国低价输入。现在，参照国际市场价格定价和供货的贸易形式逐步在独联体国家盛行起来。

但是，从总体上看，中亚五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处在起步阶段，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利地位尚未得到根本改善。这是因为：第一，中亚五国潜在经济实力不可低估，但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处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之列，产业结构畸形落后，生产技术陈旧，高科技力量薄弱；吉尔吉斯、哈萨克两国推行激进改革方针，导致生产连年大幅度下降；塔吉克国内政局动

荡，经济也每况愈下。乌兹别克和土库曼虽然政局稳定，经济情况尚好，但经济体制转轨速度缓慢。这种状况，使中亚五国在激烈竞争的国际经济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以对外贸易为例，面积相当于日本的一半，人口约 440 万的吉尔吉斯，除了稀有金属、硅、烟草之外，没有什么重头出口产品，而石油和天然气全靠进口。它是个农业国，但畜牧业比重大，不仅工业制品，连粮食也需要进口。所以，对外贸易大幅度入超。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虽为出超，但出口商品基本上是初级产品。第二，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严重依赖和受制于俄罗斯，对外经济活动自主权尚未在实质上得到保障。第三，政策多变，政治不稳定因素逐步增加，使许多外国投资者裹足不前。第四，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程度、政府与企业管理水平，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都不能适应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需要，办事效率低，法律观念淡薄，经常出现违反合同现象，使许多经济技术合作项目难以顺利落实。

制约中亚五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因素

1. 自然条件是制约中亚五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前提因素

中亚五国的自然条件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深居内陆。五国位居欧亚大陆中心，四周大陆环抱，没有出海口，远离世界主要市场和主要经济中心。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必需首先借道邻国。因此运输成本高，受制于同周边邻国的政治关系。二是幅员广阔，人口稀少。五国平均人口密度仅为 14.4 人/平方公里。劳动力不足，国内市场相对狭小。三是资源富饶，但分布不均。哈萨克素有原苏联自然仓库之称，其铜、铬、铅和镍的蕴藏量居原苏联首位，磷钙石储量仅次于俄罗斯而占前苏联的第二位，但水资源匮乏。吉尔吉斯的汞、锑储量与产量均居原苏联首位，水力资源居第三位，但其领土的 90% 为 1500 米以上的贫脊山地；塔吉克的铀矿储量居原苏联之首，水力资源占第二位，但其山地占 93%，其领土 50% 在海拔 3000 米以上。乌兹别克的黄金占原苏联第一位，是重要的铀矿基地，但缺铁矿。这种资源禀赋，一方面使中亚五国在经济发展上具有巨大潜力，对外国投资者有巨大吸引力，同时也要求五国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

2. 经济现状是制约中亚五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因素

如前所述，中亚五国处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之列；产业以能源、原材料、矿业及农业为主，结构单一，经济自给率一般只有 30~50%；五国的经济基础设施基本上以俄罗斯为中心，铁路、公路运输较为发达，但运输效率和通讯技术水平很低（如通讯技术仍主要采用模拟传输技术，数字与光纤技术仅占 8%）；自独立以来经济业绩表现不一，如 1993 年，工业总产值吉尔吉斯下降 25%，哈萨克下降 13%，塔吉克由于战乱，经济临近崩溃。只有土库曼和乌兹别克去年经济开始好转，但增长幅度不大。各国赤字严重，外债增加，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

3. 国家利益是制约中亚五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核心因素

国家利益包括领土主权完整安全和经济发展。中亚五国都是新独立的国家，在主权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十分敏感。目前，其经济上受制于俄罗斯，又毗邻动荡的西亚和南亚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国内

市场狭小，国际市场遥远，与前苏联各国的分工协作关系紊乱。如何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逐步调整和摆脱上述不利条件，巩固和发展国内经济，保障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而使来之不易的独立权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上巩固下来，是中亚五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问题。

4. 历史遗产是制约中亚五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

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原苏联留给中亚五国的历史遗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五国同前苏联各国，特别是俄罗斯之间，在经济上存在广泛的相互依存关系。据估计，俄罗斯每减少10%的石油天然气制品供应量，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国民收入就会相应减少3~5%，而吉尔吉斯、塔吉克的国民收入就会减少7~9%。中亚地区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斯坦，市场上工业品的70%是从俄罗斯进口的，而其主要产品粮食、煤、铜、铅、锌、铬等矿产，也大多出口到俄罗斯。这种经济依存性还表现在基础设施方面。以哈萨克为例，其南部电网与俄罗斯相连，北部电网与前苏联南部各共和国相联，南北分离，没能形成统一的电力输送和配电网。实际上，运输和通讯系统，将哈俄两国联为一体。中亚各国的输油管线也大多数经过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二是各民族杂居，俄罗斯族的技术与管理人员成为中亚各国人力资源中的骨干。如俄罗斯族在哈萨克占37.8%，在吉尔吉斯占21.5%，在土库曼占9.5%等。俄罗斯族由于历史原因，在中亚五国的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传统关系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改变。

5. 国内经济政治制度最终走向及国际环境变迁，也是制约中亚五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因素之一

向市场经济转轨，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是中亚五国的基本趋势。但到底采用何种经济模式，以及以什么方式过渡，似乎并不确定，吉尔吉斯和哈萨克倾向于以激进的方式过渡到市场经济；而土库曼与乌兹别克斯坦则强调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渐进的方式过渡。上述差别，必然制约着对外经济关系在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从外部国际环境看，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独联体的发展，伊朗、土耳其对中亚的政策，西方国家外交战略的变迁，都将对中亚五国产生重要影响。

中亚五国对外经济关系未来走向估计

1. 对外开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总趋势不可逆转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和竞争的世界。各国经验表明，不对外开放，不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与世隔绝，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必然是呆滞、落后的。中亚五国独立以后，面临着改变原料、农业生产国地位，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双重任务。五国都认识到，依托资源和战略要地优势，加入世界经济，寻找新的市场和出海口，全方位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2. 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根本目的是引进短缺资源，促进本国发展，争取实现经济独立

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加强国际合作，说到底是为了吸引外资，引进技术，

发展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改善经济结构，把原材料生产国变为工业成品生产国，推动经济发展，谋求经济独立。为了引进短缺资源，就必须以本国丰裕资源参与国际分工，以换取短缺资源。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中亚五国在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将处于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资金技术设备的不利地位。这个过程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同于其原来前苏联内的分工，那是一种凝固化的旨在发展中亚五国初级产品生产的分工。而现在出口初级产品的目的在于引进短缺资源，最终摆脱初级产品生产国地位。

3. 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范围将是全方位的

这里所说的全方位，一是指贸易、金融、投资和分工合作等一切领域，二是指地域上的概念。这里仅就后者作一些估计。

首先，发展同以俄罗斯为核心的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关系将被置于优先地位。中亚国家同俄罗斯的经济关系正常化，是中亚五国经济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关键条件之一。中亚五国 5000 多万人口中，俄罗斯人有 1000 多万，而且大多为工厂、企业的业务骨干和熟练工人，是中亚经济发展中的宝贵财富。由于经济结构单一，经济自给率低，中亚五国在经济上对俄罗斯的依赖很高，大量机器设备、零部件和日用消费品必须经俄罗斯进口，而能源、原材料也主要出口到俄罗斯。俄罗斯在教育、科技、工业化程度、经济发展层次上比中亚五国高得多。短期内中亚五国同俄罗斯经济关系的暂时曲折和低落，不可能割断和否定它们之间的客观依存关系。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中亚五国同俄罗斯的经济关系必将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恢复和发展。

其次，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西欧、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是当今世界资金和先进技术的主要供给源。中亚五国把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重心逐步持向西方发达国家，是必然的。另一方面，西方跨国公司也看好中亚的战略地位，西方和俄罗斯对之通过发展经济关系展开争夺是势所必然。但由于俄罗斯本身是中亚五国在引进资金、技术上的竞争者，因此，在近中期内，在经济争夺战中，西方无疑将占上风。中亚五国将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发展同西方的经济关系来弥补同俄罗斯经济关系低落所造成的空白。

再次，中亚五国将高度重视发展同东亚、东南亚等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亚太地区既是先进工艺的地区，又是可能成为大规模投资的地区，还是中亚未来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吸引劳动力的市场。中国内地、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中小工业在国际上有独特的优势，它具有工艺先进、门类齐全、资金雄厚，竞争力强等特点。东亚、东南亚国家对中亚市场也有极大兴趣。韩国、日本等国企业，已捷足先登，欲抢先占领中亚市场。东南亚国家也计划开辟从马来西亚经中国的云、贵、川、新疆到中亚的第三条欧亚大陆桥，以发展同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

4. 发展中西亚经济合作将是中亚五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必要环节

中、西亚经济合作的基础，一是地缘优势。中亚五国地处封闭的欧亚大陆中间，寻找通往地中海东岸、波斯湾或印度洋的出海口岸，发展途径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的铁路、公路、管道，是势所必然。二是民族认同感。共同的历史、宗教和语言是重要的心理纽带。三是经济上一定程度的互补性。中亚五国有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粮、棉、畜牧业资源，有开采矿业、电

力、机械制造等方面的技术。西亚国家则有轻工、食品及开发油田及石油中下游部门的一些技术，也有一定资金积累。四是经济发展模式上的认同。中亚国家对土耳其步子谨慎的经济政策、政教分离的政治结构和保持与西方良好关系的战略颇感兴趣。“土耳其发展道路”一度成为中亚地区发展经济的口号。由于中西亚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发展同西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是中亚五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不可缺少的必要一环。

5. 中亚五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也是中亚五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

不过，由于中亚五国各自经济实力很弱，共同力量有限，相互间切实的援助又力不从心，所以，这种经济合作深度、广度和效果将是十分有限的。但由于五国在许多方面面临共同任务和难题，在资源禀赋及经济结构上有一定互补性，故而相互间的经济合作将会逐渐发展和深化，不能排除在中远期内形成一个新经济联盟的可能性。

中亚五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五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根本目的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它们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客观条件。虽然五国拥有资源优势，但地处内陆，加上国内制度转换、不稳定因素逐步增加，政策不连续等因素，很可能使它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外部环境看，美俄等大国及伊斯兰势力的渗透，必将给中亚五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增加困难和不确定因素。

